

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四卷)

本书编委会 编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四卷) 本书编委会 编
武汉: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7 月
ISBN 7-5609-2253-8

. 中...
. 本...
. 人文科学-中国-高等学校-文集
. C53

本书特别服务专线
电 话: (027) 87540030-402
电子信箱: jimmyhsia@etang.com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四卷)

本书编委会 编

责任编辑: 夏增民
责任校对: 郭有林

封面设计: 刘 卉
责任监印: 张正林

出版发行: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武昌喻家山 邮编: 430074 电话: (027) 87545012

经销: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录排: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照排室

印刷: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3.875

插页: 3

字数: 290 000

版次: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00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 001—20 000

ISBN 7-5609-2253-8/C·48

定价: 17.5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四卷简介

世纪之交,素质教育成为中国社会的热门话题。以文化素质教育为切入点,全面推进高等学校素质教育工作,已成为高等教育界的共识。五年来的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为高等学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做了必要的理论准备和实践探索。本书作为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成果之一,希望能对全面提高大学生乃至整个国民的综合素质有所助益。

本卷共收有 30 篇演讲稿。按内容分为:哲学与科学、传统与现代、素质与成才、文学与艺术、经济与社会等五个部分。另有“人文访谈”一篇。

演讲者中有著名学者和艺术家:杨叔子、杜维明、张岂之、涂又光、费振刚、袁行霈、余秋雨、邓晓芒、王选、何继善、吴冠中、谢铁骊等。

目 录

素质·素质教育·文化素质教育(代序)

/ 周远清(教育部副部长)

/ 1

哲学与科学

道法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眼中的《老子》

/ 杨叔子(中国科学院院士 华中理工大学前校长) / 涂又光(华中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

/ 13

苏格拉底与孔子言说方式的比较

/ 邓晓芒(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

/ 32

思维科学的研究对象与体系结构

/ 钱学敏(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 50

天文历史年代学初论/ 江晓原(上海

交通大学科学史系教授 系主任)

/ 70

传统与现代

儒家人文精神与文明对话/ 杜维明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美国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士)

/ 85

- 20 世纪我国史学大师的创新精神
 / 张岂之(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教授 西北大学名誉校长) / 99
- 文化传统与现代阐释/ 张隆溪
 (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 / 113
- 搭建中华文化的第四座桥/ 余秋雨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 125
- 中国现代化的回顾及其他/ 郭世佑
 (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 / 135
- 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刘仲林
 (天津师范大学交叉科学研究所
 教授 所长) / 150

素质与成才

- 科学人文相融 爱国创新与共/ 杨叔子
 (中国科学院院士 华中理工大学前
 校长) / 163
- 知识创新呼唤当代中国青年/ 何继善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南工业大学前
 校长) / 184
- 为振兴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矢志奉献
 / 王选(北京大学教授 中国科学院、
 中国工程院、第三世界研究院院士) / 196
- 让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在地端上飘扬
 / 鄂栋臣(武汉测绘科技大学
 教授 党委副书记) / 205
- 读书与做人/ 陈赫(中南工业大学

应用系统研究所教授 所长)	/ 221
学习观念的变迁和学会发现知识 / 隋允康(美国纽约科学院院士 北京工业大学教授)	/ 238
文明本土化与大学/ 涂又光(华中理工 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	/ 248
继承与超越:/ 吴同瑞 (北京大学教授 副教务长)	/ 257
理纬文经织锦成:/ 吴硕贤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教授)	/ 271

文学与艺术

盛唐气象与盛唐时代/ 袁行霈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 283
《诗经》的经典性/ 费振刚(北京大学 中文系教授)	/ 294
中西美术比较谈/ 吴冠中(著名画家)	/ 307
电影艺术是一门综合艺术/ 谢铁骊 (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	/ 327
中国当代电视观念的沿革/ 胡智锋 (北京广播学院副教授 《现代传播》 副主编)	/ 338
音乐与人生/ 沈致隆(北京工商大学 化工学院教授)	/ 355

经济与社会

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 赵海英	
----------------	--

(香港大学博士)	/ 371
现代企业家的思维方式/ 陈建新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	/ 380
资源有限,创意无限/ 周冠雄	
(广东省顺德市北滘镇镇长)	/ 395
美国个人主义价值观透析/ 李其荣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 407
人文访谈	
游学谈——访华中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张良皋教授/ 饶传平 谢添 王沐	/ 425
后记	/ 436

素质·素质教育·文化素质教育(代序)

——关于高等教育思想观念改革的再思考

教育部副部长 周远清

世纪之交,党中央国务院主持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了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战略决策。最近,江泽民总书记《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不仅对当前教育中所存在的问题给予精辟而深刻的论述,而且对新世纪我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随着全教会及江总书记谈话精神的深入学习和贯彻,素质教育已成为各级各类教育普遍关注的焦点,也成为全社会共同关心的话题。

高等教育如何贯彻全教会精神,高等学校如何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应该说,经过几年来教育思想观念的探讨,以及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的开展,特别是通过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精神的深入学习和领会,方向已经明确,思路也已清晰,而且也初步形成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然而,真正要将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落实到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实际中,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明确。

一 关于素质

素质是在人的先天生理基础上,经过后天教育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由知识内化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心理品质。这是对“素质”一词经过几年来的探讨和实践,被大多数人普遍认

同的一种界定。这一界定对于人才培养来讲,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的意义。

首先,作为心理品质,这里所讲的“素质”有别于人的生理素质,不是先天的、生来就有的,它是通过教育和社会环境的影响逐步形成和发展的。也就是说,素质是教化的结果,是可以培养、造就和提高的。

其次,素质是知识内化和升华的结果,单纯具有知识不等于具备一定的素质,知识只是素质形成或提高的基础。没有知识作基础,素质的养成和提高便不具有必然性和目标性,但只具有丰富的知识并不等于具有较高的素质。

第三,素质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心理品质,由于它是知识积淀、内化的结果,因而它具有理性的特征,同时它又是潜在的,是通过外在形态(人的言行)来体现的,因此,素质相对持久地影响和左右着人对待外界和自身的态度。因而,也有专家将人才的素质概括为人对自然、对社会、对他人以及对自身的态度。

当然,并不因为素质的相对稳定性而断言素质一旦形成就是一成不变的,正如我们前面所言,它是可以培养、造就和提高的,因而它又会在外界的影响和冲击下,发生变化,有时可能是质的变化。从这一意义而言,人才的素质是稳定性和可变性的统一。

从高等教育的角度来看,人才素质应包括四个方面,即: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身体心理素质。也就是通过教育在这几个方面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心理品质。

二 关于素质教育

以提高人才素质作为重要内容和目的的教育就是素质教

育。

素质及素质教育观念的提出,使我们对人才、人才培养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从素质的观念出发,构成人才的基本要素可以概括为知识、能力、素质;人才的素质又可分为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其中思想道德素质是根本,是灵魂,文化素质是基础。这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新型人才观。从这一意义出发,在人才培养上,融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为一体,特别是应更加注重素质的提高,在提高素质中又以提高思想道德素质为根本,提高文化素质为基础,全面提高人才的整体素质,也就成为一种新型的人才培养观念,或称之为素质教育观念。素质教育,就是一种更加注重人才人文精神的养成和提高,重视人才人格的不断健全和完善,也就是说更加重视使学生学会“做人”的教育理念。

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的问题上,从重传授知识到重视培养能力直至注重提高素质,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教育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知识的传授,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培养能力的重要性,五六十年代在我国流传着一个著名的比喻,即给学生干粮不如给学生猎枪,这个比喻强调了培养能力的重要性。到了20世纪90年代,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在构成人才的要素中,有比知识、能力更为重要的东西存在,对于人才接受和获取知识、提高和发挥能力更具影响力的东西存在,或者说使人的知识和能力更好地发挥作用的東西存在,那就是“素质”,其核心就是一个人的为人之道,就是“做人”。

现实的存在已经证实了这样一个道理,具有丰富知识和较强能力的人,不一定就是具备了较高素质的人,换言之,只

有丰富的知识和较强的能力,而缺乏较高素质的人才不能称之为完善的或是健全的人才。从教育的角度而言,只注重知识的传授和能力的培养,而忽视人才素质的提高,不能算是完善的教育。由此可见,注重人才素质提高的教育思想观念的提出,在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重视传授知识到既重视传授知识又重视培养能力,是教育思想的一大突破;从重视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到重视传授知识、培养能力的同时,更加注重提高素质,是教育思想的又一大突破。

然而,我们并不由此推断,过去的教育,特别是以传授知识、培养能力为着眼点的教育体系或模式,对人才素质的提高就不产生影响或发挥作用。就一般意义而言,任何一种类型、模式或方式的教育对人才的心理品质即素质都会产生影响,“言传身教”、“教书育人”是可以体现于任何一种教育的。但值得指出的是,在素质的提高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教育中,教育本身对人才素质的提高所产生的影响带有不自觉性和不确定性,而只有当素质教育的思想观念提出以后,提高素质才成为教育的重要内容和明确目的。因而,加强或注重素质教育,可以说是教育思想观念上具有时代特征的一个重大突破。

素质教育思想所强调的,就是要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融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和提高素质为一体,或者说在传授知识、培养能力的同时,要更加注重素质的提高。正确处理好知识、能力与素质的关系,促进三者协调发展,是素质教育思想的关键所在。

高等教育是培养专门人才的专业教育。在高等教育领域倡导素质教育的思想,不是以一种教育代替另一种教育,也不是以素质教育取代专业教育,或者说不能将素质教育与专业

教育对立起来。因此,从素质教育的思想观念出发,高等教育应是更加注重人才素质提高的专业教育,因此,就高等教育而言,重视素质教育就应将素质教育的思想渗透到专业教育之中,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知识、能力、素质三者是素质教育中的三个要素,并且是相辅相成的,同时,在高等教育中贯彻素质教育的思想,传授知识、培养能力赋予了新的内涵,提出了新的要求,对现行的教学方法也提出了挑战。

知识是素质形成和提高的基础,没有相应的知识的武装,不可能内化和升华为更高的心理品格,从素质教育的思想出发,对传授给学生的知识除了专业的有关知识外,更应重视学生“为人”、“做人”所必备的知识,即相关的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的知识。

能力是素质的一种外在表现,所以培养学生什么样的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从全面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出发,更要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交往,与他人共处、共事、合作,即“做人”的能力。

素质与知识、能力密切相关,但素质是更深层次的东西,素质提高的过程也更加复杂,所以加强或注重素质教育,就要更加注重渗透性的教育、养成型的教育,更加注重受教育者的体验、内化过程,为此就应更加注重实践,包括社会实践。仅仅是表层知识的灌输和简单的说教是与素质教育背道而驰的。因此,素质教育要求教育方法的变革与更新。

从素质教育的思想来看,高质量的人才应是知识、能力、素质的高度和谐和完美统一。从人才培养的角度而言,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往往只解决如何做事,而提高素质则更多地解决如何做人的问题,只有将做事与做人有机地结合,即既要使

学生学会做事,又要使学生学会做人,才是理想的教育。因而我们认为,高等学校人才的培养目标应是: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较宽、能力强、素质高的专门人才。这与党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是完全一致的。

三 关于加强文化素质教育

1995年,针对当时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实际,我们提出在高等学校开展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并在全国部分高等学校进行试点。长期以来,我国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着一些偏颇与不足,其中人文教育薄弱尤其突出,针对这一状况,我们提出通过加强对大学生进行文、史、哲、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以提高全体大学生的审美情趣、文化品位、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这一设想在高校引起强烈反响,得到普遍的认同。

通过三年多的实践,试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为进一步推动这项工作的深入开展,我们采取了积极措施:制定了《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成立了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确定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建立若干个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并提出加强文化素质教育要实现“三提高”,即: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提高教师的文化素养,提高大学的文化品位与格调。这使得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的思路更加清晰,目标更加明确。

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开展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有利于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弥补了我国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工作中存在的不足,符合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际,同时也顺应时代潮流和世界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趋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加强文化素质教育的探索与实践,对

我国高等教育教育思想和观念的改革,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影响,可以说,起到了一种“催化剂”的作用。

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着重强调加强文化素质教育,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认识。其一,加强文化素质教育是高等教育加强素质教育、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其二,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在提高人才的整体素质中具有重要的基础性的地位和作用。

加强文化素质教育是高等学校加强素质教育、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切入点,这已经在实践中得到证实。首先,加强文化素质教育的实践,始终与高等教育界教育思想观念的改革和讨论相依相伴。在开展文化素质教育的过程中,一场以“加强素质教育,提高质量意识”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思想观念的大讨论正在全国高等教育界展开,这就使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具有了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思想观念讨论中的收获与突破对实践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实践经验的总结与提炼反过来也推动了思想观念的变革。因此,加强文化素质教育教育工作不断深入的过程,也是教育思想观念变革不断深化的过程。随着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素质教育的思想观念在高等教育界逐步确立,并逐渐深入到高校领导和广大教师的头脑与教学改革的实践中。其次,加强文化素质教育教育工作强调渗透到专业教育之中,强调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强调通过教育过程的整体优化来实现,注重潜移默化的熏陶和知识的内化过程,重视课内外、多种形式的教育与实践,这些做法有利于推进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符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精神,无疑为在高等学校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奠定了实践的基础,提供了实践的经验。

文化素质教育是加强素质教育的重要的基础,对于这一

点,江泽民总书记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有精辟的论述。江泽民同志讲到:“要说素质,思想政治素质是最重要的素质。不断增强学生和群众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是素质教育的灵魂。”他同时指出:“对干部、群众和学生必须认真进行中国历史、地理、文学知识和政治知识的教育,没有这些知识的武装,人们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是难以确立起来的。”1999年1月31日,江泽民总书记在视察内蒙古大学时指出:“文化素质教育很重要,应当好好抓,理科的学生要加强学习人文方面的知识,文科的学生要加强学习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这实际上强调了文化素质教育对于思想政治素质形成和确立的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文化素质教育对于业务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的养成和提高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就业务素质而言,文化素质教育一方面为学生学好业务打好文化基础,有助于学生理解专业知识,掌握专业技能;另一方面从更深层次推动专业教育。业务素质是学生服务于社会的特殊本领,如果大学生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无论在专业学习上,还是在实际工作中,他都能够坚忍不拔、顽强拼搏,克服一切困难去完成学业和工作。对于身体心理素质来说,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人,懂得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能够爱惜生命、重视健康,形成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进而使自己能够应付和承受来自外界的各种困难和压力。

无疑,加强文化素质教育从一个方面为高等学校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有益的尝试。但我们也要十分清楚地认识到,文化素质教育不等于是素质教育的全部,要全面提高大学生的整体素质,必须以思想道德素质为根本,必须把素质教育的思想贯彻到教育的各个环节,贯穿于人才培

养的全过程,特别在业务培养过程中要注重提高学生的素质,当然也包括提高身体心理素质。素质教育是一种教育思想,不是一种单纯的教育模式或分类,所以教育者首先要转变教育思想、更新教育观念,不能把学校仅仅看作是一种单纯传授知识的场所,也不能把教学活动简单地理解为一种传授知识的活动,要自始至终贯彻素质教育的思想;在人才培养的问题上学校也要转变观念,高等学校所培养的高质量人才不仅仅是基础扎实、能力强的专门人才,而且同时应具有较高的素质。

2000年3月

哲学与科学

ZHONGGUO DAXUE RENWEN QISILU

杨叔子

中国科学院院士 华中理工大学前校长

涂又光

华中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

在基督教世界,几乎每一个人都要读一本书——《圣经》;在伊斯兰教世界里,也要读一本书——《古兰经》;那么在中国,是不是每一个中国人也要读一本书呢?作为普通的中国人,要读《老子》和《论语》;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还要多读几本;作为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还要再多读几本。

道法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眼中的《老子》

——在华中理工大学演讲——

主

持人:今天,我们荣幸地邀请科学家杨叔子院士和哲学家涂又光教授共同主讲中华民族的经典著作《老子》。我记得1998年年底杨院士曾作过一次人文讲座——《初读老子》,后来,涂先生评价是“在中国大陆这是第一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讲《老子》,而且讲得那么精彩,非常了不起!”涂先生曾经说过,要了解中国文化就要从阅读经典著作开始。在他为人文学院青年教师主讲的经典著作读书班上,

开篇第一讲就是《老子》。今晚,两位先生分别从科学和哲学的角度为我们讲解《老子》。下面请杨院士先讲。(掌声)

杨叔子:今天是我们人文讲座在新千年、新世纪的第一讲,因此,我首先将我最近为欢度新年而填的一首词《浪淘沙》送给大家:“千禧接龙年,昂首云天,扶摇九万击三千。更有明朝圆梦日,阿里山前。‘瑜’字赞名园,美也弥坚。自强不息证青篇,气壮乾坤来问鼎,第一流间。”瑜园”,大家知道,就是指我们华中理工大学。祝我们的祖国在新的世纪欣欣向荣;祝我们华中理工大学早日达到世界第一流水平;祝我们的同学们在新的世纪不断进步,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多作贡献!(掌声)

今晚的讲座是学生先讲,先生后讲。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是在涂先生的启发下开始读《老子》的。今天,我把我读的这本《老子》也带来了,上面清楚地记着,1995年12月21日开始,这年我61岁,由于多方面原因,1996年1月2日到3月26日中断了近3个月,到1996年11月10日,读完最后一篇。这期间,我任校长,一天读一篇,共读了三遍。我61岁开始读《老子》,为什么呢?涂又光先生说得好,在基督教世界,几乎每一个人都要读一本书——Bible,《圣经》;在伊斯兰教世界,也要读一本书——《古兰经》;那么,在我们中国,是不是每一个中国人也要读一本书呢?他说要的。读什么书呢?分三个层次:作为普遍的中国人,要读《老子》和《论语》;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还要多读几本;作为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还要再多读几本。他说,你见过美元吗?上面有上帝!我特地找来一看,果然如此。上面印有 In God, We Trust,上帝与我们同在;硬币 Coin 上面也是如此!美国的基督教都印到钞票、铸到硬币上去了,可见其深入人心。但是,在我们中国,情

况又是怎么样呢？去年(1999)12月上旬,我在广东,大概是6日晚上,我看到某电视台的一个读书节目——这个节目很好,邀请了一位横穿一个大峡谷的勇士,谈他们的体会,谈得非常好。可是最后不太好。最后是这样说的,“我们要有大无畏的气概,不要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哎呀!我说这句话糟糕了!(笑)什么叫中庸之道呀?讲的人绝对没有搞清楚,他理解的中庸之道就是像棉花团似的,软弱无力,不求上进,任人欺负。这完全搞错了!这是一个例子。在此之前,11月,在某个城市举办的一个座谈会上,有人告诉我说,中国目前科学技术不发达,中国没有获得诺贝尔奖,关键是中国背了五千年的文化包袱,特别是背了人文的包袱。当时我就表示不同意。我想,大概是你没有将包袱打开来看一看,到底有什么东西?包袱里不可能没有不好的东西,但大量的却是珍宝。如果你不了解五千年的历史,你也绝对不能搞清楚这些珍宝。最近,好些媒体的记者来采访我,都问到一个问题,说最近许多媒体都在谈你,说你规定博士生必须读《老子》和《论语》,有无此事?我说:“查有其事。”我规定1998年入学的研究生要背《老子》,1999年入学的研究生不仅要背《老子》,还要读《论语》,而且要背前七篇。为什么如此重视呢?我想,基督教世界读《圣经》,伊斯兰世界读《古兰经》,为什么中国人对中国的两部源头经典著作《老子》和《论语》就可以一点也不了解呢?更何况是高层次人才!因此,今天应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的邀请,我愿意先作一个发言,抛砖引玉,然后请涂先生作更为精彩的演讲。今天,我想讲五个问题:第一,道与宇宙的本质;第二,世界的两个重要的客观规律;第三,《老子》中的“不争”;第四,《老子》中的“无为”;第五,把《老子》的第三十三章作为新年寄语送给大家。

第一,道与宇宙的本质。

前年(1998)的春天,武汉市举办了一个优秀中学生的座谈会,会上,有一个中学生问了我两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您对宇宙大爆炸理论是怎样看的?”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想问,宇宙大爆炸之前世界是什么情况?”他说:“对的!”我说:“我知道好学生往往不直接问问题,都是绕着问。”(笑)“我可以告诉你,在宇宙大爆炸之前,世界是‘无’,是什么都没有。”我进一步解释说,“无”不是没有,“什么都没有”不是真的什么都没有,而是一种存在形式,人觉察不到的一种形式。《老子》第四十章早就讲了:“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我还建议他去看一看《老子》第二十五章和第二十一章是怎样描述“无”的。去年(1999)2月上旬,我看到《科学时报》上刊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年的科学报告摘要,题目是《科学的未来是什么》。里面有一段是这么讲的:“大爆炸之前是什么样子?严格地讲,什么都没有,连时间、空间都没有。”我看了,激动得几乎落泪!大家看看,这个讲法,跟2500年前老子的说法惊人的一致。《老子》第二十五章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寂兮寥兮,就是没有时间、空间。我想,这绝对不是偶然的。

我今晚还带来了另一本书,是美国物理学家F.卡普拉写的,题目是《物理学之道》,副标题是《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我把有关内容作一个简单的介绍,看看老子讲的、东方哲学与现代物理学,为什么如作者所讲,两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且作者断言,“西方的思维、西方的物理学发展,必定要走到东方哲学道路上去”。这位学者指出:“东方宇宙观的两个基本主题是,所有的现象是统一的、相互联系的,宇宙在本质上是能动的。”他认为:“我们越深入到亚微观世界,

越会认识到近代物理学家是如何像东方神秘主义者一样，终于把世界看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相互作用的、其组成部分是永远运动着的一个体系，而观察者本身也是这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不是“天人合一”又是什么？《老子》讲的“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不正是这个意思吗？

F.卡普拉明确指出：“本书的目的在于通过说明东方智慧的精髓和西方科学在本质上是协调的。”他讲：“科学实验和神秘主义经验之间的相似性是令人惊讶的。”中国的直觉和西方的科学的实验差别“在于观察方式，而不在他们的可靠性和复杂性”。他指出，物理学家们在原子物理学初期面对的自相矛盾的经历正是“真谛隐藏在佯谬之中，这些佯谬不能用逻辑推理来解决，而只能以一种新的认识来理解——当然，这时我们的老师是大自然”。海登堡这么讲，“难道大自然有可能像我们在这个实验中看到的那么荒唐吗？”这里许多荒唐的事情用现代物理讲不通。世界的本原是什么东西呢？F.卡普拉讲，近代物理学再次为我们表明，有形物体不是截然分开的实体，而是和它们的环境不可分开地联系在一起的。它们的性质是根据与世界其他部分的相互作用来了解的。若不是存在着宇宙的遥远部分，我们日常的环境也就无法继续存在下去，我们日常的经验从最小的细节直到宇宙巨大的尺度的特征都是紧密联系的，以至不能指望把两者分开。

我今晚带了一份材料，就是涂先生写的。涂先生在中国文化方面造诣很高，中外兼收，古今并蓄，所以北京大学请他作兼职教授。北大的“环境研究中心”约请涂先生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环境卷》（增订版）增写一条新条文，叫“环境哲学”。涂先生应邀写了这个条文，就是这份材料，他给我看，我觉得他写得非常好，是开创性的论述，奠基性的论述。他认为环境

哲学总的出发点,就是“天人合一”。环境与人,本为一体,绝对不能分开。环境哲学有两条最高的原则:第一条,大平等原则,世界万事万物是平等的,不能搞以人为中心;第二条,致中和原则,中庸之道,不偏之谓中,不倚之谓庸,不偏,恰到好处,若任何一种超过度量,就是列宁讲的,真理前进一步就是谬误。涂先生在环境哲学上讲的同F.卡普拉所讲的完全一致,同现代物理学完全一致。任何东西都不能和周围环境分开,所以你在这个地方也不能和遥远的宇宙其他部分分开,这也是现代物理学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近代物理学表明,粒子不过是“真空”的一个激发态。“真空”是什么?就是“无”,是“气”,是F.卡普拉讲的“量子场”。F.卡普拉讲,量子场被看成一个基本物理实体,世界本身就是个量子场,是个连续的东西,在某种条件下由于激发能量凝聚成粒子,粒子随着能量的变化时而存在,时而消散。这正是东方宇宙观的基本要素。量子场的基本观点和东方哲学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场是种连续体,它在空间中无处不在,然而,通过它所表现出来的,是不连续的颗粒状结构,这两种对立的结构是以动态的方式统一起来的,物质永不停息地相互转化着。佛经中有句名言,表达了这种既对立概念又融为一体的特征,“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还有“空无自相,约色以明,不碍幻有”。空,就是场;色,就是场的激发态,就是我们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所能感触到的各种物质吧!场是永恒的,而激发态只是暂时的,“幻有”的,但两者永远处于不断的转化之中。

1990年,这本书出版了第三版,作者在后记中说,经过15年,他更加坚信他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我把这本书给了一些物理老师看,他们讲,近年来物理学的进展更证明了F.卡普拉的基本观点是非常正确的。我读这本书,总的感受是,东

方的直觉哲学思维与西方的实证科学所得出的结论殊途同归。因此,我们不能忽视中国先哲们的智慧。了解我们源头文化,不仅使我们认识到祖先的伟大,深深地挚爱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与优秀的民族文化,而且与现代相结合,与科学相结合,更可使我们对世界的本原有一个更加正确的认识,使我们在攀登科学的高峰时有一个更为正确的思维。

第二,世界的两个重要的客观规律。

客观世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规律,一是“相反相成,物极必反”,一是“守弱居柔”。

“相反相成,物极必反。”这是基本的规律,违反不得。世界上的事物就是如此。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这一点,《老子》书中所讲,比比皆是。所谓中庸之道也就是要求事物处在发展的恰当程度,要“允执厥中”,“不如守中”,否则,就会走向反面。《老子》第四十章讲得好:“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唐朝开国的时候,有一位非常出名的宰相,叫魏征,他给唐太宗写了一个奏疏——《谏太宗十思疏》,告诫唐太宗要处理好十种关系。这十种关系充分说明了事物“相反相成,物极必反”的关系。他告诉唐太宗,你做一件事,一定不要过头,欲望要有限度。在我们生活中,可以说,到处都存在着“相反相成,物极必反”的现象。在美国的阿拉斯加州,原来狼很多,鹿也很多,狼是吃鹿的,为了保护鹿,当地人就把狼杀光了,结果鹿也不行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了狼,鹿群里那些老弱病残把草吃光了,强壮的鹿没草吃了,饿得不行。有了狼以后,狼把那些老弱病残的鹿吃了,强壮的鹿才有草吃。于是只好把狼重新放回去,鹿才又繁殖起来。所以,涂先生认为环境哲学的基础就是“天人合一”,它有两个原则,一是大平等原则,一是致中和原则。既要讲平等,又要讲中和。关于“物极必

反,相反相成”,《老子》中讲了很多。如第五十八章讲“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第二十四章讲“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第二十二章讲“曲则全,枉则正,洼则盈,蔽则新,少则多,多则惑。”例子多的是!

“守柔居弱。”《老子》书中很多地方谈到这一点,强调要自觉置身于柔弱的地位,处事要低调,办事要节俭。柔弱胜刚强。如第二十八章,“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第五十九章,“治人事天,莫若啬”;第六十六章讲,“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人,必以言下之;欲先人,必以身后之”;第七十六章讲,“坚强处下,柔弱处上”;还有“哀兵必胜”等等,多的是!为什么老子要如此强调守柔居弱呢?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柔与弱能量最小,因而也是最稳定的,最有前途的。在控制论中,判断一个系统稳定不稳定的原则之一是,是否存在一个李亚普诺函数。它是什么函数?是二次幂的函数。什么是二次幂的函数?是能量函数。所以线性系统或非线性系统是否稳定,就看它的二次幂函数是否存在,看看能量是不是最小的。我们机械学院的师汉民教授研究切削加工,他发现,切屑流动方向是阻力最小的方向,也是切削消耗能量最小的方向。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在模具的设计中,应考虑到模具里面的材料是向流动阻力最小的方向流动的。可以说,世界上的事物都包含一点,能量越小,守弱,事物越稳定。材料是如此,世界上天然材料的结构中,特别是生物体的材料结构,都是最节省的。最典型的是蜂窝窝,六角形,是最省材料的结构。信息也是如此,在自然界,信息的储存与传递,消耗最少的能量与材料,得到最大的信息量。例如,精子和卵子的结合,非常之小,但却包含了人的一生全部信息,人的10万个基因与30万

万个碱基对的信息，全都在里面。应该说，“守柔居弱”正是“相反相成，物极必反”这一规律的重要体现。

第三，不争。

老子讲不争，并不是说要消极软弱，没出息。所谓不争，有两重含义，一是在一定的场合下，例如讲，在人民内部，要“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要不争，要和谐一致，没有什么好争的，“利而不害”，“为而不争”。但更为重要的含义是，不争是为了更好地去争。《老子》一再声明，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怎么不争？“不争”是争的一种最优策略。不争，可以使自己保持在一种较为弱小的地位，使自己还有上升和发展的空间。用现在体育界的话说，就是“一切从零开始”，也就是说，要把自己放在一个新的位子上，在这个新的位子上，你是零，你最低，所以你还会继续发展。你们读一读《老子》的第六十八章，“善为士者”、“善战者”、“善胜敌者”、“善用人者”，都不争，即“不武”、“不怒”、“不与”、“为之下”。为什么？他们是内行，是“善者”，懂得以“不争”以达到“莫能与之争”的目的。相反，如果你把自己总是放在最高峰，很可能你马上会掉下来。

有人讲，《老子》明明白白讲了，他的“三宝”之一是“不敢为天下先”，这与我们时代的要求“敢为人先”完全相反。我想，如同有人批判“不争”一样，这些人没有从整体上看，没有深入看。《老子》一再讲，“后其身而身先”，“欲先民，必以身后之”，而且还明白讲了，“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显然，“不敢为天下先”，即是“不争”，是老子的“为天下先”、“争”得有策略，也可以说是列宁所讲的“退一步，进两步”的策略吧！所以，我认为“不争”就是让事物在达到发展的高峰后，转移到一个新域，在此域中处于低点，也就是它开始了新的阶段，从

最低点开始,因此还可以向上发展。你看,“天之道,不争而善胜”。显然,不争最终是为了更好地去争,其实就是“守柔居弱”,“相反相成”。

第四,无为。

无为绝对不是讲不做事情,无为的目的是为了无不为,正如不争是为了更好地去争一样。《老子》第六十四章讲,“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圣人的欲、学、工作,都是“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很明显,这里所谓无为,就是要遵循客观规律。自然就是客观世界的运动规律,无为就是让自然按自己的规律去运动,而人不去妄加干涉。《老子》讲,“不知常,妄作,凶。”常,即自然规律。比如人体有心,有肺,有胃,有肠子,等等。可大脑并没有去管每分钟心要跳多少下,肺要呼吸多少次,胃要摩擦多少次,肠子要蠕动多少次,但它们配合得很好。如果人要大脑下命令,每分钟心跳多少次,肺呼吸多少次,肠子蠕动多少次,胃收缩多少次,那人就要出问题了!

最近,我在香港理工大学讨论网上制造问题。所谓网上制造,就是通过网络互联,我在这里设计,你在那里加工,他在另一个地方装配。而且,往往是设计、加工、装配都不只有一个企业,不只有一个地方,加工更是如此。因此,要用计算机通过网络将所有的地方与企业连接起来。现在网上制造最大的问题是联网问题,也就是如何协调的问题。比如说,有50家企业联合制造一个产品,制造中的问题是这50家企业如何协调?当然要有一个中央协调机构。是不是所有问题都要交中央机构协调呢?不可能!怎么办呢?向生物学习,根本的一条,就是不要做违背客观规律的事情。各家企业都要有自律,重要问题交中央机构协调。其实,一个国家,一个省市,一

个单位，如何管理，又何尝不是如此！

正因为如此，“无为”还可以指导管理工作。大到国家、省、市的管理，小到学校的管理，怎么管？就是管该管的事，不该管的就不要去管。我曾经向青年教师推荐过一篇文章，唐朝的政治家、改革家、文学家、诗人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这篇文章的字数我点过，471个字，不包括标点符号，正负误差不会超过三个字。这篇文章既有很好的管理思想，也有很好的教育思想，写得非常好。文章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郭橐驼是什么人；第二部分，谈郭橐驼如何种树；第三部分，引申到如何管理老百姓；第四部分，结论。橐驼者，骆驼也，驼背之谓也。郭橐驼以种树为业，树种得特别好，成活率高，长得茂盛，果子也结得特别多，熟得特别早，没有人能赶得上他。别人问他原因，他讲了一个“八字方针”：“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也就是说，要按照树木的客观生长规律来种树，使树的本性得到很好的发展。郭橐驼种树时，根要舒展，树要种正，土要故土，土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这才能种得好。有人种树，根是卷起来的，土被换成别的土，土打得要么太紧，要么太松。有人对树又太关心了，早晨看看，晚上摸摸，生怕它活不了，摇一摇，晃一晃，甚至把皮剥开看一看。（笑）表面上是在爱护它，关心它，实际上，是害了它。又有人问郭橐驼，把你种树的方法用来管理老百姓，如何？他回答说，我是种树的，不懂如何管理老百姓。但我看乡干部管老百姓，表面上是爱护老百姓，实际上是害了老百姓。为什么这样讲呢？这些干部一会儿喊：“起来起来，上级有命令，赶快育秧！”一会儿又喊：“起来起来，上级有命令，赶快耕田！”一会儿又喊：“起来起来，上级有命令，赶快收割！”一会儿命令早早缫丝，一会儿命令早早纺线，一会儿要养鸡养鸭，一会儿要教养孩子。一会儿击鼓命令

集合,一会儿鸣金出工。干部喊个不停,老百姓累得要死,连饭也吃不上,哪里谈得上休养生息呢?只能是又累、又饿、又病!想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年代,我们的农村又何尝不是如此?柳宗元最后得出结论,管理一个地方,要顺着事物的本性,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三皇五帝中的舜如何管理的呢?孔子讲:“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我们办教育,管学校,最根本的是育人,是按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学生,在总的要求下,一个大原则是“因材施教”,充分重视学生个性的健康发展,这里就是“无为”,无违学生的个性。没有个性的健康发展,没有独立思考,没有独立人格,哪会有什么创新能力的培养?哪会有创新人才?“不知常,妄作,凶。”妄作,就是按主观意志办事,这样,必招凶险。因此,老子讲不争,讲无为,就是强调要遵循客观规律。不争、无为,实际上都是“道法自然”的表现。

第五,《老子》的第三十三章。

最后,我把《老子》第三十三章送给大家,这是极富人生哲理的一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己知彼,才是明智;而且了解自己比了解别人更为重要;“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胜己胜人,才能强有力;而且战胜自己比战胜别人更为关键。“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中心意思是要强迫自己按客观规律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永不迷失自己的目标与定位才能长久;肉体虽然死亡,但精神长留人间,这样的人才真能永存人间。这样,也可算达到“道法”,达到“自然”,达到“人法自然”吧!

我这个学生刚好讲了一个小时，下面有请涂先生作更为精彩的演讲（长时间的掌声）。

涂又光：各位同志，听了叔子同志刚才的演讲，我想先说他底演讲底意义。上次，我参加了他们博士生读《老子》的心得交流会，由叔子同志带头讲。我很有感触，集中到一点，就是一个科学家，一个院士，自己来讲读《老子》的心得，在最近五十年，最近一百年，都没有过（掌声）。1949年以前，有一个中央研究院，其中有学哲学的，学文学的，学历史的，总之，学人文的院士。现在没有了，文科现在没有设院士。在这种情况下，学机械工程的院士来讲《老子》，这个意义，请大家好好想一想，到底有什么意义？（笑，掌声）

前天晚上，我看电视元旦晚会，其中提出四个字为主题：“天地人和”。要这么读：“天、地、人、和”，主持人却读作“天地，人和”，怎么能这样读呢？它是“天、地、人”再加上一个“和”字，这个“和”是贯穿在“天、地、人”之间的。从“天、地、人、和”这个主题联想到我们今天的题目——《道法自然》，看老子是怎么讲的。我们校园东部有个世界文化名人园，其中老子像下刻有《老子》第二十五章的话：“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段话体现了中国底思想，历来都是把天、地、人统一起来的。西方基督教有这样一个词，Trinity，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三合一的意思，表示“圣父、圣母、圣灵”三者底合一。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词表示“天、地、人”底合一。“天、地、人”是一个合一体，我们只要一走出门就可以感觉到，朝上一看就是天，朝下一看就是地，中间就是我们——人。我小时候做文章，学作文言文，学说很多套话，其中有一句就是“人生两大之间”，“两大”是什么？就是天和地。《老子》这一章还说，

“域中有四大”，即“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道法自然”底“自然”就不是一个“大”了，“自然”是一句话，或者叫“主谓结构”，其中“自”是主语成分，“然”是谓语成分。这个“自然”不是现代汉语中的一个词，是两个音节的词，与“社会”这个词相对而言的“自然”那个词。与社会相对的自然是一个词，用英文表示，就是 nature。《老子》底“自然”是一个主谓结构，用英文表示，就是 self (is) so。每一个事物，包括人，只要存在，就有一个自己，每一个自己，都有一个样子。样子如此，就是“然”。所以“自然”，就是自己如此。如果说“自然”也是一个“大”，就有了“五大”了，就跟《老子》说的“域中有四大”对不上了。所以不能把“自然”也看作一个“大”。后来，我讲授中国高等教育史，发现一个“盛唐模式”，它包括四个系统：国家系统，道教系统，佛教系统，民间系统。在研究道教系统时，我研究了唐明皇——就是杨贵妃底先生，（笑声）他写了一部《老子注》，和一部《老子疏》，都收在《正统道藏》中。在《疏》中他认为，不能把自然与道、天、地、人一样地看待，否则就有了五大了。这位风流天子早已把我得到的结论说出来了。不过他没有明确地指出，《老子》中的“自宾”“自均”“自知”“自胜”“自化”“自定”“自正”“自富”“自朴”等等，都是“自然”式的主谓结构，都可以归纳为“自然”。不过他能看出“四大”不是五大，已经很了不起了。

唐明皇为《老子》作注作疏；宋徽宗也为《老子》作注，还自号“道君”；明太祖也为《老子》作注。这三位皇帝作了四部《老子》注疏，都收在《正统道藏》里。这是明英宗正统年间修的，在 15 世纪中叶。我们华工图书馆藏有一部，完完整整。日本东洋大学有一位中国哲学研究生到华工来留学，指名要学“道教哲学”，我就把《正统道藏》调出来，摆了满满一书架，对他

讲：“好，你学吧！”他哎呀一声，心想理工大学竟然有这部书，服了。其实他要求不高，只学了王重阳一派底《全真清规》。他更不知道，这部书是由中国传到日本，由日本传到台湾，由台湾传回大陆，华工这一部是台湾影印本。

清朝第一代皇帝世祖，年号顺治，也作了一部《老子》注，收在《四库全书》里，这是清高宗乾隆年间修的，18世纪的事了。《四库全书》华工也有一部，影印本。第二代是圣祖，有名的康熙帝，他亲自写“无为”两个大字，作成横匾，悬在交泰殿，他底小办公室，显然是当作座右铭。他底孙子乾隆帝，将此匾重新贴金，还写了几句跋语，表示坚持祖训。这块“无为”匾还挂在北京故宫交泰殿，游故宫时可以看看。“无为”是《老子》首创的学说，《论语》赞同它，《韩非子》赞同它，尽管理解不尽相同。

我们再看看《论语》，有几个皇帝为《论语》作注？没有，一个也没有。我不是说皇帝作注有什么了不起，我只联想到一个情况，就是，一说中国文化文明，人们往往就和儒家划等号。这个等号只怕划不得，若是划了，你把这些作《老子》注的皇帝们摆在哪里？

皇帝算什么！皇帝写的《老子》注算什么！不必“以人废言”嘛，前面说过，唐明皇看出“自然”不是一个“大”，有其理论意义；现在再说明太祖朱元璋底《老子》注，有其历史意义。朱元璋建国之初读《老子》，他当年身受的痛苦，和由此养成的本能、情感、觉悟，一齐发动，从而理解到《老子》“乃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老子》朱元璋注自序语）和西汉初期类似，皇朝统治层内部斗争尽管残酷，但是对待老百姓总算力求清净无为，使之安居乐业，过几年太平日子。所以朱元璋注《老子》的历史作用，类似西汉初期以黄老治国。这

样的历史作用不能说是消极的。曾经盛行一种理论,说《老子》是没落奴隶主阶级思想。这样说未免太美化了没落奴隶主阶级。

再说一遍:我并不看重皇帝们作的《老子》注。我很看重东汉末年汉中地区张鲁政权都习《老子》。

有人问:《老子》第二十八章,“知其雄,守其雌”,那些话是什么意思?下面来讨论这个问题。

“知”与“守”对举,这样用法,还见于第五十二章:“既知其子,复守其母。”《老子》以“母”比喻“道”,以“子”比喻“万物”。万物是知底对象,道是守底对象。这样搭配,是《老子》自具特色的用法。第四十八章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知”与“为学”相通,“守”与“为道”相通。这些情况都与本问题底讨论有关,值得注意。

还说远一点,“知”“守”到后世成为职官用语,这并不是瞎扯,实与《老子》含有天下国家侯王百官体系有关。后世职官,有“知军国事”,“知府”,“知州”,“知县”,日本现在还称呼“县知事”。又有“郡守”,“太守”之类。“守”字还有更特别的用法,举个例子,诸葛亮挥泪斩了马谡,自己也引咎降级,虽然还当丞相,却加上“守”字,官衔是“守丞相事”。官阶与官职有区别,正常情况下二者相当;非常情况下,若是官阶低于官职,就加“守”字;若是官阶高于官职,就加“行”字。下面的讨论,将显示“守其雌”底“守”字与此意正合。

大家都知道《老子》赞美柔弱,那么就要问:《老子》是不是主张永远柔弱?是,也不是。就精神状况言,《老子》是主张永远柔弱;就物质状况言,《老子》不是主张永远柔弱,而是主张柔弱变成刚强,不是普通的刚强,而是刚强得“取天下”“莅天下”“得志于天下”。“天下”一词在《老子》五千言里出现整整

六十次(据河上公章句麻沙本统计),真正没有忘情天下。就拿第二十八章来说,明明是要“为天下谿”为天下式”为天下谷”,要把天下纳入他底谿谷之中,也就是囊括天下,作天下规范。如此抱负,如此学说,如此方向,是教人消极吗?

下一步就要问:变成刚强了,怎么保住刚强,发展刚强?《老子》底回答才是“知其雄,守其雌”。你,很“雄”了,要以“雌”自处。或者说,你很刚强了,要以柔弱自处。你若说,我刚强了,以刚强自处,才“实事求是”,才好“从实际出发”,否则岂非虚伪。《老子》说不对,以刚强自处,是死路;以柔弱自处,才是生路。第七十六章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徒”通“途”,“路”底意思。

这里是两个问题,不可混淆。一个问题是物质状况,即客观地位。另一个问题是精神状况,即主观境界,表现为以何自处。前面讲过,就精神状况言,《老子》主张永远柔弱。讲到这里,需要具体一些,具体化为:尚未刚强时,以柔弱自处,变成刚强;变成刚强了,仍以柔弱自处,保住刚强,发展刚强。比方一个人执政了,其客观地位,很刚很强,印把子,刀把子,都在手里,大权独揽。越是这样,他越是以在野自处,他本是在野之身,本有在野之心,他自己都知道,只要“反求诸己”,仍以在野之身、在野之心自处,是自然真情流露,不是装模作样,只要这样自处柔弱,他那刚强的客观地位,你说能不能保住,能不能发展?刚才叔子同志讲,外国科技理论有一个说法:换一个地方作新的起点,可以发展出新的高峰。这是一个说法,说得很好。若按《老子》底说法,就不用换个地方作新的起点,啥也不用换,你底客观地位还是你底客观地位,只是主观境界、精神状况方面,仍以在野自处,仍以柔弱自处,就成了。你若不信,客观地位越刚强,精神上、主观上越以刚强自居,《老子》第

九章说,这就会“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它还说,“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如果以刚强自居的话。

总起来说,“知其雄,守其雌”,可以转换为“知其刚强,守其柔弱”,或者更简单明了:“知其阳,守其阴”,或者“知其有,守其无”。以“无”守“有”,以无官(心态)“守”有官(地位),比官阶低的“守”官职高的更彻底,这个“守”字正是后世职官用语中“守”字底意思,像前面说过的那样。至于“知”字,就不止是“知道”,而有“担当”“负责”底意思。“知”字还有“主宰”底意思,但《老子》反对主宰,所以讲《老子》底意思不取此义。

最后讲一讲“啬”字。《老子》第五十九章第一句是“治人事天,莫若啬”,可以英译为 In the handling of the problems of man and nature, there is nothing better than the law of parsimony。最后一个词组 the law of parsimony,是从美国 William James 底《心理学原理》卷 496 页借过来的。其相关的解释不必引用了,有兴趣可看原书。有人反对它,也不必说了。借用这个词组,是因为这个词组表示的意义,在形式方面实在与《老子》底“啬”字大致相当,虽然前后相差两千四五百年。中国历来提倡“俭”,俭过了头便是“啬”。普通是“勤俭”连着说,意谓生产要勤,消费要俭。《老子》不然,不连着说“勤俭”,只单独说“俭”,意谓消费要俭,生产也要俭,“双料”的俭,就是“啬”了。这个说法,有没有现实意义?我是说现实意义,不是说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底现实,特指资源、环境与人类生存底关系。事关人类生存与可持续发展,值得我们大家想一想。

谢谢大家耐心倾听我底发言,完了。(鼓掌)

演讲日期:2000年1月4日,华中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供稿,录音整理:孙自方,本人审校

编者絮语 两位德高望重的先生一直在大力倡导阅读经典原著，并且身体力行——杨先生规定他的博士生要背《老子》和半部《论语》才能参加论文答辩；涂先生连续几年为青年教师开课讲授《论语》、《老子》、《孟子》、《庄子》。

关于《老子》，我们最熟悉的评价是：消极、反动、虚无主义、客观唯心主义、没落奴隶主思想的代表等等。听完两位先生的演讲，不禁引人深思，对于《老子》这部经典著作，我们是不是有太多的曲解和误读？

邓晓芒

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

苏格拉底的言说,他的标准是确立于言说本身的,就是说,话语本身有自身的标准。所以我们在言说伦理道德问题时,以及言说其他任何问题时,我们都应该遵循话语本身的标准。这个标准,到后来经过世世代代的发展,就形成了西方的逻辑。西方重逻辑、重语法规范,这是西方文化的一个特点,也是西方言说的一个特点。

苏格拉底与孔子言说方式的比较

——在华中理工大学演讲——

今

天,跟大家谈谈关于苏格拉底与孔子在言说方式方面的区别。这个问题很重要。首先,这两个人在中西文化各自的传统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西方,苏格拉底是一个大师,特别是在伦理道德方面,成为了后世的楷模。曾经有人把苏格拉底比作为西方的孔夫子,整个西方哲学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开始有了一个转向,从原来探讨自然界的本原转向了探讨伦理与道德问题,所以苏格拉底是一个开创性的大师。大家都知道,孔夫子在中国是具有崇高地

位的。今天我要谈的,不是他们具体的道德观点和道德历程,而是他们在谈话的时候,他们的说话方式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中西方的差异,想从这个问题来切入到我们在讨论伦理道德、政治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所不知不觉在遵循、在运用的某种思维方式。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对中西两大文化体系产生一种清晰、宏观的认识。

在说话的方式上,孔子的《论语》是众所周知的。孔子一生,没有留下他自己专门撰写的哲学和伦理道德著作。《论语》,就是他跟他的一些弟子们的谈话,由他的弟子们记录下来的对话录,所以孔子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也就是说,他不写书,他只整理古籍,然后以口头的方式把他的意思和道理讲出来。苏格拉底在古希腊也有类似的著作。苏格拉底也没有一部自己写的书,也只有由他的弟子们所记录的对话录。特别是他的大弟子柏拉图,在他的书里,往往就是以苏格拉底的口吻来转述苏格拉底의思想和柏拉图自己的理解。所以这两个人都是用他们口头的对话形式来启发人们去关心和思考真理、追求智慧,以这种方式阐述自己的思想,而阐述的话题主要是伦理道德问题。但是在对话的方式上,他们二者有极大的区别。当然在道德、伦理的思想内容方面,他们也有很多区别,即使大致相同的地方也有很多区别。但是我们今天考察的主要是他们对话的言说方式究竟有何区别。西方人在思考伦理道德问题的时候,他们的说话方式就跟我们不太一样。做这样一种比较,对于我们反省自己的民族文化是有启发意义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他们在谈话的时候,关于言谈标准的问题。也就是说,任何言说,任何对话,如果要从这些言说里面获得某种东西,而不是一般的闲谈,那么这种言说都必须有

一个标准。我们每个人说话、内心里都有自己的标准,我们按照这些标准来发表自己的看法。孔子和苏格拉底,可以说在东西方传统中,在谈到伦理道德问题时,他们对言说的标准各自有自己的确立。

苏格拉底的言说,他的标准是确立于言说本身的,就是说,话语本身有自身的标准。所以我们在言说伦理道德问题时,以及言说其他任何问题时,我们都应该遵循话语本身的标准。这个标准,到后来经过世代的发展,就形成了西方的逻辑。西方重逻辑、重语法规范,这是西方文化的一个特点,也是西方言说的一个特点。

孔子在言说中也有标准,但是他言说的标准在言说之外,而不是把标准放在话语本身之中。正因为这个标准建立在言说之外或者说言说的后面,建立在没有说出来的东西里面,所以他最终取消了言说本身的标准。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具体的事例。首先从苏格拉底来看,苏格拉底有一篇著名的对话,是专门讨论美德的,这个对话叫做《美诺篇》,就是指苏格拉底与美诺的对话。美诺是当时的一个年轻人,追随智者派。智者派善辩,最喜欢与别人辩论,甚至经常诡辩,以显示自己的聪明。美诺自认为非常聪明,自认为了不起,苏格拉底便与他讨论美德问题。苏格拉底在讨论中,经过反复辩难,最后总结出讨论要有一条原则。这条原则应该是什么样的呢?苏格拉底是这样说的:一条原则如果有某种正确性,它不应该只是在此刻正确,而应该是永远站得稳的。就是说,苏格拉底在对话中强调这样一条原则:你要讨论一个命题,那么你要使这个命题不仅在此刻说明它有道理,而且在能设想的任何情况之下,它都应该站得稳。如何能做到这一点?苏格拉底主张:应该抛弃任何一个用未经解释或

未经承认的名辞来说明的答案。就是说,任何一个名辞,如果这个名辞未经解释,没有经过双方同意,是不能用来做答案的。比如说美德。我们如果要谈论美德,首先就应该明确什么是美德,而不是美德是怎样的、美德是不是可教的,或者是什么样的人有美德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不是我们首先要面对的,我们首先要面对的是搞清我们所讲的美德究竟是什么。苏格拉底说,当我对任何东西不知道它是“什么”的时候,如何能知道它的“如何”呢?他举例说,如果说有美诺这个人,但我对美诺这个人什么都不知道,那么我怎能够说他是漂亮的还是不漂亮的,是富有的或是高贵的呢?我首先要知道这个美诺是一个人,要对这个美诺作出他是什么的规定,然后我才能说他是漂亮的。如果美诺是一棵树,我就不能说他是漂亮的,也不能说它是富有的,只有人才能够是漂亮的或富有的。所以苏格拉底非常注意言说本身的逻辑层次,在言说中使用的任何概念,都必须建立在这个概念明确的严格的定义之上,否则我对它的一切描述都无以生根。所以这种要求是言说本身的要求,而与你所言说的对象没有关系。不管你说什么东西,反正你要说任何一个东西,你都必须首先给出你所说出来的那个东西的定义。哪怕你所说的内容再好,如果你不遵守这样一个原则,那么你就不知道自己说出来的是什么东西,你就很可能陷入到自相矛盾的境地。所以美诺在跟苏格拉底讨论的时候,处处陷入被动,因为他没有搞清美德是什么东西,反而大谈美德的一些属性。这样一个原则也就是后来亚里士多德所建立起来的形式逻辑的原则——同一律与不矛盾律,再就是实体性原则。你要谈一个对象,你这个对象必须有所指,所指的那个对象就应该看作实体规定。在“什么是美德”这个问题上,美诺是这样回答苏格拉底的:“美德就是男人懂得治理

国家,女人善于管理家务等等。”苏格拉底就讽刺他:“我问你什么是美德,美德只有一种,我问你一种美德的时候你又把你的一窝美德都给我端出来了。”我们今天讨论问题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你问他什么是美,他就说:“美是一个漂亮的小姐,美是一个很漂亮的花环。”然后举一大堆例子。用举例说明的方式当然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大体说明问题,你不知道什么是美,那么就拿几件美的东西给你看看。但这不能解决问题,这不能回答什么是美的问题,也不能回答什么是美德的问题。苏格拉底认为:美德,无论它们有多少种,无论它们有何不同,它们都有一种共同的本性,要着眼于美德本身,而不要着眼于具有美德的那些事物。这就是要对什么是美德这个问题必须作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本质定义,有这个定义你才能永远站得住脚。

亚里士多德认为:真正的定义应该是种加属差。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你光说人是动物还不够,你必须把最近的种差加上去:人是有理性的动物,只有人才有理性。那么这个定义就完全了。所以光说美德是知识那还不够,至于是什么知识,还必须继续探讨下去。苏格拉底虽然还没有做到这一点,但是他已经提出来:要使我们的思想摆脱具体经验的束缚。在日常生活中有大量的经验,我们必须摆脱这些经验的束缚而上升到逻辑的言说。这是苏格拉底在西方思想史上作出的贡献,就是要通过谈话把逻辑理清楚,这样一种言说方式就在他那里初步建立起来。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论语》。孔子在《论语》中与他的弟子们讨论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仁”的问题。这个“仁”,可以说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但是孔子与弟子们的这些讨论,都是建立在没有给“仁”下一个明确定义的前提之下的。究竟什

么是“仁”，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在《论语》里面，孔子的弟子一共问了七次“仁”，但是孔子的回答每次都不相同，他不去追求一条要永远站得稳的原则。在《论语》中，问“仁”的意思，根据我们的体会与孔夫子的回答，我们可以看出来都不是限于问什么是“仁”，而是比较笼统的问关于“仁”方面的事情。

樊迟问“仁”，是不是樊迟想给“仁”作一个定义呢？其实没那么回事。樊迟想要问的是关于“仁”方面的各种各样的事情，由此我们才能够理解孔子对这样一些提问的回答为什么那么多，而且经常把不同层次的事情混在一起。我们可以索性再仔细看看。第一次是颜渊问“仁”。孔子的回答有三句话，这三句话代表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句话是：“克己复礼为仁。”这一条是不是“仁”的定义呢？是不是说只有“克己复礼”才是“仁”？或者说所有的“仁”都是“克己复礼”的呢？也不是。这样一个回答类似于美诺对苏格拉底什么是美德这个问题的回答，但是美诺这样回答还有想穷尽一切列举的意向，而孔子没有这种欲望，他不想穷尽凡是与“仁”有关的一切场合，他只提出一个“克己复礼为仁”。第二句话是：“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这句话回答的问题就更加不是回答什么是“仁”的问题了，而是说一旦你做到了“克己复礼”，就会怎么样。他所说的这个问题是怎么样才能使“天下归仁”。这个回答是跟前一个回答不一样的，前一个回答提出了“仁”的一种情况，就是“克己复礼”，而第二个回答是一旦这样了，就会怎么样。还有第三句：“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这是第三个层次，它所要谈的是你要成为一个仁人，你的根基何在？你是由自己使你成为仁人，还是由别人使你成为仁人的呢？这三句话连贯起来看，里面有一个意思，就是劝说，而不是证明。这三句话不是为了证明什么是“仁”，而是为了劝说颜渊做一个仁人。

颜渊问“仁”，于是孔子就获得了一个机会，趁机就可以对颜渊讲为“仁”的道理，劝他为“仁”。劝说当然也有一个内在标准，但这个内在标准不是体现在言说本身，而是包含在一问一答的意思后面。他们在讨论“仁”，讨论后面的意思包含的一个前提，就是讨论的双方都想成为“仁人”。颜渊问“仁”不是想弄清什么是“仁”，而是想知道怎样才能做一个“仁人”。孔夫子就告诉他，你应该这样，这不是证明，而是劝说，是劝说你要这样去做。所以问“仁”，它本身就意味着一个人想要“仁”了，而去问怎么做。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对话就根本不成立。所以孔子的教导只对于那些想要成为仁人的人才有意义，而对那些甘做小人的人来说，不存在他们对话的基础。颜渊听了上面的三句话，还不满足，于是就继续探问具体的实施方法：“请问其目”，孔子就告诉他：“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也就是说把视、听、言、动，你的一切行为都落实在一个“礼”上来。但是这里有个问题，他为什么不说非礼勿想？非礼勿想是一切视、听、言、动的出发点，为什么他不说呢？这个问题并不复杂，非礼勿想是用不着说出来的。如果连这点都还有疑问，那么双方就没有共同语言了。《论语》的很多地方都是以骂人而告终的，骂人家“不仁”、“小人”、“德之贼”。所以一个人想要“仁”，是构成他们一切对话的潜在标准，但是这个标准却不能自成为讨论的对象。“仁”是孔夫子一切对话的根本与前提，如果你问孔夫子为什么要做仁人，那孔夫子就要骂人了。因为这个问题在孔夫子看来是没有道理的，它是不能讨论的。言说的标准是有的，但是它不进入言说之中，而是在言说之外，成为言说的前提，它不受到言说的检验，它不是一个未定的需要言说加以探讨的问题，而是不容探讨的。

第二处谈到“仁”的地方是仲弓问“仁”。孔夫子的回答仍然是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主要是指“仁”在外部表现出来的举止，“出门”应该怎么样，“使民”应该怎么样。第二个层次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孔子的一句名言，指的是人的主观对他人的态度，即人相互之间关系，你不想要的事情不要加在别人身上。这不仅仅是一种外部的举止，而且是主观对他人的一种态度。第三个层次：“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这指的是内心的一种心境。这三个层次，第一个是外部的客观的态度，第二个是主客观的即自己与他人的关系，第三个是内心的心境。这三个层次同样也没有给什么是“仁”下一个定义。此外，在这三个层次中，孔夫子没有指出这样一些特征、标志和层次，到底哪一个层次是根本性的。其实，孔夫子认为，第二个层次是最根本的。他曾经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看成是“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至于“出门”应该怎么样，“使民”应该怎么样，“在邦”应该怎么样，“在家”应该怎么样，这些都不重要。

再看看司马牛问“仁”，他的回答只有一句：“仁者，其言也讱。”就是说，仁人说话是不太机灵的，说话笨一点就是“仁”了。司马牛就发问了：“其言也讱，斯谓之仁矣乎？”意思是，说话笨一点，这就叫“仁”了吗？孔子的回答就更加答非所问了：“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意思是，做起来很难，说话能不迟钝吗？这个回答可以说是驴唇不对马嘴的，同时这句话本身也是经不起推敲的。说得容易，做起来很难；或者做起来很容易，但是说不清楚，这种事情太多了。孔夫子在这里似乎是不太讲道理的，有的注者这样解释：孔子这么说，是针对司马牛多嘴的缺点。但是从言谈本身来说，司马牛问的是“仁”，而不是什么小事情，你怎么能把多嘴随意上升到如此高度呢？

迟钝还是多嘴并不是“仁”的根本问题。所以这表面上看起来是对话,但实质上它只是一番教训。

再就是樊迟问“仁”了,樊迟一共问了三次“仁”,每次得到的回答都不同。第一次是在《论语》的“颜渊”那一章里,孔子的回答只有两个字:“爱人”。但是这样未免太简单了,“爱人”,根据孔夫子的精神,爱什么人,怎么去爱,都应该有所交待,不能够仅仅用“爱人”两个字就把“仁”概括了。例如墨子也讲“爱人”,并且是“兼爱”,什么人都爱。孔夫子跟他是不一样的,孔夫子不主张不分彼此来爱一切人,他主张爱有差等,首先爱你的父母,然后按照亲疏关系才能一级级爱下去。单纯讲“爱人”两个字,不是孔子本身的思想,但是他在这里的回答只有这两个字。而且孔夫子在别的地方还说过:“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意思是,“仁”的人应该厌恶那些不“仁”的人,并且不让那些不“仁”者把不“仁”加到他的身上。为了“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仁”者实际上是可以“恶人”的,甚至可以恨人。所以“爱人”根本不能概括孔子的意思,孔子的“仁”除了“爱人”之外,还可以“恶人”。樊迟又第二次问“仁”,孔夫子又是另一种答复:“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如同前面讲的教训司马牛多嘴一样,有人据此以为,孔子认为樊迟害怕力行而有意敲打他。樊迟第三次问“仁”,孔夫子答道:“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前三句没有什么新意,最后强调到了外国也不可放弃。这是否暗指樊迟朝三暮四,不能坚持,也只有他们两人知道。这种需要在具体情况下才能领会的对话,《论语》中还有很多。但时过境迁,这些文字给后人留下了很多的猜测,有的人就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加以解释,这就使中国哲学史上留下了很多疑问。我们读古书,经常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因为说这话的语

境已经时过境迁了,我们既不知道樊迟是怎么样的,也不知道孔夫子当时的心情怎样,所以很多注释就永远解释不清楚。

最后我们看一看子张问“仁”,孔子的回答是:“恭、宽、信、敏、惠,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孔子对这五个字还加以具体解释:“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这当然是经验之谈,而且是非常实用的。但令人奇怪的是,子张问的是“仁”,而不是什么实用哲学。如果“仁”仅仅被理解为这样一些有用的品质,那么这种回答就是恰如其分的,但对孔夫子来说,这些品质跟利未免结合得太紧了一点,这跟孔夫子的原则——君子言义不言利,是直接相冲突的。为什么要这样回答什么是“仁”呢?有人解释,孔夫子并不是把这些品质归结为“仁”,而是针对子张这个小人。子张是个小人,他问“仁”,孔夫子便诱之以利害,以小人能理解的语言来引导他。至于孔子的标准则始终在内心,没有说出来,一切可以说出来的标准都是相对的、不确定的、不可依靠的。所以孔子的话我们不能从字面上来理解,我们必须悉心领会。

但在《论语》中也有说得明确的话,这样的话有两句。一句是:“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夫仁者”这样一种句式,就是下定义的方式了。什么是“仁”?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可以看作是一个定义。有的人也把它解释为孔子对“仁”所下的最确切的定义。另一句是有子概括出来的:“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这句话也被称为孔子的“仁”的标准,孔子就是用“孝弟”来衡量“仁”。前一句我们看成是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相反的说法,就是说你想做的事情也要让别人做。但这两句话的根据,还是“爱人”。然而“爱人”有差等。这个差等又要以“孝弟”作为标准。所以“孝弟”,即亲亲之爱,才是最根本的。但是,反过来问一下,是

否一旦“孝弟”了,就能够做到“爱人”、“立人”或“达人”了呢?这倒未必。当然爱自己的父母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不是也能爱别人呢?孔夫子就说,你的父亲如果偷了羊,你也必须“子为父隐,父为子隐”。你的父亲偷了羊,这本来是不好的事情,但是别人追究起来,你要为自己的父亲隐瞒,否则,你就不爱你父亲了。“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父子之间要相互帮助隐瞒,这是“孝弟”的一种方式。但很显然,这种方式是制造纠纷的一条原则,为了爱自己的父母而与别人争斗,在生活中是很常见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谈得上“爱人”、“立人”和“达人”呢?所以孔子的“仁”在根本上不是一个普遍的人性标准,而是一条引起家族纷争的相对性原则。而引起家族纷争也就必然导致在实际社会生活中需要有一个最高家长,也就是专制君主。家族起了纷争,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请父母官裁决。你固然爱你的父亲,但你也爱父母官,你的父母官就是你的“父亲”,皇帝老子就是你最高的“父亲”。所以你除了“孝悌”外,还必须“忠君”,也就是说,孔子“仁”的原则,最终会导致专制君主。这样一条原则如果扩展到世界,那就导致天下不能有二主,引发国际纷争,所以中国社会在这条原则下,就产生了对专制君主的绝对需要。在言说方式上,就导致话语权威。话语权威表现为,以一己之欲,强以“立人”和“达人”。因为我觉得这样很好,所以你也必须这样做,我是为了你好。在话语权威里,虽然看起来是很温和的,没有任何强制性,但实际上背后有很大的强制性。而以“一己之欲”,强以“立人”和“达人”,这个标准始终隐没在话语背后,这样一来,在谈到伦理道德、法律和政治问题的时候,整个言说在语言中就找不到任何标准。

上面讲的是话语的标准,下面我准备谈谈话语的性质问

题。

苏格拉底的言论大多是以对话的形式传播下来的,孔子也是如此。但是只有苏格拉底的对话才真正具有对话的性质,孔子的对话其实不是真正的对话,而是独白。它类似于教义问答,问所起的作用只是提起话头,等待教导。所以孔子在对话中是“诲人不倦”,不断去答疑解惑。而苏格拉底则恰好相反,苏格拉底是以提问者的身份出现的,而苏格拉底的对手,才是问题的解答者。苏格拉底总是问对手一个问题,他的对手自以为很聪明,便加以解释,苏格拉底便抓住他的解释再次提问,往往使对手陷入绝境。所以苏格拉底全部对话的灵魂,都在于提问,而不在于回答。苏格拉底的问题是最尖锐的,而回答则是比较平庸的。对话是由针对回答的提问,才引导谈话进行下去,而且通过提问才使问题本身变得清楚明白。但苏格拉底并不以全知者的身份自居,他曾说过:“我自知我一无所知。”他有的只是困惑,所以有人说自己有智慧时,他便用困惑去请教他。很多人说苏格拉底装傻,其实他不是装傻,也不是过分地自谦,而确实是他真实的想法。他的确很聪明,但他认为他最聪明的地方就在于他知道自己傻。他有一种开放的心态,他提出问题让对方自由回答,他并没有任何预测的前提,而是自由的。他用他敏锐的目光一下就把问题抓住了,在抓住的时候,他并没有预见到对方将会怎样回答,而是看对方怎样回答。对方可以任意地回答,对方是自由的,他也是自由的。对方回答了,他就可以自由地寻找漏洞,把对方的问题抓住。一个问题将会引出怎样的回答是临场发挥的,只有话语本身的逻辑在把言谈引到某一个方向上去,使问题越来越清楚、明白。依据话语本身的逻辑,双方都是自由的,但整个谈话并不是随意、散漫的,而是有一个中心的,每一次谈话都

要解决一个问题。苏格拉底相信,话语有它自身的标准,就是逻各斯,逻各斯是人人所固有的理性。逻各斯译成中文往往就是理性,理性就在语言的逻辑中。这种逻各斯哪怕是苏格拉底自己一个人所发现的,但他意识到,即便是他自己发现的,也要由别人的嘴里说出来,来证实它的普遍性。话语本身也就起这样的作用,就是把人们口里说出的话经过反复的辩驳而证明是普遍的。所以苏格拉底从不强迫别人相信他自己的判断,而总是诱导别人自愿说出他没有说出的话。相反,如果使别人处于不自由、被动受教育的地位,即使别人承认你说得对,这句话的普遍性也是永远得不到证实的。苏格拉底把这种方法称为“精神的助产术”。也就是说,产婆可以帮助孕妇生出孩子,但却不能代替她生孩子。“孩子”是别人所固有的,你只能帮他说出来,却不能代替他思想。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孔子,孔子虽然并不认为自己是“生而知之者”,他是“学而知之者”,但在对话时,他是以学成者的身份来高居于他人之上的。尽管还要“学而时习之”,但在对话时,是不需要学习的,只要教育。他有一句话:“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面对学生,凡是需要知道的他全部知道,凡是他不知道的都是不必知道的。他也很多次说“吾不知”,但当他说到“吾不知”的时候,很多是回避。他的弟子问某某人算不算仁人,他本想说这个人哪里算得上仁人,但他不这么说,他说“吾不知也”。实际上他早就下断语了。当然他也有很多不知道的地方,但他知道的那一点,肯定是不可怀疑的。对于他所知的,他必须“笃信好学,守死善道”。但他没有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有自以为知其实并不知的情况。

苏格拉底是当时知识最丰富的人之一,他在青年时代,就

已学遍了所有的自然知识及自然哲学,所有智者的道理他全都知道,但他对这些知识抱一种怀疑态度,他并不自认为什么都知道。对自己的知识抱怀疑态度,对那些自称有知识的人的知识,他同样抱一种怀疑态度。

孔子说,“吾知其不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与苏格拉底“自知其无知”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孔子的“知其不知”,对知识并不是一种反问态度。他也承认有些事情是不知道的,但他对这些事情不屑一顾,对自己的知识没有一种反思的态度。他不像苏格拉底那样,把对话当作双方一起来探求真理的一个过程,而只是传授已知知识的方式。孔子有这样一句话:“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吾叩其两端而竭焉。”就是说,当“鄙夫”来问我时,我什么都不知道,但只要从君子的立场“叩其两端”,就可以穷尽它的道理,我不必知道具体的那些知识,或者说,一般“鄙夫”的知识是不用去学的。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这段话可以解释什么是“叩其两端而竭焉”。“叩其两端”,就是上下两端,上就是孔子,下就是老百姓。老百姓种菜的知识是不用学的,只需要学如何与人斗,不需要学如何与大自然斗。

在苏格拉底的对话中,苏格拉底专门寻找那些自以为有知识的人提问,去揭示他们的矛盾,去打破他们的自满自足,去启发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和浅薄。苏格拉底的对话都是这样的,这样的对话致力于知识的进一步深化,揭示出那些貌似有知识的话语里其实掩藏着的浅薄。而与此相反,孔子则

是：“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也就是说，别人有疑问来请教时，就正好是占领话语制高点的机会了。朱熹注曰：“待其诚至而后告之。”这就是孔子教导的原则，首先要被教导的人有诚心。

经常有人说到这样一个悖论，中国文化，你没有诚心是进入不了的，但是有了诚心又跳不出来，结论是中国文化不可认知。这样一个悖论其实从孔子就开始了。孔子对美诺及古希腊智者派那样一些自以为是的人是绝对说服不了的，他只能成为那些脑子不太开窍的人的精神领袖。而一旦成为精神领袖，就可以对他人任意褒贬评点，成为一个知人心者。所以孔夫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好恶都是由仁者发出来的，只有他能够做到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孔子的说话态度虽然是谦虚的，但总使人感到不平等，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居高临下的原因，哪怕他的谦虚也使人感到一种压力。他的话即使是毫无逻辑的，也是不容辩驳的。当然孔子也有他的技巧，他不让你辩驳，他也不说出话来使你能够辩驳，而总是在你走了之后说你几句。

最后，谈一谈讨论的效果问题。

苏格拉底在对话中，虽然执着于一个明确的目的，这就是要找到一个事物的“定义”，但他也知道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他自己心中预先并无定数（所以才“自知其无知”），唯有依靠自己的理性和“辩证法”去不断地有所发现。例如在《大希庇阿斯篇》中讨论“美是什么”的问题，最后的结论竟然是“美是难的”。不过讨论并没有白费，虽然还不知道美是什么，但毕竟知道了美“不是什么”，思维层次有了很大的提高，而这正是苏格拉底真正想要达到的。又如在《普罗塔哥拉篇》中关于美德是否可教的问题，双方在讨论中都从自己本来所持的立场不知不觉地转向了持对方的立场，颇具喜剧性，最后也没有结

论,苏格拉底说对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讨。但毫无疑问,在这种开放式的讨论中,不但讨论双方的思维水平已不是讨论前的水平了,而且所讨论的问题的内在复杂性、微妙性也暴露出来了,这就给后人沿着思维已指出的方向继续深入提供了极宝贵的启发。

相比之下,孔子的对话看重的只是结论,而完全不重视反复的辩难,一般是一问一答为一小节,少有两个以上来回的,即使有,也不是针对同一个问题,更不是贯穿一条思路。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又说“吾道一以贯之”;但他是如何由故而“知”新的,他的“思”的思路究竟如何,他又是怎样用他的“道”来贯穿他所有那些论点的,却从来不曾交待。我们只能认为,他的“知”、“思”和“道”都只不过是一种内心的体会,所能说出来的只是结论,而不是过程。

所以,《论语》是中国传统官样文章中泛滥成灾的“要字句”的始作俑者。所谓“要字句”,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要……”的句式,有时不一定包含“我们”,常常连“要”字也省掉了,但意思每个中国人都懂。但西方人就不一定懂了,他们只可能将它看作“无人称句”,但西文无人称句不含“要”的意思,因此他们往往抱怨这种句子没有主语。随便举一例:“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前面加上“我们要”三字(或只加“要”字),亦通。又如“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等等,不胜枚举。在“要字句”中,“为什么要”是不能问的,一问你就成了异端,“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因此这是一种权力话语。

那么,一介儒生,权力从何而来?来自道德上的制高点,而道德制高点又是基于自己情感上的自信,即相信自己的情感合乎自然情理(天道)。如宰我(予)对孔子说守三年父母之丧太

久了,许多该做的事都荒废了,孔子问他:“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答曰:“安。”孔子就冒火了:“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走后,孔子骂他“不仁”,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父母抱大他到三岁,所以父母死后就要守三年之丧,如果当作一种量化的推理来看这的确是很可笑的,哪里有什么道理;但能够想到这个类比并说出来的人显然表明了他的情感的深切笃实,自然就有资格训人了。幸好没有人来和孔子竞争说父母养你到十八岁,因此要守丧十八年,因为这毕竟只是一种权力话语,而不是真正的权力。不过,一旦和真正的权力挂上勾,就难说会出现什么荒唐事了(如“文革”中大家竞相表“忠心”)。所以,对话中对权力话语的争夺实质上是一场情感的表白和比赛,其结果就是写有“忠孝”二字的大奖杯。

因此,从历史上看,苏格拉底和孔子的两种不同的对话其效应也是极不相同的。前者造成了西方哲学史上从自然哲学向精神哲学的大转折,刺激了后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超越苏格拉底而建立起庞大的唯心主义体系;后者则树立了无人能够超越的“大成至圣先师”,只能为后人“仰止”和不断地体会、学习。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从此便进入到了一个自我循环、原地转圈的框架之中,尽管内容上还有所发展和充实,形式上却两千多年一仍旧制,几无变化,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才开始有了初步的松动。

演讲日期:2000年3月1日,华中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供稿,录音整理:范辉,本人审校

编者絮语 这篇演讲稿的切入点非常独特。言论或言说方式,不仅仅是一种表达方式,其中还蕴含着言说者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及演说者的心态。苏格拉底与孔子言论方式的比较,邓教授已作了很好的分析,有兴趣者不妨将苏格拉底与孟子的言论方式加以比较,相信会另有体会。

顺便要提到的是,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十分推崇对话体著述。苏格拉底、孟子可谓对话体著述的代表。读他们的著作,也可将自己作为论辩的一方加入其中。许多问题,即便是今天,我们要驳倒他们,也决非易事。不信,你可以试一试。

钱学敏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要有一种勇于创新的精神和热爱科学与真理的激情。实事求是,不畏艰险,敢于坚持真理、追求真理、为真理而斗争。

思维科学的研究对象与体系结构
——学习钱学森有关论述的体会
——在北京大学演讲——

关于思维与智慧的奥秘,自古以来,很多学者一直在探索,只是他们研究的角度与途径不尽相同。生物学家多从脑科学入手,社会学家常常侧重于认知心理学,哲学家对于人们的思维活动则往往从主客体的相互关系、从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的角度去研究。近 20 年来,钱学森教授提出研究并建立的思维科学,是从一个崭新的视野展开的,它既吸取了哲学、逻辑学、脑科学和认知科学的营养,又采撷了

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丰硕成果,并使之融为一体,因而,其体系、内容和研究方法更具实践性、科学性与时代性。

钱学森教授认为,思维科学应该是一个独立的现代科学技术部门,并且设想了思维科学的研究对象、体系结构与发展趋势。他的许多思想观点新鲜、超前、有创见。现将其有关论述和我的粗浅体会简述如下,并向大家请教。

一 思维科学的研究是时代的需要

在这 21 世纪的大门徐徐开启的时候,我们进入了高科技群体飞速发展的新时代,世界日趋一体化。世界范围内以微电子信息技术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和通信为核心的信息革命浪潮拍岸而来。科技经济、高科技产业随之迅猛崛起,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科学技术已对经济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因而,必然要求人们具有高度的思维能力和智能,以便掌握现代的高科技。在这方面,计算机技术革命特别是“智能机”技术的发展是关键,是国内外争夺的制高点。如何使计算机模拟人的思维活动,具有部分人脑的智能,使人-机结合,互相促进,发挥更大的效能?这一问题迫在眉睫。迫切需要有一门新的关于思维的科学,从理论上和技术上去指导、去配合、去解决。钱学森教授正是抓住了这一科学技术发展的特点和时代的需求,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一下子就提出建立三个新的科学技术门类: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和人体科学。他说:“这三个新的科学技术部门都有强大的生命力,推动系统科学研究的是现代化组织和管理的需要,推动思维科学研究的是计算机技术革命的需要,而推动人体科学研究的是开发人的潜力的需要。”

思维科学的建构与发展亦已具备了客观条件。按照钱学森教授的社会发展观,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与革命,必将引起经济的社会形态,主要是社会生产体系的变革与飞跃,这就是产业革命。在人类历史上已出现了四次产业革命,我们正面临的是以相对论、量子力学和信息技术革命为先导的第五次产业革命,21世纪相继到来的将以生物科学和人体科学为先导的第六次和第七次产业革命。钱学森教授认为,当今的“信息革命的一个与前几次产业革命不同之处似在于直接提高人的智能”。如果说,18世纪下半叶开始的以蒸汽机技术革命为先导的第三次产业革命,推动了以机器为基础的近代工业兴起,开创了人-机结合的物质生产力;那么,第五次产业革命,由于高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信息网络、计算机、多媒体、灵捷技术(virtual reality)等的使用与普及,不仅进一步扩大与提高了人-机结合的物质生产力,而且将大大促进人们的思维与智慧的发展,开创出人-机结合的精神生产力。这两种生产力紧密地结合起来,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必将创造出新的人类、新的社会、新的思维。

二 思维科学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

思维科学是钱学森教授提出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一门极为重要且内容丰富的科学技术部门类,它的学科建构与其他科学部门的层次结构一致,它的完善、发展与整个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密切相关。因此先介绍一下钱学森教授对科学与技术的界定以及他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观。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钱学森教授就特别强调“现代科学技术不单是研究一个个的事物、一个个现象,而是研究这些事物、现象发展变化的过程,研究这些事物之间的关系”。并

指出“现代科学技术已经发展为一个很严密的综合起来的体系”。因此,他提出:“认识客观世界的学问就是科学”,“改造客观世界的学问是技术”。各科学部门的分类,是根据客观实际情况,从人们研究问题或看问题的角度之不同来划分的,它们研究的对象虽然有其与众不同的特征与范围(例如其不同的外部特征、内部构造、运动形态、矛盾特殊性等等),但从总体上来看,他们都是互相关联的、统一的,即都是研究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人和人化自然、人类社会等)的。

这个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应该包括所有通过人类实践认识的学问,目前暂定为 11 大部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地理科学、军事科学、行为科学、建筑科学和文艺理论。每一大部门又分三个层次: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各门科学技术部门通过各自的哲学概括(桥梁)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相通。各门科学技术的发展受辩证唯物论这一哲学的指导和体系中其他各门科学技术的相互影响与促进,同时,也推动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这个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外围还有大量一时还不能纳入体系中的人们的认知、作为思考的哲学思维以及点滴实践经验,即前科学。

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复杂的网络体系,随着人们不断实践、认识的历史长河之流,各门科学相互贯通、相互促进,将会形成许多新的科学技术部门,人们的认识亦将从相对真理日益趋近于绝对真理。这个体系也是一个哲学与科学、理论与实践、“性智”与“量智”、“科学”与“艺术”相互统一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所包含的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及其外围大量不成文的经验、感受,是我们

进行思维活动所需要的知识和信息的源泉。

三 思维科学的研究对象与任务

什么是思维科学呢?国外有不少相关的研究成果,在外语中说法众多(cognitive, thinking, thought, denken,)。钱学森教授1987年在北京思维科学研讨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言时说:“思维科学就是人的思维的科学,翻成英语叫noetic science”。“noetic”原意多指理性的、智力的或思维的活动。钱学森教授提出的“noetic science”作为一门研究人的思维规律的科学,它侧重研究人脑通过思维活动,怎样加工处理从客观世界获得的各种信息,从而得到正确的认识 and 知识并能进行创造性的思维,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能有所创新。在当前则应注意研究人工智能、人-机结合的问题,注意研究“cyberspace”,探索在有电子计算机影响下的空间里,人脑如何与计算机信息加工相配合以及人脑与电脑合作加工的思维规律和思维方式,以集智慧之大成,提高智能。

思维科学与人体科学密切相关又有区别。思维是大脑的一种功能,思维也是大脑运动过程的产物,所以,思维与大脑不可分割。但思维科学并不是研究大脑的生理活动的。这部分内容属人体科学研究的对象,人体科学是从脑科学、精神学、心理生理学、人机功效学等角度去研究人体的结构和功能态如何承受客观世界的影响和作用的,侧重探索人体和人脑如何获得各种信息。研究人体科学的目的在于充分发挥人的潜在的体能与智能。可见,人体科学与思维科学对人脑与智能的研究角度不同,它们有别又相关。

思维科学与认知科学有相似之处,也有区别。西方认知科学发展的现状与贡献,已有不少介绍,仅从认知心理学来

看,例如 1983 年曾为北京大学客座教授的美国的西蒙(Simon Herbert Alexander 1916—)曾研究人类认识事物的过程和计算机模拟思维,促进了人工智能和认知心理学的发展。中国科学院也有些专家在研究认知心理学。由此可见,今天的认知科学研究的对象既与人的感觉、神经和脑的活动有关,又同人与自然和社会的信息交流有关。因而会有许多值得借鉴的成果。1996 年 3 月,钱学森教授在给我们的一封信中曾说:“我从前(见《关于思维科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8 页)也说过,思维科学的一个别名是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现在又经过 10 年,看来可以说,认知科学是不主动使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的思维科学。我们对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要注意,吸取其有用部分,但不盲从。”

四 思维科学的体系结构

思维科学也像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其他科学技术部门一样,分为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三个层次(见图所示)。

(一) 思维科学的基础科学层次

按照钱学森教授的观点,思维科学的基础科学层次主要包括思维学和信息学两大部分。

思维学中主要有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创造思维等三个重要内容。

逻辑思维 亦称抽象思维,已有 2 000 多年的研究历史,比较有基础。逻辑思维主要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能动地反映现实的认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进行科学的抽象: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分析综合、归纳演绎等思维加工制作,撇开事物的具体形象和个别属性,揭示出事物的本质特征,形成新的认识、新的概念;再运用新

思维科学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客观和主观世界的科学	哲
认 识 论	学

思维^学	逻辑(抽象)思维 形象(直感)思维 创造思维	信息学	基础科学
------	------------------------------	-----	------

科学方法论	情报学	数理语言学	结构语言学	模式识别	知识系统学	技术科学
-------	-----	-------	-------	------	-------	------

密码技术	计算机软件技术	情报资料库技术	文字学	计算机模拟技术	人工智能	智能机	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技术	工程技术
------	---------	---------	-----	---------	------	-----	--------------	------

钱学敏 参考钱学森：《关于思维科学》一文（1984）中“思维科学体系图”编绘。

的认识、新的概念继续进行判断和推理,由此达到概括地、间接地反映现实事物和各种关系,形成对现实的更高一级的理性认识。一般来说,这种认识过程虽是螺旋式上升的趋势,但仍属线型的或枝叉型的。当然,我们所研究的逻辑思维过程,是以客观世界为基础的,离不开反复不断的社会实践、科学实验,是唯物辩证的逻辑思维过程,不是黑格尔的纯思辨式的,也不是康德的先验式的。

在研究逻辑思维的科学中,除了形式逻辑、辩证逻辑,还有数理逻辑,数理逻辑是用数学方法去研究思维形式的结构及其规律的科学,亦称符号逻辑,它与演绎逻辑和形式逻辑密切联系。但由于它起源于对数学推理方式的分析,并且越来越多地使用数学方法,也可把它视为数学中的一个分支。在数理逻辑的边缘,日益发展起一个以计算机为中心,特别是进行有关程序语言以及理论的可行的可计算性研究领域。我看,钱学森教授比较注重的是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数理逻辑,或者说,他希望辩证逻辑和数理逻辑能够结合起来,形成一门“数理辩证逻辑”。他注意到数理辩证逻辑对于人-机结合进行正确有效的思维活动可能会有重要作用。

形象思维 钱学森教授所谓的形象思维又称直感思维,并把灵感(顿悟)思维作为形象(直感)思维的特例。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区别在于,形象思维是一种复杂的、多途径、多回路、非线性的思维方式。如果说逻辑思维侧重微观法,主要是获得“量智”的科学思维方式,那么,形象思维则侧重宏观法,主要是获得“性智”的艺术思维方式。

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并不是单纯对事物表面进行生动的直观(直感),而是努力寻求所观察事物的整体性、规律性的一种猜测与思考。形象思维(包括灵感思维)的形成好像具有一

些经验性、偶然性的因素,但又不是随心所欲、信手拈来的。有时要运用“泛化”思维,即大跨度的跳跃。这只有通过反复实践与思索,具备丰富的经验和广博的科学技术知识,才有可能透过复杂现象和迷雾,从不同视角、不同层次、不同途径,整体地、宏观地去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钱学森教授曾说:“形象直感思维跟抽象的逻辑思维不一样的地方是网络性、并联处理的;而且这里面有一种模糊性在里头,人的形象(直感)思维都是从许多方面同时进行,开始的时候是很模糊的,所谓得到结果就是在这个网络里头的某一个部分忽然出现一个很清晰的形象,好,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那么人的创造过程也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当然,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的成果还需迅速用逻辑规律去进一步证明,用科学实验、社会实践去检验)所以,形象思维非常重要,它是研究思维科学的突破口,因为它一旦搞清楚了,前科学的那一部分,别人很难学到的那些形成科学以前的知识、经验、感受等,都可以挖掘出来了,这将把我们的智力开发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创造思维 创新,是科学发展的灵魂。创新,是时代对中国人民的强烈呼唤!

创造思维的目的是获得新的观念、新的智慧。钱学森教授认为:如果说逻辑思维是微观法,形象思维是宏观法,那么创造思维就是微观与宏观相结合。也可以说,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都是为了实现创造思维而思维的,就此而言,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都是手段。创造思维才是涌出智慧的源泉。目前来看,逻辑思维的任务基本上可以交给计算机(智能机)去干,而形象思维的计算机化才开始,现在主要靠人,至于创造思维,现在只能靠人了。当然人在进行创造性思维的时候,离不开计算机和信息网络。

创造性思维可以说是各种思维方式中最高的思维方式,是人类思维中最亮丽的花朵、最理想的成果。但是,真正达到创造思维,获得创造的灵感,不是一蹴而就的,也没有什么捷径和窍门,需要的是一分天才,九分汗水,需要的是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走人-机结合“集大成、得智慧”的道路。这就是:

首先,要有一种勇于创新的精神和热爱科学与真理的激情。实事求是,不畏艰险,敢于坚持真理、追求真理、为真理而斗争。

第二,要有一个科学的宇宙观、人生观,必须掌握研究科学的科学方法,这就是要掌握唯物辩证的科学观、方法论。

第三,要刻苦钻研,努力拥有广博的多学科的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包括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已列入的和尚未列入的许多新的学科和尖端技术知识。

第四,破除迷信,从实际出发,反复实验,认真观察,哪怕是罕见的现象也不放过,对其进行科学的研究与探索,更要尊重并注意学习专家群体的智慧和经验。

第五,人-机结合,利用信息网络等高新技术,采取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技术方法,集古今中外智慧之大成,激发专家群体的心智,达到创造思维。

第六,在利用人-机结合的信息技术集大成得智慧的过程中,要注意运用多种唯物辩证的思维方式,特别是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使之相互结合。

例如,把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包括灵感思维)方式结合起来(把微观与宏观结合起来)、把还原论的思维方式与整体论的思维方式结合起来(从整体上观察和解决问题)、把科学的思维方式与艺术的思维方式结合起来等等。

钱学森教授在强调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必须相结合时曾说：“从思维科学角度看，科学工作总是从一个猜想开始的，然后才是科学论证。换言之，科学工作是源于形象思维，终于逻辑思维。形象思维是源于艺术，所以科学工作是先艺术，后才是科学。相反，艺术工作必须对事物有个科学的认识，然后才是艺术创作。在过去，人们总是只看到后半，所以把科学与艺术分了家，而其实是分不了家的。科学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科学。”所以，钱学森教授时常强调科学家要有些艺术修养，艺术家要懂得些现代科学技术，这样才易于认清客观世界，获得新的智慧，形成创造性的思维，有惊人的创新。

在思维科学基础科学层次中，除思维学，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即信息学。信息学是研究什么的呢？

信息也就是情报，它对于人们的认识与思维过程，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美国的申农(C. Shannon)和维纳(N. Wiener)就在研究探索关于信息的理论。钱学森教授注意到他们的成果，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信息学主要是研究信息和信息过程的学问。钱学森教授还说：“信息是由一个出发点、一个传播渠道和一个接收点组成的。……一切信息的传递，都是物质运动。”也就是说一切信息的传递都有一定的物质载体，例如，教师在课堂里讲话，语言的声波是靠空气的振动传播给大家的，是空气这种物质运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和大型文艺演出的现场直播，是通过无线电波和通信卫星转播的，是借助电磁场这种物质运动。所以，从物质运动的信息传递方面来看，其中的信息量等问题也是信息学要研究的问题。

信息学要涉及信息、系统、控制的理论。那么，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三者是什么关系呢？人们一般都认为它们是相

互并列的“三论”。钱学森教授认为,实际上,信息的变换和控制的问题都是在相应的一个系统内部产生和进行的。所以,核心问题是系统,就是一个系统论。他说:“我想,整个系统里面的结构是非常重要的,由系统的结构产生的功能,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而功能必然有信息传递,也会有控制的问题。”¹所以是“一论”,即系统论,而不是“三论”并列。但这不是说研究信息论不重要,而是要我们特别注意信息论与系统论的关系。从思维科学角度研究信息学时,就不仅要考虑控制的问题,更要注意将其相关的整个系统联系在一起进行思考。

思维学与信息学难解难分。不管人们采取何种思维方式(逻辑的、形象的、创造的),都离不开信息网、信息源和各种有关信息。信息在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或许可以说,人的思维质量,除了思维方式,更重要的一是靠自己的知识结构和基础以及亲身的社会实践和科学实验;二是靠掌握前人和他人的知识和经验。也就是说,思维活动所需要的信息量极为广泛,涉及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尚未列入体系中的前科学的人类实践经验和感受。简而言之,要达到好的思维质量和获得优秀的思维成果,必须掌握人类创造的全部精神财富所提供的信息。甚至我体会是否可以这样说,没有信息也就无所谓思维,思维活动的过程,就是信息加工的过程。信息学在思维科学基础理论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钱学森教授多年来,每讲到思维学、提到智慧,必谈信息学;每谈信息学,也总是强调它对于思维与智慧的重大作用,当然,信息学的研究目前刚刚起步,还需深入探索,但前程广阔。

思维学与信息学的侧重面不大相同。信息学侧重寻求广泛的信息并研究信息传递过程的特点及其规律,思维学则主

要不是对信息学所研究的信息源、信息量、信息通道和信息接受系统,以及信息运动的速度等感兴趣,而是对提取、采集其内涵——有关的信息知识、情报内容等感兴趣。因为,“思维学的任务就是怎样处理从客观世界获得的信息,包括波普尔(Popper)的‘第三世界’这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源、信息库,以获得改造客观世界的知识”²。

由此可见,思维学与信息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它们共同构成了思维科学的基础理论,并对思维科学的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层次的各学科有着指导作用,而思维科学的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的飞速发展,也必然会丰富和推动思维学与信息学的研究。

(二)思维科学的技术科学层次

按照钱学森教授的观点,思维科学的技术科学层次大致包括:科学方法论、情报学、数理语言学、结构语言学、模式识别和知识系统学等。它们是关于如何把思维科学的基础科学与思维科学的工程技术相结合的科学知识与方法论。也就是关于如何把基础理论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学问。

这里只谈谈钱学森教授关于建立情报学和强调语言和思维结构的关系两个问题。

关于情报学 钱学森教授非常重视,他主张认真研究并建立起情报科学技术的学问——情报学,不能只把它视为一种简单的图书资料工作。什么是情报呢?说法不一,钱学森教授给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情报就是为了解决一个特定的问题所需要的知识,要注意它的及时性和针对性这个要求。”³情报离不开大量资料 and 事实,但情报又不等于资料 and 事实,“情报还要经过一个活化、激活的过程。也就是说,僵化的资料不是情报,情报是激活了、活化了的知识和精神财富,或

者说利用资料提取出来的活的东西”⁴。所以,情报工作有两大方面:“一个就是把资料收集起来,建立资料库,建立检索系统,以便于使用;再一个方面,就是把这些资料活化、激活了以后,变成情报。这就需要分析、研究、提供。当然,这两个方面是互相影响的。”⁵而情报学,“就是把情报工作上升到理论的、系统的学问,使科技情报工作形成一个有效的组织结构体系”⁶。

情报、信息是一种特别的精神财富。钱学森教授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出发,又对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作了些补充。他认为,今天作为一个认识主体来认识客观世界,那么,打交道的还不光是客观世界,我们一开始就要同精神财富打交道。也就是人在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起作用的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人,这是认识主体;第二个是客观世界,这是认识的对象;还有第三个,就是精神财富,那是全人类所创造的认识客观世界的工具”⁷。这里客观世界是物质的,是第一性的;认识过程中人的意识活动是精神的,是第二性的;精神财富,那是人类创造的,反映了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这当然也是第二性的。情报、信息就是一种特别的精神财富,是一种特别的知识,它对于人们认识客观世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靠的是情报、信息。

钱学森教授的这一观点吸取了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的一些说法,同时也批评、反对了他的一些观点。钱教授认为,波普尔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世界1是客观世界,世界2是主观世界,世界3是知识世界,它们都是独立的,可以独立发展的),其中强调了知识世界,也就是强调了全人类所创造的知识 and 智慧这些精神财富对于我们认识客观世界的重要性,这一观点是对的,值得借鉴的。但是波普尔又强调了知识是由

心灵的经验逐渐形成的,可以独立发展的,他赞同反决定论的形而上学,这一点是不能成立的,甚至是荒谬的。因为“知识是人去创造的嘛,知识怎么能独立自主地在那发展呢?”⁸知识这种精神财富离开了人的广泛的社会实践活动、离开了客观物质世界本身的发展变化、离开了世世代代千百万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苦学习与钻研、不懈探索与追求,宝贵的精神财富怎能自天而降、自动发展、独立行进呢?又怎能代代相传,自行增添真理的颗粒呢?“精神财富不是物质的,它是人的意识、人的精神在认识客观世界过程当中所创造的东西”。“所以,波普尔实际上是陷入了哲学二元论”。⁹

关于语言学 在思维科学技术科学层次,还有数理语言学、结构语言学。钱学森教授十分重视语言对于思维和智慧发展的作用。他说:“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先有语言、后有文字。人类产生语言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是第一个进步。有了语言表达,一个人在劳动中积累的经验就可以彼此交流。”有了语言、概念、词汇,才可能进行逻辑思维:概念、判断、推理。目前更重要的是在人-机结合进行思维活动时,需要有统一的、规范化的语言文字。特别是在这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新时期,计算机软件的开发及其规范化、标准化,都需要有战略发展的眼光,才便于信息、情报的存储、交流、汇集并与国际联网,综合集成一切有用的、所需要的知识。而“目前电子计算机语言繁杂多样,各不相谋的现象令人忧虑”¹⁰。

此外,钱学森教授还提出从中国文学艺术的语言文字中寻找思维结构,研究思维学的畅想。他说:“既然文学创作中要运用抽象(逻辑)思维、形象(直感)思维和灵感(顿悟)思维,那我国几千年古老的文学作品不就是三种思维的结晶吗?那

我们为什么不从中国的赋、诗、词、曲及杂文小品中学习探讨思维学呢？它们是最丰富的泉源呀。”²

对联是中国旧文人思维的基本功，首先要求“对仗”，按照字音的平仄和字义的虚实做成对偶的语句。

例如：五月黄梅天

三星白兰地

从思维学角度看，上联给出一个语言结构，请下联按此结构去找字、词、零件添入这个结构。思维就在于搜索思想库找材料，这就是对对联的思维学。而形象思维则与对对联的思维相反，它“是有材料、无结构，思维的任务是找形象，即从大量零零碎碎的信息、知识、材料中找出它们内在的、相互联系的结构，以便弄清或说明事物的概貌与整体”²。

以上是思维科学技术科学层次诸多学科中关于情报学与语言学的简要观点。由此亦可看出思维科学技术科学层次的各项技术不但与工程技术比较贴近，而且直接联系着思维科学的基础科学——思维学。

（三）思维科学的工程技术层次

这是钱学森教授所倡导的思维科学的特色。大致包括：密码技术、计算机软件技术、情报资料库技术、文字学、计算机模拟技术、人工智能、智能机，以及多年来正在积极探索的大成智慧工程，即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技术。

或许可以设想，未来的人工智能中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就是人-机结合的“大成智慧工程”。通过大成智慧工程，“集大成，得智慧”，进行创造思维。

采用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技术，其实质是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不是过重依赖计算机，但又十分重视构成人-机结合的工作体系和思维方式，利用计算机、多媒体技术、

灵捷技术、互联网络等,将所需的知识、信息检索、调集出来,与各方面有关专家的理论、知识、经验、判断结合起来,同步快速地对各种类型的复杂事物(开放复杂巨系统)进行从定性到定量,从感性到理性逐步深入的分析与综合。在这种工作过程中,除了专家群体之间民主讨论互相启发、相互补充以外,还可以通过计算机、灵捷技术等快速提供的古今中外的有关信息,启迪参与者的心智,激发集体的智慧,把各种学科的科学理论和人的知识、经验结合起来,发挥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整体优势和综合优势,集智慧之大成,群策群力找出从总体上观察和解决复杂性问题的最佳方案和决策。做到“在定方针政策时居高远望,统揽全局,抓住关键;在制定行动计划时又注意到一切因素,重视细节”,并能有所创新。

钱学森教授近年来对人工智能、智能机的发展十分关注。特别是各种信息技术和设备对人的认识、人的思维的影响。同时他也强调要积极研究人体科学,特别是脑科学。他认为努力理解人脑是怎样思维的,才能开发出有效的、便于人-机结合的计算机软件、发挥人-机结合精神生产力的巨大效率。

钱学森教授一贯认为具有较高文化素养、拥有广博科学知识的人群,如果经常人-机结合地进行工作,同时在思维过程中,把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灵感思维并用,将使人的智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大大提高人的创造思维能力,甚至可能出现智能革命。他曾说:“灵捷技术是继计算机技术革命之后的又一项技术革命。它将引发一系列震撼全世界的变革,一定是人类历史中的大事。”他并且为此于1994年10月亲手绘制了一个图表³。

五 思维科学的发展及其深远意义

综上所述,思维科学的建构与发展涉及广泛的科学技术领域,几乎需要整个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的知识以及广泛的实践经验。仅从发展人工智能这项思维科学的工程技术来看,就不仅需要思维科学的基础科学、技术科学的理论,还需要系统科学、控制论(反馈外部环境与信息)、数学科学、人体科学、脑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行为科学(包括教育学)等等。所以,思维科学的发展固然有其独特的道路。但也与现代科学技术各部门的发展密切相关。

从思维科学体系结构中所包含的内容来看,思维科学不是哲学,它是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一个新兴的重要部门。但它与哲学、认识论紧密相关,无论是在批判吸收国外思想文化成果上,还是在思维科学的建构与发展上,都需要有正确的哲学、认识论的指导,“破除迷信,既不搞机械唯物论,也不搞唯心主义”²。而思维科学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关于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创造思维、思维与智慧,以及人工智能,人-机结合系统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技术等,这些属于思维科学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各层次的成果,都可能促进思维科学通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认识论以及辩证唯物主义的丰富与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科学性与时代性,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大约在 20 年前,钱学森教授在展望人-机结合的思维工作系统的运用与发展时,就满怀信心地说:

“我们所设计的信息系统简直可以包括全部人类千百年来创造的、而且还在不断创造的精神财富。而这全部精神财富可以由我们每一个人随手调用和享受。这不但是从旧的脑

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而且是获得了一个伟大的新世界,从来未有的高度文化的新世界。难道这不是天翻地覆的变化!”³

把我们的智慧集中到整理全人类的知识。全面考察,融会贯通,从而创造出更多更高的脑力劳动成果,人变得更聪明了,人类前进的步伐更快了,那将是“新的人类”、“新的社会”、“新的思维”!

这就是钱学森教授 20 年来殚思竭虑倡导研究思维科学、关注人工智能的发展,精心设计人-机结合的信息系统的目的和意义。

同学们! 尽管探寻思维与智慧奥秘的山路仍漫漫,但是,老一辈科学家钱学森教授已为我们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和方向,他殷切期望年轻人不畏艰险继续攀登到光辉霞蔚的顶峰!

让我们努力攀登吧!

钱学森:《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与人体科学》,载《自然杂志》1981 年第 1 期。

参见钱学森:《我们要用现代科学技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载《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 2 卷,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91 ~ 194 页。

3 参见钱学敏:《钱学森关于科学与艺术的新见地》中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示意图”,载《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 2 卷,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23 页。

钱学森:《现代科学技术的特点和体系结构》(1985 年),载《现代科学技术和科技政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年版。

钱学森:《思维科学》,载《现代化》1987 年第 5 期。

钱学森:《专家系统与思维科学》(1986 年 12 月 22 日),载《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发展纵横观》,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① ② 参见钱学森:《开展思维科学的研究》,载《大自然探索》1985 年第 2 期。

¹ 参见钱学森 1995 年 3 月 16 日给戴汝为的信。

1948 年申农发表了他的著名论文:《关于通讯的数学理论》。他的工作开拓了通讯理论的定量研究。同年,维纳也发表了他的名著:《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或机器中控制或通讯的科学》。用信息过程说明人的认识活动。

^{3 4 5 6 7 8} 钱学森:《科技情报工作的科学技术》(1983 年),载《国防科技情报工作》1983 年第 5 期。

^{0 1} 钱学森:《电子计算机软件与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载 1968 年 8 月 5 日《光明日报》。

² 钱学森 1994 年 9 月 18 日给戴汝为、钱学敏的信。

⁴ 引自钱学森 1999 年 2 月 15 日给钱学敏的信。

⁵ 钱学森:《情报资料、图书、文献和档案工作的现代化及其影响》,载《科技情报工作》1979 年第 7 期。

演讲日期:1998 年 9 月 12 日,本人供稿

江晓原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教授 系主任

在早期文明中,精神占据着极大的比重,古人可以为某种非常抽象的理念去死,毫无惧色。所以,今天我们去想象荆轲刺秦王就觉得很难理解,而这在当时并不是非常难以想象的事。

天文历史年代学初论

——在上海 STS 学术沙龙的演讲——

所谓“天文历史年代学”,就是利用天文学的方法,去解决一些历史学家难以解决的历史年代学问题。

为什么历史年代学问题可以借助天文学来解决?这要从中国古代的政治观念说起。

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如果帝王的统治(政治)是开明的,上天就会呈现出一些好的天象,风调雨顺,并出现一些“祥瑞”的天象。如果政治黑暗,上天就会呈现凶的天象来警告统治者,还会出现水旱灾害、地震等,甚至会把帝王的天命夺掉给另一个人。这种思想在古代根深蒂固。所以,每当他们(帝王)作重大决策时就要去观天,把当时的天象记录下来,然后,

根据记录来判断自己想做的事能否成功。如果想做的事涉及到改朝换代,那就要更慎重研究天象记录了。首先要观测天象,天命是否归我?当然改朝换代最终需要付诸军事行动来完成,但完成后是否被天下百姓所接受?这不同现今只要军事力量强大,你不接受也得接受。但在古代并不是这么简单,你得让百姓承认你有这个王权。

在早期文明中,精神占据着极大的比重,古人可以为某种非常抽象的理念去死,毫无惧色。所以,今天我们去想象荆轲刺秦王就觉得很难理解,而这在当时并不是非常难以想象的事。

由于古人的思想观念是这样的,所以他们就要观天,把当时的天象都记录下来。既然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前后往往会记录着当时的一些天象,那么后世的人们就会想,如果这些天象是周期性的,我们只要重新去推算这些天象,不是就可以知道某些未留下确切年代记载的历史事件的年代了吗?

这个想法从汉代(西汉末年的刘歆开始)就已经有了。刘歆给我们留下的一部历法《三统历》,其中专门有一章称为“世经”,记载了当时用天文学方法去推算历史上一些有关天象的记录。尽管刘歆的这套历法对有些历史年代不能作出精准的推算,但他已经掌握了一种初步的推算方法,即利用周期性函数来推算历史的年代。比如在“世经”中核算了春秋中记载的几十次日食(日食是一个可以推算的天象),刘歆的推算大部分都是正确的。“世经”可以说古往今来、也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个用天文学方法去解决历史年代学的成果。

关于“武王伐纣”的年代,刘歆也推算过,他所推算出的年代,与我们今天推算的结果大约相差70年左右,相差并不是很大。刘歆的基本思路,现在看来完全是对的。我在“断代工

程”的一次会议上曾说:如果把我现在用的奔腾电脑给刘歆用的话,说不定他也能计算出武王伐纣的确切年代了——当然这是半开玩笑的说法,事实上当时他所掌握的天文学方法也太落后。

用天文学方法解决一些历史年代学问题,是因为天体力学现在能够很准确地回推那些周期性的天象。比如说我们想知道 3 000 年前某月某日九大行星在什么位置上,当时有一次日食或者月食发生在几时几分,在什么位置(地方)能看见,现在的天文学家都可以精确地计算出来。

然而仅仅依靠天体力学并不能解决像“武王伐纣”的年代这样复杂的问题,这里还有一个必要的条件是计算机的使用。天体力学在理论上可以计算得十分准确,但是你要去解决历史年代学问题的时候,就不是我刚才说的我们想知道 3 000 年前某月某日九大行星的位置在哪儿这么一个容易计算的问题。如果能指明几月几日,你岂不是就已经知道那个事件的年代了。在解决历史年代学问题时,需要做大量的计算,因为一个事件发生在什么年代你并不知道,不知道,这就意味着你要对一个很长的时间段进行地毯式的计算。比方说,我连续计算它 100 年,把每天的天象都排出来,这时,没有计算机是不行的。

直到 10 多年前,中外学者在做这方面天象计算时还感到非常困难。比较早的有一些华裔美国人,他们在美国的大学从事理工科的教学工作,但对中国的历史特别感兴趣,自己张罗着办个小刊物,当时他们的条件比起国内已经要算好的了,比较早已经开始把计算机用于天象的计算,只是当时的计算机比较老式(纸带穿孔式)。尽管他们用计算机进行工作,但计算的工作量是相当大的,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又慢。直到最

近几年,功能极其强大的台式计算机已经普及,这时来做天象计算才相当方便,条件才成熟了,你可以地毯式地去排算大量的天象,并从中进行筛选。所以说,天文历史年代学要进行卓有成效地计算,也就是这几年才有可能,再往前是没有这个条件的。

20 世纪虽然已有不少中外学者在研究“武王伐纣”年代时考虑到了天象,但是他们一般只用一种或两种天象来计算。因为他们不可能对很多天象都进行计算,当时没有这个条件。一个天象就可能要计算几个月。也许他们心里也明白,应该把所有的天象都进行计算,但实际上在当时是力不从心的。另外还有一些研究者,尽管是多年在天文台工作的,却直到今天仍然不会使用国际上最先进的天文学星历表,以至于多年来他们一直骇人听闻地使用着 19 世纪的——现在说起来就是两个世纪前的星历表。这些因素都导致许多结论是偏颇的、各执一端的。

“武王伐纣”的事件非常奇特,在中国历史上所有的重大事件中就数它留下的天象记录最多。根据我们的普遍搜寻,一共有 16 种天象之多。通常,我们在历史上找到一些改朝换代时留下的天象记录,一般有 1~2 项或 2~3 项记录就不错了。武王伐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天象记录?这可以从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史上得到解释。

“武王伐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详细文献记录的改朝换代,我们今天讲的“革命”这个词语,就是从“武王伐纣”开始的。所谓革命,就是要把对方的“天命”(统治人间的权力是天给的)革掉,这个行动称为革命。在周朝这个革命之前,商朝的成汤也是从夏朝的夏桀手中夺了天下,但对成汤的行为留下了多少具体记载呢?基本上没有记载留下来,也没有什么

文物能证明这件事,只不过是个传说。

我们必须注意到,天命理论,实际上就是周朝人创立的。周人以一个诸侯小国反叛中央大国,并最终把大国打败,成了天下的主人,他们当然要造一套理论,竭力让天下百姓知道,他们的天命是合法的。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些天命理论,主要来自儒家学说,而儒家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周人所创立的改朝换代理论,本来是为自己服务的。儒家把成汤灭夏也纳入自己理论的范围,所以我们经常看到“汤武革命”的说法,表面上包括了商之前的夏,实际上这些说法是从周人开始的。

正因为这样,周朝人留下了大量关于“武王伐纣”获胜时前后的天象记录。但这些天象记录多了也挺麻烦,如果历史上只留下一个天象记录,而且这个天象确实发生过,并且也是可以回推的,我们的天文历史年代学的任务就很简单,只要推算这个天象就可以得出结论。但“武王伐纣”时记载有 16 种天象,这 16 种天象从理论上说在推算过程中都应该考虑进去。以前的推算过程为什么没有把这些天象都考虑进去呢?一方面是当时的条件限制,另一方面是学科背景造成的,有些文科学者对逻辑上的事情比较疏忽,认为挑选一个比较符合的天象即可,这是知识背景造成的区别。对于我们学理工科出身的人而言,认为这 16 种天象都应该考虑,是非常自然的。

怎么考虑或计算呢?我们的具体方法是:先对这 16 种天象进行验算。

历史上对“武王伐纣”年代的探讨已经有了上百篇的论文,其中提出了 44 种年代——3 年前我们的课题启动时统计的是 44 种,但这两年又出现了新的说法,实际上不止 44 种。对那么多的不同说法,首先我们考虑这些说法中的年代分布,

前后相距 100 多年的时间,然后我们对 16 种天象在 100 多年的时间段内进行验算,如果有某种天象在这 100 多年的时间段内不可能发生的,我们就将这种天象排除(有些天象是古人误记)——我们强调,绝不能遇到天象记录与自己的假说不一致时,就轻率地将天象记录说成是后人的附会。但如果天文学的计算表明在这 100 多年的时间段内某种天象确实不可能发生,那就是非常过硬的证据,它只能是古人误记。

也许有人会问:你干吗只验算这 100 多年,为什么不多验算一些年代?那是因为“武王伐纣”的年代毕竟有个大致范围——你总不能设想周武王是在去年伐纣的吧?100 多年的时间已经非常宽泛了。所以,我们把这 100 多年都验算了,排除掉若干种天象,那些通过验算的天象,就是在这 100 多年的时间段内确实可能发生的。

但是还有些天象虽然在这 100 多年内确实可能发生,却是不能用来定年的。这听起来似乎很抽象,必须举一个例。

比如说很有名的哈雷彗星,中国已故的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钰哲教授曾发表过一篇论文,他研究了哈雷彗星历史上的记录,发现了 20 多次回归在中国古代文献上都有记录,他在推算“武王伐纣”的年代时,这 16 种天象记录中有一种就记录着“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这句话的意思是:“武王伐纣”时天上出现了彗星,授殷人其柄,表明了这颗彗星的彗头在东面(殷朝人在东面,武王从西面去讨伐,古人把彗星比作扫帚,彗头被看成是扫帚的柄)。张钰哲教授根据上述信息推算出:在公元前 1057 年有一次哈雷彗星的回归,他认为,如果“武王伐纣”时出现的彗星是哈雷彗星的话,那么,“武王伐纣”的年代是公元前 1057 年。这个结果可以说是天文历史年代学在我们做出的“武王伐纣”年代之前的最为轰动的一个

结果,张钰哲教授的这篇论文发表在“文革”晚期的《天文学报》上。当时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位教授看到这篇论文时非常振奋,并在《历史研究》上写了一篇专门介绍张教授这个结果的文章。历史学家通过《历史研究》刊物知道这一结果后,当时都认为这是最权威的结果。如现在上海博物馆任副馆长的一位学者对我讲,当时张钰哲教授的结论被我们看成是迄今为止最科学的结论。

然而现在我要讲的是,偏偏哈雷彗星这个天象是不能用来定年的天象。为什么是这样的呢?我的第二位博士研究生卢仙文的博士论文是专门从事研究这个问题的,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就指出了:先要解决“武王伐纣”时那颗彗星它是哈雷彗星的可能性这个问题,因为张钰哲先生说的是“如果”它是哈雷彗星的话,那么“武王伐纣”是公元前 1057 年,而如果它不是哈雷彗星的话,那么结论当然不成立了。现在分析“武王伐纣”时出现的那颗彗星它是哈雷彗星的可能性有多大?这是可以分析的,因为彗星它有不同类型的,我们知道不同类型的彗星在整个彗星中占的比例。分析得出的结果是:“武王伐纣”时出现的那颗彗星是哈雷彗星的可能性只有 0.3% ! 我们大家都知道,不能把结论建立在 0.3% 这样小的概率上,因此这个天象是不可用来定年的。

在 16 个天象中最终确认可以用来定年的,同时它又是在 100 多年时间段内可能出现的天象一共是 7 个。在确定了 7 个天象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寻求一个让这 7 个天象都符合的年代。如果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年代,就说明目前的天文学研究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如果找出来了几个年代,同样也说明天文学研究的作用有限——如果出现几个年代就存在一个取舍的问题,取舍时已经不能再用天文学的条件了。因为

天文学的条件在整个演算过程中已经用尽了,势必要引用其他手段来取舍。

我们使用现今国际天文学界公认最先进的星历表 DE404——这是由该星历表的研发负责人 Stanish 无偿赠送给我们的——来进行我们的推算。幸运的是,做出来的结果只有一个(年代),这个结果就让这 7 个条件(天象)都符合了。整个过程主要是依靠计算机的计算(我的助手钮卫星博士经常是晚上睡觉前将程序放入计算机,到第二天早上算出一个结果)。这 7 种天象都能吻合,确实是很奇妙的,它给出的不仅是一个年代,同时还是一个日程表,因为在这 7 种天象中也包括了日程安排。周朝人当时已经有了记录重要事件的习惯,每天发生什么事都记录下来,同时也记录了这天的天象。这个行为可以联系到后来帝王的起居注(专门记录帝王每天的衣食住行),可以推想起居注在周朝是存在的,当然那时可能不叫起居注,所以历史上留下了一些“武王伐纣”时若干的大事记,同时也不能排除后来的历史学家删改这些记录,或者把一些没有重大事件记录的日子给拿掉了,留下的记录都是一些有事情的。比如说今天出兵,隔几天发生合朔,再过几天渡过了黄河渡口等。一旦做出符合这 7 个天象的结果的同时,它也就是一个日程表。

“武王伐纣”的具体年代和过程是:

公元前 1045 年 12 月 4 日,周朝的军队从周地出发,出发时周武王并没有随军,大约行军一星期左右,周武王再从周地出发,稍晚时到达军中。到了第二年(公元前 1044 年)的 1 月 3 日,军队渡过了孟津(黄河渡口)。两年前,周武王曾率八百诸侯到过孟津渡口,当时在渡口作军事示威,诸侯们对周武王说可以讨伐殷纣了(这就需要渡过黄河去),周武王对众诸侯

说,你们不知道天命,现在还不行,大家就回去了。过了两年,公元前 1044 年 1 月 3 日,周武王再次来到了孟津,并挥师渡过了黄河,正式向商朝宣战。渡河后第 6 天(公元前 1044 年 1 月 9 日)的清晨,在牧野地方开始决战。相传当时商朝军队有 70 万人,但在决战时都倒戈了,因为商朝的统治已经不得人心了,周武王的军队摧枯拉朽般地将商朝军队击溃。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牧野之战”。

对“牧野之战”的年代,目前文献上没有确切的记载,各种推算很多。但这一天是有文物记载的,1973 年在陕西出土的一个叫利簋的青铜器,簋是一种盛酒的器具。被称为“利”的人,是周朝的一个史官,他在“武王伐纣”的战役中立了功,周武王为了奖励他,就为他铸了这个簋,当时大臣或者诸侯,谁要是立了大功,就会赐你一个青铜礼器,上面铸有你的功绩——这和现代的勋章、奖状等类似。从陕西出土的利簋上铸的文字清楚地记载着,“牧野之战”的日干支是甲子,这天早上有岁星上中天的天象(“岁鼎克昏”),一个天体“上中天”,是指它走到当地子午线,恰在正南方(太阳走到上中天的位置就是当地的中午)。现在我们来推算当时的天象,公元前 1044 年 1 月 9 日这一天的日干支就是甲子,而且这天早上在牧野当地时间 4 点 55 分,我们可以看到岁星——木星——上中天的天象,这些天象条件是如此奇妙地吻合。

岁星上中天这个天象是目前唯一在文物上出现的天象,其他的天象都是从文献上留下的,而文献上留下的记录本身陈述的年代又在“武王伐纣”之后,至少间隔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所以,有些人对文献记录的真实性的怀疑。我们的做法是不管它可疑不可疑,用天文学的方法去验算它,不可能发生的天象已经被排除,凡是可能发生的就对其进行推算。

因为 7 种天象同时满足是一个概率非常小的事件,不是随便可以满足的,所以,可以相信古人确实留下了一些真实的记录。我们今天能够回推过去并让这些条件同时满足,那是因为古人如实地记载了天象。只有记载是真实的,推算过去才会如此吻合。有人曾推算出别的结论,但不能符合这 7 种天象中最关键的几个天象,那就无论如何不能成立。

上面讲述的主要是围绕“武王伐纣”的年代所展开的一系列工作,另外,还有其他一些事件的年代也是可以用天文历史年代学来检验的。我们最近又做了一项工作,即推算孔子的生年。这项工作可以说是一个特殊的例子。首先,史籍记载:孔子出生前 50 天有一次日食。日食与月食不同,日食发生的次数比较少,每次发生时在地球上只有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才能看到,这就使日食的筛选能力大大超过月食;第二,孔子生年的争议范围很小,只有两年(公元前 552 年还是公元前 551 年)。争议的范围小,日食的筛选的能力又很强,所以这个问题比较容易解决。

在推算当时的日食时,发现在公元前 552 年 8 月 20 日,在曲阜确实可以看到一次日食,而争议的另一年根本没有日食发生。日食一旦确定,孔子的诞辰也就确定了。以前人家为什么没有想到呢?因为这中间还有一个难关,即怎样把这次日食发生的时间对应到公历中来,这涉及到一个换算问题。

通常的思路是,首先要知道当时(春秋)用的是什么历法?知道后就将这个历法与公历去对应。因为春秋时代的日食当然是用当时的历法语言记载的。但偏偏学术界对春秋的历法是有争议的,春秋时用什么历法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既然没有解决,那么换算就会出问题。

我们在计算过程中想到了一个“巧取”的办法,我们采用

的方法是从根本上抛开了春秋时的历法,用天文学上的“儒略日”来表征这次日食。“儒略日”是天文学家常用的一种计算方法,从公元前 4713 年起,这个时间记录系统中是没有年和月的,只有日,逐日加起来连续计算。用儒略日来表征这次日食发生的时间,然后把这个时间与公历去对应是很容易的。我们要解决的是公历哪年几月几日是孔子的诞辰,并不需要去解决当时历法中的年月日如何安排。所以绕开了当时的历法,就可以非常明确地推算出孔子的生日。我们推算出的孔子诞辰是:

公元前 552 年 10 月 9 日。

对于孔子诞辰一直有争议。为什么呢?一是孔子的家族从来不用公元前 552 年这个日子,他们用后面一年的日期即公元前 551 年;二是古人相信,圣人的诞生之年是不可能有日食出现的,因为日食是一个不祥的天象,所以坚持用公元前 551 年。我们今天站在科学的立场上来看,这些理由当然是不可信的。以前常见的孔子诞辰,在年份上依据主张公元前 551 年出生的史料,在月、日上却又依据明确记载为公元前 552 年的史料,这种“各取所需”的做法在逻辑上也是根本无法成立的。

在谈及孔子生年时还涉及到一些戏剧性的问题。1999 年我们在纪念孔子诞辰 2550 周年,事实上,按照我们的推算,1999 年确实是孔子诞辰 2550 周年,但是许多人相信的是后一年(公元前 551 年出生),可是 1999 年他们也在庆祝孔子诞辰 2550 周年,这不就不对了吗?按公元前 551 年的说法,他们应该是在纪念孔子诞辰 2549 周年。因为很多人在关于周年的问题上又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他们未曾注意到,由于公元零年是不存在的,所以计算跨越公元前后的周年问题时应该

减去一年。

比如说 1989 年邮电部发行了一套纪念孔子诞辰 2540 周年的邮票,当时邮电部相信孔子的生年是公元前 551 年。从公元前 551 年算到 1989 年其实是 2539 年,不是 2540 年。当时邮电部发行这套纪念邮票时也没有考虑到公元零年并不存在,其实这套邮票是错的,但是现在根据我们考证出来的结果,这套邮票又对了。

我曾经对媒体说过,凡是在 1999 年举行纪念孔子诞辰 2550 周年活动的人,他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同意我的结论,一是承认自己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当然他们都不愿意承认犯了低级错误(众笑)。

关于零年的问题,在这里可以再说一下。记得有个媒体的记者采访我后,他们领导对零年的问题一时不明白,记者也不能说服他,就让他直接在电话中与我交谈。我问他有一个人在公元前 1 年 1 月 1 日出生,到了公元 1 年 1 月 1 日时此人应该是几周岁?他脱口说是 2 周岁。我说此人明明出生后只过了一周年,怎么会是 2 周岁呢?这样一讲他就明白了。因为公元零年是不存在的,从公元前 1 年接下去就是公元 1 年。上面讲到的孔子诞辰 2550 周年还是 2549 周年的问题其实就出在这里。

天文历史年代学可以有多种的应用,一般对于早期的历史事件,应用得比较多,与考古学联系比较密切,因为早期的历史记录不完备,所以要借助天文历史年代学。

附记:

本文由朱泽民先生根据演讲录音整理而成,在此深表谢忱。

录音整理：朱泽民，本人供稿

编者絮语 演讲者是举世瞩目的国家重点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课题组成员。运用天文学的方法研究历史年代，可谓 20 世纪后半世纪史学研究的又一创新。这一方法再次说明，创新首先源于方法的创新；其次，现代学术研究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一个问题的研究，要求研究者具有多学科的知识背景。

传统与现代

ZHONGGUO DAXUE RENWEN QISILU

杜维明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美国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士

我们认为儒家具有涵盖性的人文精神,可以为文明对话提供丰富的人文资源。联合国已经决定,2001年为世界的文明对话年。不同的文明当然有冲突的危险,不同的族群,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地域,都可能有冲突。假如我们认为有这种危险,对话更是有必要。

目前,如果想开发儒家的人文精神资源,为文明对话创造良好的条件,我们必须发挥全面而深入的批判精神,使儒家传统能够很成功地进行转化。

儒家人文精神与文明对话

——在湖南大学演讲——

各

位老师,同学们、朋友们,大家好!我感到万分荣幸,能够在这个难得的机会在这个千年学府,在对儒家人文精神作出极大贡献的岳麓书院提出文明对话的构

想。就在 1999 年 10 月 7 日到 10 日,我参加了纪念孔子诞辰 2550 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是一次由国际儒联主持的,有 17 个国家的 260 位学者参加的学术盛会。会议总共提交了 160 多篇论文,对儒家从曲阜所谓洙泗源流发展到中原文明,然后从中国发展到东亚,从亚洲面向全球,也就是说儒学发展的所谓三期,都作了超时代、跨文化的多学科探索与研究。10 月 13 日,在贵阳参加了以王阳明的“龙场顿悟”为主题的文化节,在修文县,也就是阳明顿悟的龙场,和贵州的许多学者乃至成千上万的同胞,一起探讨了王阳明心学的价值,比如说“知行合一”、“致良知”和“事上磨炼”。1996 年我到贵阳的时候还没有多少人知道王阳明,这些年大家对他都耳熟能详,对儒学情况已经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前两天,我们在武汉和国内外著名的学者,像饶宗颐、任继愈、庞朴、裘锡圭、李学勤等一起参加了有关郭店楚墓出土竹简的学术讨论会,对儒家原始的古典形态特别是《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所体现的人文精神进行一些了解,自己也作了一些阐释。郭店的出土材料使我们对孔子的第一代学生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有了一些文献上的证据。

朱熹是《四书集注》的集撰者,他明确地提出我们应该顺着《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顺序了解儒家的核心价值。《大学》所呈现的是步步扩展,层层深入的一种修身哲学。如果用一种形象的语言,就是我们可以想象,《大学》所体现的人文精神是一个逐渐向外扩展的同心圆,这个同心圆的外圆应该是开放的;从个人到家庭、到社会、到国家、到世界,乃至到人类的群体、宇宙,它是向外扩展的;同时,它层层深入,由我们的心知,到我们的灵感,再到我们的神明,就像陆象山说的。这个人文精神,一方面向外扩展,一方面向内深入,也就

是孟子说的“掘井汲泉”，尽量在我们存在的条件之中向内发掘，一直要碰到一个能够向外通的源头活水。这一思想体系，不仅在中国，而且后来在东亚，现在在世界上也受到大家的重视。

《论语》提出了“为己之学”，“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在1985年，我在北京大学担任了儒家哲学的课程。我第一次上课就先问我们的学生，说儒家的思想是为己，还是为人？绝大多数的北大学生，包括研究生都说，当然是为人，为人民服务，儒家是为人之学。我说这与《论语》里面说的正好相反，《论语》里讲得非常清楚，儒学是为己之学，不是为了师长，不是为了家庭，不是为了简单的社会要求，而是为了发展我们自己的人格，为了发展我们自己的内在的人格资源，是为己之学。但是这个“己”不是孤立绝缘的个体，而是一个关系网络的中心点，从中心点来讲人的尊严，从关系网络来讲人的社会性、感通性和沟通性。所以儒家在《论语》里提出的基本价值，“仁”的基本价值，有两个向度，一个是“为仁由己”，每一个人都可以阐发他的内在道德资源，每一个人都可以发现他的独立人格，同时人一定要感通，一定要通过同情，逐渐地展现儒家，从这个角度来看，儒家所体现的不是一般我们说的道德说教。有一个日本的学者，我与他曾在韩国进行过学术交流，他说假如我们把《论语》中孔子的人格来作一种美学的欣赏，不是要怎么学它、模仿它，而是看他的人格怎么样发展，会给我们一种灵感。从这个角度来看，《论语》所体现的人文精神有美学的价值，有伦理学的价值，有宗教哲学的价值。在学术界，美学、伦理学、宗教哲学是三块完全分割的部分，美学是讲人的感性、觉情；伦理学讲道德的规约；宗教讲信仰。我们把感情彻底地转化，才能发展道德理性，我们要跳越道德理性，

通过信仰的飞跃,才能进入宗教的领域。但儒家所体现的人文精神,我们的道德实感是在感情之中体现的,是在人伦之中、日常生活中体现的,不是虚幻的、抽象化的、理想化的说教,它每一句话都有实在的意义。孔子和他的学生之间的交流,就是要体现这种人文精神。另外真正的道德理念必须要向外扩展,不仅要从个人到社会,而且要有人类全体,甚至要超越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所以《论语》所体现的美学、伦理学、宗教哲学是贯通的。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开始提出中国儒学史上的几个大问题。他的问题意识非常明确,人与一般禽兽有没有区别,文化和非文化有没有分别,真正的公益和唯利是图有没有区别,霸道和仁道、王道有没有区别,这是孟子思想中的四个最重要的辩论,也就是所谓的人禽、义利、王霸、夷夏之辩。孟子所讲的人和禽兽不同,从孟子的角度来看,所有的生物都有气,而只有植物才有生,只有动物才有知,只有人才有义,人除了气,除了生命,除了意志,还有道义。从儒家的角度来说,人是具体的,活生生的,存在于世界的人,不是一种抽象的观念,所以一定有特殊的族群,有性别,有特殊的语言,甚至有不同阶层,乃至不同的年龄代。每一个根源都是塑造人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但条件不是限制,假如我们能把这些条件转化成我们逐渐在发展中尽量体现价值的人,那我们虽然是某一族群的人,我们也能体现普遍的人的价值;虽然有不同性别,我们不会为性别所限制;虽然有各自特定的语言,但我们的价值可以超越语言;我们有特定的出生地,我们对出生地有非常深刻的情感,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也可以通过转化,超越我们的出生地,甚至我们的年龄代。由于这个原因,《孟子》里面对两种思想进行了批评,一种可以说是极端的个

人主义,即杨朱;一种是极端的集体主义,即墨翟。孟子所要走的这条路是中道,仁义内在。所谓仁义内在就是这种价值不是外在强制的枷锁、教条,迫使我们成为有道德、有操守的人。我们每一个人的内部都有足够的资源,通过我们的反省来发展我们的人格。我们的人性,可以从我们最根本、最有价值的感情来体现,比如说恻隐之情、羞恶之情、是非之情、辞让之情,即所谓四端。这中间特别突出同情。我们不忍最心爱、最亲近的人受苦受难,可能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对路人、其他的人没有这种感情,但我们希望把这种感情向外推,不仅对所有的人受苦受难我们都不能忍,甚至对植物、对动物也是如此。这是我们的“仁”逐渐扩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非常具体的,但是又有非常崇高的理想,要把“仁”的差等性和“仁”的普世价值结合起来。

我觉得在“五四”以后,有一种很极端的思潮。首先我们忍敌人,甚至狠打落水狗,慢慢地,即使我们的朋友不够前进,观点不够全面,我们也能忍,后来甚至我们的亲戚朋友,乃至我们的父母、兄弟,我们也能忍,这和儒家传统就有了非常大的差距。儒学从不忍慢慢向外推,所有的情在这里面都有价值,不是简单的温情主义。真正的情是有价值的,但情要向外推,假如不向外推,它就变成自私自利,狭隘的家族主义,乃至人类中心主义。如果向外推,它可以成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宽广的人文精神。很多国内第一流的学者到晚年发现了这种精神价值。例如,冯友兰先生认为“仇必和而解”,突出“和”,突出沟通的价值,甚至要回到他早年所理解的张横渠的四句话,这就是大家所非常熟悉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宏观的人文精神,在《中庸》里体现得特别突出。《中庸》里有一个非常有明确价值的

信念,如果我充分了解自己的人性,我就可以了解一般人的天性;如果可以了解一般人的天性,我就可以了解物性;假如我能真正地了解物性,我就可以“参天地之化育”,参加天地大化流行的创生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参加天地之化育,则我可以与天地为参。这也就是说,天地人可以成为一个全面的、整体的人文关怀,这是人文精神全部的开展。

人文精神有四个不可分割的向度,或者说不可分割的侧面。第一是个人,如果你还记得那个同心圆的话,那个同心圆,一个是个人,一个是群体,一个是自然,还有另外一个是天道,它们是四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是每一个人要通过修身使自己的身心灵神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每一个人的事业。所以在《大学》里面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这个根本,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是我们的义务,使得我们的身心和谐,使得我们的身体心知、灵神能够配合,成为有机的一个整体;第二个原则,个人和社会要进行互动,社会应从家庭一直到人类社会,这中间是错综复杂的,特别突出家庭的重要性,不是说要回复到简单的家族主义。近现代儒学家对家族,就是礼教吃人的家庭现象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康有为认为儒家的“五伦”都可以归为朋友一伦,甚至父母、夫妇、兄弟这些伦常都不重要,要打破家庭的困境。熊十力先生甚至讲得非常极端,家庭为万恶之渊。在很多家庭里面,对妇女的歧视,对于年轻人的暴力,对于弱势团体的不重视,这些坏的事情都出现了,我们要彻底消除。这些现代情绪的观点,当然有它的价值,但是个人如何和家庭、社会,与更宽广的社会群体进行健康的互动,这是每一个人要通过自己的修身哲学来发展的;第三个基本原则就是人类全体和自然能够进行持久的和谐;再一个呢,就是人心与

天道能够相辅相成。

有的学者说“天人合一”大概在宋代才开始,其实董仲舒就提出了“天人感应”、“天人相应”这种天人间的互动的观念。在中国(包括港澳台地区)和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一些最杰出的思想家,都提出了这种观点。像钱穆先生在去世之前,就说他有一个彻悟,那就是中华民族对世界人类全体的贡献就是一个天人的观念。另外冯友兰说天地境界,熊十力说最后他要回归到《易经》里面那个生生不息、自强不息的创生的观念,梁漱溟先生讲人心与人生,乃至唐君毅先生提出了人的心灵有“九境”,最高的境界是道德流行,天人能够合一。这个观念,我们可以这样说,儒家所展现的人文思潮,和西方从启蒙运动以来所发展起来的以人类为中心的思想有相当大的不同。儒家的人文精神是一个涵盖性的人文精神,要包括自然,也要包括天道,它走的不是一条归约主义的道路。在定义人的时候,不把人当作是一个隐性的动物,或者说一个政治的动物,或者一个能运用工具的动物,或者是当作一个可以运用语言的动物。

在很早,古典的儒家思想就把人的多元多样作一个多元的展示。人是一个感性的动物,天地万物人为贵,因为他最灵,最有感性。这种感性可以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共鸣来展示。人与人之间可以共鸣,人可以跟自然、生物、无生物共鸣,即使是无限遥远的星球跟我们也有感情的联系。这种感性的情,在传统中国思想就是诗教、乐教,使人成为一个美学的动物。不仅如此,人是一个社会的动物,这是《礼记》、礼教所体现出来的。我们上面说过,“五四”以来批判吃人的礼教,是强制人、要人做循规蹈矩的工作,给人一种强烈的霸权压制感,这是礼观念的异化,不是本来礼的观念。人是一个社会的动物,

一定要跟人进行长期的健康互动,这是《礼记》里面所体现的价值。同时人也是政治动物,作为一个政治动物他要在政治中生活,庄子甚至说这是“无可逃于天地之间”。《尚书》所体现的最好的政治是属于人道的政治,清廉的政治,能让各种不同的人都能发挥他的才智,发挥他们的价值。人也是历史的动物。人是有集体记忆的,长期的集体的记忆形成了我们今天的文化。有很多有古无今的文明,像古埃及、古代希腊,今天我们要了解这些文明,就要到博物馆里才看得到。也有今但古并不很长的文明,比如说俄罗斯和美国;既有古又有今,源远流长的文明不多,有印度的文明,中国的文明。而中国的文明历史意识特别强,有强烈的沉积性。可是我们现在碰到的困境,就是两三千年以来的历史和近百年的记忆非常短暂,这是很大的困境。同时人也对超越有一种向往,有对理念的追求,对价值的追求,同时还有一种终极关怀。《易经》所体现的就是终极关怀。所以《六经》体现了六种不同的人文价值和人文精神。人是感性的,是美学的,是诗教的、是礼教的,是有社会性的,是有政治性的,是有历史性的,同时人也是超越的,向往终极关怀的动物。这个思潮在古代中国展现以后,成为人类文明重要的文明遗产。

到了宋明以来,这种思潮又有进一步的发展,而岳麓书院可以说是对这一思潮作出极大贡献者,在人生观和宇宙观方面尤其突出。在宋明时代就提出“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同时他们所讨论的气、理、心、性,都不是我们现在认为的抽象的形而上的、跟我们人文世界没有关系的理念,这些所讨论的问题都是和我们日常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价值。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时朱熹和张栻就在岳麓书院进行了三天三夜的辩论,讨论《中庸》里面“中和”的问题。这个“中和”问题是情的问

题,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恻隐、是非、羞恶、辞让之情,所谓四端之情,每一个人又都有喜怒哀乐。这两种不同的情,我们怎样理解?一种,比如说我突出恻隐,恻隐这个情越多越好,越有爱心越有同情感,那么我们就越像人。另外,喜怒哀乐这种情,假如我们不调节,不转换,就会伤害我们的身体,使得社会发生不同的困境。有一种情越多越好,有一种情是要转化的。这些讨论后来在中国并没有很好地发展。但在韩国的儒学中有一个“四七之辩”,就是“四端”和“七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讨论一些非常复杂的观点,都是和我们如何做人,如何在人伦日用之间安排我们的感情生活,理性生活,我们的社会生活,我们的个人生活,怎么样和我们的家庭、亲戚、朋友进行健康的互动完全联系在一起的课题。他们所提出的这些,如果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以仁爱心和关怀来发展人的道德理念。王阳明在贬到贵州的那一年也到过岳麓书院。他的《大学问》里特别提出“一体之仁”,从“亲亲、仁民、爱物”开拓出去,发展出去,达到“一体之仁”。这个“一体之仁”又是有分别的,一方面是和天地万物合为一体;另外,这里面又有非常明显的分殊、远近的分殊。这非常现实,但又有深厚的理想主义。它不是一种浪漫主义,不是一种个人主义,而是一种非常高深的哲学。但这个高深的哲理又可以在人伦日用之间发展。他曾经讲过一段话,说有很多每一个人都能做得到的事,但我并不一定能做到。我对父亲很尊重,但希望我的孩子对我也一样,这件事情,我现在还办不到;我对我的君应该尽忠,但期待我的臣能够对我一样尽忠,这个我还办不到;我对我的朋友十分信,但期待我的朋友对我信,这个我还办不到;对于我的兄,我有一种敬重之感,但希望我的弟对我这样,这个我还办不到。这是非常简单的人伦日用之间的关系,我们每天

都会碰到,但我每天碰到的价值,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有非常深厚的内涵,我们需要慢慢地去陶冶。社会上如果没有这种价值,没有这种理念来陶冶,这个社会是很难安定的。这个观念非常平凡,但又有非常深厚的哲学内涵。

我们认为儒家具有涵盖性的人文精神,可以为文明对话提供丰富的人文资源。联合国已经决定,公元 2001 年为世界的文明对话年。不同的文明当然有冲突的危险,不同的族群、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地域,都可能有冲突。假如我们认为有这种危险,对话更是有必要。目前,如果想开发儒家的人文精神资源,为文明对话创造良好的条件,我们必须发挥全面而深入的批判精神,使儒家传统能够很成功地进行现代转化。中国最近的一百多年以来,一流的知识分子一直在投入这个之中。这一非常艰苦的工作,也就是如何使儒家这一具有涵盖性的人文精神和 18、19 世纪从欧洲发展出来的启蒙的人文精神,包括自然主义传统和社会主义传统进行对话。西方的启蒙提出了自由、理性、法制、人权和个人尊严,这些价值在世界各地都认为是普世的价值,现代化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公民社会、个人权利充分发展的一个运动,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的一百多年以来,从鸦片战争开始,很多的知识精英发现,儒家的人文精神和中国的小农经济、家庭的伦理、权威政治乃至集体主义,都纠缠在一起,在中华大地出现了很多消极的因素,使它不能够充分地现代化,来掌握西方提出的非常有光辉、而且普世的价值,所以强烈地批判儒家,把它当作封建的遗毒,当作阻碍现代化的绊脚石。自由主义的胡适,社会主义的陈独秀,大文豪鲁迅等人从“五四”以来一直在进行这种批判。如果我们想要把儒家的人文精神进一步阐发,就要对他们批评带给我们的教训,进行全面而且

深入地体认、剖析,我们如果不能使得儒家的人文精神充分发展,而让小农经济的保守主义和不健康的家庭伦理,比如说男性中心主义、政治权威主义充分地发展,将来儒家的人文精神能够提供的对话的资源是很小的。

现代以来,在西方一些核心的思想家,对于西方的启蒙心态,也开始进行非常深刻的反思。从生态环保的角度来看,人类中心主义,完全以人为中心,这是西方所代表的人文精神,一定要超越。从多元宗教的角度来看,怎么样让启蒙以来的文明多元开放,而不是狭隘的西方霸权;从社群伦理来看,怎样突破极端主义,西方学者在进行深刻的反思。中国的学者,日本的学者,朝鲜的学者,也就是儒家文化圈的学者,一百多年来,对自己传统文化的阴暗面,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现在一个新的对话条件已经出现,我举一个实在的例子,说明这个可能性。9年以前,我在我服务的学校哈佛大学提供了一个课程——“儒学的修身与现代社群”,在这个课里面,我突出了儒家的基本价值。当时我进行过一个简单的调查,上课的大概每次都有四五百个学生,跟这里差不多,来自各个不同的年级,我问他们在价值思考中间,自由的观念和公益平等的观念哪一个更重要。当然这两个观念都重要,但一定要选择其中哪一个观念比较重要,理性和同情这两个怎样选择,法制和礼教,人权和责任,个人和群体你怎么样选择。当时75%的哈佛大学学生——有的是学理工科的,有的是学文法的——选择自由、理性、法制、人权。今年(1999年)5月再作一次调查,50%以上的选择公益,不选择自由,因为美国社会的自由度比较大,大家发现社会的不平均、族群之间的冲突、社会矛盾和斗争太厉害。有50%的学生,特别是70%女生,选择同情。同情比理性更重要,只有理性,没有同情你不能发现你的道德

价值。法制和礼教,选择的人差不多相等。人权与责任比较,还是选择权利的多于选择责任的,但是已经相当接近了。把人当作社会网络的中心点,而不把人当作孤立绝缘的个体,这一个思想也在上升,现在 45% ~ 50% 的学生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网络的中心点,和刚刚所述的儒家价值很多地方正好相契,什么原因?并不是说现在美国的学生都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至少在我们这代人是太可能的。可是正像我前面所说的,因为生态环保意识、女性主义和多元宗教的发展,逐渐使西方过分突出自由、理性、法制、人权和个人主义的倾向受到遏制,开始认识到其他的普世价值,包括公益、平等、同情、礼教、责任和群体等,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情况。

这次回到祖国之前,我在汉城参加了联合国科学文教委员会组织的全球伦理的研讨会。这个全球伦理的研讨会在韩国举行,主要是想通过全球文明的对话,来了解能不能够建构一个全球社群,讨论假如全球社会已经形成以后的核心价值。因为会议在韩国开,所以特别探讨了儒家人文精神能够为全球伦理这一努力方向提供什么样的资源。学者们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得到下面的结论。在 1993 年宗教学术大会的时候,有 6000 个学者参加,最后也得两个共同信念。人类社会要发展,两个基本原则我们必须推进,这两个基本原则和儒家基本价值是可以配套的,一个基本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恕道”,最近张岱年先生在人民大会堂讨论儒家伦理时也提出这个。这个“恕道”,不仅是儒家伦理,也是犹太教的伦理,和基督教的“己欲欲示于人”不大一样,但也是可以配合的,也和伊斯兰教价值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以“恕道”待人,对我来讲很好的东西,对我的亲友就不一定很好,设身

处地想一想其他人的情形是如何,这就是推己及人的基本价值。这个价值的后面还要有一个价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不是利他主义,不是说我现在掌握了足够的资源,想要和其他人分享,而是要发展我自己的人格。但我是关系网络的中心点,我不能只是自私自利地发展自己,那样到最后我就没有办法发展自己了。我如果要发展自己,就一定要发展我周围的人,和我有关系的人,圆圈逐渐要扩大。另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儒家中有一种为千秋万世考虑的意识,比如张载所谓的“为万世开太平”,也就是说我们人类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不能只考虑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要为我们的子孙考虑问题。非洲有一个谚语,说地球不是我们的祖先所付给我们的财产,地球是我们千秋万代的子孙委托我们保护的财富。我们考虑伦理的问题,不能只考虑我们这一代,不能只考虑过去,要考虑未来。儒家思想在这一方面有很多资源可以发展。

这些具体资源要发展,要靠什么人?是靠少数的知识精英吗?是政治领袖吗?是靠企业界里面有权有势的人?靠媒体?靠什么?我们认为要靠一个广大的公众知识分子。各位在这里的都是属于广义的公众知识分子。什么叫做广义的公众知识分子?就是关切政治——也不一定要从政或参与政治,注重文化,就是属于公众知识分子。这些人不完全在学术界,学术界有很多人成为专家学者,他不一定扮演了这个角色。所以,这种公众知识分子不仅要在学术界,而且应该在媒体、在政府、在企业、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中,去从事各种不同的社会运动,包括环保的运动,女权运动,对弱势团体怎样协助、怎样帮助的运动,消费权益的运动,这样就使得我们能够为文化中国——广义的中国文化——创造资源,开发资源。

有了这种创造,这种开发,我们进行文明对话就有了基础。正因为如此,我感觉到,如果想要现在使得广义的儒家人文精神为人类文明的将来塑造全世界都能共享的基本价值,必须要在儒家文明圈的内部进行发掘,必须要减少内耗,把儒家的积极因素发扬起来,慢慢地通过各种不同的领域来形成蕴育。中华民族从鸦片战争以来,经受了很多的屈辱,很多的悲愤,经过一段时间,现在正在腾飞。中华民族的再生是一个经济现象,一个政治现象,同时也有深刻的文化涵义,这种文化的涵义,正是可以通过儒家的人文精神以及其他很多在中华土地上所发展的价值,包括佛教的、道家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各种领域的价值来共同发扬的。

演讲日期:1999年10月17日,湖南大学教务处供稿,
录音整理:杨健康,未经本人审校

编者絮语 杜先生在华中理工大学曾作过题为《人文精神与全球伦理》的演讲。此后,这一演讲的录像被重播过三次,听众场场爆满。学术大师的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把杜先生的两次演讲联系起来看,不难找出他的学术努力的一个方向,即在建立全球伦理的基础上,发掘儒家人文精神的现代价值。在经济、科技全球化的今天,文明不仅仅只是冲突(见本书第三卷王缉思的演讲稿),而更应该通过文明的对话来建立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伦理观念。

张岂之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西北大学名誉校长

凡是在学术上有成就的,必须中西二学融会,光懂中学不懂西学,搞不出所以然;光懂西学不懂中学,很难做出大成绩来。

20 世纪我国史学大师的创新精神

——在华中理工大学演讲——

首

先讲一讲新史学口号的提出及其意义。在 20 世纪的第三年,即 1902 年,梁启超先生发表了一篇题为《新史学》的文章。提倡新史学,就是要建立与旧史学不同的新史学体系。这个新口号的提出,就意味着创新。那么传统史学有哪些缺点呢?梁先生在文章中指出有四个缺点:第一,传统史学告诉人们的只是朝代,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一个朝代代替另一个朝代,而国家的观念很淡薄;第二,传统史学描述的都是个人活动,或者帝王将相,或者大儒,都是个人,没有个群体;第三,传统史学只告诉我们过去的事情,不能告诉我们历史的演进方向,一句话,就是知古而不知今;第四,传统史学只描述具体史实,没有揭示史实之间的规律,看不出历史演进的原因。正因为有这样四个缺点,

所以传统史学要走向新史学。新史学的体系是什么样的呢？梁先生列了一个大纲。当时，另一位史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他是鲁迅先生的老师，鲁迅称他为“有学问的革命家”，也提出历史要改写。为什么会在1902年提出新史学的口号呢？我认为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首先它说明贯穿20世纪始终，历史学都是中国人为实现民族独立而奋斗的一个重要环节，这是时代的要求。中国要寻找出路。1898年的戊戌变法失败了，因此，靠变法是没有出路的，必须革命。当时年轻的民族精英，像陈天华、邹容等，写了如《革命军》等著作，呼吁革命。既然要革命，在学术上也要变革，要创新，要建立新史学。其次它说明了20世纪的文史哲、社会科学都提出了学术革新的要求，光是老一套不行，要有所创新，有所前进，有所发展，而且要向西方学习，借鉴西方的史学。

怎样建立新史学呢？梁先生作了一个试验，提出了新的尝试。要建立新史学，就必须了解世界；要了解世界，就必须了解世界的历史和地理。为此，1902年以后，梁先生写了好几篇关于地理学方面的文章。举两个例子。一篇是《亚洲地理大势》，梁先生表示，这不完全是自然地理，而是包括了各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后来他又写了《欧洲地理大势》，谈到了地理与文明的关系等等。梁先生年幼时并没有学过地理学，好在梁先生既聪明又勤奋，为了建立新史学，他读日文著作，尽管他的日文并不算太好，仍坚持查阅资料，然后下笔万言，笔端充满感情，征服了读者。不但要研究地理，还要研究西方的历史。为什么西方比较进步？19世纪末，许多研究西方的人认为西方的进步主要表现在船坚炮利，有新技术。梁先生认为这还不够，要进一步研究西方为什么会进步，为什么有新技术，原因在哪里，是西方人聪明吗？是他们牛肉吃得多，大脑

发达吗？这些都不是答案。梁先生的答案是什么呢？他认为是因为欧洲有新的思想，新的哲学，新的研究方法。同学们，大家看看，近百年前梁先生的见解多么深刻！为此他写了不少文章，重点是写了《培根学案》。培根是英国 16~17 世纪的大哲学家，他的《新工具》一书在欧洲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这本书讲什么呢？讲科学归纳法，一般的原理只能从对个别的研究中抽象出来，不像中世纪讲的那种演绎，人的前提是上帝，上帝形成真善美，凡是上帝派生的都是真善美。培根认为这不行，必须从现实的个别的研究出发，归纳出一般的原理。《新工具》主要讲科学的归纳法。这种方法出来后，原来宗教中的结论就靠不住了。梁先生注意到这种思想在英国引发的大革命。梁先生还注意到了另一伟大哲学家，即 16~17 世纪法国的笛卡尔，笛卡尔有本很著名的著作，叫《第一哲学沉思录》，它着重讲科学的演绎法。大前提必须是经过证明的，是正确无误的。所以，你不能讲上帝就是真善美，它未经证明。笛卡尔有句名言，同学们都知道：“我思故我在”。我在思考，因此才了解我这个认识主体是什么样的，一切世俗的论调，都要经过我的头脑来衡量一下，我们不是宗教的婢女，人也不是某一个偶像的崇拜者，人是一个独立的主体，一种理性的存在。所以，16~17 世纪的欧洲思想界，培根的归纳法和笛卡尔的演绎法，推动了文艺复兴以后欧洲科学技术的进步。梁先生为此写了一篇长文，叫《近代文明初祖两大家之学说》，培根和笛卡尔就是近代文明的两大初祖，欧洲近代文明，源于哲学学术思想的变革，船坚炮利都是由这种哲学思想的指导所得到的具体成果。梁先生对新史学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他提出了新史学这一口号，而且还在于他把向西方学习提升到了思想方法的高度。后来他研究学术史、研究思想史，很多方面

借鉴了西方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这是他的创新。他站到了时代的前列。他的许多观点,现在我们再看,仍然是十分深刻的。关于梁先生,主要就谈这些。

第二点,我要从王国维的学术成就谈谈中西文化的融会。王先生的中西融会论比梁先生就更进一步了。他生于 1877 年,卒于 1927 年,浙江海宁人,早年留学日本。当时去日本留学的,大多是学工科和政法的,王先生学什么呢?学哲学,他对德国的两位哲学家学得很深入,一个是尼采,一个是叔本华。王先生早年研究哲学,中年专注文学,给我们留下了几部不朽的著作。一部就是《人间词话》,阐述诗词的境界说。还有一部叫《宋元戏曲考》,研究戏剧史,今天研究戏剧史的人都必须看它。再有一部叫做《红楼梦评论》,用叔本华的观点研究《红楼梦》。晚年,王国维研究史学。1925 年,清华成立了“国学研究院”,当时清华的校长叫曹云祥,当过外交官,比较有世界眼光,他去请胡适,说清华也要设立研究院,请你给我造一个计划。胡适当时从美国回来不久,对西方的高等学校很清楚,很熟悉,而且对中国古代书院制度也有一些研究。他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给曹云祥建议,清华国学研究院要请几位导师,不要院长,也没有一堆秘书,只要一位办公室主任,然后招学生。曹云祥当时想请胡适来,胡适这个人很聪明,当时尽管年纪很轻,却已经成为新文学革命的发动者之一,在北京大学文学院教书。但胡适却说:“我的资历,我的年龄还不够格。”然后就推荐了一些人,其中就有王国维。当时国学研究院办公室主任是研究英美文学的吴宓,据他日记上的记载,1925 年他拿了曹云祥校长的聘书,到王国维家里去,在厅堂里,行鞠躬礼,请王先生出山,到清华国学研究院里当导师。王国维接受了邀请。梁启超也去了。本来还想请章太炎的,

太炎先生看来和梁启超的关系不太融洽,拒绝前往。后来又请了陈寅恪,再后来还有赵元任。这就是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清华国学院存在的时间很短,1925 年到 1927 年,但大名鼎鼎,几个导师培养出了很多人,开了一个辉煌的历史阶段。王国维到清华国学院以后,给学生讲历史,讲《古史新证》——古代历史要有新的证据,新的证明。他讲的古史是商代的历史。当时发现了甲骨文。商代的文字刻在龟甲或者兽骨上,就叫甲骨文,也叫龟甲文字,还叫殷墟文字。为什么叫做殷墟文字呢?因为据查这些龟甲最初出土地点在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19 世纪末,学者们开始研究甲骨文,要研究,首先要认识文字,然后再把它们作为商代的史料来运用。怎么研究呢?司马迁的《史记》有商代的本纪,商代的帝王世系。王国维把甲骨文的史料与《史记》里的《殷本纪》所记载的商王世系加以对照,发现《史记》有些地方是准确的,有些地方还有待于补充商榷,所以王国维就把这种新方法叫做二重证据法。研究历史,光靠文献材料不行,历史学家必须重视地下的发现。地下的实物当然不只是甲骨文了,还有其他的東西。整个 20 世纪,地下出土的文物很多,把它们和文献资料结合起来研究,可把历史的真相尽量揭示出来。二重证据法,这是不是创新呢?当然是。

王国维在史学上的创新当然不限于甲骨文研究方面,他还十分注重通过敦煌文书来研究隋唐历史。他还研究中国佛教的历史,以及许多简牍。据他预言,学术上大的成果,要依靠新资料的发现。作为一个搞学术的人,在新的发现面前,不要怕,要钻进去,使用它,利用它,研究它。在学习西方学术方面,王国维的论断也很精辟。他认为中国的学问和西方的学问,这两者的关系是八个字:“盛则俱盛,衰则俱衰”——要兴

盛起来一块兴盛,要衰落则一块衰落。凡是在学术上有成就的,必须中西两学融会,光懂中学不懂西学,搞不出所以然;光懂西学不懂中学,很难做出大成绩来,要把二者结合起来(参见《国学丛刊序》)。20世纪人文学术史证明,这个观点是正确的。那么西学的长处在哪里呢?王国维认为,西学长于分类,长于抽象,兼用归纳、演绎二法。那我们中国的学问呢?有长处,这个长处是在实践方面,特别是道德实践。中学的缺点在哪里呢?只以具体知识为满足,不再深究了。所以,王国维提出,必须用西学的长处补充中学的短处(参见《新学语之输入》)。王先生的分析很精深吧!把中学西学的优缺点分析得很好。有学生问他研究历史应该有哪些方面的知识,王国维谈了研究历史应该有广泛的知识,历史是人类生活的反映,总括全貌,你要有这些知识:一、中国史;二、东洋史,就是今天讲的亚洲史;三、西洋史;四、哲学概论,要有抽象思维;五、历史哲学,外国的历史哲学也必须懂;六、年代学;七、比较语言学;八、比较神话学;九、社会学;十、人类学;十一、教育学;十二、外国文学等等各方面的知识。那样才能研究史学,光凭教科书,要想成为史学家,不可能!差得太远!学术眼光要开阔才行。20世纪有造诣的史学专家都是如此。王国维于1927年的某一天,对任何人也没有说,就离开清华国学研究院,步行到颐和园,自沉于昆明湖。后来学术界就分析他自沉的原因,各种原因都提出来了,这里我们不去详细分析它,这位大史学家的去世,对史学界是一大损失,本来他可以留下更多的东西,虽然他留下的东西很有价值,但是应该留更多的成果。

第三个问题,陈寅恪的史学研究中西融会。“恪”这个字念“què”,陈先生说他的名字念陈寅恪(què)。陈寅恪的生

卒年是 1890 至 1969 年,逝世于“文革”期间。他在哪里去世的呢?就在广州中山大学。陈先生是江西修水人,出生于大家庭,官僚世家,他的祖父名叫陈宝箴,做过巡抚;他的父亲是位诗人,叫陈三立,光绪时的诗人,很有名气。陈先生少年时期饱读诗书,13 岁时就随他的哥哥到日本去学习,呆了几年以后,17 岁回来了。回来以后,18 岁,考进了吴淞复旦公学,就是现在上海复旦大学的前身。1909 年,陈先生结束了复旦公学的学习,到欧洲去,先是在德国的柏林大学、瑞士的苏黎世大学和法国的巴黎大学学习语言,1917 年到 1921 年又到美国哈佛大学留学,1921 年至 1925 年再回到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在国外,陈先生着重研究佛经的翻译。佛教是西汉末、东汉初传入中国的,许多佛经被翻译成中文。要了解这些佛经译文究竟译得如何,必须学梵文,利用外国的资料,这就需要多方面语言的素养。陈先生在这么多名牌大学中跑来跑去研究的目的在于取得博士学位。陈先生有没有博士、硕士学位呢?没有!在柏林大学研究院期间,他写了 64 本的笔记本,北京大学季羨林先生加以整理,然后再向学术界介绍。季先生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了 10 年的梵文,所以陈先生的笔记季先生能看得懂。季先生说,陈寅恪的这些笔记本主要是语言学。有哪些语种呢?藏文、西夏文、满文、朝鲜文、梵文,还有印尼文、俄文、希伯莱文、东土耳其文等。要研究佛经,就要打好语言基础。陈先生专注于此,不想拿学位。梁先生推荐陈先生到清华去教书,曹云祥就问:“陈先生是不是博士啊?”梁先生回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当然曹先生就不太愿意聘他。“那请问陈先生有什么代表作没有?”回答说:“到目前还没有。”那意思是说,将来会有。曹云祥犹豫起来。梁先生一句话很厉害:“请问曹校长,我梁启超也不是博士,那

你怎么聘我？我的著作很多，你是知道的，我几百万字还不如陈寅恪先生的几百个字的价值，那你究竟聘不聘？”梁先生十分谦虚，可以看出他真能识别人才。结果，曹云祥还是聘请了陈寅恪任国学研究院导师。当时是20世纪20年代，大学聘教授不需要开什么教授会，也不需要开人事处长会，校长和专家就定了。陈先生主要教“佛经翻译”。现在我们国内，我估计，很少有这方面的专家了。陈寅恪在清华国学学院开课，许多先生都来听课，连北大的有些教授也来听。当年的北大，同学们，你们知道在哪里吗？不是在今天北大的地方，今天的北大用的谁的地方呢？燕京大学的地方。当时也没有多少公共汽车，教授们就乘黄包车，也叫人力车，到西郊的清华来听陈先生的课。有人回忆，陈先生还为清华招生出过作文题，叫“梦游清华园”，你到过清华园可以写，没有到过清华园也可以写。比如你是浙江的考生，根本就不知道清华园在哪里，反正梦游嘛，怎么描述都可以，把西湖描述成清华园也可以，由此正可以看出考生的想象力和文字表达的水平。

说到这里，我顺便说一下过去的考试和过去的教授。我是1946在北京考上北京大学，那是抗日战争胜利的第二年，语文分数就看你作文怎么样，没有现在那些语法、字词呀，还要按标准答案回答呀，这样一来，现在有些考生的语文考分被扣得一塌糊涂。过去没有这些。清华还有一条规定，教授们教了5年书，然后到国外进修一年。比如30年代，朱自清先生，大家都知道，他写了两篇很著名的散文。《背影》，同学看过吧，我每看一遍都要流泪。还有《荷塘月色》，它是最优美的散文。现在朱自清的日记公开出版了。你看他在英国进修时的日记，记载在英国伦敦的时候，他夜间有好几次梦到清华大学不聘他了（事实上并不存在），说朱自清在中国文学方面有

些根基,但是他对西方文化了解甚差,所以清华不聘他。他一梦到这些,浑身出冷汗。惊醒过来后,冷静下来想,确实自己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很不够,怎么办?赶紧补课,研究莎士比亚的戏剧,《威尼斯商人》、《李尔王》等等都要看,而且还要看博物馆,并且自修《欧洲美术史》。他希望在短短的一年里头,把他在学问上的不足加以弥补,使自己更加充实。你看,朱自清先生对自己的要求是多么严格呀。过去北大和清华文学院里的第一流教授开的课必须体现中西融会的精神,既能开中国文化方面的课,也能开外国文化方面的课。我读北大是比较晚的,是在1946年到1950年,1949、1950年我们暂且不说,那时新中国刚建立,活动是比较多的,就说说1946、1947、1948这几年吧!当时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先生,有一学期开两门课,印度哲学史、魏晋玄学,到下一个学期呢?又开出英国经验主义课,再下一个学期呢?再开出欧洲大陆理性主义课。朱光潜先生是外文系的教授,在外文系开什么课呢?从他开的课程单子里可以看到有英国拜伦、雪莱的诗歌,但光开这些不行,还要讲中国古典诗词赏析。冯至先生,外文系的教授,研究德国文学史,开出歌德的《浮士德》的专题课程,光有这些还不行,所以冯至先生还研究唐代诗人杜甫,后来冯先生还写出了一本《杜甫传》,也很有功力。可见,当时的一流教授还是很有压力的。有压力,有竞争,才有前进。衡量一位教授的水平,不光看你今天的成就,而且还要看你学问的领域宽不宽,能不能发展。

陈先生在德国,受实证主义史学大师兰克的影响很深。陈先生经过各方面准备以后,要写著作了。他选了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的这段历史作为研究重点。这段历史很复杂,有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还有中外文化的交流,难度很大。到

1940年,他的书出来了,叫《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隋唐的政治制度是根据什么而来的呢?我看这本书,就惊叹陈先生对史料掌握之全面,非常宽!例如,他提出隋唐政治制度有一个来源,叫河西文化。什么叫河西文化呢?就是今天的河西走廊,湟水流域,凉州一带。凉州在哪里呢?在今天甘肃武威一带,在天下大乱的时候,河西走廊这一地带相对安定,经济比较发达,社会秩序也较好,有一批中原人士,包括一些大家、文化人,都把书带到这里来了,所以河西文化就成为奠定隋唐政治制度的来源之一。第二年,也就是1941年,陈先生又拿出一本书,《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唐代,懂一点历史的都清楚,唐高祖、唐太宗时期,是一种情况;而武则天当政以后,又是一种情况。武则天当权,这个变化说明了什么?陈先生经过研究,认为这是社会集团之间的斗争在政治上的反映。唐代起家是哪些人呢?陈先生认为是关陇集团,关陇就是今天甘肃陕西这一带的少数民族和汉族土族的混合体。李渊及李世民就是关陇集团的政治代表人物。到武则天时期,政治上发生了变化,武则天大开进士科,要从汉族读书人中选拔官僚,与过去关陇集团的继承人进行抗争,因此就有了过去大世族与进士出身的新贵族之间的矛盾斗争,所以看唐代政治问题不能离开这一点。一直到今天,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来研究唐代历史,基本上还采用陈先生这个观点。陈先生的这本著作奠定了他在史学上的地位。1947年出版的《元白诗笺证稿》则表现出陈先生独特的功力。元是指诗人元稹;白呢?就是白居易。通过这两个人的诗来展现社会生活,展现唐代的社会面貌和读书人之间的交往,说明当时唐朝思想文化上的状况。陈先生对唐诗很有研究,在清华就开了这门课,叫《白居易的长恨歌》,讲了多长时间呢?一共讲了两个月。当然《长恨

歌》是比较复杂一些,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很多风貌。用文学的分析来说明历史,以便通过文化看历史的演进,通过历史看文化的价值。这就叫作以文证史。中国 20 世纪的史学家只有两位可能做到这一点,一般人做不到,一位是陈寅恪先生,一位就是郭老。

晚年,陈先生患眼疾,在助手协助下,他用了 10 年的时间,于 1964 年完成了一部大书,即《柳如是别传》。柳如是是何许人也?她是清朝初年一位很有民族气节,很有民族思想的歌女,是钱谦益的妾。钱谦益是明朝万历年间的进士,南明时官至吏部尚书,清军南下的时候投降了清军,后来又参加了反清活动,这个人博览群书,在诗文方面很有成就。当时还有一个人叫陈子龙,大家听说过吧?南明的抗清将领,这个人很有文采,也写了很多诗歌。柳如是和当时许多要人都有交往。《柳如是别传》以柳如是为中心,通过他们相互之间的诗歌唱和,揭示出清朝初年读书人的各种心态、各种面貌。陈先生写这本著作所参考的书在 1 000 多种以上。全书 80 多万字,有大量的考证。但是陈先生讲了,这本书宣传一种思想,一种精神,六个字:“超世俗”——超越世俗;“轻生死”——有比生死更加重大的事情,就是民族气节。这是歌颂独立精神,歌颂自由思想,歌颂高尚的民族气节。《柳如是别传》在历史学方面是有贡献的,也很有创新精神。

下面不妨把王国维和陈寅恪归纳比较一下。这两位史学家都被列为史学大师,是中西文化、学术交汇于一炉,都有很大的贡献,这是没有异议的。再一点,他们都是“国宝”。我用“国宝”这个词,并不是从语义上讲——国家的宝贝。“国宝”一词来源于《荀子·大略》:“口能言之,身能行之”,指言行如一,理论和实践统一。王国维和陈寅恪都能做到言行统一,这

很不容易。我们说这两位在学习上达到中西融会,能不能说都是博古通今呢?我认为不能,不能讲他们是博古通今的,他们只是在研究某一段历史上有贡献。“通今”,谈何容易!仅仅在书房里研究,不可能通今,必须在实践里头去磨炼,去分析研究才能通今。所以我们对前人的评价,用词要慎重,要做到贴切、准确。中西融会,只要下功夫,有些人能做到,但要做到博古通今就很难喽!王国维,他对清朝的那些事情感情比较深。这样看,王国维之所以 1927 年 6 月自沉,可能是与北伐军节节胜利的进展有关,他感到他的理想的天朝已经是很难建立起来了,倒不如以死来结束自己的悲剧命运,这是不值得的,不必去研究,反正是这样一个事实。

最后,我还想讲一讲郭沫若的史学成就。郭沫若的生卒年代为 1892 年到 1978 年。1927 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郭老亡命日本 10 年,此间他一方面研究甲骨文,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研究古代文字、研究金文,还研究古代的铭刻等等。同时为了维持生计,必须挣稿费,他还搞翻译。他很有勇气,谁敢翻译《浮士德》?他最初想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后来条件不具备,就改主意译《浮士德》。他还翻译了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大家看过了吧,这本书在国内青年中曾轰动一时,个性解放、反对封建婚姻等遂成为时髦话题。当时郭老正是在热恋时期翻译的,其中有很多郭老自己的感情。这点到老年也没有变化。《蔡文姬》怎么样?也是写他自己心情的。1930 年,郭老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用历史唯物论来分析中国古代社会,用甲骨文和金文等等材料来研究古代社会,这就是创新嘛,而且他讲,从某种意义上说,王国维是他的老师。王国维主张实事求是,郭老讲光求是还不够,还要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是”,不能只知其然,而更要知其所以然,所以要

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现在海内外有一些人对郭沫若有不公正的批评,有些显然是攻击。郭老有他的缺点和不足,但就大的方面而言,现在看来,并没有错。70 年代林彪自我爆炸以后,张春桥到他家里,传达江青的意思,要郭老批判周总理,这时候郭老一句话也没有讲,江青他们从郭老那里没有得到一句批周总理的话。可见,郭老在大节上是守得住的。所以,今天我们看以前这些大家,苛求他们没有任何缺点,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看人要看大局,看大节。1938 年抗战一开始,郭老便离开妻子儿女从日本回到祖国,参加抗战,这是很了不起的。也有人不是如此,例如周作人,不要大节,日本侵略中国,他去做日本人的文化汉奸,这不行,这不可饶恕。

总之,我们对前人的评价应当看大节,郭老在大节上毫无问题,他是 20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

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了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郭沫若四位中国史学大师。我们应当学习他们的创新精神,在任何情况下,全力专心根据我们自己选定的目标去做,总会成功的。一是方向,二是毅力,还有创新精神,贯彻这三点,你在某一个领域总会取得成就的。只要不怕失败,不怕挫折,如果一点挫折就摔倒了,爬不起来了,那就做不成任何事情。今天,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勉励华中理工大学的同学们,在你所选定的范围内应当不屈不挠地努力,因为时代给了你们许多优越的条件,我想你们将来肯定会有很大的成就。祝大家鹏程万里!谢谢大家!

演讲日期:1999 年 9 月 27 日,华中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供稿,录音整理:涂重航,本人审校

编者絮语 20 世纪是近代意义上的科学——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在中国全面确立的时代,在几乎所有的学科领域,都产生了一批大师级的学者,其中有的是一代宗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学贯中西,通古知今。这一点,从本篇演讲介绍的四位史学大师身上,就可略见一斑。对今天的人才培养,亦有借鉴意义。

张隆溪

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

世界上的主要文化传统都有一个核心特征,就是他们都有自己的经典。在这些经典著作中,包含着一定的哲学思想、道德伦理观念、行为规范等等。而各个时代对这些经典的阐释,是这些文化得以维持、保存和发展的重要手段。认识文化,就是认识传统,同时还要注意经典与经典阐释之间的关系。

文化传统与现代阐释

——在香港城市大学演讲——

这是我第二次举办关于中国文化的讲座。今天我要讲的是古代经典与现代阐释的问题。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因为马上就要进入新的世纪,新的千年,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这一话题引起了知识分子的普遍关注,由此也引发了许多讨论。文化的概念非常宽泛,很多东西都可以包括进去。关于文化的定义,据说有 100 多种。它不仅仅是指一个社会的典章制度、政治经济结构、思想、学术和文化,就西方文化研究而言,它还包括商品的消费、大众传媒、影视娱乐、

畅销书刊,甚至卡拉 OK 等。有些研究者还对文化进行了分类,例如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等等。在这么多莫衷一是的说法中,要给文化下一个定义也是不可能的。今天,我不准备给文化下一个定义,只是就文化观念在历史与情感中的表现,尤其是在文学艺术方面的表现这一问题,谈一点自己的认识。当然,文化还包括物质层面的内容,但我今天想阐释的主要是表现在观念意识方面的文化,尤其是表现在文字方面的文化。

文化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它不是一夜之间产生的。换句话说,它是一个传统。文化与传统两者很难分开。我们要理解什么是文化,也就意味着理解什么是传统。任何有价值的传统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字的记载,也就是文化传统中的经典著作。比如说在西方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化,它有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系列的经典著作;基督教文化,它的经典主要有《新约》和《旧约》;当然,伊斯兰教有《古兰经》;印度教和佛教有梵文的各种经典。那么,中国的文化也同样有自己的经典。世界上的主要文化传统都有一个核心特征,就是它们都有自己的经典。在这些经典著作中,包含着一定的哲学思想、道德伦理观念、行为规范等等。而各个时代对这些经典的阐释,是这些文化得以维持、保存和发展的重要手段。认识文化,就是认识传统,同时还要注意经典与经典阐释之间的关系。

中国传统的图书分类方法把图书分为“经、史、子、集”,“经”是最重要的,排在首位。《庄子·天运》中有记载,孔子曾说过:“丘治《诗》、《书》、《易》、《礼》、《乐》、《春秋》六经以为文。”这大概是中国古代典籍中最早提到“六经”的。那么什么是“经”呢?历来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说“经”是官书,不是私人的著书;另外有人说“经”是圣人的著作,不同于一

般的著述。刘勰的《文心雕龙·宗经》里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这里固然把“经”强调得很重要，但其实是已经有了经典的观念之后才回过头来下定义的，并不能说“经”的原义就是如此。近代学者章太炎说：“经者，编丝连缀之成，犹印度梵语之称修陀罗也。”他把“经”说成编书装订的工具，也就是装订书用的丝，有如梵语中“修陀罗”。“修陀罗”就是指用丝线把贝叶编成书，译成汉语叫“经”。这个解释是较切实的，较有说服力的。蒋伯潜在《经学纂要》中肯定了这一说法。“经”本来是书籍的通称，后又演变成特指经典。这与西方的情况也很类似。西方的经典叫“bible”，“bible”的原义其实就是“书”的意思，后来特指《圣经》，书的名称才演变成现在的book。

可是不管它本义如何，成为经典之后就归于专门部类，有特别的意义。例如“诗三百”，历来被视为经典之一。《论语》中孔子把《诗经》作为教人应辩的教材，是出于实用的目的。《论语》里就说“不学诗，无以言”，认为不懂诗就不会说话。据《左传》记载，在各种外交场合，各国大使交涉时就引用“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在当时被视为有文化修养的一种表现。所以孔子另外有一句话说，“诗三百”你背得再熟，但到别的国家不能应用的话，那也就没用了。在孔子时代，背诗就是这样一个目的。古代用诗撰章是很普遍的做法，就像我们现在写文章时引一两句大文豪或大家的诗，而且用得贴切，适合你讲的意思，也是一种文化修养的表现，所以一个人能不能赋诗在古代是很重要的。孔子也据此认为学诗就是学语言，不懂诗就根本不会说话，不能说得很有修养，别人也就不会尊重你。另外，孔子还认为“诗”还有其他的实用价值。孔子还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远可以事君，近可以事父，多

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关于诗的“兴、观、群、怨”这四种作用的解释历来有争议。大意是说,“兴”,可以给人启发;“观”,可以反映当时人的思想和情感,如民歌,所以古代有“采风”之说;“群”,很多人在一起可以互相用诗沟通交流;“怨”,用诗可以抒发自己的怨气;“事君、事父”,孔子认为家和国是联系很紧密的,诗可以有伦理和政治的作用;“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三百》里有很多丰富的知识,包括古代对很多事物的命名,学了《诗三百》可以从中知道古代许多事物的名称。所以后来陆机还专门写书讨论这一问题。可见,孔子并不是从文学的、审美的角度来看待《诗经》的。实际上,《诗经》在文学成为自觉的艺术之前,还能基本保存下来,是因为古人把它作为“经”来看,人人都要念,都要背,而且有重大的作用。

一旦成为经典,“诗”就成为负荷文化价值的载体。但成为经典后,它本来的意思就不够了,因为中国传统文化认为经典应该具有伦理政治等等各种方面的作用,这样一来,人们要求“诗”所具有的意义就比原来的意义要多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就有诗本义与后人阐释发挥的意义之分了。《诗三百》中,尤其是“风”中有很多是民歌作品。宋代大学者朱熹在《诗集传·序》里说:“凡诗之所谓为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遇咏歌,或言其情者也。”这话说得较合情理。但作为经典,《诗经》如果只是表现男女之情是不够的,它不能满足古人对经典所具有的微言大义的要求。这时评论家讲解诗,就出现了评注,他们往往把作品跟评论者的思想和文化价值观念联系起来。例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首爱情诗,可是《毛诗序》却认为是表现“后妃之德”。评论家显然是在根据儒家的思想观念来解读这首爱情诗。毛诗中还有类似的记载。例如《郑风·将仲子》:“将仲子兮,勿逾我里,勿折我树杞。岂

敢爱之？畏我服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将仲子兮，勿逾我墙，勿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将仲子兮，勿逾我园，勿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这首诗很有意思，表面上是怕人多言，而实际上却是说女孩子跟情人之间的怕人议论的心理。可是《毛诗正义》的解说却更妙了，说：“刺庄公也。不胜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既仲谏而公弗听。小不忍以致大乱也。”什么意思呢？是说这首诗根本不是爱情诗，而是批评郑庄公的。这就涉及到另一个历史故事。郑庄公出生时难产，所以他的母亲不喜欢他，而喜欢他的弟弟叔段。庄公的母亲本来希望庄公的父亲传位给叔段，但庄公的父亲没有这样做。庄公即位后，其母就让他封了一块地给叔段。叔段后来招兵买马，出兵攻打庄公。庄公因为害怕母亲，不敢出兵讨伐叔段。直到兵临城下，庄公才出兵消灭了叔段的军队。随后将其母软禁起来，并宣称再也不见她。《将仲子》本来与此事毫不相关，但恰好庄公有一个臣子名既仲，对他非常忠诚。在叔段叛乱之前，既仲曾劝庄公好好管教一下叔段，否则，“小不忍以致大乱”。于是，这首诗就被解释为庄公回答既仲的劝谏：既仲你就别管我家母子、兄弟之间的事。诗的主人公也就由青年女子变成了郑庄公。就诗的本义而言，这种阐释是完全不着边际，而且居然还由此总结出“小不忍以致大乱”。阐释者的确是颇费心机。在今天我们看来，传统评注的牵强附会是不言而喻的，当然要消除这些荒谬也是没有困难的。可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解释呢？像郑玄、孔颖达都是非常有知识、有学问的人，他们不可能不懂诗的本义，那么为什么还要如此解释呢？这反映了古代人对经典的一种期待和理解。他们认为，《诗经》绝对不能讲爱情，

而只能讲国家大事。这里我们更要关注的是,这种传统的曲解和误读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文化价值和人文观念。

现在,我要谈的问题是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这个问题在中国文化里显得特别尖锐。早在“五四”时期,传统与现代的尖锐对立表现为保存国粹与全盘西化这完全对立的 two 派。而实际上,这种截然相反的对立并不能解决当时提出的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的问题。当然,今天看来,当时形成这种局面并不难理解,因为那时中西文化开始碰撞和较深入的接触,在政治经济上来说,西方列强用枪炮打开了古老的中华帝国的大门。这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很屈辱、很痛苦的经历。“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有感于时代的危机,认为中国必须变革。比如胡适、陈独秀、鲁迅、傅斯年、钱玄同、顾颉刚等,他们或提倡白话文,主张文学改良;或主张易古变位,推翻经学。他们一方面对西方文化发起猛烈攻击,另一方面又引用西方的思想观念和研究方法,在学术上产生了许多超出前人的成果,在思想文化上形成了一场影响深远的运动。“五四”的基本精神是反传统的,对中国现代文化和社会产生了不可否认的影响。例如,顾颉刚等人编著了七卷本的《古史辨》,其中第三卷是关于《易经》和《诗经》的。它收录了当时的许多学者对汉代以下历代《诗经》的注疏的批判,指出《毛诗序》对《诗经》本文的歪曲,力求把《诗经》从经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现在,“五四”已过去 80 多年了,对我们现代人而言,“五四”已成为现代人的传统,今天,我们讨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的关系,就必须认识“五四”精神与新文化的关系。“五四”精神是反传统的,但它除了反传统的一面,是否还有与传统相联系和继承的一面呢?新文化的倡导者,不仅有很深的旧学根底,而且他们是借传统来反对传统的。有人写过文章,

特别注意到“五四”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指出“五四”批判旧文化,实际上从清末的今古文之争就开始了。再比如说,他们对历代具有反抗精神的人特别重视,他们在反传统反礼教时,有意无意地回到传统中非正统或反正统的源头上寻找根据,而此正是他们熟悉的东西。外来新思想,由于他们接触不久,了解不深,只有附会于传统中某些已有的观念上,才能产生真正意义。当然,我们不能说“五四”反传统文化,都是附会于中国传统文化已有的观念,可外来文化的观念,要在本国文化中真正起作用,就不能不尽可能地与本土文化相结合,赋予旧观念以新的意义,逐渐改变旧文化的面貌。这正是文化传统在历史变迁中发展变化的基本路子。传统决不是铁板一块,其中本来就既有趋于保守的正统的观念,也有趋于变革的非正统或反正统的观念;既有精英文化的大传统,也有民间文化的小传统。所以任何反传统的激进思想都会在传统中寻找反传统或非正统的源头。

在 20 世纪即将结束时,我们不能不对这种将传统与现代截然对立的观点作批判性的检讨,我们要用更冷静的态度和更细致的方法深入思考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要做到这一点,西方的阐释学对我们很有帮助。

阐释学一方面研究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古典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的传统,另一方面又注重研究基督教、《圣经》的传统,在这两者的基础上,对于具有普遍性的理解和解释问题作理论性的探讨。它以理解过去历史遗留下来的文字著述为主要研究对象,所以过去和现在的关系是阐释学研究的新问题之一。其代表著作是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伽达默尔是以他的老师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关于存在的理论为基础的。海德格尔认为,任何存在都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在

一定的时间空间历史条件下的存在。人的历史观念受到一定的条件限制,以一定的条件为前提。人通过理性来认识历史、认识传统,而人的理性本身并非是超越历史的抽象,而是在历史产生当中形成的。所以伽达默尔说,对于我们来说,理性只能是具体的、历史的,也就是说,它并不是自己的主人,它总是依赖于一定的条件,在一定的条件下活动,其实不是历史属于我们,而是我们属于历史。早在我们以反思的方式理解自己以前,我们已以自然而然的方式在我们所生存的家庭、社会、国家的环境里理解自己。这就是说,社会时代、文化等都对理解、思维的方法有很大的作用,这些历史条件决定性地影响着我们。对历史条件本身的意识,包括历史批判主义——即我们对历史的批判,都是依赖于我们的文化本身和历史传统的。那么,这是不是说历史性的理性完全受到历史冲突的限制而没有自由呢?在传统与理性之间其实并没有这种无条件的对立。所以,伽达默尔又说了一段很重要的话:事实上传统里总有自由的因素,甚至是最纯粹的、最稳固的传统也不是靠曾经有过的东西的惯性力量而得以自动延续下去,而是要靠不断被确认、把握和培养,它在本质上是保存,是在历史的变迁中的活跃的保存,保存是理性的行动。他的意思是一方面承认历史传统的限定作用,同时又肯定人的理性在一定条件下的自由,肯定理性通过对传统做出选择来保存传统,而传统也需要理性的确认、把握才能得以保存。我们懂得传统与理性之间的相辅相成的关系,就可以打消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理性之间非此即彼的绝对对立。由此看来,保存国粹与全盘西化,它们的问题不是在谁更具有合理性,而是这两派的基本方法完全相同,即把历史批判主义的理性与历史传统作了截然的对立。所以,按照阐释学的观点,过去与现在是统一体,传统与

现代不是外在的。人们认识传统也不是在看一个外在的客体,因为认识主体本身就是在文化传统中形成的。抛弃历史与理性、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抽象对立,当然不是否定历史传统本身的客观性,而是强调认识历史不仅仅具有肯定历史客观性的意义,同时还具有今天的现实意义。这样一来,历史的意义和我们的理解就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历史不再是客观化的死的过去,而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和阐释就负有一种责任,一种道德。我们怎样去认识、选择文化,本身就体现出我们的道德和责任,因为这关系到我们的身份和后代,关系到文化传统的发展。由此观之,中国传统文化也不是完全已经过去的、死去的文化,而是仍然在起作用的活的文化。

中国文化本身就是多元的,他的根基早在先秦的诸子百家时期就已经形成。当然,后来儒家在大部分时候占据统治地位,但其他各派别,如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等的思想,也是存在的,活跃的,并且成为儒家的补充。后来佛教的传入,使得中国文化变得更为丰富,这些都为中国人提供了不同的思想资源。历史上,统治者对这些文化资源往往采取折衷调和的态度,并没有以绝对的方式加以干涉。即便是那些以极端的态度对待非儒家文化的人,也不可能完全排斥其他文化的影响。韩愈就是较为典型的例子。韩愈以儒学道统的卫道士自居,排斥佛老,态度异常坚决。可实际上,作为文坛巨匠,他非常欣赏道家的著作,尤其是庄子文章的汪洋恣肆。作为古文家,他无法否定庄子。在《进学解》中,借学生之口,他提到了庄子、离骚、扬雄、太史公,唯独没有提及孔孟,为此,宋代的大学者都瞧不起韩愈。例如程颐就批评他是“先有言而后求德”,朱熹、陆象山等人也有类似的批评。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观点,韩愈提出要继承道统的说法,本身就受到禅宗的影响。

历史上,韩愈本人也与和尚有来往。可见,排斥佛老的韩愈并没有摆脱佛老的影响。所以,他的主观愿望与实际做法是矛盾的。古代大多数文人,包括韩愈在内,对历史上的各种思想、著述都是兼收并蓄的。这也说明,文化传统对我们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只不过有时我们意识到,有时没有意识到。

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首先它对小说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陈寅恪先生甚至认为,中国的律诗理论中的四声等音韵的确立,就是南齐时沈约等人将佛经中的声调运用于中国文化而形成的。到宋代,严羽把诗与禅联系起来,禅中的许多术语成为中国古典文论中的重要概念。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是中国文化成功地吸收外来文化进而使自身变得更为丰富的典型例子。“五四”以来,中国文化吸收了很多西方文化的成分,这些成分也已成为我们的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文化已经包含了西方文化的成分。

现在如果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对立起来,那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不可能。对一些有价值的西方文化,如科学、民主、自由,我们应该像“五四”时的先驱们一样热烈地去追求。把文化看成是活的东西,即是通过我们的选择的活的文化。这样一来,如何选择就至关重要。可以说,自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正统和道统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来说,以君臣父子这些尊卑名分的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制度早已失去存在的可能。然而传统文化典籍中记载的这些文物制度对我们今天的社会组织虽没有实践的价值,但至少有帮助的价值。也就是说,历史只是对我们有参考价值。同时,传统文化中的审美和伦理的价值在今天仍然是重要的精神资源。在传统文化中,比较能超越时间的局

限而能与现在共存的首先是其中的文学和哲学思想,尤其是文艺的价值。我们今天可以从《诗经》、《楚辞》等古典作品中吸取营养,以提高我们的文化修养,提高我们的生活格调。文艺作品的审美价值尽管产生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中,但它一旦产生以后,就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存在。无论产生于何时何地,文艺作品在我们的审美经验中都存在于此时此刻,与我们没有隔阂。这就是伽达默尔特别提到的文艺具有“共时性”的特点。在我们欣赏文艺作品时,过去和现在都在我们的审美经验中变得统一起来,我们在审美的关照中达到了忘我的境界。当然,我这样说,主要是为了更好地说明什么是活的文化,并不意味着否定传统中的政治、经济、哲学思想等在今天也有其价值。

传统文化是精神财富,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只要我们肯努力,古今中外的文化宝藏都可以任我取用。在文化修养上要做到博古通今、兼备中学西学之长当然是极为困难的,但惟其困难,才是我们努力追求的理想目标;也正因为其难,所以凡是在治学谈艺上能囊括中外古今的学者才值得我们由衷地敬佩。杜甫是伟大的诗人,他曾做诗《戏为六绝句》来总结诗歌创作的传统。这里我借用其中的两句来阐述我的观点:“不薄今人爱古人”,“转益多师是汝师”,也就是要既不否认传统,也要注重现代,好的东西,我们都要接受,从各个方面去学习古今中外有价值的东西。精神财富是属于全人类的。如果我们能采取这样一种开放灵活的态度,那么我们就可以乐观地看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谢谢大家!

演讲日期:1998年8月10日,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科目中心供稿,录音整理:范长军,未经本人审校

编者絮语 经典是文化的核心,对经典的阐释则是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的核心内容。在经典的阐释过程中,尽管曲解或误读不可避免,但对经典的阐释决定了文化的发展方向。这一点,对照中西文化对各自经典的阐释过程就不难看出。由此,当有些人把中国近代落伍的原因完全归结于自己的文化经典时,我们是不是应该思考,究竟是祖先的过错,还是后代子孙的不孝或无能?《诗经》被阐释得面目全非;儒学的伦理精神被僵化为“存天理,灭人欲”的“三纲五常”;墨子、名家等所包含的科学精神和思维方法完全被视而不见;道家的积极思想没有得到更多的张扬,而消极思想却在滋生蔓延……

余秋雨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我估计,在大概 2020 年左右,亦即在 21 世纪开始的 20 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华文化可以出现一个范围相当广泛的复兴。这个话,我虽然说是我估计,其实是有很多人提出的判断。我在《山居笔记》的序言里讲到了白先勇先生给我的一封信中的判断。他认为在 2020 年中华文化会出现世界性的复兴,因为,很多很多的条件已经开始具备,而不在那个时候复兴,则最佳的复兴时机有可能失落。

搭建中华文化的第四座桥

——在湖南大学演讲——

今

年是 1999 年,在正好 800 年前,也就是 1199 年,我们中国可以称得上是世界级的哲学大师朱熹先生去世了,不管哪一种理由,在他去世 800 年之后,我们的后代学人应该到这儿来朝拜他、来纪念他。我们可以这样说,在

朱熹先生离开 800 年之后,我们中华文化的命运真可以说是一言难尽,很难用一个短暂的时间能够把这 800 年中的文化经历说清楚。但是有最粗浅的几点那是可以说的。我曾经在文章当中提到,在朱熹先生离开的 300 年之后,另一位世界级的哲学大师,就是王阳明先生来到这个庭院,他在这儿徘徊,他的思维和朱熹先生距离比较大,但是,在这个庭院里面徘徊的时候,他感慨良深,写下了一些非常深情的诗句。后来,又过了几百年,发生了一些非常巧的事情,这期间我们中国历史的纪年也进入到与世界同步,把百年叫世纪,作为分隔阶段。如果说,朱熹先生去世在 12 世纪的最后一年,这有点巧合的话,那后面这样的巧合比较多。

19 世纪开始,中华文化突然和西方文化冲撞,中华文化过去的骄傲和自己带来的许多弊病,在 19 世纪的冲撞当中表现得非常充分。总的说来,这些冲撞对我们中华文化来说是悲剧性的冲撞,更多地暴露了我们中华文化的某一种不适时宜的地方。但是,它的骄傲的一面没有很好地冲撞出来,在 19 世纪晚些年的时候,有一大批文化人包括当时从岳麓书院出发的很多了不起的人,他们在思考中国的命运,他们从文化的意义上考虑要改变 19 世纪对中华文化的一个根本意义上的曲解。所以 20 世纪就成为了要雪耻的一个世纪。这里有很多很多故事,发生了很多很多事件。当 20 世纪结束的时候,就是现在我们怎么来看待一代一代大师留给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现状和我们的前景。这是留给我们的课题。

中华文化在历史转型时期,在世纪交替时期它怎么走?我想起去年我们在东南亚一个地方进行了一次叫做“跨世纪的文化对话”的演讲,我在那儿发表演说的题目,我看网站上传过来的消息,叫第四座桥。我想作一个整体的回顾。

我在想,几个世纪以来中华文化的世界形象可以说已经搭建了三座桥。第一座桥,在我看来叫“经典学理之桥”,指的是我们中国古代的好多经典,在世界上确确实实发生了很深刻的影响,包括朱熹先生的学说。应该说大概在17世纪的时候,来了很多西方的传教士,特别是耶稣会的传教士,他们想来传播他们的宗教,当他们在我国住下来以后,突然发现我们的先秦哲学当中有一些思想让他们非常惊叹,这让他们进行了一场反传播。一方面在我国传播西方宗教,一方面把他们发现的我国的先秦哲学传播回去。他们翻译了比如孔子、孟子的一些书,甚至写了孔子传。这些翻译使西方世界为一个古老的东方哲学而惊叹。在我看来,比如像法国的启蒙主义者当中很少有人没有读过由17世纪的那些传教士翻译的我国古代的哲学著作。比如像孟德斯鸠,他从我国古代哲学里边,发现了某一种专制的阴影。这种对我国古典学理传播的桥梁,从那个时候搭建,现在也没有坍塌。可以这么说,哪怕是没有来过我国的欧洲学者,他如果要写一本世界哲学史的话,他会把前面很长的篇幅留给我国哲学。这是第一座桥,古典学理之桥搭建了,而且它现在巍然屹立。

第二座桥,我称之为“世俗民艺之桥”。随着我们许许多多华人飘洋过海,来到东南亚、美洲、欧洲。他们带去了自己的日常文化生态方式。这当然也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说,经典学理之桥能够表达出我们文化的一种尊严的高层建筑的话,那么世俗民艺之桥却把有质感的我们的文化实践状态推到了世界各地。我们如果到世界各地走一走的话,会看到舞龙、舞狮、龙舟、功夫,甚至包括餐饮等等民间艺术,以那种世俗方式渗透到了各个方面。我们过年过节的时候,看到飘洋过海的华人用这样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某一种

文化生态,我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但时间长了以后,我们又感到了一种遗憾,有相当多的西方人觉得这可能就是中华文化的主要部位。他们对我所熟悉的戏剧艺术也往往作世俗民艺方面的理解,认为那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民间艺术,带有技巧性的民间艺术。这时候我就觉得,是啊,这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父母辈的文化生态,但是中华文化最精华的部位好像不在这儿。你没法跟世界说清楚,你最精华的部位在哪里,但是你感到,这是的,但是又不全是。不仅不全是,主要部位还不在这儿。这是第二座桥,这座桥,现在你到世界各地还能看到,很热闹,一到有节日的时候,唐人街里边,华人地区,那种文化生态方式,比我们的腹地大陆还要热闹还要沉醉。这是文化、俗文化,但是我们总觉得它的精华部位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

第三座桥,“信息传媒之桥”。这指的是,耶稣会传教士当时写回去的信——这些信终于慢慢地出版了——然后有好多游记、日记、调查报告,到现在有好多摄影集、纪录片。现在当然传播更方便,有电视、有网络,有很多很多传媒方式,通到世界各地。我们中国的文化生活和熏陶对他们来说已不太陌生了。我们有一些文学作品,他们更多地往往是以信息方式来接受,也从中看到了那个时代曾经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

已经搭建了这三座桥,古典学理之桥、世俗民艺之桥、信息传媒之桥。我想似乎还缺少一座桥,所以我的演讲题目叫“第四座桥”。这个第四座桥是个什么样的桥呢?就是当我们古代哲学传过去以后,当我们生活方式作为一种文化传过去以后,当我们作为一种信息报道传过去以后,还缺少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表现中国人的灵魂的一种东西,包括他们精神内涵的东西,还没有很好地传播过去。就像人们要通过歌

德和贝多芬来了解德国人,要通过雨果、罗丹来了解法国人,要通过泰戈尔来了解印度人,或者通过海明威来了解美国人一样,我们中华文化经过好多世纪以后,还没有一种强有力的、足够的、能够体现群体灵魂的那种艺术吸引力。让我们文化圈外的世界人们所共同感动。这是我们的责任。这也就是我们要努力来搭建的第四座桥。

我们是从建设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而不是纯粹从建设者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在这座桥的搭建过程当中,我们就要想如何进一步来塑造自己新的素质,我们进一步地来反思我们曾经有过的缺陷,进一步地来改变我们的好多已经不适应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生态方式。我们想,有没有可能把问题想得大一点,高一点,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要深深地来反思一下的话,我们尽管非常尊重我们的前辈艺术家、前辈作家,他们作了很多很多努力,我们可以开出一大串的名单,说明他们曾经在搭建这座桥梁当中作了很大很大的贡献。但是这座桥似乎至今还没有畅通,如果畅通的话,也显得不够坚实。我们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生活在兵荒马乱的时代。到 21 世纪我们却不能如此了,我们在 20 世纪的最后一年中,在谈论的时候,那已经不是一种过于轻松的谈论了,我们已经感觉到某种紧迫感。如果当世界已经非常瞩目、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时候,他们还很难收到有关我们群体灵魂的最美丽的信号的话,中国的艺术家要负有责任。就像泰戈尔讲的那样,历史是一堆灰烬,我们要把手伸进这堆灰烬里面,这里面说不定还有余温,我们要捕捉的是这个余温,把这个余温和我们的体温联结起来,然后有可能点燃很多很多读者心头的文化之火。这个我们做得不多,我们就觉得这堆灰烬就是重要,但很少把手伸进去,去动弹一下灰烬的外层。这已经有很多

人去责备你了,这就出不了好的作品。过于固步自封,过于人云亦云,我们不仅自己生命热能发不出来,我们祖先传教给我们的生命也就耗散掉了。

对我而言,面对世纪之交,我在想我个人的素质当中有很多障碍,有很多不合时宜的地方。我有的时候会思考到文化的一些宏观的东西,一些道义性的根本的东西,但是在多数情况下,我和我的同伴对中华文化的问题的思考,往往是技术性的、具体的、琐碎的,使文化失去了它最庄严的本原。我经常有此种感觉,写了一些散文,引起了一些好评;或者写了一些学术著作,得到了一些奖励,你就会顺着这些好评和奖励走下去了,以为这就是我们文化追求的某一种终点性意义了,在这个终点性意义周围徘徊徘徊就够了。而没有想到,我这个身体是一定要在人生的短暂过程中经受最严重的磨砺,在磨砺中把中国人之谓中国人的一种最珍贵的东西揭示出来,这就很少很少。有一个很好的批评家批评我的作品严重缺少酒神精神,最多只有日神精神,我当时虽然一身冷汗但我觉得非常痛快,觉得真是深深地了解我的局限。这一点,我想在这样的庭院里边面对我们的祖先说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地惭愧。

那么,当 21 世纪的任务放到我们眼前,无论我,无论我的同仁,我们都应该感到,我们浪费掉的时间太多太多,我们很多岁月都在过去的慌忙的过程当中耗散掉了。所以,由我们来参与搭桥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这是时间原因。我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 21 世纪的新的一代人的身上。但是我们这一代需要呼吁,需要有这个眼光来指点,需要来指引,而不要再沉淀在我们文化界一些非常琐碎的一些事务性的麻烦当中。那么 21 世纪在中华文化能够搭建的桥梁当中,我们首先要建立的一个心态就是一定要大力地欢呼、期待那些建设者,不要

出现过去曾经有过的情况,就是拆桥的人比搭桥的人还要多得多的情景,(如果那样),这个桥就很难搭起来。一定要搭这个文化之桥(的话),必定要有慢慢地呼唤建设者,或者等待建设者的心态。

我们不断地参与,不断地创造,最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呢?我估计,在大概 2020 年左右,亦即在 21 世纪开始的 20 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华文化可以出现一个范围相当广泛的复兴。这个话,我虽然说是我估计,其实是有很多人提出的判断。我在《山居笔记》的序言里讲到了白先勇先生给我的一封信中的判断。他认为在 2020 年中华文化会出现世界性的复兴,因为,很多很多的条件已经开始具备,而如果不在那个时候复兴,则最佳的复兴时机有可能失落。白先勇先生代表了一大群海外华人的集体意识。前不久我见到他,他又表述了这种想法,我非常赞同。这次复兴会给我们的祖先、我们全体中国人带来一种精神上的尊严。这是这些年来我始终考虑的问题,因为我走遍世界很多地方,我总觉得海外很多文化群落可以佩服中国人物质方面物化的东西,比如建设成就、古代的各种遗迹,但对活生生的灵魂的群体存在状态,他们由不太了解到轻视,这是到处都可以看到的。所以,我想这个复兴以后有可能出现我们的父母之辈期盼已久的一种整体性的尊严。而这个尊严,我个人觉得不仅仅是让海外人对我们佩服,包括我们自己,他无论是学理上的还是形象上的作品,能够感动我们文化圈内的人,而且第一感动层不是海外,而是海内。我们受到这样的感动和启发以后,我们群体的生命质量都会提上去。作为一个文化人期盼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远景。我可以这么说,从我们的前辈大师开始,他们一代代所受教育,他们所写的著作,他们除了倾吐自己个人心中的不平之外,更多

的正是期盼这种很悠久的历史有没有可能在新时代复苏。现在,尽管我们的问题很多,失落也很多,但复兴的可能比前辈大师所遇到的似乎还大一点。我们抓住这种可能性,把复兴我们中华文化、振兴中华文化认认真真地向前推进。如果在中华文化的腹地来说是这样的话,那么如果在更大范围来讲,更应是如此。

我们的文化人当然不能以文化去轻视我们在其他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做的工作,但是一定要固守住文化在我们现代生活当中、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尊严、地位,让中国人在 21 世纪做得更好。不是一般的外在尊敬,而是我们也自重了,文化来给自己增添着重量。当好多民族能够用自己的文化增添自己的重量,用自己的文化来沟通世界的整体标准时,我们这个地球就会变得更美好,否则,无数的麻烦问题就会积下来,最后的结果将会是不堪设想的。

面对着我们已经感到的缺憾,又有很多任务在我们眼前,又有中华文化复兴的一种依稀朦胧的愿望在我们眼前闪耀,我们要做的事情确实很多。我们一定要深入到现实文化的最前沿,来改变我们原先好多文化的思考方式。我们当然要抓教育,但我们能够教给学生的内容一定要和中华文化本身向前推进的需要紧紧联在一起,需要和社会发展的规律紧紧联在一起。如果光是在一般意义上的弘扬文化,我觉得还不够。文化自身的内质需要发生变化,文化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很重要。岳麓书院当然有一种非常庄严的文化,它延续着中华文化最优秀的部位,但一夜之间能够让几亿人都能接受的文化运载工具和文化自己的信号系统,在现在的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显而易见已经非常重要了,(而岳麓书院却难承其任)。如果我们面对电视文化,还固步自封,认为它不应该成为我们中华文化的组

成部分,那文化就很难向前发展了。这也是我到最后不拒绝电视采访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我们要把文化的旗帜举起来,把文化桥梁的进度推向前的话,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一定要面对文化发展的自然逻辑,面对文化发展的自然规律,而不要固步自封地作一个文化之国的梦。否则对于现实的世界,中华文化过去的尊严有可能丧失在我们的手上。就像中国戏曲一样,如果你在外层结构当中固守,而完全不考虑到它的时限的接受状态和自然的发展规律,它的过去的我们认为很尊贵的命运有可能破碎在那些过于热烈、过于虔诚的人的手里。

我们在一个古典文化的汇集之地,在大师的跟前,来谈论这一点,只要是有文化远见的大师,他们在天之灵一定是鼓励我们这么做的。这就是面对现实、面对时代、面对中华文化生存的土壤,努力地把我们中华文化最值得骄傲的部位认认真真地一步一步地往前推进。在推进的过程中,触摸今天的人的灵魂,用今人的灵魂去沟通我前面所讲的灰烬深处的余温,那么在现代人的体温和灰烬深处的余温沟通当中,有可能出现真正的大作品,有可能出现让我们自己和我们的邻居们一起感动的大作品。这个作品出来以后,不仅我们欢欣鼓舞,而且能给给灰烬以余温的先辈们以欣慰。这个时候,我们中华文化就会出现一个非常兴盛的局面。如果再过很多年,譬如我设想,到现在朱熹先生去世 800 年了,如果在 900 年,当我们再次朝拜前辈大师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我们中华文化的世界地位已经很高了,如果我们觉得整个民族的素质由于我们文化地位的提高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我相信,即使那时我们已不在了,也会感到非常高兴。他们可能不会记得在 1999 年 7 月 11 日下午一个细雨蒙蒙当中我们有过这样一个聚会,而这样的聚会会不断地有,全部的聚会都是一种企盼、

期待和向往。他们可能不记得我们有过这样的聚会,这都不要紧,我们把自己的愿望留给这个庭院。我们相信,这个庭院既然已经有过千年的魅力,那么不管再过多少年,她一定会给我们今天的期望有一个满意的答复。

演讲日期:1999年7月11日,湖南大学教务处供稿,
录音整理:杨健康,未经本人审校

编者絮语 “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这是前几年广为流传的一个口号。的确,我们既需要用世界的眼光来审视中国文化,也要在世界文化的大潮中亮出中国文化的旗帜。“搭建中华文化的第四座桥”,这是一个文化上的颇具战略意义的口号。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希望寄托在新一代的青年身上。

郭世佑

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

美国有位经济学家认为,对于许多谋求现代化的国家来说,19 世纪的最后 25 年显得很重要。如果哪个国家在这 25 年内发展上去了,事情就好办得多,否则就很被动。

由于近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不是以和风细雨的平等方式进行,而是充满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残暴与自私,如果真的有人要去“师夷”,国人除了存在“夷夏之辩”的思维障碍之外,还会遇到相应的感情障碍。思维与感情的双重障碍,就在较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步履艰难。

中国现代化的回顾及其他

——在浙江大学演讲——

各位同学、各位朋友:你们好!承蒙教务处的信任,我作为咱们新浙大成立后的第一批校区巡回学术讲座的 12 名演讲者之一,能与这么多非人文学科的同学交流心得,感慨万千。

常听前辈们说,46 年前的浙江大学本来就是一所学科齐

全的综合性大学,还享有“东方剑桥”之美誉。她不仅拥有竺可桢、苏步青、陈建功、贝时璋、王淦昌、谈家桢等一大批家喻户晓的科学家,还拥有张荫麟、张其昀、谭其骧、姜亮夫、夏承焘、严群等一大批名扬四海的人文学者。1952年的院系调整,就把一个完整的浙江大学分割成四家。46年后的今天,几经沧桑,四家总算归于一体,总算恢复了一个学科齐全的浙江大学,也才有了今天多学科的校区巡回学术讲座。但何时重振“东方剑桥”之雄风,也许还有待全校四万余名师生的共同努力,海内同行都在拭目以待。我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面对那近乎“剪不断、理还乱”的校史,感慨良多。

刚才主持人说了,海报也写了,今天的讲座主题是谈咱们国家的现代化问题。也许有的同学会产生怀疑:请历史系的教师来讲现代化,是不是“江湖郎中”来了?请同学们注意,咱们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并非才从今天开始,早在近代所谓“自强新政”时就已启动。而“自强新政”,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洋务运动”,恰恰属于历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再说,如果用人文学科的眼光来看今天的现代化,比起从统计或技术的角度来谈现代化,也许会有些差异,但差异并非坏事,许多具有创新意义的思考就往往来自于认知差异的启发,也就是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今天的讲座打算谈三个问题:一是我国以往现代化成效不大的主要原因;二是如何看待当前现代化建设的成就;三是如何看待我国在21世纪的前景。这三个问题,分别涉及我国现代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每个问题其实都是大题目,两个小时的讲座,只能选取其中相对有代表性的话题与同学们交流。由于第一个问题比较复杂,而且时间与空间的跨度很大,准备多花点时间,作重点解释。同学们都是祖国现代化建设

中不可缺少的后备军,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祖国的未来,欢迎同学们提问。据说,今天出席讲座的还有来自现代化建设第一线的校外听众,我也感到很高兴,也很想听听他们的声音。

关于“现代化”的概念,我国历史学界内部的表述并不完全一致。包括台湾学者在内,还有部分学者喜欢把近代史上的现代化进程叫做“近代化”,试图以此来区别于今天的现代化,这种区分在学理上是否说得通,在历史学界还容易引起争议。这是因为,以技术革命为先导、变小农文明为工业文明的中国现代化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某些阶段性的变化,呈现某些阶段性的特征,但彼此的时空联系显而易见,不便人为地断裂开来,有关阶段性的变化与特征也不一定非借助于不同的概念来表述不可,这样的表述不仅不便于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尤其不便于说明事物的本质。

不过,人们都把曾国藩于 1861 年创办安庆内军械所、试图仿制西方坚船利炮视作中国早期现代化或“近代化”的开端,这一点似乎没有什么争议。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在目睹英法联军的猖獗之后,带着“自强”的理念,率先引进机器生产,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从 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转向“求富”,创办民用工业,包括航运、纺织、采矿、冶炼、铁路、电报、邮政等。这些官办的民用企业还刺激着民办工商企业的兴起,后者就是人们常说的“民族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的对等词应该是外国资本主义,人们却把官办的民用企业排除在咱们的民族资本主义之外,好像这些企业的创办者就不是咱们中国人,这些企业不属于咱们中华民族的企业,这当然说不通。我想,如果那些“洋务”官僚的后裔为此提出诉讼,他们肯定能打赢这场官司。

清政府的“自强新政”比日本的明治维新还早 7 年,其成效却比日本差多了。30 多年后,在日本挑起的甲午战争中,庞大的中国被一个岛国打得落花流水。在此之前,黄头发蓝眼睛们通过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侵华战争打破了一个所谓“天朝上国”的神话,但还算给中国留下一点关于“东方大国”的体面。但是,经日本一打,连这点“东方大国”的体面也被一扫而光。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随之而来的是爱国书生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人的变法呼声与戊戌年间由光绪皇帝发号施令的“百日维新”。可惜好景不常,一个席卷全国的变法运动被大权在握的西太后慈禧轻而易举地镇压下去,谭嗣同等人成了紫禁城权力格斗的牺牲品。

等到 1900 年八国联军血洗京师之后,饱受逃亡之苦的慈禧才发现都是她当家的错,才急急忙忙号召变法,宣布“新政”。军事上,大规模编练新军;经济上,大办实业,鼓励民间投资设厂;教育上,兴学堂,派留学生,废科举。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清政府于 1905 年派遣 5 名大臣考察欧美与日本的宪政,第二年宣布为实行君主立宪制做准备。再过两年,又被迫宣布准备的期限,以 9 年为期。这时,光绪皇帝和慈禧在两天之内先后死去,3 岁“儿皇帝”溥仪的父亲、25 岁的载沣以“摄政王”的身份主持朝政。在梁启超、张謇等人的号召或影响下,广大和平请愿者要求迅速召开国会,载沣一伙强行把请愿运动镇压下去,请愿者们则纷纷向反清革命队伍靠拢,加速辛亥革命高潮的到来。

美国有位经济学家认为,对于许多谋求现代化的国家来说,19 世纪的最后 25 年显得很重要。如果哪个国家在这 25 年内发展上去了,事情就好办得多,否则就很被动。从 19 世

纪末 20 世纪初帝国主义势力明显操纵和压制落后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情况来看,这种见解不是没有道理的。清朝政府搞了 30 多年的“自强新政”,结果既没有富国,也没有强兵,举国上下都感到失望,“自强新政”的主要干将李鸿章从此以后再也抬不起头来。为什么会这样,就值得我们认真讨论。至于被日本打败后,好不容易激发起全民族的图强意识,造出变法声势,只因遭遇一次宫廷政变,就被顽固守旧势力绞杀得差不多了。即使是 20 世纪初年的“新政”,虽然使中国的国防建设、经济发展、人才培养与民众政治热情的调动等方面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势头,但国际环境与改革者的内在素质、国内社会环境等都很糟糕,外表很热闹,实际上很肤浅,而且捉襟见肘,险象环生,加速辛亥革命高潮的到来。

关于晚清时期现代化成效不大的主要原因,许多中外学者都作过分析,见解很不一致。在我看来,有三个因素最值得注意。

第一,“夷夏之辩”的陈腐观念。《春秋左传》说:“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久而久之,“华夏”一词就成了文化与文明的代名词,所谓华夏民族或中华民族就成了该民族自身文化优越感的一个象征性符号,随之而来的是对周边民族的轻蔑,“夷”、“戎”、“蛮”、“狄”、“胡”等词都不知不觉地变成了贬义词。孟子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他的这句话影响很大。其实,“未闻”并不等于未有。华夏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混合体,华夏文化属于典型的多民族混合型文化,这种混合经过春秋战国、西晋、东晋、五胡十六国,再到元朝和清朝,始终没有间断过,而“德华兽戎”、“以夏变夷”、“尊王攘夷”等观念又始终伴随其中。只认可“用夏变夷”却反对“用夷变夏”的卫道者们早就忘记了他

们所奉为华夏正宗的东西原来就有“夷”的成分,历史上并没有纯而有纯的“夏”或“华夏”。

平心而论,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所谓“用夏变夷”也并非毫无根据。由于从前华夏民族所遇到的周边的“夷”都相对落后一些,后者的社会经济发展都明显低于属于滚动概念的华夏民族,往往是周边落后民族从整体上模仿和吸收华夏文明,而不是相反。居高临下的朝贡体制取代了平等互利的中外交往。即便是武力强大的征服者,像元朝的蒙古人和清朝的满洲人,也是仿效汉族的典章文物制度来巩固自己的统治,“用夏变夷”就容易在咱们祖先的大脑中形成一种刻板印象。

自从鸦片战争以后,用大炮和商品强行打开中国的大门的西方不速之客既是侵略者,又是前所未有的先进者和强者,“用夏变夷”已经完全不管用了,惟有“用夷变夏”,才是根本出路。用魏源的话说,就是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说,就是要“变成资产者”(《共产党宣言》)。由于近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不是以和风细雨的平等方式进行,而是充满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残暴与自私,如果真的有人要去“师夷”,国人除了存在“夷夏之辩”的思维障碍之外,还会遇到相应的感情障碍,以强盗为师原本就是一件十分痛苦和难堪的事情,何况,咱们中国人还是一个很讲名分很要面子的民族。思维与感情的双重障碍,就在较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步履艰难。君不见,魏源的呼喊在神州大地只是浪费表情,应者寥寥,却在异国日本遇到不少知音,日本朝野将他的《海国图志》一版再版,成为明治维新的重要参考书。他的同乡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人力排众议,小心翼翼地将他的“师夷”主张付诸实践,却也常常遇到群起攻之,郭嵩焘作为近代第一个驻外使臣,他的结局最悲凉,死后连一个谥号

都没有。八国联军侵华时,还有人想找郭嵩焘出气,扬言要把他的尸体挖出来,以谢天下,好像八国联军侵华是他惹出来的。在吵吵闹闹的改革进程和争权夺利的老节目里,那些顽固守旧者往往以爱国者的姿态大打出手,一呼百应,泛道德主义在近代中国很有市场,那些立志进取者反而容易当作过街老鼠,无论是“洋务运动”的发起者曾国藩,还是后来居上的李鸿章,他们的日子都很不好过,不是经常当被告,就是夹着尾巴做人。虽有满腹牢骚,也只能在日记里或给朋友的书信中私下发一发。这种现象,其实并不局限于晚清时期,值得深思。

顺便提一下,我国史学界在总结“洋务运动”成效不大的原因时,有一个很流行的观点,认为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之辈只引进了西学的“皮毛”,却没有同时引进西学的“根本”,只引进科学技术和坚船利炮,没有同时引进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我总觉得这不像在说历史,而是像说政治神话,我在1985年提交兰州洋务运动史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就提出疑问:曾国藩等人当年只引进了一点“皮毛”,都弄得那么狼狈,如果真的引进政治制度,又能怎样?就不会败得更惨吗?如果洋务官僚没有引进政治制度是“洋务运动”不成功的主要原因,照此推论,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就应该成功,因为它们都程度不同地引进了西方的政治制度,但它们也偏偏令人失望。这时,许多学者又转换话题,说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悲剧完全可以证明,西方的资本主义方案在近代中国行不通,它救不了中国。这样的说法至少是自相矛盾的。既然说行不通,却还要苛责洋务官僚不引进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究竟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第二,皇朝政治的周期性衰败。这种衰败主要表现在两

个方面:一是周期性的社会矛盾与政治腐败加剧,二是紫禁城的政治素质与治国能力周期性地下降。

先就周期性的社会矛盾与政治腐败的情况来说,对中国古代史稍有了解的同学都知道,许多朝代在建朝初期,一般都懂得江山来之不易,也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都能开明廉洁、轻徭薄赋,尽快医治战争创伤,发展生产,从而使物产丰盈,人口繁衍,人民安居乐业,所谓“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康乾盛世”,都大致如此。换了几朝皇帝之后,就开始出现土地兼并,豪强称霸,官场腐败成风,社会矛盾上升,到了晚期更加厉害,加上人口膨胀与天灾人祸,甚至还有外戚专权或宦官跋扈,不得安宁,只好等待新一轮农民起义来改朝换代,让起义首领或哪个军功地主新建一朝,又从开明廉洁做起,先由盛到衰,再以新换旧,周而复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对于这种现象,国内有学者称为“超稳定结构”,国外有学者叫做“高度平衡陷阱”。尽管也有不少学者反对这些提法,但不等于说那种由盛到衰,以新换旧的周期性皇朝政治危机就不存在。

再就统治者的政治素质与治国能力来说,几乎每个朝代也存在由强到弱的周期性衰败现象,既与皇朝本身由盛到衰、由治到乱的局面相适应,又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种局面。中外学者一般都承认,嘉庆以后清朝皇帝显得一个不如一个。道光皇帝人虽不坏,也希望能对得起祖宗,但才识平庸,鸦片战争的惨剧只是让他打了一个哈欠,然后又做他的“天朝上国”之梦去了。咸丰皇帝是一个玩得很忙的花花公子,他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去睁眼看看外面的世界。他把允许外国公使驻京这一条款看成洪水猛兽和奇耻大辱,宁愿放弃关税收入,也想收回这个条款,结果使英法联军借此重开战争,直至血洗

京师。他在《北京条约》签订的第二年死去,由惟一的儿子载淳即同治皇帝接位,载淳的生母就由昔日的贵妃变成同治一朝的皇太后,即西太后慈禧,她带着才满6岁的儿子君临天下,也就是所谓“垂帘听政”,同治皇帝还不到20岁位就死于性病,慈禧就让才4岁的侄儿兼娘家外甥载 接位,继续做她的太后,前后把持朝政达48年之久。慈禧的文化程度并不高,还常写错别字,但智商不低,很有心计,她的主要精力不是用来精心治理国家,而是如何施展权术,经营自己的小天地,她的胸怀好像还装不下偌大一个中国。历史研究往往喜欢划派,有人说她属于“顽固派”,还有人说她属于“洋务派”,我总觉得,她好像都是,又都不是,她就是她——一个君临一切的主宰,顽固老朽也罢,开明干才也罢,王公也罢,汉员也罢,都不过是她玩于股掌的几颗棋子。在一个由男性唱主角的国度里,慈禧略施小计,就让那么多王公与汉员服服贴贴地拜倒在她的脚下,一拜就是整整48个寒暑。哪怕像袁世凯这样手掌北洋劲旅的强悍奸诈之徒,也只有在慈禧死后才敢调皮。我总觉得,如果根据社会学的角色分工原则来看,慈禧作为嫔妃出身的女人,她也许是成功的,但作为主宰多灾多难的近代中国命运将近半个世纪之久的最高当权者,作为中国早期现代化建设的领导者,却是很糟的。这既是爱新觉罗皇朝的不幸,也是近代中国的不幸。至于慈禧的后继者——宣统朝的摄政王载沣和隆裕太后,无论见识还是手腕,都比慈禧更糟。

第三,民族矛盾的复杂性。在近代中外民族矛盾的两极,既存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与中华民族的反侵略的矛盾,还存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同中国小农文明的矛盾,这是十分陌生和棘手的政治难题。用李鸿章的话说,近人所遇到的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而近代中国社会的民

族矛盾除了中外民族矛盾之外,还存在国内的满汉矛盾,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所罕见的。

由于国内满汉矛盾的存在,出自少数民族的清朝统治者总觉得内心空虚和不安。大敌当前,统治者不是尽可能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励精图治,一致对外,对于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而且在本国范围内属于先进行列的汉民族,仍然采取防范和压制的政策,对改革顾虑重重,总是带着弱者心态,担心改革会把权力改到汉人手里,总担心汉人“保中国不保大清”,不仅对一片诚心支持朝廷改革反对暴力反清的爱国书生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不放心,而且对曾经赴汤蹈火把清皇朝从灭顶之灾中解救出来的曾国藩等人也不放心,常常以内耗的形式毁坏中华民族内部那已经相形见绌的政治资源,既分散了督率国人全力对外的精力,又使迫在眉睫的改革打打停停,反复无常,使中外之间的差距越拉越远。

我个人觉得,要想理直气壮和卓有成效地走“师夷之长技”的理性之路,从根本上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富强,除了应当果断地抛弃“夷夏之辨”的陈腐观念、扭转皇朝政治周期性的衰败局面之外,还应当从切实解决国内的满汉矛盾入手,把防范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的国策改成尽可能调动这个基本的社会群体的积极性,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共谋我中华振兴之路,为现代化建设扫清障碍,直到我中华民族昂首挺胸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历史发展到了清朝末年的时候,当清朝统治者接连失去振兴朝廷也振兴国家良机的时候,要想切实解决满汉矛盾,单凭预备立宪期间宣布的准许满汉通婚、旗人自谋生计等官样文章是无济于事的,惟一可行的办法恐怕就是孙中山领导的暴力反清了。至于孙中山等人的反满思想充满汉族主义的内容,需要予以理性分析,那是另一回事。

在评价辛亥革命的必要性与历史功绩时,人们往往对暴力革命的重要性讲得比较多,如果能适当注意满汉矛盾的解决与中国现代化之间的重要联系,也许更显得深刻些。

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的现代化略有起色。如果实事求是的科学原则可以用于对任何历史人物的评价,则应当承认,袁世凯虽然不是革命者,但属于有办事能力的建设者,他采用内行治国,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重视金融体制改革和现代教育,在他当政的4年内,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不像教科书讲的那么糟。如果能这样发展下去,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要顺畅得多,问题是他搞专制独裁,排斥异己,还怂恿特务活动,尤其是公开践踏民国,想借君主立宪制当实权皇帝,建袁家天下,造成长期的政治动荡和北洋军阀的内部混战。

蒋介石在1928年基本上统一全国后,社会经济也有明显增长,据统计,在抗战前的10年里,尽管遇上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国民经济平均年增长率还能保持在8%~9%,当时的上海就以东方明珠的姿态展示在人们面前,香港还无法和它相比。但蒋介石也搞专制独裁,排斥异己,也怂恿特务活动,不仅围剿共产党,还迫害其他民主人士。国民党内部也经常四分五裂,不仅党外开战,连党内也开战。抗战结束后,满目疮痍,全国人民渴望和平,中共中央也在认真思考“和平民主新阶段”,国共两党携手建国的机会已经到来,但蒋介石仗着军事优势,不肯让步,使两党关系再次破裂。结果,国民党军队不堪一击,只好败退孤岛台湾,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的欢呼声中重建家园,承担起现代化建设的领导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百废待举,举国上下扬眉吐气,团结一心,现代化建设的大好时期已经到来,经济生产恢复很

快。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对国家建设的历史条件、长远战略与近期目标都讲得很实在,也很具体,其中关于国内主要矛盾、主要任务、党内民主生活等重大问题的认识和表述,都与22年之后影响深远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有关表述十分接近。可惜从第二年开始,毛泽东错误地估计了社会舆论的善意批评对中国共产党所造成的所谓危害,发动大规模的“反右”运动,先党外,后党内,部署所谓“引蛇出洞”,再一网打尽,这一网就打了50多万。接着又是“大跃进”,然后又是为期10年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大革文化命,大革知识分子和说真话者的命。政治运动像打仗一样,一个紧接一个,几乎人人自危,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老百姓很难吃饱饭,连牙膏、白糖、豆腐等日用品和食品都要凭票购买,或者走后门。那些数不清的闹剧和笑话,后人听起来都很难相信,但那都是一些真实的故事,都是父辈或祖辈亲身经历过的,每一个故事都包含一份代价。在那50多万右派中,如今没有平反的只剩下几十个了,可见,无辜者实在太多,其中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就占了不少比重,工农兵很少。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让那50多万错划的“右派”充当建设国家的主力,如果让那么多政治运动都改成经济生产运动和科教兴国运动,我们国家的现代化水平恐怕还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恐怕可以叫“社会主义中级阶段”了。可见,坚持货真价实的唯物史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何等重要!

只有回顾历史,才会深深地感到改革开放20年来的现代化成就来之不易,很值得我们珍惜。可以断定,尽管我国现代化建设已有将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但真正有声有色和像模像样的现代化建设还是在最近20年。尽管清朝末年的“新政”就曾经出现社会转型的迹象,也明显不如小平先生领导的

最近 20 年。20 年来,我们国家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教育上都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不说别的,我们这个雅致、气派的演讲大厅和功能齐备的多媒体演讲设备,这在 20 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如今男同学与女同学的发型、衣着都显得多姿多彩,不说在 20 年前,就在 80 年代中期,还会被教师和家长指责为“不像话”,“既不像人,又不像鬼”,或者叫做“资产阶级自由化”。我是 20 年前走进大学校门的,当时,国家高考制度刚刚恢复,男同学与女同学的服装布料和颜色几乎就没有什么区别,最时髦的是黄色军装和蓝色工作服,很少见到红色、绿色和花色,无论是出身农村,还是来自城市,个个都打扮得像贫下中农。什么复印机啦,彩照啦,只在报纸上见过。传呼机、磁卡、卡拉 OK 更是闻所未闻。前不久,我女儿见到我们大学同学的集体照,还大吃一惊,说:“没想到你们既像土八路,又像兵马俑,既土气,又呆板。”我老实告诉她:“那是历史的见证,比你的集邮册还珍贵呢!”我心里明白,如果没有这 20 年的巨变,这照片就太小儿科了。

不过,我们还应当同时看到,虽然 20 年来的成绩很大,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是不小,我们实在没有自满自傲的理由,小农文明中就有容易满足的传统。由于从前很不讲究现代化建设,很落后,如今大搞现代化建设,有 10% 左右持续不断的年平均增长率,其成效就比较容易体现和感受出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人家虽然只有 5% 左右的年平均增长率,但仍然不是小数目。就拿一个平时的功课不太好的同学来说,如果他由 50 分进步到了 60 分,虽然一下子把考分提高了 20%,但并不能说他的成绩如何理想;如果另一个同学由 85 分进步到 90 分,虽然只提高了 5.8%,但他的成绩还是要比前一个好得多,这两个提高率的差别并不能真实地反映绝对

值的差别,这是我们在欣赏增长率时要适当注意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在现代化建设中,还是在日常工作中,最重要的并不是增长率和速度,而是成本效益。坦率地说,近 20 年来中国的发展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也付出了许多昂贵的代价。至于这些代价哪些该付,哪些不该付,或者不该付那么多,都值得认真总结,各行各业和全国人民都要高度重视成本效益,不要大手大脚图热闹。

列宁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列宁的观点其实是有针对性的,但有不少人把列宁的观点教条化和绝对化,以为历史评价只要看比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就行了,不需要考虑成本效益,这很片面。我觉得,历史评价不仅要看是否比前人提供了新的东西,还要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该提供多少,又提供了多少,其实际效果究竟如何。在现代化建设中,动用那么多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大气、水、土地表土与矿藏等自然资源都在拼命地利用,不发展才不可思议,关键是看究竟发展了多少,是否符合国家法令和法规。如果某个城市应该增长 1 个亿,结果只增长 8 000 万,那也不是什么伟大的贡献。如果增长了 1 个亿,却乱吃乱花乱送乱拿,浪费二三千萬,也不是什么惊人的成就,还应当依法追究責任。如今全国每年公款吃喝就花掉 2 000 个亿,还不包括洗桑拿浴洗掉 200 个亿。

21 世纪即将到来,在地球村,几乎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像在赶集,都特别怀有一种跨世纪的激情,真有点普世化。饱经近代百年沧桑的中国人民也是如此,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不要以为 21 世纪就是咱们中国人承包的世纪,尽管某些西方人士也说过,21 世纪可能是中国崛起的世纪,我们没有理

由头脑发热。要注意某些西方人士说这些话的用意,他们主要是担心所谓“黄祸”,提防咱们中国的强盛,我们更要注意自己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各位朋友:天上并没有林妹妹,21世纪也没有为咱们中国人准备独家享用的牛奶和面包。新世纪的征途需要我们不卑不亢地走过去,而不再是站在自卑与自傲的两极跳来跳去。不管别人是怎么夸奖我们或嘲笑我们,让我们沿着小平先生开创的现代化道路,脚踏实地,用汗水和老茧托起明天的太阳,圆一个民富国强之梦,那是几代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梦啊!

演讲日期:1998年12月5日,浙江大学教务处供稿,
录音整理:刘海东、杭梦之,本人审校

编者絮语 现代化,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宏伟蓝图。然而,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上充满坎坷,充满荆棘。今天,我们已踏上现代化的正确航程,但我们要时刻牢记,只有人文和科技两翼齐飞,双翼强健,现代化的航程才会一帆风顺。

刘仲林

天津师范大学交叉科学研究所教授 所长

把中国文化视为一件装饰品、一种知识、一个古董、一件商品、一种手段的观点,都是对中国文化浮泛、浅薄的理解。把中国文化看成与人的心灵无关的身外之物,离开了心的自觉和人生的亲证来谈中国文化,就如同在岸上谈游泳一样,永远得不到其中的实感和真谛。

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在国防科技大学演讲——

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转换,既是一个世纪文化热点,也是一个百年难题。在改革开放深化发展的今天,它作为中国新文化建设的重要议题,愈发引人注目。

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转换,有多种不同的观点和见解,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本人近年师从张岱年先生,下面就以张先生的“综合创新论”为主线,结合个人研究心得,与同学们做一交流。

一 中国文化精华及其最高追求

要转化传统,首先要了解传统。亲爱的同学,作为炎黄子

孙,你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吗?你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一义,即其精华吗?我在给文理各系学生上课时,曾调查过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结果令人震惊和失望,除个别系外,绝大部分学生都没有上过中国文化方面的课,甚至包括大部分研究生,都没有中国文化方面的基本知识,大家谈起中国文化,都是些道听途说、一知半解的东西,我们祖先文化遗产的精华要义则无人知晓。

现实中的一些误区,也妨碍了我们对中国文化精义的了解。例如:有的人觉得能谈几句孔孟格言、老庄语录,就可以表现出一个人文雅而有修养,就算了解中国文化了;有的人觉得文化经典都是文言古文,时代久远,学这种知识难度太大,畏难而远之;有的人觉得中国文化是封建时代产物,抱残守缺,尊古复旧,和现时代精神格格不入,不值一学;有的人觉得文化经典有利可图,竞相炒作,粗制滥造,把中国文化当成了摇钱树;有的人觉得中国文化重“义”,市场经济重“利”,提倡中国文化可以起到制止道德滑坡的作用;凡此种种。这些把中国文化视为一件装饰品、一种知识、一个古董、一件商品、一种手段的观点,都是对中国文化浮泛、浅薄的理解。把中国文化看成与人的心灵无关的身外之物,离开了心的自觉和人生的亲证来谈中国文化,就如同在岸上谈游泳一样,永远得不到其中的实感和真谛。印度著名学者泰戈尔有一本书名为《人生的亲证》,梵文是 sadhana,意思是“将人生引向正确的道路”,译为“人生亲证”,非常贴切,因为包括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其核心焦点在于达到人的自觉和亲证。泰戈尔说:“源于伟大心灵的体验的有生命的语言,其意义永远不会被某一逻辑阐释体系详尽无遗地阐述清楚,只有通过个别生活的经历不断予以证明。”这意味着,东方文化的精华,

不能单凭学习经典的语言文字达到,而是要通过修身践性,超越文字表层,达到心领神契、大彻大悟的境界。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下学上达”。

阅读学习是“下学”,而通过亲身修证,超越字面,达到彻悟的境界,就是“上达”。“上达”是中国文化第一义,而“下学”是中国文化第二义。眼下社会上流行的普及中国文化经典的书,把重点都集中在注经解字、疏文述义上,结果止于“下学”,而中断了“上达”,致使中国文化精义被大量名词术语分割得支离破碎,古代文化大师们的真精神已荡然无存。这就是千百年来“经学”治学方法,它至今束缚和阻碍着我们的心灵与古代大师心灵的直接沟通。

说到“上达”,同学们要问,“上达”的究竟是什么境界呢?这一境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即是“道”。换言之,“道”是整个中国文化的最高追求。当代著名哲学家金岳霖在他的《论道》一书中指出:“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似乎是道。所谓行道、修道、得道,都是以道为最终的目标,思想与感情两方面的最基本的原动力似乎也是道。”

什么是道?《老子》一书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意思是说,道在本质上不能用语言表达;可以说得出来的,不是真正的道。“道”不可说,这是道的最大特点,也是把握道的最大难点。我们前面说的中国文化第一义,正是这个道。道不能说,书上写的不是道,那么,到哪里去寻找道呢?宋代一位尼姑写了一首《悟道诗》,颇有深意,诗云:

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陇头云;
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

在诗中,她以“春”喻“道”,为寻春的踪迹,踏破芒鞋,入岭穿云,却不知道春在哪里,但是在归来后笑拈梅花,轻嗅香气的瞬间,忽然感悟到春在枝头,早已十分烂漫了。作者心头,顿时春意盎然。为此,《历朝名媛词》在评此诗时说:“诗有悠然自得之趣,此尼直已悟道,不特诗句之佳也。”

这首诗表达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即道不远人,道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心头。道虽不能言说,但是可以在生活实践中体验、感悟,其真知妙义只有亲身经历才能明了。譬如练习骑自行车,其中也有“道”。无论会骑车的人怎样讲解骑车之“道”,初练的人上车总不免要摔跤,原来,把握车子动态平衡的方法,是无法言传的,只有经过多次实践,学车的人才能掌握要领,骑行自如。小小的骑车之“道”,不也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吗?孙中山先生曾有“知难行易”的著名观点,借用在这里,我们可以说,“道”也是“知难行易”,即用概念语言定义清楚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在实践中容易体会,只要在现实生活中有心寻道,道就会出现我们身边。

简言之,“道”是人通过对某种事物(最高是天、地、人)融会贯通、整体领悟,而在实践上达到的境界。这一实践境界是难以用语言解释清楚的,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如何解释道,而是如何求道、得道。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诸子百家,都是内容、风格各异的求道派,其中儒、道、释三家影响尤为深远。儒家主张以“仁”为中介而达道,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人称孔子之学为仁学;道家主张以“法自然”而达道,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是一种“虚静无为”之学;佛家主张“道须神悟,妙在心空”(《人天宝鉴》),是一种“息心寂灭”之学。这三家学说的内容很丰富,不乏有我们现代生活可以借

鉴的观点和思想,但从总体上说,它们尚不能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化的内在源泉和契机。

现在问题就显现出来,大家一定要问:现代中国文化是如何求道、得道的呢?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化的内在源泉和契机是什么呢?这两个问题实质是一个大问题的两个方面,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论”对此做了深入解答,下面我们就做一简介。

二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

同学们可能都记得,1997年江泽民同志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中指出:“我们的先哲通过观察宇宙万物的变动不居,提出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变革创新、努力奋斗的精神力量。”这句话虽然简短,但确实点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化的关键。当我们把这句话的内涵展开,就会发现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奥妙。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语出自《易传》,而《易传》思想中正是包含着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以及向现代转化的内在源泉和契机。

《易传》是对《易经》的解释,共由10篇文章组成,又称十翼。传说是孔子所作,但无确据。今天多数哲学史家都认为《易传》是战国以至秦汉陆续形成的解释《易经》作品的汇集。值得注意的是,在历史上,自两汉以至近代,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易传》是孔子撰写,《易传》以孔子手著的名义对中国文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从《易传》内容分析,它是在易(经)、儒、道等思想基础上综合创新的结晶,其中不仅含有丰富的易、儒、道观点,而且通过“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实现了理论上的飞跃,形成了原有的易、儒、道中未曾有的新观点。

正是《易传》这些新观点,包含着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以及向现代转化的内在契机和接榫点。

张岱年先生认为,《易传》中有两句话,对中国的民族精神有决定性的影响。一句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这是说,那包括日月星辰的天体永远在运动,永不停息;有道德的人应效法天的“健”,努力向上,绝不停止。另一句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卦)地势是坤,载物就是包容许多物类;有道德的人就应该胸怀宽大,包容各个方面的人,能容纳不同意见。“自强不息”是积极进取的精神,“厚德载物”则是一种博大宽容的精神。这两句话,在铸造中华民族精神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参见《张岱年全集》第6卷,第137页)《易传》上还有一句话“天地交,泰。后以财(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泰卦)天地交的思想也很重要。天和地,一个为乾一个为坤,或者说一个为阳一个为阴,二者相交合,产生了万事万物,是吉祥通泰的象征;有道德的人应效法这一天地交的大法则,裁成天地之道,辅助天地自然之宜。由天行健、地势坤、天地交泰,依次引导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裁成辅相”等重要思想,这三句话形成一个较完整的整体,可以说集中表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在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化的问题上,基本精神定位是十分重要的。张岱年说:“中国文化持续发展,已有数千年之久,延续不绝,虽有时衰微而可以复盛,必然有其不断发展的精神支柱。这精神支柱可以称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这里所谓精神指文化发展的内在源泉。”(参见《张岱年全集》第6卷,第62页)许多文化观点,如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中西互为体用、中西非体非用等,都是未能把握中国文化基本精神,陷入空泛的口号之争。

当然,光有基本精神不够,还要寻找出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化的具体接榫点。木器中两部分接合的地方,突出的部分叫“榫头”,凿空的部分叫“卯眼”。“接榫”就是凸凹两部分的接合,互相咬住,形成一个整体。这里我们以“接榫点”做比喻,象征“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化的接合部。这个接榫点在哪里呢?也在《易传》之中。《易传》的核心观念是变易,而变易的根本要义是“生生”。《易传·系辞上》云:“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张岱年解释说:“世界是富有而日新的,万物生生不息。‘生’即创造,‘生生’即不断出现新事物。新的不断代替旧的,新旧交替,继续不已,这就是生生,这就是易。”(《张岱年全集》第6卷,第228页)由此可见,“生生日新”是一种积极的进化发展观,反映了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实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富生命力的世界观,也即是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化的接榫点。我们前面所说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裁成辅相”,都是这一观点在人生观上的表现和应用。《易传·系辞下》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这个“生”字,可以说是接榫点的聚焦。对这个“生”字,张岱年先生有一个画龙点睛的转语:生即创造。从“生”到“创”虽是一字之差,但却包含着极为重要的观念飞跃,是传统向现代转化的根本点。古人讲“举本统末”,从“生”到“创”的飞跃,就是传统到现代转化之“本”,脱离了这一个“本”,转化就会歧路亡羊,难以成功。“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指出:“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创造的精神。创造就是进化,世界上不断的进化只是不断的创造,离开了创造就没进化了。”这是对新文化发展的重要反思。

以《易传》“生生日新”学说为起点,以“创”的观念为主线,

经过 60 多年的孜孜不倦探索,张岱年形成了较完整的“综合创新”理论体系,这是我国新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张岱年认为:宇宙是物质生生不已的创造历程。生命与心灵,皆是物质演化之结果。由自然而有人,是自然之趋于自觉。世界无人之前,是不自觉的演进;有人,然后由盲渐得不盲,由无明而渐得明。人之作用在于自觉参加宇宙创造大流中,而赞助自然的创造。于人,乃得宇宙之自觉。张岱年强调指出:人之所以为人,在于能有所创造,在于自觉而有理想。人生意义由创造出,且在创造中。

应当指出,张岱年所说的“创造”,是一广义的创造,其基本含义是“前所未有者之出现”,既包括自然界不自觉的创造(进化),也包括人类的自觉创造(实践)。正是通过自然和人之间这种既联系又区别的创造双向作用,使天人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他称之为“动的天人合一”。张岱年把古人“静的天人合一”,转化为高扬人的主体能动精神和实践精神的“动的天人合一”,是从传统到现代有深远意义的重要观念转换,这一转换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竞争和创新的时代,今日的哲学与文化亦应体现这种时代精神,否则就会被时代所淘汰。大家环视一下身边的一切,从阶梯教室的建筑、坐椅、照明,到大家的衣服、笔记、钢笔,哪一件不是人类的发明创造?一种文化如果脱离了“创造”这一人生和社会的主导潮流,只谈仁义道德、清静无为、四大皆空,怎么能“激励鼓舞国人的精神,给国人一种力量”?怎么会有强大的生命力?所以,新时代的中国文化,必然是一种以创造为主旋律的文化。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文化论”就是时代的产物,它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继续,又是融入时代精神的创新发展。

马克思说：“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这就是说，“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是人类的本质特征。在我国，由于小农经济、专制制度和经学文化的长期束缚，这种人类的本质特征受到严重压抑，中华民族落伍了。今日我们建设新文化，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解放人的创造精神和创造潜力，找回并展示人的创造本性。因而，我们这里所谈的创造，不仅仅是经济或技术层面的，而是涉及人的本性和灵魂层面的，用中国文化的语言说，既有“器”层面的意义，更有“道”层面的意义，是“成物”“成己”兼顾的全方位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说，“综创论”的目的，是把“创”作为最高观念，融入中华民族的灵魂中，铸造新的中华民族精神；同时也是把“创”作为普遍实践，落实在中华民族发展中，推动各领域创新大潮。

大家知道，传统文化占主流地位的是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伦理至上的儒家文化；而“综创论”是以“创”为核心的真善美一体化的新文化。从“仁”到“创”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包含着天人观、价值观、思维观等一系列观念的根本性变革，它在实践上带来的精神面貌、成果产品的巨大变化，更是难以言表的。一位著名学者指出：“我们理解的创造不是指文化作品的创作，而是为了向一种更高的生活、新的存在而产生的全部人的存在的激动与热情。”它引向世界的改造，引向新的天和新的地，这种新的天地应当由人来准备。”（别尔嘉耶夫：《自我认识》）的确，“创造”将把我们每一个人以至我们的民族引向新的天和新的地，让我们体验一种更高的生活和更新的存在。这种崭新的境界是难以言传的，只有在创造实践中才能体会，它就是新文化追求的“道”。

由此可见,新文化的最高追求也是“道”,也有一个“下学上达”的过程。创造的真谛是无法靠书本或语言学到的,必须在创造的实践中亲身体会,才能彻悟。正如科学家钱学森指出的,创造“要是真成了一门死学问,一门严格的科学,一门先生讲学生听的学问,那大科学家也就可以成批培养,诺贝尔奖金也就不稀罕了”。从这一意义上说,古道和今道的“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基本特点是贯通的。

关于“综创论”的更详细内容,大家可以参阅《张岱年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或《张岱年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以及其他有关著作。在张先生指导下,我最近完成了《古道今梦》(由《新精神》、《新认识》、《新思维》3卷组成,大象出版社出版)一书,欢迎大家参看、指正。当然,更重要的是在亲身实践中体会。道不远人,希望大家从身边的小事做起,通过生活和学习中的创造,探索发现人生的新天新地。让我们共同用教育家陶行知在《创造宣言》中的一句话共勉:“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让我们至少走两步退一步,向着创造之路迈进吧!”

本人供稿

编者絮语 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也可以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因为按照阐释学的理论,阐释不仅仅是解说,也是创造。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是建设现代文化的一项任务。又如:毛泽东与周恩来对联:

橘子洲,洲旁舟,舟行洲不行
(毛)

天心阁,阁中鸽,鸽飞阁不飞

(周)

再如：请代名儒纪晓岚与江上武夫对联：

两舟并行，櫓速不如帆快(武)

八音齐奏，笛清怎比箫和(纪)

江上武夫乘的船有帆，纪晓岚的船用櫓，武夫用“櫓速”与“鲁肃”谐音，“帆快”与“樊哙”谐音，说文不如武。纪晓岚一时无对，被困数日，闷闷不乐。直到数日后抵达福州，主持院试大典，听到乐声，才顿悟出下联。这里“笛清”与“狄青”谐音，“箫和”与“萧何”谐音，说武不如文。这种文例极为丰富。

素质与成才

ZHONGGUO DAXUE RENWEN QISILU

杨叔子

中国科学院院士 华中理工大学前校长

没有先进科学、没有现代技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是落后，就是衰弱，一打就垮，永远受制于人，痛苦受人宰割；然而，没有优秀民族传统，没有民族人文精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会空虚，就会异化，就不打“自”垮、自甘受制于人，自愿受人宰割。

科学人文相融 爱国创新与共 ——再论让中华诗词大步走进大学校园 ——在华中理工大学演讲——

“秋 风萧瑟，洪波涌起。”改革大潮，席卷大地。秋风今又是，更换了人间，愿以这次演讲，献给伟大祖国的五十华诞。

我所写的《让中华诗词大步走进大学校园》在《中华诗词》1998年第5期上刊登后，引起了海内外许多诗人、词客与有识之士的强烈共鸣，投之以木瓜，报我以琼瑶。他们给了我真切的鼓励、支持与关心。对此，我是“衷心藏之，何日忘之？！”这也是对我的启迪与鞭策，使我深感有责任，尽管对诗词界我是“班门弄斧”，愿继续上文再谈一些陋见。

一 时代强烈呼唤

江泽民同志在北大百年校庆庆祝大会报告中,深刻地把当今世界的形势概括为三点:一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二是知识经济已见端倪,三是国力竞争日趋激烈。这三点的核心就是人才的问题,是高层人才的培养问题,是高等学校如何办的问题。因为在当今世界,特别是面对着新世纪,一切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特别是高级专门人才的竞争。正因为如此,江泽民同志在这个报告中语重心长地对我国的高等学校与大学生提出了衷心的期望与明确的要求。仔细读一读这个报告,就应深深地体会这点。

试看科学技术突飞猛进,“飞”者、“进”者,创新也,“突”者、“猛”者,加速也,巨大也。现在世界,可上九天揽明月,可飞出太阳系外;可入微观擒夸克,可制造出反氢原子;网络技术将世界联成一体,世界成为一个“村落”;制造技术将原子排列组合,技术跨入“纳米”世界;制导精度可保证千里之外,击中目标误差以米计;计算速度可达万亿次每秒,且在问鼎“量子计算机”;材料科技又有新的突破,材料芯片已问世,能使新材料的发现或制成的速度提高 10^3 到 10^6 倍;生物技术已达分子水平,可产生新的生物品种;更有甚者,克隆技术已能复制出亲本。

如果讲,信息科技的发展已带来并将进一步带来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那么,更可预期,生命科技的发展不但直接给人类的健康、寿命、幸福带来无比巨大的影响,而且还将给其他科技领域带来极为深刻的启迪与极为强力的推动。例如,生命密码的编制、转录(复制)、翻译、防错等等,技术绝妙!生物体内各器官的分别自律、共享信息、协调动作等等,智能卓

越;遗传信息的配置,极为优化,奥妙无穷!生物材料的结构与性能,无比超群!生物的“制造”(成型)方式,无与伦比!人们还在更高的高度与更广的广度上,探索宇宙起源、物质结构、生命起源、思维本质等更大的根本性的科学问题。这一切,没有人才,没有高级专门人才,怎能实现?!

知识经济是以高新科技及其产业作为主要基础的经济,是以知识的生产、传播与应用作为内涵的经济,实质上也就是人才经济、高级专门人才经济。邓小平同志早已指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试看今日世界中,最为人们注目的第一颗明星是美国微软公司的第一把手比尔·盖茨,是世界拥有个人财富最多的第一位,前几年他个人财富平均每周增加4亿美元,1999年五六月份个人财富已达900亿美元,三个月后竟达1100亿美元以上,此即,这两三个月来,平均每天增加1亿多美元。有什么窍门?他手下的打工者绝大多数都是大学生、研究生,都是知识的拥有者与创新者,都是“白领工人”、“知识工人”。在美国,人口只占世界的 $1/22$,而科技人员人数却占了世界的 $1/4$,大学生人数却占了 $1/3$,研究生人数竟占 $1/2$,这就是美国的最大财富、最强活力。还可举一个例子,光盘是用聚碳酸酯制造的,一片光盘成本还不到3元,而制成“Office 97”的光盘后,销价上千。增值主要源于何处?知识!人才!高级专门人才!没有知识,没有知识的创新,就没有这一切!

正因为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从而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江泽民同志分析得十分深刻,国力主要有三个内容: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民族凝聚力。显然,民族凝聚力是最为基础的、最为重要的。没有民族凝聚力,中华民族及其文明怎能绵延五千载!没有民族凝聚力,经济实力、军事实力

就没有了主体,又能由谁去掌握?当然,没有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历史与现实清楚地告诉我们,再怎么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只能落得个“八国联军屠杀义和团”的下场!落得个“日寇大举侵略中国”的结局!

民族凝聚力主要来源于民族文化,来源于民族人文文化,来源于民族文化认同。民族,主要同民族本身的文化有关;没有自己的文化,特别是人文文化,实质上就没有这个民族。“书同文”,汉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基石。汉字是拼形文字,只用了不到 100 种规则,就创造如此众多的汉字,创造了如此科学的形、义、音的统一体的汉字,创造了如此意义域极为广阔的汉字!科学研究已表明,汉字不但具有一般文字的功能,而且极有利于人大脑左、右两半的和谐发展,有利于人的智慧发展。而作为中华诗词,不仅具有各国各民族的诗的一般特点。而且由于采用了汉字,在构词、造句、达意上,更是高度的精炼与结晶,无与伦比,光照千秋。

我深深地感到,中国诗歌、中华诗词,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思想之含蕴,意境之深邃,感情之充沛,语言之丰富,文字之凝炼,音韵之优美,风格之纷繁,技艺之高超,流传之广泛,活力之强大,孰可与比?我们可以无愧而自豪地说:作为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一绝的中华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璀璨明珠,是中华民族文学的皇冠钻石,是中华民族艺术的杰出珍品,是一直激励着我国人民前进、推动着人类文化发展、一座永垂不朽的“日日新,又日新”的入云丰碑!是的,中华诗词可以兴、观、群、怨。中华诗词不但是文学,而且是历史,是地理,是哲理,是图画,是音乐,还是科学!

我坚定地认为:没有先进科学,没有现代技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是落后,就是衰弱,一打就垮,永远受制于人,痛

苦受人宰割;然而,没有优秀民族传统,没有民族人文精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会空虚,就会异化,就不打“自”垮,自甘受制于人,自愿受人宰割。危险在一个“自”字上。人文教育、诗教之所以重要,要害就在于此。

二 民族文化熏陶

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内涵深刻,意存高远,特别是“元典”,即文化的源头著作,例如《易经》、《老子》、《论语》等,更是一个开放式的哲理宝库,富有民族的特色,它们超越了时代的限制,直接指向宇宙、社会、人生,博大精深,许多论点与内容,至今仍极富有活力,放射着夺目的思想光辉。

《老子》不仅是一部伟大的哲学著作与涉及多个领域的不朽著作,而且是一部诗,是以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为主的诗,尤其以四言诗为突出。读一读是八十一章这种版本的《老子》,其中第五、六、九、十九、二十一、二十四、三十六、四十一、四十五、五十八等章,感受就特别强烈。第九章是:“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常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有的版本上,后两句是“功成、身退,天之道也。”那就完全是四言诗了。再看第十章,“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爱民治国,能无为乎?天门开阖,能为雌乎?明白四达,能无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除第一句五言外,全是四言。如将儿、疵、雌、知读为古音,那离、儿、疵、为、雌、知全是押韵的了。第十章充满了“无为”与“不争”的思想,第九章充满了“物极必反”、事物向其反面转化的思想。

《老子》是中国最重要的“元典”之一,是一部奇书。它那

深邃的哲理与惊人的智慧,极大地滋沃着中华大地,特别是:(1)无为而无所不为,(2)不争而莫能与之争,(3)一分为二(成对),(4)反者道之动。这四点,更为光芒四射。无为,是尊重客观规律,即尊重“自然”,尊重道;“道法自然”者,即道是按照自身规律而运动的客观存在;因此,《老子》明确讲,无为就是,“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不争,是以柔克刚,循事物的发展规律而为,目的是达到“天下莫能与之争”。“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就是最好的例子;而“天之道,不争而善胜”,就是自然界给人类树立的“不争”的榜样。无为与不争,决不是什么消极以待的哲学,决不是无所作为、甘愿落后的思想,而恰恰是在更高程度上的“为”与“争”,是遵循客观规律的“为”与“争”。《老子》清楚阐明了事物是对立面的统一这个一分为二的成对哲理,这点书中比比皆是,“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有计算机,就有“病毒”;有网络,就有“黑客”;核能用于和平,就有用于杀人;提倡廉政,宣扬正气,正因为有了贪污,有了腐败;进行改革,谋求发展,社会就会有阻力,改革也会有挫折;有滚滚前进的大潮,就会有与之俱下的泥沙与泛起的沉渣。而对立面的斗争规律,就是“反者道之动”,事物无不在一定条件向其反面转化,“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毛泽东同志弘扬《老子》思想在哲学的一个伟大贡献,就是提倡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尊重客观规律,创造出转化的条件,使事物朝着人们的预期方向转化。

是的,我就是在这种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熏陶下,就是在前赴后继、英勇不屈的我国人民一百多年的革命斗争传统的洗礼下,自强不息而成长起来的。

我家是个大家庭,父亲长期追随孙中山先生干革命,是一

位老同盟会员,是一位坚定不移、民族气节凛然的爱国主义者。他有着深厚传统文化的造诣,诗写得很好。日寇侵华,我还不到5岁的1938年,全家逃难。父亲严肃地告诉全家:“我们是炎黄子孙,是中国人,我们决不能做亡国奴!如果日本鬼子追上我们,我们全家自杀,投河自杀!”至今,言犹在耳,当时,铭刻衷心。他教我读书,第一本书是《唐诗三百首》,第一首诗是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他沉痛地讲:“孩子,你看到月亮,就要想到湖口,想到石钟山,想到故乡给日本鬼子侵占了,老百姓在遭敌人蹂躏。孩子,这些,你不能忘记!”他写的诗,“长蛇封豕出扶桑,一任横吞并八荒。”我至今记忆十分清楚。当我念到《诗经·秦风·无衣》时,“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予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我就深感中华民族同仇敌忾,誓死抗击入侵者的信念。当我念到《诗经·卫风·河广》时,“谁谓河广,一苇杭之;所谓宋远,予望之!”就深感一个宋国妇女,有这么伟大的气魄,今天中华儿女不更应如此吗?当念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念到于谦的“粉骨碎身都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时,就下定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不可动摇的决心!是的,在1996年11月,在湖南大学举行“高等学校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试点院校第二次工作会议”时,第一天下午我主持会议,湖南大学校长俞汝勤院士第一个发言,当他谈到岳麓书院师生抗击元兵攻打长沙而英勇殉难时,我情不自禁地打断了他的话。我讲:“俞校长,这事我也知道,小时候我念过一首诗,什么题目,谁是作者,我忘了,诗我记得:‘举家自杀尽忠臣,仰面青天哭断云;听得北人歌里唱,潭州城是铁州城。’这不就是写这可歌可泣的事迹吗?”长沙当时叫潭州。元兵攻下长沙,守城太守全家自杀,守城将士

纷纷自杀,城中人民纷纷自杀,岳麓书院师生也纷纷殉难。这是一个民族的铮然傲骨与崇高气节!如此受民族文化的感染,受中华诗词的熏陶,爱国情,怎不深?!民族根,怎不固?!

解放后,我从高二语文课本鲁迅的《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读了一首诗,中间四句真深刻:“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解放前中华大地上,“百年魔怪舞翩跹”,国民党反动派血腥镇压革命人民,残杀青年志士,然而,“血沃中原肥劲草”,面对这一幕幕黑暗场面,中华儿女无比愤慨,拿起枪,拿起笔,为赢得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而英勇奋斗。从两千多年前屈原的“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到解放后毛泽东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代代先哲、文人、诗人、英雄、豪杰、志士、仁人,他们的作品与言论深刻反映了当时的现实与历史的趋势,给我们民族留下了一大批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民族重要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的一个巨大源泉!我愿再次强调:没有自己的人文文化,就没有这个民族!

三 下学更需上达

我们需要学习知识。没有知识,就愚昧、无知、野蛮、落后。但是,我们不仅要学习形而下的具体的知识,我们更需要从这些形而下的知识中,去思考、去抽象、去领悟形而上的精神世界中的东西,将下学的知识内化、升华、上达为形而上的精神与素质。如果讲,知识是基础,那么,素质就是根本。

李岚清同志告诫过高等教育工作者,不要只精于科技,而荒于人文。我们既要精于科技,又要精于人文,两者缺一不可。我们不但要下学,要有科技知识、人文知识,更要上达,有

科学精神人文精神。

科学是什么？是求真，求是，是解决对客观世界的认识问题，要回答的问题是：“是什么？为什么？”科学是一个知识体系，认识体系。这个知识，这个认识，越符合客观规律，就越真，就越科学。然而，科学并不解决“应该是什么？应该如何做？”这一问题，科学并不能保证本身的发展与应用是否有利于人类进步、国家富强、民族繁荣、人民幸福。

人文是什么？是求善，是解决精神世界的认识问题，要回答的问题是：“应该是什么？应该如何做？”人文不但是一个知识体系、认识体系，而且是一个价值体系、伦理体系。这个知识、认识、价值、伦理越符合人民的利益就越善。然而，人文并不能保证所回答问题是否建筑在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从而是否能实现，是否真的会造福于人民。

江泽民同志在中国科协“五大”上讲得好，科学技术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石。显然，真为善奠基，善为真导向；只有真与善的结合，科学与人文的结合，才能真正造福于人民，泽被子孙万代。

科技知识上达的科学精神是什么？我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求是。科学就是追求认识与掌握客观规律，不仅求实，更要求是。我国《大学》中早已指出，格物与致知是基础，即研究客观世界及其规律与认识客观世界及其规律是基础，而后的顺序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切的活动，凡不以客观规律为基础的，必定招致失败。求是就是最重要的最根本的科学精神，是唯物主义者的根本标志。第二，献身。要求是，就可能经历千辛万苦，乃至付出生命代价，这就得献身。布鲁诺死于火刑，居里夫人为发现放射元素经历艰苦的长期实验。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就要敢于不怕

罢官,不怕家庭破碎,不怕迫害,不怕杀头。第三,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繁荣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动力。社会的进步、科技的进步,其前提就是知识创新,创新知识的应用。一部社会发展史,一部科技发展史,也可说是一部知识创新史。当然只有献身,才可能求是;只有求是,才能创新,才不会搞假冒伪劣,才不会贩卖“水货”。搞假冒伪劣,搞“水货”,到头来,一害国家,二害集体,三害自己。中华民族是富有创新传统的民族。《诗经》中讲得好:“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孔子在《易经·系辞》中明确提出:“富有之谓之盛德,日新之谓之大业。”求是,就是为了追求未知,就是为了认识新事物、新规律,就是为了创新。第四,从严。“三老四严”非常好,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思维严密,作风严肃,态度严谨,步骤严格。从严,本质上就是要有严密的逻辑思维,前后一致,始终如一,一丝不苟,不能马虎。如果无视“严”,无视逻辑思维,那么,我们所致力的是、献身、创新都会落空。

人文(文、史、哲、艺等)知识上达的人文精神是什么?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确立责任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的优良传统。北京大学季羨林老先生讲得多么精辟: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什么?人文精神是什么?是爱国,有骨气。爱国,文天祥讲得好:“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有骨气,孟子讲得好:“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现代京剧《红灯记》中,铁路工人李玉和痛斥叛徒王连举,骂他是“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走狗,就是卖国贼,癞皮狗就更糟;断了脊梁骨,就是没骨气。堂堂正正的人,就决不如此!这就是在任何情况下,要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负责。1998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了第一

次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大会文件讲得十分正确,高等学校首要任务是,“培养高素质的毕业生与负责任的公民。”是的,作为毕业生,是高素质的;而作为社会公民,这个高素质就表现为负责任。对国家、对民族负责任,就是忠;对父母、对长辈负责任,就是孝;对晚辈、对子女负责任,就是慈;对朋友、对同事负责任,就是义、就是信;对恋爱、对婚姻、对配偶负责任,不仅是义、是信,而且是节;对应负的责任而不负责,就是耻。人而无耻,不知其可也。今年是白求恩大夫逝世的60周年,毛泽东同志《纪念白求恩》这篇著名文章的核心,就是高度评价白求恩对人民极端热忱,对工作极端负责任,显然,对人民极端热忱,也就体现在对工作的极端负责任上。《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这三篇光辉著作,核心就是对人民负责:打败敌人,解放中国,不就是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对历史负责吗?负责任的感性化就是感情,就是真情的自然流露,“无物似情浓”、“人生自是有情痴”。感情的变化或改变,是一个人最根本的变化或改变,“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是感情之所使然,当然是对知己者与悦己者负责任。“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在爱情诗中永放异彩!负责任的理性化就是价值观,是死的重于泰山与轻于鸿毛的评价标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诗写得好:“生命诚可贵”,一个人的价值;“爱情价更高”,两个人的价值,小家庭的价值;“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民族的价值,国家的价值,这是最高的价值。天安门前那座耸入云霄的丰碑所纪念的人民英雄,他们生命的价值是永垂不朽的!我们对青少年、对大学生加强人文教育,最重要的是培养他们的爱国精神,要有中华魂,要有民族根;而中华诗词的主旋律与最强音就是爱国主义。加强中华诗词的诗教,其重要性可知矣!

第二,完善思维方式。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贯重视思维方式,在《论语·公冶长》中,孔子问子贡:“是你行还是颜回行?”子贡说:“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孔子完全赞同子贡的看法,而且说:“我与你都比不上他!”这表明孔子十分称赞颜回的思维。还有,在《论语·卫灵公》中,孔子问子贡:“是不是你以为我学得多,从而知道得多呢?”子贡讲:“对呀!难道不是吗?”孔子讲:“非也!予一以贯之。”抓住一,抓住本质,通达全体;这也就是《老子》讲的,“少则得,多则惑。”我在大学念“理论力学”这门难学的课时,学完后,我对老师讲:“这门课没有什么,动力学就是一个公式, $f = ma$ 。”这讲得对,因为所讲的动力学都是起源于公式:力 f 等于质量 m 乘加速度 a 。科学研究已表明,文、史、哲、艺等人文学科的思维活动,一般是形象思维,是开放的、直觉的、求异的,而科学技术工程等学科的思维活动,一般是逻辑思维,是严密的、推理的、求同的;一个同右脑有关,一个同左脑有关。各种科学研究均表明,人的创造性思维主要是同右脑的形象思维有关。苏轼写的诗赞美与可画竹:“与可画竹时,见物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比,无穷出清新。”这种创新的思维不是形象思维又是什么?爱因斯坦讲得多么深刻:知识是有限的,而艺术开拓人的想象力是无限的。想象力是形象思维能力,是创新思维能力。这是爱因斯坦从他创建“相对论”的奋斗中所体验到的,也是伟大科学家一般所必然经历的。

第三,增强非智力因素。非智力因素在一个人事业取得成功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起作用,大量事实充分证明了这点。非智力因素的增强同所受到的人文精神的熏陶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美国一位脑科学专家、哈

佛大学教授,名叫丹尼尔·戈尔曼,写了一本名为《情感智商》的专著,风靡一时。其实,他讲的“情感智商”大体上就是非智力因素。这本专著译成中文出版。丹尼尔·戈尔曼非常友好,为中文版撰写了《致中文版读者》前言。在前言中他把情感智商概括成五点:(1) 提高自觉意识,(2) 控制情绪低潮,(3) 保持乐观心态,(4) 不断自我激励,(5) 增强移情与同情心。他还进一步将这五点概括为两点:自我管理与调节人际关系能力。我认为在《论语》中早已阐明了这五点。例如,孔子对颜回的评价就突出了这五点:(1)“不二过”,(2)“不迁怒”,(3)“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4)“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5)“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仁,二人,就是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就是孔子的接班人曾参所深刻揭示的:“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什么是忠?是心放在当中;是从正面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君子成人之美”。什么是恕?是如我心,将心比心;是从反面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君子“不成人之恶”。这五点与丹尔尼·戈尔曼讲五点一一比较,两者何其一致!至于再概括出的两点,那就是《论语》中孔子所讲的“克己复礼”。在此,我们不能不再次感到自豪,中华民族“元典”中所揭示的精神世界的有关重要结论,同现代用大量科学研究与实验所得的结论是那么惊人的一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欣欣此生意”,是充满了无穷活力的。

科学精神:求是,献身,创新,从严;人文精神:确立责任感,完善思维方式,增强非智力因素。严格讲,精神就属于人文范畴,科学精神也是人文精神,是人们求真的人文精神,而通常所讲的人文精神是人们求善的人文精神。求真、求善的结合,实现人的自我超越,实现一种完美的人文精神:求真、务

善、完美。

四 双翼健劲高飞

科学与人文,是一个人实现高度完美的双翼,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实现繁荣富强的双翼。双翼健劲,才能万里高飞,长空竞胜。

表面看来,在科学领域中,论述与结论是理性的、实证的,从而是一义的,清晰的,从而是一元化的;而在人文领域中,论述与结论往往是非理性的、非实证的,从而是多义的、模糊的,从而是多元化的。这两者似乎也确实存在很大的不同。科学,主要同左脑工作有关,人文,主要同右脑有关。但人脑毕竟是个整体,左、右两半紧密联系,功能协调,共同工作。因此,从本质上讲,科学与人文是相融的、是一体的,或许可用李政道的话讲,它们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用此来形容两者不可分割,但还不足以形容两者相互渗透与相融。

首先,科学与人文都有着自己的强烈追求,一个追求真,一个追求善,而且真与善往往不可分割;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都激励着追求者为其所追求的真理而斗争、而献身、而青春无悔、一生无悔。“砍头不要紧,只有主义真”,这是一个真正的人所具有的最崇高的品质。《老子》讲得何等深刻:“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伟人去了,精神、事业、价值长存!

其次,科学与人文都十分重视思维方式与能力,尽管表面上主导方面各有不同,一个强调逻辑思维,一个强调形象思维,但两者不可分割,同起作用,只是隐显、主次随条件不同而不同罢了。

在进一步探讨科学与人文在思维方式的相融与统一之前,我愿再举一例,讲明科学与人文往往彼此相融而不可分

离。李益的诗,“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这也是计算机科技。“姓”加“名”,是人脑这个“计算机”的“地址码”,将“地址码”输入后,打开相应的“存储”部分,调出所存储的图像信息,即“旧容”;再同当前所见到的人的图像即“新容”,进行“图像配备”、“图像识别”。“配备”者,“识别”者,即“忆”也。显然,“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也是科学的。

以下着重从三个方面来探讨科学与人文在思维方式上的关系:

第一,逻辑思维是正确思维的基础,而形象思维是正确思维的主要创新源泉。没有严密的逻辑思维,就不能有正确的思维,思维就是混乱的、漏洞百出的、自我矛盾的,乃至往往是错误的,以至是荒谬的。正因为如此,学音乐的,应该懂得些声学;学美术的,应该懂得些光学;学艺术体操的,应该懂得些力学;学人文的,应该懂得些科学技术。《红楼梦》是一部了不起的文学巨著,光照古今,流传不朽,但也存有不掩瑜的瑕点,例如,林黛玉入贾府的年龄,多处有矛盾,这也是曹雪芹这位伟人在创作《红楼梦》时在逻辑上失误之处。然而,正因为逻辑思维执著于前后一致的严密,因此,一般摆脱不了现有思维方式与内容的框架,难于飞跃,难于求异,难于作出超脱现有模式的重大的创新。而文学艺术恰恰与科学相反,不是追求抽象,不是直接表达共性、普遍性,而是着手于个体,着手于特殊,通过个体、特殊的形象来反映共性、普遍性;因此,必须力求从不同侧面、从不同个体、从种种特殊,来创造新的形象,来深刻反映事物的共性、普遍性。正因为直接表达的是侧面、是个体、是特殊,从而就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给观赏者、阅读者、研究者去思考、去领悟、去追索、去开拓;极为精炼的中华诗词,就更是如此。“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是写登鹤雀

楼？还是哲理之言呢？“杨花榆荚无才思，唯解漫天作雪飞”，是写暮春的杨花榆荚呢？还是哲理之言呢？“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是写诗人无比喜悦之情呢？还是哲理之言呢？不管怎样，这些名句，都是合乎客观实际，合乎逻辑的。

文学写作中的“起承转合”，就是逻辑分明的。京剧、交响乐讲究程式，这同逻辑学讲究格式，没有什么大区别。《论语·八佾》中，孔子讲，奏乐有第四步：翕如也，纯如也。如也，绎如也。这就是起承转合。金昌绪的《春闺怨》，“打起黄莺儿”，是起；“莫教枝上啼”，是承；“啼时惊妾梦”，是转；“不得到辽西”，是合。白居易的长诗《长恨歌》又何尝不是如此！杨玉环入宫，是起；杨玉环受宠，是承；安禄山叛乱，杨玉环赐缢，道士奉命去招杨玉环魂魄，都是转；长诗最后的四句就是合了。由于“转”容易出奇笔，出妙句，所以，名句出在“转”中往往居多，就不足为奇了。晏几道写的名词《鹧鸪天·彩袖殷勤捧玉钟》与《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前者从过去写到现在，后者从现在写到过去，起承转合，层次分明，画面生动，蕴藉含蓄。崔护的《题都城南庄》与赵嘏的《江楼感旧》两首七绝，前者从过去写到现在，后者从现在写到过去，层次清晰，同为名篇。“桃花依旧笑春风”，“风景依稀似去年”，给人留下了多少回味！

第二，正确的创造性的思维，都能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区别主次，把握关键。科学当然是追求透过纷繁现象，区别主要次要，把握关键的环节，认识事物的本质，掌握客观规律。文学艺术创作又何尝不是如此？！

一个漫画家画某个人，不管怎么美化或丑化，不管怎么夸大，寥寥几笔，确如此人。为什么？关键就是这几笔。这几笔不是其他，而是同现代数学一个分支即“拓扑学”有着紧密关

系的。“拓扑学”是研究图形在各种变化中有哪些东西始终不变的。这些不变的东西叫做“特征不变量”，这几笔就是“拓扑学”的“特征不变量”。严肃音乐的主旋律，京剧中所谓的“不能不像，不能真像；不像不是戏，真像不是艺”，所谓的“神似”，都是科学中的“特征不变量”；就连摄影，如果是艺术照，就决不能将客观事物原封不动搬上照片，而应加以“艺术”处理，分出轻重浓淡，突出主要，突出本质，这不是科学又是什么？“春秋笔法”下的用字用词，如是“杀”？是“弑”？是“诛”？是“戮”？是“斩”？用之不同，所表达的人际关系、事件性质及所作的褒贬评价则大不相同。诗眼、词眼、文眼，也正是用以集中地深刻地揭示事物的特征的。正因为这些伟大的作家，阅历广泛，深入实际，深入思考，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粗取精，由定性到定量，才抓住了事物的本质，掌握了事物的特征。

“环滁皆山也”，欧阳修《醉翁亭记》开始第一句中的“环”字，滤去了词句水分，浓缩了语言容量，揭示了滁州为群山环绕特征，一字可敌万语。宋祁的“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字，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一个写小小空间的红杏枝头，一个写辽阔空间的锦绣江南，都生动深刻、内涵极为丰富地展开了春天的欣欣向荣的画面。温庭筠的《商山早行》诗中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10个字，10件事物，6点景色，描绘出了行人秋晨离开荒村野店匆匆上道的有声有色的凄凉景象。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曲中，“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18个字，9个景，组成了一幅漂泊悲凉的画面，揭示了无可奈何、前途无望的衰败特征，从而引出了“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结局。要强调指出的是，正因为中华诗词用词用字最为精炼，从而也最能抓住事物本质，突出事物特征，反映事物主要方面。

第三,正确的创造性的思维都是承认客观存在,尊重客观存在,努力探索客观存在的奥妙的。科学技术论著如此,人文著作也不例外。文学艺术中的夸大描写,那是在承认与尊重客观存在的基础之上的一种文艺超越,从而更有力地突出事物的特点或本质。韦应物《滁州西涧》中,“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诗中“自横”两字,正确描写小舟在溪流潮急时,是横在溪流中,而不是依水流而纵置,这里有水力学的原理。李白的《望庐山瀑布》中,“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诗中“紫”一字,不是诗人胡编乱造,恰是在一定条件下的阳光发生“漫射”,而可见光中光波波长最短的紫光漫射最强的结果。王维的《使至塞上》中,“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诗中的“直”与“圆”两字,杜甫的《水槛遣兴》中,“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诗中的“出”与“斜”两字,都完全符合科学原理,这里不加讨论了。至于如辛弃疾的《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中,诗人的提问,是科学的提问,是科学的思考:“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好一个‘东’!中国大地上的明月西沉,正是美国大地上的明月东升,美国正是‘别有人间’。‘是天外,空汗漫,但长风浩浩送中秋。’好一个‘长风’,诗人竟然猜测到在高空有‘高空风’强劲吹着。‘玉镜无根谁系?嫦娥不嫁谁留?’诗人实际上已问到万有引力上去了!诗人怀疑是否有嫦娥住在月上了!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论述,《徐霞客游记》是地理学还是文学?《本草纲目》是药学还是文学?《狂人日记》是文学还是狂人病史的医学?著名的《蒙娜丽莎》一画是艺术还是光学、解剖学的展显?天然混成一体!

人的大脑不可分,人的思维不可分,科学与人文不可分。人的左、右两半脑有差异,人的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有差异,科学与人文有差异,这种差异正好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相互

支持,相得益彰,浑然整体。人为地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加以割裂,就会严重地妨碍、制约、摧残乃至扼杀人的本性、人的潜力与全面发展,导致培养出梁思成 1948 年在清华大学所讲的“半个人”。历史教训不深刻吗?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就是要青年学生全面发展,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融。我认为,素质教育中,最重要有两点:一要爱国,要有民族气节,这是最重要的如何做人,最重要的人格;一要创新,要站在时代发展的前面,这是最重要的如何做事,是最重要的能力。做人做事,不可分割,不可偏废,而做人是基础。事是人去做的,不会正确做人,如何能正确做事?但是,做人主要得通过做事来表现,做事,特别是对于一个高级专门人才的做事,事做不好,又如何谈得上做好人呢?不会创新,怎么能增强国力?怎么展现高级专门人才爱国之赤诚?

在大学,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中,加强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主要是人文教育,是件关系国家、民族兴盛的千秋大业的基础工作,诗教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当然,我们的人文教育,我们的诗教,一定要有时代特色。同一描写夕阳,有多么不同的写法:李商隐是位伟大的诗人,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是伤感的、消沉的。刘禹锡也是位伟大的诗人,而且还是坚贞不屈的改革派,他的“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体现了他的战斗到底的改革精神。而叶剑英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位伟大的诗人,在他 80 岁时写下的“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诗句,不但洋溢着高度的乐观精神,不但看到自己,而且更看到汹涌如潮的来者,看到来者充满青春活力;这两句诗是地道的传统诗词的形式,然而充满了强烈的时代精神!读读贺苏写的庆祝香港回归的五绝吧:“七月珠还日,百年耻雪时;老夫今有幸,不写《示儿》诗。”是地道的五绝,

是现代的五绝！

我们的教育,我们的高等教育,要坚定不移地贯彻邓小平同志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三个面向”的战略思想,要使我们的大学生坚持江泽民同志的“学习科学文化与加强思想修养的统一,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实现自身价值与服务祖国人民的统一,树立远大理想与进行艰苦奋斗的统一”的“四个统一”的原则,向着新的百年,向着新的千年,前进！

华中理工大学如同许多兄弟院校一样,十分重视素质教育,重视人文教育,重视诗教,重视中华诗词。中文系的学生一定要学会写诗填词,非中文系的许多学生也努力学习写作诗词,这蔚然成风。电信系学生罗琳写的一首诗最后几句是:“谈笑时,珠玑玉润,挥洒间,各显风骚。指点江山尽慷慨,敢问天几高?!”多有诗味,多有气魄!前既见古人,今更见来者;看大江之滔滔,喜奔腾而东下!

演讲日期:1999年9月27日,华中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供稿,录音整理:佚名,本人审校

编者絮语 众所周知,杨叔子院士是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但作为诗人,其风采还不为大家了解。1999年中秋月圆之夜,华工园内,桂香四溢。在华工为庆祝“中华诗词学会第十二届研讨会”而举办的“中华诗词吟唱晚会”上,杨叔子院士的一首词《浪淘沙·峡浪接云天》的朗诵、演唱将晚会推向高潮,在座的台湾几位诗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峡浪接云天,似水流年,悲欢离合几多篇。本是根生同一处,梦也团圆。

举酒醉华宴,情意绵绵,心心相印永相连。要领风骚新世纪,愿我黄炎。”

何继善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南工业大学前校长

我想,日本人现在已经达到了他们在“二战”中没有达到的目的。“二战”中,他们用飞机、大炮无非是想征服中国人,从中国人那里掠夺财富。现在,他们可以笑嘻嘻地、把大量的中国财富掠夺到日本去!这就是技术的差距!

经济规律是无情的,我们不能怨天尤人,我们必须向前看,必须面向未来,特别是对青年一代来说,你们应该肩负起我们国家在21世纪初叶发展高技术的重任,你们是使我们国家在知识经济发展的道路上赶上发达国家的最关键的一代。

知识创新呼唤当代中国青年 ——在中南工业大学演讲——

同

学们:站在20世纪的门槛,我们迎来了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的曙光!21世纪是一个充满竞争、充满希望的世纪,也是一个崇尚创新的世纪。大到国家的创新

系统,小到学生学术科技竞赛,知识创新正在成为我国举国上下关注的一个话题。然而,知识创新并不是现在才有,它更不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专利。今天,我们就从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来探讨知识创新是如何创造了工业经济的辉煌,又将在知识经济的时代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怎样迎接知识经济挑战。

—

整个社会发展的历史,从科学技术的角度看,是一部创新的历史。在农业经济时代,就有创新。但在农业经济时代,根本上讲,经济的发展是极其残酷的,它把人(劳动者)作为工具来使用。在18世纪中叶,首先从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人类社会逐渐进入了工业经济时代。如果说,在农业经济时代是以劳力、土地、阳光和水等作为主要的生产资源,那么,工业经济时代就不一样了。以蒸汽机的发明划线,人类社会开始了真正的工业革命。我前年到英国去的时候,在瓦特的家乡跟一个小孩谈起了瓦特。小孩说瓦特copy了人家的东西,(笑)因为他的前面有纽克曼蒸汽机。但瓦特的功劳在于他大大提高了热能的利用,同时把往复直线运动变成了旋转运动,使得蒸汽机真正地进入到工业的各个部门,促进了工业的全面发展。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到20世纪初,以1866年发明电机、1876年发明电话、1879年发明电灯等为标志,从欧洲开始到美国完成的电力革命,世界范围内的工业革命经历了一个大发展时期。如果说蒸汽机的使用创造了生产的文明,那么,电力革命的完成,创造了生活的文明。因为,有了电力工业革命的发展,才有了人类的现代化生活。

随着工业的发展,人类对资源的依赖更强,特别是随着内

燃机的发明和应用,人类对石油的使用和依赖发展得十分迅速。事实上,可以说人类社会在 20 世纪进入了一个石油工业的时代。无论是农业资源也好,矿产资源也好,都是资源。因此也就有人把工业经济时代叫做资源经济时代。

随着工业经济的向前发展,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文明程度的提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半个世纪,人类一系列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正因为这些重大的发明和发现促进了社会生产和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出现了所谓“知识经济时代”的说法。

二

为了能够比较好地理解“知识经济”的概念,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近半个世纪以来重大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看看科技创新是如何推动工业经济的发展。

有人做了这样的估计,现代自然科学知识的 90% 以上产生于“二战”以来,也就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自然科学知识总和只占人类现有自然科学知识总和的 10%;又有人做过这样的估计,说一个现代工程师知识的半衰期是 5 年,也就是说,一个工程师如果不学习的话,5 年后他的知识只一半有用。这些说法是有一定依据的,并不是耸人听闻。因为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其迅速。在这里,我们举出几种重大的技术发明和科学上的重大进步来说明它们对人类历史的影响。

首先,我们要提到原子能。原子核里聚积了巨大的能量,一旦释放出来威力极其巨大。“二战”期间,希特勒德国组织制造原子弹,流亡美国的德国科学家非常着急,就在 1938 年,联名写了一封信,请当时威望很高的爱因斯坦签字,设法送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罗斯福起初并不以为然,是他的朋友忠告

他不要做第二个拿破仑——拿破仑曾拒绝发展轮船制造技术,使得自己在海上的制海权丧失——这样才激起了罗斯福的注意。后来,美国人实施了“曼哈顿计划”,到1945年,他们共制造出三颗原子弹,一颗用的是铀-235,另外两颗是钚-239。1945年7月,美国在新墨西哥州爆炸了一颗试验的钚弹。本来制造原子弹是要对付德国的,这时德国已投降了。科学家们,包括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都联名反对继续使用原子弹。但美国军事领导人认为需要使用,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颗原子弹。两个城市共50万人口,死伤了一半。原子能被用于战争的同时,科学家们努力把核能用于和平事业,如发电、医疗等等。1950年,美国人造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利用核能的3万千瓦的发电装置。现在全世界已经有200多个核电站,在建的还有140多个。像法国,它的电能70%都来自核电站。

另一个重大的技术发明是计算机。今天,计算机已经家喻户晓。在美国,计算机已经“泛滥成灾”。(笑)计算机也是因为战争的原因发展起来的。因为需要计算弹道曲线,当时雇的女士们用手工计算一条弹道曲线要花二十几个小时。这之前就有人提出了电子计算机的设计和想法,但美国政府并没有注意。因为造武器需要了,才组织制造电子计算机。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造出来了,这时候战争已经结束,它计算同样的一条弹道曲线只需3秒钟。虽然这台计算机有18吨重,但它的功能远远不如现在的一台微机。从那以后,电子计算机以极大的速度得到发展。现在计算机向两个极端的方向发展,一个是快速的超大型计算机,一个是微型的计算机。超大型计算机除了科学研究的需要,像检测DNA等之外,最主要的是满足战争的需要。1991年美国人

打伊拉克,用“爱国者”导弹去拦截“飞毛腿”导弹的时候,“飞毛腿”导弹的射程是500公里,“爱国者”导弹是100公里,它必须在“飞毛腿”导弹发射升空,甚至在快要接近目标时才能发射。这就需要大量的观测信息和超大型的计算机。

我还要介绍一个日地空间研究计划。现在,虽然我们有很多气象卫星和气象站,但我们还常会觉得气象预报不准确。而事实上,我们的气象科学家早就把十八般武器都使出来了。我国的高速计算机“银河”就是为国家气象局研制的,用来处理气象数据。我们平时说的气象卫星只是测得距离地球附近的很近的空间的数据。然而,太阳的一举一动对地球的影响极大。如果太阳辐射持续地减少千分之一,地球上就会出现灾难性的寒冷;如果太阳辐射持续地减少百分之一,人类就会大量地死亡。而且,太阳黑子的变化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也有极大的影响。为了提高人类的生存质量,我们就需要知道从太阳到地球的这个空间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国际合作组织就发射了一系列的卫星,这些卫星更靠近太阳,而且可以测得从地球到太阳的不同的地方的一些科学数据。如SOHO卫星就主要是测量太阳辐射的,POLAR卫星是测量地磁极场情况的,而CLUSTER卫星则是个星簇。由于日地空间很大,我们分布的几个卫星只能够测量宏观的情况。可惜,CLUSTER卫星由于阿里亚娜火箭发射失败,至今还没有升空。事实上,我们对自然灾害所知甚少。像这两年的异常气候,科学家所做的解释还远远不够。那么,在做了这些工作之后,就有可能使我们的气象预报对灾害的预报能力大大提高。可以预期,到你们进入中年,正当“三十而立”或“四十不惑”在看电视的时候,除了看到现在的气象预报之外,还会看到日地空间的预报。

还有,就是海洋问题。我国既是一个大陆国家,也是一个海洋国家。我国有 960 万平方公里领土,但人均面积只有 0.008 平方公里,大大低于世界人均 0.08 平方公里的水平。我们有 18 000 公里的大陆海岸线和 6 500 多个岛屿。这些岛屿还有 21 000 平方公里的沿海滩涂和 16 000 多公里的岛屿海岸线。按照国际组织关于划分“经济专属区”的协定,我们国家还有 300 多万平方公里的经济专属区。在海洋里,除了大量的生物资源外,还有大量的矿产资源,像镍、钴、铜、锰这样的稀有金属元素,在海洋里的蕴藏量是其在陆地上的蕴藏量的几十倍到几百倍,海上石油的蕴藏量也超过了陆地。现在大约还剩下不到 7 年的时间,我们就要跟和我们有海洋边界的国家谈判,他们分别是韩国、朝鲜、日本、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文莱。

为了今后的谈判,就需要发展一系列的海洋技术,包括对海底地形的测定。这看起来很简单,但在茫茫大海里找一点坐标是很不容易的;这种卫星定位系统美国人有,但是他们在它的卫星定位系统讯号上加了干扰。他们用精度很高;我们用起来,精度就很低。同时,我们还要开发海底资源。海底资源的蕴藏量很丰富,约占地球总数的 $\frac{2}{3}$ 。例如,海上采油的效益就很好。前年夏天,我到了南海东沙群岛以南我国的一个采油平台上面。1996 年他们的人均产值是 245 万美元。但是,要做到这样的高效益,不是靠人海战术,他们总共才 270 人嘛!这里全都是高技术。要把一个平台植在海上是很不容易的,它要抗台风,更何况还要采油!如果没有高技术,是不可能获得这样好的经济效益的。

最后,我简单介绍一下生物技术。生物技术是当代知识经济的一个重要内容,从广义上来说,它不仅包含基因技术,

还包含细胞技术、发酵技术。正是基因技术的出现,使得生物技术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平时,我们说生物技术处在什么水平,如果说原子水平上,指的就是基因技术;如果说细胞水平,指的就是对细胞进行改造,不涉及到基因的操作。基因技术发展得很快,可以预见,今后一个小孩还没生下来,就想办法取出他的基因来,去跟我们已经知道的基因对照,这样就可以知道这个小孩生下来以后,是什么性格,可能会得什么病,适合找什么样的对象等等。如果要生下这个小孩,可以从他的基因里知道他将得什么样的疾病,那么就可以及早采取措施,抑制那些疾病基因的发展,这样一来,就可以极大地提高人类的生命质量。一个人生活得很健康,又长寿,找的对象又很和谐,那该有多好哇!(笑)这不是玩笑,说不定就会成为现实。这是一个极大的产业。因为人类都希望自己生活得更好,都想测定一下自己的基因。如果将来只有美国人可以测,那么,我们就只有眼睁睁着让人家赚这个钱了!对于那些有经济头脑的人来说,什么都是产业。单说我们国家现在的CT和B超吧!目前,我们的设备大都是进口,而那些得了疾病的人也乐于在这方面花钱,可是这钱都到哪里去了,都到美国人、日本人那里去了。这本身就是一种掠夺,是发达国家利用它们先进技术优势、知识产权优势来掠夺发展中国家。

三

创新创造了工业经济的辉煌,也从而把人类社会引入了知识经济时代。早在1962年,马克卢普就提出了“知识产业”的问题。因为到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进入70年代以后,整个世界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工业经济学家总觉得用原来的理论来看待现实的经济问题不够用了,就提出了各

种各样的说法。像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就提出了“后工业经济”的概念。到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要由发达国家组成)在它们的年报中,就用了“知识基础经济”(knowledge basic economy)。这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将“知识经济”炒得很热的是在1997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在一次讲话中分析美国经济状况的时候,他用了“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这一说法。从这以后,“知识经济”就被全世界炒热了。

我国有些科学家曾给中央写信,不同意“知识经济”的提法。他们认为,瓦特发明蒸汽机就是一种知识经济,那也是以知识为基础的,是在工业化时代嘛!但是,作为一个名词,有一个约定俗成的问题。既然全世界都这么说了,惟有我们不接受,那是做不到的。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我们应该了解知识经济究竟是什么意思!知识经济是什么,各个经济学家的说法是不完全一样的。就是我们国家内在介绍知识经济的时候,写的文章也各有不同的内容。按照“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概念,认为“知识经济”是一种以高技术为基础的经济。这并不是说,对传统产业,甚至包括汽车工业,把它的技术含量加大就可以叫做高技术产业。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汽车工业是传统产业,而不是高技术产业;钢铁工业、纺织工业这些更不是高技术产业。

那么,什么是高技术产业呢?微软——是全世界公认的高技术产业。“微软”是在20年前比尔·盖茨从哈佛大学退学之后组织一帮年轻人建立的微软公司——Microsoft!当时,微软是在美国最穷的一个州——华盛顿州的西雅图成立的!现在你若到微软去参观,你看不到车水马龙的仓库和琳琅满目的原材料,那儿只有一栋栋的实验室。每一个实验室都不

大,只有一个人脑和几台电脑在那儿工作。以微软和通用汽车公司作比,它们的产值分别是 100 亿美金和 2 200 亿美金,而它们的股票市场值分别是 2 000 亿美金和 500 亿美金。也就是说,微软以不足通用汽车公司的 5% 的产值达到了通用汽车公司的市场值的 4 倍。

微软生产的是软件,是地地道道的知识产品。那么除了微软这样的产业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知识产业呢?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在传统产业里面加入高技术,若它的含量超过 40%,则可以转化为知识产业。为什么说汽车产业是传统产业呢?因为,尽管现在的汽车做得很漂亮,很自动,但是它最基本的东西——汽油发动机还没有解决,钢铁工业也是如此。尽管钢铁工业现在规模很大,但它的能源消耗量也很大,在没有用知识技术对它进行彻底改造之前,它就不算是高技术产业;而对于农业,经济学家认为,如果用高技术的生物工程技术改造农业的成分超过 40%,也可以成为知识产业。那么,农业也就不是传统的农业了。通过这些,我们可以认识到,高新技术是知识经济的支柱。现在就以美国而论,也不能说它已完全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美国除了微软之外,也还有很多知识产业,但是,这些产业的总和没有超过美国国民经济的 40%,所占比例还大约只有 20% 左右,当然这也很高了。所以说江泽民同志的话是很对的:“知识经济初见端倪!”

四

面对这些,我们国家怎么办?

这是一很严峻的问题。我们先来看一看“欧佩克”的浮沉历程。欧佩克是“世界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简称。在“欧佩克”成立之前,世界石油的开采和输出主要是由一些发

达国家控制。1960年9月10日,伊拉克、伊朗、科威特、沙特阿拉伯这些国家在巴格达开会。14日,正式成立了“欧佩克”。它成立的目的是要通过统一价格、计划产量来保护这些石油国家。1971年,他们把油价从3.01美元/桶,涨到11.06美元/桶。特别是在1973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的时候,他们以石油为武器,限产石油,提高价格。这样一来,极大地保护了石油输出国。那些阿拉伯国家就是因为有石油一下子从贫穷国一跃成为富裕国的。“Traditional dress, modern technology——传统的服装,现代的技术”,这就是那些阿拉伯人。

石油输出国组织那样做的确保护了自己。但是,这些石油输出国都是在一些科学技术特别是经济管理领域比较落后的国家,他们以为使劲涨价就能维护他们的利益。到后来,他们把石油价格涨到了34美元/桶;这一涨价震动了整个世界。就在那一年,美国和英国共有3500万人失业,占可劳动人数的11%,像法国、比利时这样的国家有1/8的人接受救济。汽车工业、钢铁工业几乎全停顿了,这一提价给西方国家以很大的打击。但另一方面,也促进了美国等那些自由经济很发达的国家调整其经济结构。美国的科学技术界,尤其是资本家要求科技界发展那些消耗能源少的产业,如信息产业,在美国,什么产业赚钱,马上就会有人拥了上去。这样一来,客观上促进了向节能和信息这样的高技术发展。如果没有“欧佩克”,当然高技术也会发展,但据专家们估计,这种发展至少会延迟一二十年。也就是说,比尔·盖茨就没有今天这么神气。(笑)正由于“欧佩克”的这种错误的做法,反而在客观上促进了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所以,西方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欧佩克”的存在使人们从石油时代逐渐进入了高技术时代。

从这个例子,我们不难得到启发。我们国家的资源不丰

富,按人均来说,我们国家的资源是贫乏的。我国华北地区的人均水拥有量等于阿拉伯国家的人均水拥有量!矿产资源按人均来算也很贫乏。我们的科学技术也很落后,很多还是手工劳动,还没有走完工业化的过程。我们必须面对差距,必须以知识和技术创新为核心,实事求是地发展我们的经济,必须在保持我国传统产业稳步发展的同时,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高新技术又必须以经济实力作后盾,以高素质的劳动者作支持。贫穷没有高技术,愚昧没有高技术。我前面提到的那个石油平台,人均产值是 245 万美金,那里的高技术是哪里来的?是钱买来的!在那个平台的 270 个雇员中间,有 90 个外国人。我就问那些外国雇员和技术员,问他们愿不愿意在这儿干,他们说愿意,因为在这儿赚得比较多,住的也比较好。这个局部的例子就说明,如果我们的整体国力增强了,我们既可以引进技术,也可以引进“脑袋”。像美国现在的许多技术,很多就是“外国脑袋”给他们做的。其中,包括很多的中国人。现在有很多的留学生都滞留在美国不回来,无非就是因为那儿的钱多一点,实验条件好一点嘛!我们的经济发展了,我们的综合国力增强了,我们可以吸引留学生回来,也可以吸引别的国家的人来嘛。

讲知识经济,最关键的是知识创新,是发展我们国家的高技术。今天的创新与以前不同的是在更高的基础上,以很快的速度创新,特别是极快的产业化。如果我们不能掌握高技术,只能够生产低档的产品,那么,我们就只能忍受发达国家的“剥削”。我想,日本人现在已经达到了他们在“二战”中没有达到的目的。“二战”中,他们用飞机、大炮无非是想征服中国人,从中国人那里掠夺财富。现在,他们可以笑嘻嘻地、把大量的中国财富掠夺到日本去!这,就是因为技术的差距!

经济规律是无情的,我们不能怨天尤人,我们必须向前看,必须面向未来,特别是对青年一代来说,你们应该肩负起我们国家在 21 世纪初叶发展高技术的重任,你们是使我们国家在知识经济发展的道路上赶上发达国家的最关键的一代。这就要求你们,首先,必须具有艰苦奋斗的思想。将来你们到一个工作单位上去,那儿绝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那么理想。所以说,增强我们的综合国力是至关重要的!这没有取巧的道路可走,必须踏踏实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实现自身理想是很重要的。作为中国的大学生,我们应该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应该提倡爱国敬业、艰苦奋斗的精神。我的另一个忠告就是,当前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应该说是一个盛世,是你们发展的很好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国家的稳定,任何乱只会害了我们自己,只会使国家的经济遭到破坏,只会延长我们向知识经济前进的时间。我相信,你们一定不会辜负祖国人民的期望,在新的世纪里作出你们应有的贡献!(掌声)

中南工业大学文化素质教育中心推荐,录音整理:周红兵,本人审校

编者絮语 本书第二卷曾刊登了中科院院士杨福家先生关于知识经济的演讲稿,这也是国内最早介绍知识经济的演讲。中国工程院院士何继善先生的这篇演讲,则以更为翔实的材料说明了知识经济的特征以及知识经济对当代青年的要求。作为著名的大学校长和科学家,杨先生和何先生都谈到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培养创新能力,是知识经济对当代大学生发出的呼唤。

王 选

北京大学教授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第三世界研究院院士

中国人有一句古话，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我觉得我做不到“上士”，做不到“忘名”的地步，但是我也没有“窃名”，而是努力去“立名”。

一个正确的名利观是一个人取得成绩的重要原因。我的原则就是：可得可不得的“名”和“利”不要去得，不应得的“名”不要得，该得到的“名”才可以得。

为振兴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矢志奉献

——在湖南大学演讲——

各

位领导、同志们、同学们：我王选今年 61 岁了。微软公司董事长比尔·盖茨曾经讲过，假如微软公司是让一位 60 岁的老者来领导的话，那是一件不可设想的事情，所以比尔·盖茨一定会在 55 岁以前退下来，把微软交给年轻一代。今天宣传王选，我应该讲一些什么事情呢？我们有一句话叫“好汉不谈当年勇”，但是我今天创造高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已经没有太多“勇”的地方了。有一次在电视台，

人家要李素丽用一句话来形容她自己,李素丽说“我是一个善良的人”,非常妥当。她用这种善良,这种爱心来感动一大片人,为人民服务。轮到我用一句话,我就说:“我是一个努力工作,曾经做出过贡献,但今天高峰已过,赶不上新技术发展的一位计算机专家。”高峰已经过去,所以今天我没有办法,只能谈当年勇,违背了“好汉不谈当年勇”的古训。

五年半以前,我脱离了科研设计技术的第一线,两年前又脱离了管理的第一线,所以最近几年的成绩都是在年轻人领导之下的。我就变成到处作作报告,讲讲过去经验的人。有时候也在电视上露露面,然后别人说“昨天又在电视上看到你了”,我就回答说:“一个科技工作者,老在电视上露面的话,说明他的科学生涯快要完蛋了。”

对于技术创新,我始终是这么一个看法:技术创新需要一种环境,需要一种激励以及多方面的支持,才能做出比较大的成就。李远哲先生在1990年授予我陈嘉庚奖的时候曾经讲过:“要培育一种土壤,在肥沃的土壤上我们才能做出创造性的成果。”我能够有所成绩,和我在年轻的时候具备了跨领域的知识是分不开的。为什么我能够在1975年提出这种崭新的技术方案——当时人们是很不相信这种技术方案的,我在20多岁的时候,即大学毕业之后的三四年之内就从事跨领域学习研究,从硬件转到了软件。为什么下决心从事跨领域的这个研究呢,因为有些事情给我带来了一种刺激,我做了三四年计算机设计工作,每看到外国新的设计,我都是非常的激动。我老是问自己,为什么你只能停留在欣赏别人成果、欣赏别人发明的水平,你自己为什么没有创新?这样就投身到软件开发,当时我跨这一步在中国是第一个,在美国这样做的人也不多。一旦有了两个领域基础以后,我忽然就有一种豁然

开朗的感觉,就会提出很多创新的构思。我体会到控制论发明者的一句话,在已经建立的学科的无人控制空白区上去耕耘,最容易取得丰硕的成果。这么一个信念,后来大大地激励了我,使我有勇气在某些方面做出超前的决定。正是有了这两方面的实践背景,才使我 1975 年能够承担“汉字激光照排”这个项目。

有一句名言讲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1975 年,我听说国家有一个工程叫“七四八工程”,是搞汉字信息处理系统的工程。我从事这个项目时,自己在家先研究,因为我具备两方面的实践经验,加上我有比较好的英语能力——这期间中国的科技人员英语水平都不高,一般不大喜欢看大量外国的文献,我就看了大量外国的文献——了解到前人做到了什么地方,所以就很容易得出判断:国内比我早从事这个项目的有五家,五家里有的“家”实力非常雄厚,但这五家都选择了模拟的道路,惟独我们选择了数字道路。为什么这个机遇会偏爱到北京大学头上呢?是因为我们是有准备的头脑,看到了未来用激光扫描带来的重大发展方向。后来做成了这个事,中国成了世界上少有的直接从铅字跳到了激光照排的国家,掀起了一场告别铅字的革命,现在中国大陆 99% 报纸用了当年北京大学开创的这个技术。

这件事还给了我以后工作一个重要的指导原则,就是需求是创造的重要源泉之一。我能出成果,是因为我有两方面跨领域的背景,加上这种需求的刺激。这一体会使我牢记在心,我懂得了要让年轻人“出彩”,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要把他推到需求刺激的风口浪尖上。

有位名人曾经说过:年轻时没有名气,做一件事情别人会说 can not do(做不成),而对 can not do 的最好回答就是 do it

yourself(自己做)。我从 1975 年做到 1993 年,整整做了 18 年,这 18 年确实非常辛苦,没有寒暑假,没有春节,没有元旦,所以我非常深刻地体会到这样一句话:“一个献身于学术的人没有权力再像普通人这样生活。”在这里我还要加上一句:他必然会失掉常人所能享受到的很多的乐趣,但他也会得到常人所享受不到的不少乐趣。这种乐趣,首先就在工作本身里头,往往并不是一个人得到荣誉、桂冠以后的那种幸福、乐趣,而是在工作本身克服困难的过程之中,就是百思不得其解、在凌晨或半夜突然想出解决办法来的那种兴奋和愉快。这种兴奋、愉快是难以形容的。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一种美的感受。居里夫人讲:“科学探讨本身就是一种自美。”歌德也说过:“一个真正有才干的人都在工作过程中得到最高度的快乐。”我认为,一个献身于科学的人,他得到的最大回报并不是他后来得到的名和利,而是工作本身的效果和克服困难的一种愉快。回想起来,我绝对没有想到今天会有这么多的光环和荣誉,也没有想到付出这么大的代价,花费这么大的辛勤劳力。我非常赞赏欧美科学家们的一句话,“一生中不要想得到诺贝尔奖”。1990 年,我碰见李远哲先生,他也讲,他从来没有想到会得诺贝尔奖,当别人得知他获奖并为之祝贺时,他还全然不知,竟以为是祝贺他正在做的报告讲得很精彩。

一个真正有成绩的人,他一定不为短期的名和利所诱惑。虽然我们很难做到忘名。中国古人有一句话,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我觉得我做不到“上士”,做不到“忘名”的地步,但是我也没有“窃名”,而是努力去“立名”。一个正确的名利观是一个人取得成绩的重要原因。我的原则就是:可得可不得的“名”和“利”不要去得,不应得的“名”不要得,该得到的“名”才可以得。我在 1988 年以前基本上不接见记者,没有什

么报道,因为我们还谈不上什么成绩,这种不满足感也是我们能够取得成绩的重要原因。

曾有这么一种说法:激光照排是先进的技术,落后的效益。担心很难推广。但事实证明,只要技术是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它一定会形成一个大市场。正是先进的技术带来的革命形成了一个大市场,中国在 1987 至 1992 年间迅速淘汰了铅字。后来人们又担心,淘汰铅字以后方正就要萎缩,但实际上十多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兴旺上升的趋势。怎么做到这一点呢?拿新技术炒出一个又一个的市场,每一个新技术都用跨越的办法,每一个做法都实现技术跨越。

举一个例子,就是做“彩色”。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初到 1993 年以前的 20 多年,中国彩色出版市场全部被外国 5 家公司所把持,中国是零。中国投资搞仿制,从 1973 年开始搞仿制,整整 20 年,仿制国外老一代技术。当国外已把新一代技术打到你的市场上来时,你的老一代技术刚刚通过技术鉴定,得到了填补国内空白的鉴定结论。但大家早就没劲头了,“填补空白”没用了,还没有生产,还要商品化,而别人新的技术都打进来了,所以仿制技术从来没有到达过市场。我们在 1988 年提出一种跨越的想法,研制了“文图合一”的彩色出版系统。1992 年 1 月 21 日第一次实现了文字和彩色技术合一的处理。这么一张报纸,过去需要两个半小时至三个小时,1992 年,我们的新技术只需要 20 多分钟,今天我们达到了三分钟不到就出一张彩色报纸,这样一来,电子分色机哪里还有什么市场?所以出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局面,1994 年前,每年都有很多单位向国家申请批准进口国外的电子分色机,到 1994、1995 年,一家都没有了,大家都知道该淘汰了。新技术炒出了一个新市场。1992 年以前很少有彩报,今天彩报满天

飞,200家中国报纸都配备了彩排系统,不少报纸天天出彩报。

我们从告别铅与火,走向了告别纸和笔,现在中国有130多家报社配备了方正的流程管理,开始了告别纸与笔的道路。我们马上又要启动告别底片的时代,《羊城晚报》的“新快报”已开始用激光技术把报文内容直接扫在版材上,底片都不要了。这样,我们发动一次又一次新变化、新技术引导新市场。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市场驱动和技术驱动有什么矛盾,我非常赞赏这样一句话,研究和开发不考虑当前市场需要的人是没有呼吸的。因此当前和未来需要作一整体考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更新技术、引导新市场,今后我们还将用这么一个办法。技术和市场的结合非常重要,技术不到市场前沿,得不到需求的刺激。开拓国外市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际化,只有进入国际化,在国际市场得到锻炼,我们才能成长。

刚才讲了,我是创造高峰已经过去的人,下午四五点钟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在我这个年龄,正是在高新技术领域犯错误的年龄。所以,我告诫自己,今后多做好事,少做错事,不做坏事。做坏事一定是你主观动机不良;你主观动机好也可能做错事;坏事一定不能做。但是少做错事这是很难的,不一定能做到。有很多例子引以为戒。我觉得,对于一个科学工作者来讲,一定要懂得失败是成功之母,不要怕失败,要坚持不懈地奋斗。而对于高新技术企业来讲,失败很难成为自己的成功之母,只能成为别人的成功之母。一定要警惕成功是失败之母,过去的成功并不意味着今后的成功,过去经验并不适合新的形势,要趋变,趋变是一个永恒的规律,像我这种年龄很难再“变”,必然要下来,不下来,可能就会是一种祸害。

高新技术企业怎么能够做到成功不是失败之母？我认为，一方面是要趋变，另一方面要信任和提拔年轻的人才，这是我们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今天方正就靠了一批年轻人。我为什么下狠心来提拔年轻人呢？并不是因为我“高风亮节”，也不是因为我“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我觉得我做出一些好的决定，核心里头是懂得社会的发展规律，看到社会发展的需要。今天我们大力扶持年轻人，也是看到社会的这种需要，很少有计算机专家 55 岁以上还成为权威的。假如不这样做，方正必然垮台，方正垮台，我的名声也没什么好的地方。所以扶持年轻人是社会的需要。

我经常讲，我 26 岁第一次创造高峰时在前沿，38 岁提出新的激光照排技术突进时也在前沿，都是“小人物”。一个小人物，会受到别人的干扰，有时候表面上看起来比我更权威的人就会告诉我，这该怎么做，那该怎么做。其实呢，他看文献比我少，在第一线干工作比我少，在多数情况下我会说服他们来接受我的意见。有时在他对我不太了解的情况下，我就采取阳奉阴违的办法，因为具体做起来他也不知道我在怎么做，还是我在主持，我便阳奉阴违了。到今天，我忽然戴了三个院士的桂冠，而且我已脱离第一线五年之久，脱离管理两年之久，忽然成了计算机的“权威”，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我发觉这是人们把“时态”弄错了，明明我是 past time(过去时)，却把我认做 present time(现在时)，甚至看做 future time，以为我是将来时态的。

要扶持年轻人，吸引年轻人，我认为有四个条件。1992 年 4 月 24 日江泽民同志召见部分学部委员时，我的发言中提出过这个问题。江泽民同志对我讲，这四点我们都能做到，但看来都有一个逐步过程。

第一点就是“成就感”。这种自豪感、成就是任何金钱买不来的。要实现这种成就感,必须把他们推到最前沿。我经常考虑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年轻科技人员在美国硅谷发挥得非常好?为什么我们一些年轻人到那里能够做出一流的成果呢?因为他们能够得到最前沿需求的刺激。因此我们要创造一种环境让年轻人在某个领域得到需求的刺激,做出成绩来“出彩”。

第二点就是团队的精神和团结和谐气氛。这种气氛是提高年轻人创造能力的一个因素。这种平等气氛对年轻人的成长非常有好处。钱学森在美国曾与他的老师争得面红耳赤,导师当时非常生气,过了一天这位年过花甲的学术权威找到钱学森行了个礼,对他说,你昨天讲的是对的,我的是错的。我觉得,我们培育年轻人,一定要有一种平等的气氛,让年轻人能够施展他们的才华。尤其是像我今天高峰已经过去,更应懂得这一点。团结和谐的气氛使人情绪比较好,就会有超常的发挥。美国华人中间有一种说法:日本人的作风是“下围棋”的作风,团结一致,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可以牺牲一粒子求得全局的胜利。最典型的就是当年的松下彩电,一点名气都没有,但它联合日本四家彩电厂商,签订了一个协议,在日本卖高价获得利润,在美国是倾销价、成本价,两年下来就在美国打开市场,后来占据垄断地位。日本、韩国都是引进外资,最后自己成长壮大的。他们是“引狼入室,与狼共舞,最后把狼赶走”。当然,中国不要把狼都赶走,大家共同发展,共同得利才好。但有的合资后连技术开发权都没有了,这太危险了。引进外资、引进技术一定要干,但千万不要变成“引狼入室,与狼共舞,最后被狼吃掉”。我们一定要坚持自己的开发权,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让步,否则我们毫无前途可言。美国人

有如“打桥牌”作风。而有些中国人不太好,喜欢“打麻将作风”,孤军奋战,看着上家,防着下家,盯着对家,自己和不了,也绝不让别人和。

第三点,要使年轻人在业务上得到成长提高,并且获得比较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我曾经讲过,北大方正要在2010年以前造就100个百万富豪,现在仍是这样讲。为什么?过去中国人的脑子里,百万富豪的概念是个体户或是利用市场经济转轨时机用非法手段致富的“大款”们。有时我感到非常痛心,周五、周六这些大款开着小汽车来到北大校园、北师大校园,约女学生出去……有些大款就是这么一种形象。我们需要树立的未来的百万富翁,是我们一些年轻的高科技的民族英雄。微软靠它的控股权,培育了3 000个百万富翁。中国的年轻人才,清华毕业,北大毕业,在硅谷工作三年,可以做到年薪10万美元,很容易成为“百万”。中国要体现知识价值,就需要他自己辛勤的劳动,创造价值。当然我并不希望方正的“头”暴富,成为千万富翁。我希望出现更多的百万富翁,成为中国未来的科技栋梁和民族英雄。

今天,大家把我“包装”上市,我只能讲我多年来的体会。方正的发展,得到了多方的支持,现在把成绩都放到我头上了。有时候我也觉得非常有意思,我虽然主观上不去“剥削”别人,但是一旦做出成绩,事情做大以后,什么都归结到我头上,好在大家也理解。要讲的话,我是方正里头“剥削”年轻人最多的人,但是我并不是主观要这样做。因此,大家看我的报道,时刻要牢记:是把别人的成绩都归结到了我的头上。

湖南大学教务处供稿,录音整理:杨力,未经本人审校

鄂栋臣

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教授 党委副书记

中华儿女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
有一个共同的家,这个家的名字叫中国。
现在我们把这两面五星红旗插到南极,
将来如果你们去南极,就不叫出国,是到
中国自己的南极去。

让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在地端上飘扬

——我的六次极地之行

——在华中理工大学演讲——

感

谢华中理工大学给我这次演讲的机会。我记得几
年前曾来过一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天,我想
首先谈一谈我国南北极考察的一些情况。

我去过四次南极,两次北极,其中一次还到达了北极点。
同时,我还是全国同时参加创建长城站和中山站的七人之一。
今年(1999)7月1日到9月9日,我又多了个“首次”——参
加中国首次北极科学考察队。以“中国首次”命名的、政府组
织的南北极科考活动,迄今为止,只有3次,依次为:中国首次
南极考察队建立长城站,中国首次东南极考察队建立中山站,
中国首次北极科学考察队赴北冰洋考察。这三次“首次”,全
部参加的,全国就我一人。(掌声,笑声)今天晚上,我就把我

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向大家介绍一下。

地球北端的北冰洋,周围是陆地,共有 8 个国家,这 8 个国家包围着北冰洋。过去其他国家不能自由进入考察,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开放了边界,现在,我们可以通过白令海峡进入冰洋考察。但遗憾的是,这个冰洋到处都是浮冰,所以至今我国无法在这里建站。而南极则是一块陆地,且没有任何国家能占有它。相应地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特殊问题。这些问题有的也与国家的权利、利益密切相关。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北极的科学考察。今年是由中国政府组织的首次对北极地区大规模科学考察,而此前都是由民间组织的。这次考察,包括船员、新闻记者在内共有 124 名队员,科学工作者有 50 多名。我作为中国首次北极科学考察队的副队长兼党委副书记随行。我是搞测绘科学的,这次主要和台湾学者合作研究重力加速度。7 月 1 日,我们从上海出发,乘坐中国惟一的一条破冰船——“雪龙号”向北经对马海峡,进入日本海,再向北经过西伯利亚的勘察加半岛、白令海,7 月 13 日,到达北纬 $66^{\circ}33'$,也就是进入了北极圈。在 7 月 13 日之前,航行得很顺利,当进入以前由探险家开辟的北方航道时,开始海面很开阔,但在北纬 $70^{\circ}\sim 71^{\circ}$ 时,薄冰变得十分稠密,我们的破冰船束手无策。这艘破冰船是从乌克兰买的,它只能冲击 1.2 米厚的冰,而前苏联的破冰船却可以冲击 2.3 米的冰块。所以我们只好退出北极圈,先到白令海进行海洋生物分布及其对我国渔业发展影响的调查。因为,鱼是一种资源,我国每年投入 $1/8$ 的渔船到这里捕鱼,而这里的捕鱼量却占我国每年捕鱼总量的 $1/4$ 。

8 月初,我们第二次进入北极圈。8 月中旬,在北纬 75° 的地方,从海陆空三方面对海冰进行了大规模的综合性的科学

考察。8月份的雾很大,但经过顽强的拼搏,终于在8月24日,圆满地完成了三大科考任务:1.北极地区与全球气候变化的关系;2.北冰洋地区的冰、海、气的能量转换对中国气候的影响;3.生物资源和生态的分布情况。8月24日,我们在北纬75°的浮冰上,举行了升国旗、唱国歌的告别北冰洋的仪式。当晚9点,“雪龙号”准时宣布返航。9月9日晚9点,我们回到了上海吴淞口。

对于一般人而言,地球的两极是神秘而奇特的地方,也是不容易去的地方。在那里还有许多科学问题没有解决。地球的两极的确是非常奇特。1996年4月4日下午,我随香港考察队来到北极点。当时,我用微型GPS接收机接收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找出了北纬90°。这就是地轴的端点——北极点。一个人如果能够站在地轴的端点上,踏上一只脚,那可是非常神气的事。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尤其是大地测量工作者,当时,我非常激动!在地球上,围绕地球转一圈,那要花多少时间?诗曰:“坐地日行八万里”,而现在我们几个人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只花了几分钟,就绕地球跑了几圈。当然,当你站在地球的极点时,也必然会看到许多奇异的景观。例如,整个时间、空间的观念都会改变。一年365天,在这个点上就变成了1天,只有1个白天,1个黑夜。这里没有春夏秋冬。在空间上,无东南西北之分,因为东南西北只是一个坐标概念,在这里,所有的坐标都指向南方,脚一动就是往南走,自然也就无东南西北之分了。这里也没有太阳的升和落。在大约北纬70°的地方,午夜的太阳非常灿烂,虽然可以落下,但不一会又升起来了。尤其是太阳落下去又马上升起来的景象十分壮观,非笔墨所能描述。离开北极点,那时太阳有升有落。在一个晴朗的夜晚,我亲眼目睹高空像彩带在飞舞,美丽异常,那

就是极光。

北极如此,那南极呢?南极更为奇特。这里有奇特的气象、丰富的矿藏资源和生物资源,科学研究的价值非常高。下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南极的情况。

南极不同于北极,它有 1 400 万平方公里陆地,平均海拔 2 000 多米,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一块陆地,虽说如此,但从整个地球形态来看,南极是凹进去的,北极是凸出来的。地球的形态极像我们所吃的梨子。

就气象来说,南极是世界上最寒冷、风最大、最干燥的地区。最低温度是零下 89.3℃,在野外几分钟就可以冻死人。在这样极低温度的环境中,一块钢板,向空中一抛,落下就像一块玻璃一样粉碎。所以南极成为地球上的寒极。南极还是地球上风最大的地区,最大风速达到 100 米/秒。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举例来说吧,沿海地区如海南岛等地的台风可以拔起大树,推倒房屋,但最大的风速只不过 30 米/秒。这 100 米/秒的风可以把人吹跑。80 年代,日本的一个考察队员只不过走出房子 50 米,就被风吹跑了。你们是无法想象的,南极的狂风一来,速度非常之快,简直是迅雷不及掩耳。同时,整个天空呈乳白色,这是由于雪被狂风吹成粉末而形成的迷雾,被称之为“乳白色天气”。在这种天气下,伸手不见五指。一旦走出房间,就怎么也找不到回来的路。那个日本的队员就是如此,尽管事后其他的日本队员找遍了所有能找的地方也没有找到。三年后,在一次偶然的考察中,发现了那个日本队员的尸体。尸体完好无损,因为南极的温度极低,所以被称之为天然的保鲜“冰库”。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南极的房屋之间都拴了一根粗绳,一旦遇上狂风,就可以抓住绳子,挪回自己的房间。(笑)所以,那根粗绳也被我们戏称为“救命绳”。

南极又是一个非常干燥的地方,一点小火星就可以烧毁整座房子。所以,南极建筑的防火要求也非常严格。有一年,阿根廷在南极半岛上的一个考察站,就是由于一位队员与自己的伙伴有矛盾,一怒之下,放了一把火,加上风势的助威,他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房子化为灰烬。因此,各国派考察队员,一要身体好,二要有技术,三要脾气好。(笑)没有修养的人,脾气暴躁,是不能正确处理内部矛盾的。特别是冬天,黑夜多,一个考察站二十来个人,每天你看着我,我看着我,很容易生烦,一发生口角,马上动手,一把火就烧得干干净净。(笑)

南极的冰量是世界上最多的。最厚的有 4 800 米,平均厚 2 000 米。巨大的不化的冰块压在 1 40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你计算一下,有多少重量压在地端?如果这巨大的冰块化了,则地球的海平面将要升高 60 米。去年(1998 年)武汉特大洪水,长江水位最高是 29 米多,如果 29 米加上 60 米中国将会淹到哪里去了?要是真的一旦融化,将会给地球带来毁灭性的灾难,整个地球岩石圈构造会发生巨大变化。南极与全球气候的变化息息相关。现在温室效应,气候变暖,如果全球气温平均上升 5℃,则今天的上海市将会变成“东方的威尼斯”。(笑)

南极的矿产也极为丰富。世界上最大的煤田在南极,其铁矿可供全世界开采 200 年。除此之外,南极还发现了各种稀有金属,因为这块大陆原本是从美洲和大洋洲等解体出来的,其他洲有的,南极也有。南极还有非常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美国在罗斯海打了 5 口井,发现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十分丰富。也正因为这一原因,美国迟迟不肯在 1991 年第二个南极条约上签字。除了矿藏外,南极还有极为丰富的海洋资源,周围大洋里全都是宝。例如鲸鱼、海豹、企鹅,还有磷

虾。这次北极之行,在进入白令海时,我看见一群海豹翘起尾巴,像一群黑色的潜水艇。鲸鱼是一种非常庞大的动物,他们喷水时的景象十分壮观,大家都争着拍照。但这已激不起我的兴趣,因为我看到过更为壮观的景象。那是1989年,当时我们从中国第二个考察站——中山站撤退,因为是二三月份,温度突然下降,而中国无破冰船,抗冰船“极地号”不敢开进去,否则会被冻结。前苏联曾有一艘船,在行驶过程中,被冰冻住,无法开动,只好派直升飞机把人员接走,到第二年冰化了以后,船才启动。(笑)那时正好前苏联的破冰船——“科学院士号”进入普里茨湾,我们只好向他们求助。前苏联非常友好,于是在1989年,我第一次上了破冰船。它前面有30厘米厚的钢板,而一般船只有2~3厘米厚,它的动力很大,2~3米厚的冰,很轻松地就穿过了。我记得,船所过之处,两边的冰块都被翻起,同时,无数的鲸鱼被惊起,像一艘艘小船一样,从冰缝中跳出来,非常壮观。这也表明,鲸鱼数量之多。

磷虾是虾的一种,你别小看它,体积虽小,但浑身都是蛋白质。在所有的海洋生物中,它的蛋白质含量是最高的。不仅如此,它的数量之多,令人瞠目结舌,完全是一个天文数字。据现在的调查表明,全世界所有人的体重加起来,还不及南极磷虾总重量的一半。这是人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蛋白质宝库。1985年,我参加首次南极考察,当从太平洋返航时,看到一规模巨大的大船队,那是前苏联所派的远东船队。他们到南极边捕磷虾,边制成罐头,获得了经济利益。为此,我国“九五”南极攻关项目中有一项专门研究磷虾的分布。磷虾的分布是有规律的,一块块地群居。因此,一块虾就是几个平方公里,几十米深地堆在一起,你去搬就是了。(笑)

除此之外,南极还有海豹、企鹅,这也是一种资源。一堆

堆的海豹,懒洋洋地躺在那儿,你用脚踢它,动也不动一下。(笑)不像北极,很少看到海豹。1996年,我随香港考察队进入北极的格陵兰岛,当时为了拍摄爱斯基摩人如何捕杀海豹,香港的一家电视台还专门带去了两台摄像机。在寒冷的天气里,我们一行人坐着雪橇,跑了340公里才发现了一只海豹。只见爱斯基摩人一枪投下去,杀了以后,马上肢解,血淋淋的,但爱斯基摩人不管那么多,席地而食。照他们的理论,要趁热吃,否则一旦冷了,就会冻成冰块。那场面简直惨不忍睹。我清楚地记得那只海豹是只母的,肚子里还有一只未出生的小海豹。北冰洋周围的动物一见到人马上就跑开,因为他们明白,人是会伤害它们的。即使是被称为北极之王的北极熊,见到人也惧怕三分。我记得,有一次是在北纬70°左右,海冰考察组一行7人一下直升飞机,马上在大冰块上埋头取样。这时,一名队员发现了三头北极熊。据他的描述,那场面就好像是狮子王站在高高的悬崖上俯视众生。其中有一位队员,反应极快,马上抓起枪瞄准北极熊,此时其他人也镇定下来,排成一排站在他的后面。就这样,人与一只大熊、两只小熊,我看你,你看我,大约对峙了5分钟。可能是熊认为这7个人穿着红红的,个儿高大,无果腹的希望,所以又对望了一会,3头熊屁股一转,走开了。(笑)

南极的企鹅,数量极大,在企鹅山、企鹅岛上,犹如千军万马,黑压压一片,无边无际。小的企鹅40~50厘米高,大的约有一米,体重40公斤,就像人一样的站在那儿。它们对人感到非常好奇,人所作的一切,他都要站在一旁看热闹,(笑)企鹅是一种颇有灵性的动物。每次船一到南极,它们就列队站在那儿,欢迎我们。(笑)当我们出去打钻时,它们就一个个围在那儿观看,每当人一走开,它们马上一拥而上,围在洞口打

转。(笑)南极企鹅还有许多趣闻,例如企鹅繁衍后代,是雌的下蛋,雄的孵蛋。一般只听说老母鸡孵蛋,而没有老公鸡孵蛋的,但在南极,是雄企鹅孵蛋。在企鹅山上,雌的只负责生下两个蛋,交给站在一旁的雄企鹅。雄企鹅把蛋拱在自己宽大的脚背上,然后压在自己的白肚皮上。这样,蛋就像盖上了一床小被子。你们能够想象出来吗?在冰天雪地中,雄企鹅不吃不喝,一动不动的要孵上两个月,直到小企鹅出世,所以,雄企鹅不愧为名副其实的模范丈夫。而此时,雌企鹅在下完蛋以后,到海里潇洒走一回,觅食吃个饱,直到预感小企鹅快要出世时,才急急忙忙赶回家。你可别小看它们,在成千上万的企鹅群中,决不会认错自己的丈夫,因为它们之间有一种生物感应。南极企鹅的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和家庭观念极强。有一次,晚上11点钟,中央戏剧学院的一位教授——金乃千,50多岁,慌慌张张地闯进帐篷,他告诉我们,他发现一位冻僵的队员,站在冰山上。在南极,也有过队员在野外考察时,突然遇到狂风的袭击,来不及躲避而被冻僵。因此,南极有规定,无论哪个国家队员出事,其他国家的队员都要去救助。所以,我们马上随金教授走出去,确实看到远处是一个人被冻僵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再用高倍望远镜一看,才知是一只大企鹅。(笑)我们观察了4天,它一动也不动。后来我们分析其习性才得知,因为企鹅都是成双成对的,非常忠于婚姻“爱情”,可能另一只企鹅遇险离去了,所以这只企鹅在这儿等待。最后,可能觉得无望,这才蹒跚离去。(笑)而海豹是一夫多妻制。在南极,你可以经常看到雄海豹为争得配偶而决斗,雌海豹则坐在一旁,坐山观虎斗。最后,一堆海豹中,只存下一只雄海豹。南北极动物的趣闻极多,说上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南极还具有非常奇特的科学研究价值,尤其是对地球科

学和环境科学而言。南北极的科学研究,整个立体空间,从上到下有太阳辐射粒子、高空大气物理、电离层、大气、气象,地面有冰雪,地下还有岩石圈的构造板块移动等丰富的研究内容。南极上空出现了臭氧洞。每年从8月到来年的1月,在1000多万平方公里的上空,没有臭氧层,出现空洞。它带来的后果就是太阳辐射的紫外线因为无所阻挡而直射到地表,所以极易患皮肤癌。一旦到了南极,不管你的皮肤有多白,就算未出太阳,一段时间以后,脸也会变得黑乎乎的,像烧焦了一样。除了太阳镜遮挡的两个眼圈周围是白的,脸的其他部分都是黑的。拿起镜子一照,活像一只大马猴。(笑)臭氧洞的出现与全球工业污染有关。氟利昂、工业排放的废气污染了大气。这种现象出现在北极还情有可原,因为北半球发达工业国家比较多,而南极周围多是一些不发达国家。那么在北极上空臭氧层只是变薄,尚未出现空洞现象,然而惟独南极上空出现这么严重的臭氧洞,这是为什么?这也是现在正在研究的课题之一。

由于南极具有的独特价值,因此,南极的权益之争也十分激烈。国际上规定,南极不能被任何国家所独占,而是全世界共同拥有。但现在却有几个国家要瓜分它,私自划分界线,提出领土权的要求。澳大利亚把其南部地区的大片南极土地划入自己的版图。而法国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新西兰的南边没有其他国家,所以它认为这些地方应属于它。挪威的阿蒙森是最早到达南极点的人,所以挪威认为阿蒙森经过的地方都应归挪威所有。英国认为他们是最早到达南极半岛的,所以把南极半岛归入自己的版图之中。而阿根廷、智利这两个国家由于东西两条经线向南延伸也包括南极半岛,所以它们也认为自己对南极半岛拥有领土权。整个南极大陆基本上被

这七国划分完了。但这些划分都是“单相思”，谁也不承认。尽管这几个国家提出了“领土权”，但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前苏联并未表态。但美苏更为厉害。前苏联沿南极大陆一圈全方位地、很均匀地建立了8个考察站，这样，又何必多此一举，说那块地方归自己呢？而美国则利用自己的高科技，调查了整个南极，选其中最有价值的地方建立自己的考察站，最远的一个站建在南极点——阿蒙斯科特站。美国最大的考察站就像一座城镇，有公共汽车、商店、运动场，有核电站，应有尽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利用自己的优势对南极进行考察，对“人口权”的要求置之不理。美苏不动，一些小国家如阿根廷、智利又有什么办法，总不能和他们打一架吧？（笑）所以，阿根廷想了一个花招，花钱建立了许多房子，成为“南极居民点”，甚至动员新婚夫妇去南极居民点，生孩子。（笑）这就为“领土权”的提出制造了借口。因为按国际惯例，人生在那里，就有那儿的永久居住权。据我所知，全世界只有5个小孩出生在南极，都是阿根廷、智利的孩子，其中一个我还在长城站抱过。因此，全世界恐怕也只有这5个孩子有权在自己的出生籍贯上填上“南极”！

针对这种情况，于是就成立了一个“国际南极条约组织”，专门负责整个南极的管理。只有在南极建站的国家才有资格管理南极，这些国家被称为南极条约的“协商国”。我记得1983年，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召开了第十二届国际南极条约会议。中国也派出了一个代表团。会议上讨论了南极矿产资源、环境污染、“领土权”等问题。在表决时，外国人很有礼貌地对中国代表说：“请您们到休息室休息一下。”这也就意味着剥夺了中国在南极问题上的发言权。这关系到国家的尊严，当时与会者一个个都掉下了泪水。他们明白，国家无论大小，

没有建站,就没有发言权。这与中国大国地位不相称。因此,国务院于1984年6月25日宣布,中国将派出自己的第一个考察队赴南极,建立中国的第一个考察站——长城站。在这片14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应该有中国人的立足之地,南极丰富的资源,应该有炎黄子孙的一份。同学们,你们说,中国应不应该去?(众答:“去!”长时间掌声)

从1984年开始,我去过4次南极,2次北极,组织过10多次南极测绘科学考察。现在,我负责中国南北极测绘科学考察组织工作。我深深地体会到,青年人应该立志,要去南北极,为民族争光。但有理想,不具备两种精神,是去不了极地的,即必须具备顽强拼搏和献身奉献精神,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我想对这个问题谈点自己的体会。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要为国家做出一点事业来,如果没有这种精神,两面五星红旗也必然插不上南北极。我记得1984年,我参加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从上海出发时,“向阳红10号”的张船长告诉我们:“这次南极考察,大家都没去过,风险非常大,所以带了大塑料袋——装死人用的。”但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参加考察的所有队员的家属都是签了字的。有一次,我们闯入了别林斯高晋海,遇上12级台风,于是我们向祖国发报,报告考察船时刻有全船覆没的危险。但这也只是让祖国知道而已,因为谁也无法救我们。在这种去多少船淹多少船的情况下,我们硬是凭着中国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顶住风浪,坚持了12个小时,终于平安地脱险。(长久不息的掌声)当时,船上有一个从阿根廷请的顾问,是从军队退役下来的,他却躲进入船舱,一言不发,怎么拉也拉不动。还有两个外国飞行员,脸色都吓白了。(笑)在南极建中山站时,遇上特大冰崩,我们也是凭着这种精神,硬是挺了过来。中国南北极考察十几年,到

现在为止,也未死一个人。

穿过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看起来很神气,但实际很困难。当你真正到了太平洋,路漫漫,水茫茫,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历程。太平洋上大部分时候都有风浪,最大的风浪有十几米高,船最大倾斜度可达到 38° ,左右摇晃七八十度。这样的颠、摇,几乎60%的人会晕船、呕吐,甚至吐出了黄胆水。在这来回三个多月飘洋过海的日子里,你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还要随时准备蹲马步姿势。当船剧烈摇晃时,走路就会像打醉拳一样东倒西歪。风浪大时,炊事员煮饭,要用绳子把两个炊事员捆在一起,可一下子爬这边,一下子爬那边,所以还要控制走向,还得把他俩儿用绳子捆在铁柱子上,一个人端着锅,调整水平度,一个人炒菜掌锅铲,才可以把饭做好。(笑)当时,我是考察队负责组织工作的副书记,分管组织发展工作,中央规定,我们在考察过程中可以发展党员。许多非党员也积极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这是一种信念、决心和爱国主义的表现。正是在这种精神支柱的支持下,我们才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南极。

1984年12月6日到达南极,我们“向阳红10号”停在外海,原来准备把站建在这块常年积雪不化、夏天岩石显露的海滩上。但一到这里,却发现南美洲的乌拉圭抢先在这里插上了它的国旗。建站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的,必须选有水源和易登陆的地方。早在20世纪60年代,国外建站后,在野外考察时,一发现好地方,马上向站长报告,做一小木房或用一个集装箱,用直升飞机吊到那里一放,插上国旗,其他人谁也不能动,这是国际惯例。后来,我们在乔治王岛的菲尔德斯半岛找到一块海滩,景色不错,于是,我们决定,在南面建站,在北面建飞机场。那是12月29日,选好了站址,我画了一张

站址地形草图,当时海滩前面的海湾没有地名,我就在草图上随手写上“长城海湾”。“长城海湾”——这是中国人命名的第一个南极地名,就是这么来的。这张草图随后被湖北省博物馆收藏,现在很值钱。(笑)

12月30日上午,54名南极洲登陆队员——我当时是湖北省惟一的一名队员,高举五星红旗乘着登陆艇朝长城湾开过去,突然发现海滩北端又竖起了两面国旗,一面是当时西德的,一面是智利的。看到这两面与我们争地盘的国旗,大家非常气愤。为了维护共和国的尊严,我们决定紧挨着老外的国旗旁边建站,当时破土动工的第一个坑就在这两面国旗下面挖。第三天一个暴风雪的晚上,一个年近40来岁的老外扛了一捆竹竿,在我建站工地北端立起一排竹竿,用尼龙绳拉起一条“国界线”,并用英文写着:“中国人建站不要越过这条线!”这下可把大伙儿激怒了:你算老几!能限制中国人的建站范围。我们决定针锋相对,派出一个7人谈判小组与他们谈判,我是成员之一。我们说:“你们划这条线违反了国际上关于南极的有关条约的规定,而且也是对中国的不友好。”因为南极是地球上惟一的无边界、人无国籍之分的“大同世界”,谁也不能圈地为界。他们解释说,他们在这里搞了5年的地下水温的试验,怕我们向北扩展,动了环境,试验也就搞不下去了。我们坚持要他们撤了这条线,否则一切免谈。他们同意马上到现场撤了线以后,我们才撤了几十米。今日的中国人已不是昨日之东亚病夫。我们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进行斗争,解决了所谓首次建站的“边界纠纷”。

在地端这样一块荒凉的海滩上,在狂风暴雨中,在过于激烈的争夺中,要建站谈何容易!这里面凝聚着我们的血汗和泪水。我记得,登陆时,我们要把两千多吨物资——起重机、

拖拉机、吊车,还有水泥、沙子等建筑物资运上沙滩。首先要修码头,这可是一场硬仗,长城湾的风浪把投下的沙袋都卷走了。为了修这码头,中国的知识分子硬是跳入刺骨的冰水中,围成一堵人墙,以阻止海浪的冲击。搬运物资,在发达的国家,可以用水陆两用潜艇,而我们只有依靠艰苦奋斗,每天工作 20 多个小时。因为无黑夜,所以可以每天干活。那年,我 45 岁,还算身强力壮,但也感到非常疲劳,只要一站下来,马上就会睡着。开拖拉机的三天三夜未下驾驶台,闭着眼睛都能开,毕竟地广人稀,怎么开也撞不着人。这样,建码头时,我们是码头工;搬物资时,是搬运工;修房子时,是建筑工;考察时,又成了科技工作者。经过 45 天的顽强拼搏,长城站建成了,发电站、办公楼、宿舍楼拔地而起。1985 年,54 名考察者,面对长城站上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不禁热泪盈眶,激动得不能自己。从 1985 年开始,中国在南极问题上,终于有了一票的发言权。从 1988 年开始,我被当选为国际南极科学研究委员会所属的 8 个工作小组之一的大地测量与地理信息工作组的常设代表。每当参加国际会议时,坐在标有 CHINA 的座位上,我就感到异常的骄傲。

我考察的任务是尽快把南极建站的地理位置测出来。当时我运用美国 GPS 北极星导航系统,测出我国南极站位于南纬 $62^{\circ}12'53''$,西经 $58^{\circ}57'59''$,用天文测量定出子午线方向。我还测得南极到北京的最短距离为 17 501.95 公里。南极的许多地方是由我命名的,例如长城湾、西湖、蛇山、龟山等,填补了南极自古以来无中国人命名的空白。

现在,南极的主要科研任务是研究南极与全球变化的关系,有几十个学科联合研究。南极是反映全球变化的放大器、敏感器。这是因为它非常干净,是地球上惟一没有被污染的

大陆。南极是科学研究的圣地,是人类的宝贵财富,当然在那儿不能随地大小便。(笑)因为无污染,无病菌,所以人在哪儿也不会生病。我在那儿,手被扎破了,不包扎也不会感染;在冰天雪地的野外搞激光测距、卫星观测时,我冻得浑身发抖,但在那儿4次共四五百天,一次感冒也没有得过。

国际上有规定,在南极的一切活动都必须保护那里的环境。所以,各国家的废物处理都有特殊的方法,有的国家甚至把粪便也装在桶中拉回国。也有些国家采取生物化学法处理垃圾。即使在野外考察,也要带一个袋子带杂物。破坏南极的环境,也就是破坏了科研的场所,给科研工作带来极大的混乱。正因为没有破坏南极的环境和生态,所以南极的动物把人视为友好的使者,一点也不害怕。1986年,作为中国第二次南极考察队的副队长,我到南极考察。因为整日吃冰冻的东西,吃得倒胃口。于是,苏联考察队员教我们钓鱼。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坐上橡皮艇,只需用尼龙绳拴个钩子,放入海中,不到两小时,就吊了20公斤,最大的有两三公斤重。这里的鱼这么容易上钩,就是从来没有上过人的当!(笑)

我到过全球六大洲四大洋,只有非洲没有去过。我的体会是:有志青年应该立足神州,报效祖国。我6次去南北极,克服了许多困难,也取得了一些成绩。而祖国也给了我很多荣誉:全国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多项省部级科研奖励,还给我记两次二等功,1998年获得国家级科学进步二等奖,江泽民同志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国在南极两个考察站的建成,无论是生活在地球上任何天涯海角的炎黄子孙都会感到十分的骄傲。1986年,南极长城站接待了不少外国人去参观。有一位美国华侨,吃完饭后,到长城站的广场上捡玛瑙石,并告诉我们,要把这些石头带回到美国

去,给儿子、孙子看看,这是从中国人自己建的长城站捡的。还有一次,我在飞机上遇到一位 20 多岁的台湾青年,当他得知我们要从南美洲到南极半岛的长城站时,异常激动地拉着我的手,连声说:“你们做得好!”在建中山站时,当“极地号”穿过赤道和太平洋风浪区来到澳大利亚南部美丽的霍巴特港口时,只见一群人打着“热烈欢迎中国南极考察队的到来!”的横幅在迎接我们。原来他们是塔斯马尼亚岛的霍巴特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船一靠岸,他们就一拥而上。我记得一个留学生紧握着我的手说道:“在国外,能踏上自己国家的船,就像回到了自己的祖国。”这种感情深深地震撼了我,我说:“中华儿女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家,这个家的名字叫中国。现在我们把这两面五星红旗插到南极,将来如果你们去南极,就不叫出国,是到中国自己的南极去。”(经久不息的掌声)长城站、中山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我希望你们在座的年轻一代将来为国家的科学事业、为中国的极地事业、为南极的这两面五星红旗永远飘扬,添上你们的风采!谢谢!(经久不息的掌声)

演讲日期:1999 年 11 月 19 日,华中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供稿,录音整理:范辉,本人审校

编者絮语 演讲者充满激情,且配之以精美的基地风景图片,使得演讲现场气氛极为热烈。可惜无法在书中再现这一场面。听鄂教授的演讲,除为其爱国主义的激情所感染外,另一深刻感受就是谈到建长城站时,我们的教授当起了搬运工、码头工、建筑工。这也形象地说明了什么是人才的综合素质。

陈赫

中南工业大学应用系统研究所教授 所长

等到有一天,我们在北京一跺脚,美国佬伸向轰炸我国驻外大使馆巡航导弹按钮的罪恶之手就得缩回去——到了那时,我才能心安理得、问心无愧地对祖国母亲、对全世界所有的民族高呼,我是炎黄子孙。

把书读好了,去做官,不做贪官、昏官,而是做清官、做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做焦裕禄、做孔繁森,这样的官越多越好,做得越大越好,对人民越有利。

读书与做人

——在华中理工大学演讲——

1 995年,4名学生和我联名发起成立了“中南工业大学学生升华读书社”。直接的原因是为了抵制某些单位、部门和个人在学校周边,甚至在校区内开设租书店,向学生出租低品位和低级趣味的书籍;更本质、更深层的原因是为了配合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

同学们请我以名誉社员兼指导教师的名义为读书社题词,我的题词是:开有益卷,做高尚人。一名学生说:老师,您写反了,应该是“开卷有益”。我说:古训“开卷有益”,已经未必是“有益”的格言了。因为,当前的书摊上,坏书实在太多了,甚至堂堂书店的书架上,也充斥着低品位、低档次的平庸之作。因此,我希望大家读好书,做好人。

这里的“好”字,原意是做形容词用的。但也可作动词补语或动词状语讲,前者表达的是“把书读好”,后者则要求我们“好好地读书”。

坏书能不能读?我想,有如垃圾可以做肥料一样,坏书也可以经过处理变成“肥料”。只是,各位的阅历、判断力和免疫力还不够,未到火候,权且把坏书当作“儿童不宜”的影视片,暂时不读为好。

一 也谈“走出‘半人时代’”

徐葆耕教授在《走出‘半人时代’》的演讲中,提到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 1948 年在清华大学作过一次演讲,标题是“半个人的时代”,谈文、理分家导致人的片面化问题。他认为,科技与人文分离的结果,就两个极端而言,出现了两种畸形人:只懂技术而灵魂苍白的“空心人”和不懂科技、侈谈人文的“边缘人”。

其实,如果把一个“完整的人”看做一个球,那么,从不同的角度通过球心把这个球切开,可以形成许多不同型号的“半人”。

比如,人与动物有根本的不同,在于人固然有与高等动物相同(或“客气一点”说是相似)的自然属性;但是,人有与动物根本不同的社会属性。由此可知,人是要继承动物的某些本

能,但人若是只剩下动物的本能,那这种“型号”的“半人”,就可能比动物还不如。中国传统道德中的精华告诉我们,人之本在于心,心地光明则为人,心地阴暗则为兽。为人则通情达理,为兽则肆意横行。

当今描写改革开放的电视剧中,大凡在社会上充“强人”(包括“女强人”和“男强人”)的人,后院大都要起火,配偶大都要安排一个“外遇”。我在长沙看到一个电视谈话节目,女主持人讲述某电视连续剧中的故事,男主角一心扑在事业上,他的妻子又不热心于夫妻生活,于是,这位“男强人”有了外遇。主持人巧妙地作了一些引导之后问:“这是为什么?”一位女医生嘉宾抢过话头说:“对啊,这是生理的需要啊!”却没有下文。我真着急啊,我又不能跑到屏幕里去与她们辩论!(大笑)如果我在演播现场,我一定会大声疾呼:“人不能只剩下动物的本能啊!”我和夫人两地分居14年,每年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一个月,我们可没有去“外遇”啊!(赞许声和笑声)

当然,我自己并不是、也不希望你们都变成禁欲主义者和苦行僧。我只是想告诉大家,人格、人的精神追求和专一的爱情是可以战胜单纯的生理需要的。

人的一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如下图), $0 \sim t_1$ 是成长期,这是向父母、向社会索取的第一索取期,索取量由面积 A 表示; $t_2 \sim t_3$ 是衰老期,从 t_2 起,人丧失了劳动力以后,一直到 t_3 他去世,社会和晚辈得赡养他,这是向社会和子孙索取的第二索取期,索取量由面积 C 来表示; $t_1 \sim t_2$ 是人的服务期,这时,他向社会和他人作奉献,因此叫奉献期,奉献量由面积 B 来表示。人生在世,想要活得像个人样,或者说人要想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的条件是 $B > A + C$ 。

有的人一辈子只索取、不奉献,那是不劳而获的地主、老

财、寄生虫；有的人只索取最起码的需求而主要是作奉献，这又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大公无私的英雄，一是受人统制的奴隶。奴隶主容许奴隶的索取量只能保持奴隶本身还能为主干活和生小奴隶。这种分法也造成两种相对的“半人”。

还可以有许多种分法：有的人守旧，有的人创新；有的人只爱幻想，有的人崇尚务实；有的人愿意把自己当商品，有的人则很看重自己的人格……“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要是把“切开”的相对的两“半人”结合起来，人就可能变得完整起来。比如，你既有当好主角的本领，又有甘当配角的风格，而且，当配角就一定能争当最佳配角；又比如，你对人充满感情，却又不感情用事，处事充满着理性，却又不干巴巴地……

教师也可能“分成”两个“半人”，或照抄前人，或继承发展。1962年，我从当时的华中工学院毕业，分配到当时的中南矿冶学院，进入教师行列时，就想写一首诗抒发教师情怀。我既不想自诩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不愿套用“像蜡烛一样燃烧着自己，照亮了别人”的赞语，那太悲壮了，（笑）因而迟迟未能成诗。

1989年秋，我去给学生作“现代青年与古典体诗词”的报

告,在教员休息室与讲台上,居然找不到一支完整的粉笔。在带着些许抱怨搜集粉笔头的过程中,猛然想起无产阶级教育家徐特立先生讲课时专捡粉笔头、从来不用新粉笔的故事,心情豁然开朗,诗潮奔涌而来,压抑了 27 年的诗思即兴之下变成了一首七绝《咏粉笔·赠教师》:

模范型成正直身,白头笑对黑头吟;
一生磨炼灰飞尽,擦去遗痕让后人。

1997 年 7 月,我应老校长杨叔子院士之召回母校讲学,我以此诗相赠。我对杨先生说:“送您一首歪诗,权当离开母校 35 年后的一份作业,请您批改。”杨老师品评后风趣地说:“‘歪’字要拆开来读,中间再加一个逗号,读成‘不,正诗’!你既然自谦为歪诗,那我也和你一首歪诗,歪歪得正嘛!”

同年 8 月 15 日,杨老师应邀到长沙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将他 7 月份早已写好的和诗赠给了我,诗曰:

敬和陈赫同志《咏粉笔·赠教师》诗
并步其韵

己身不为为他身,写史忘身共啸吟。
身化灰飞身价几?身身不已有来人!

原诗的最后一句,原为“接班更爱后来人”。一则,我怕杨老师在表扬他事业有成的诸多弟子时,把我也搭进去,不敢“愧领”;同时,也觉得这一句有点“套话”的味道,建议杨老师改为“但求身后有来人”。杨老师也觉得太悲壮了,后来就改

成了现在的样子。

此诗用“顶针格”的手法，有意多次重复使用一个“身”字，耐人寻味；尤其是“身化灰飞身价几”多么传神——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教师，实在是“价廉物美”！这一句诗把人民教师不求索取、无私奉献的高贵品质，可以说是写透了。这样的教师比起那种只会照抄前人的“粉笔人”来，可谓完整得多了。

是的，一撇是“歪歪”的一半，一捺也是“歪歪”的另一半，这两个“一半”互相帮衬起来，就成了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掌声）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一个人也许一辈子也成不了完人；但是，这不能作为不向完人境界无限追求的借口。而要想追求做一个完人，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读书——好读书、读好书、把书读好。

二 读书的目的

为了完善自己、充实自己的人生，为了明理——明做人的道理和办事的道理，需要读书、读好书、好好地读书和把书读好。这是十分原则的要求。那么，读书还有什么较为实在的目的呢？

现在，有人听不得带有任何革命性的语言，容不得带有任何传统意义的词汇，谁使用了这样的语言和词汇，就说你是“马列主义老太太”，说你是在喊“空洞的革命口号”。所以，在这一部分，我不急着告诉大家我个人思考后得出的答案，以免引起某些听众的逆反心理。

首先，让我们来探讨一下“狭义的读书”与“广义的读书”。

在座的诸位都有一个专业，读专业书算是狭义的读书；而理工科学生读一点人文社科方面的书、人文社科的学生读一

点理工方面的书,可算是广义的读书。

读出版物,包括纸张印刷品、影像带、录音带、光盘等,是狭义的读书;而读社会、读人,是广义的读书。

前几年流行着一首歌,叫做《读你》,唱歌的人从自己爱恋、倾心的人的脸上,特别是从他(她)的心灵的窗户——眼睛里,读出对方的心思和追求。

我这里所指的“读书”,既包括狭义的读书,也包括广义的读书。

然而,读书到底为了啥呢?

现在,社会上流行着关于读书的两种说法,一曰读书做官,一曰读书发财。不少人内心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追求的,只不过书读少了,讲不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样较为文雅的“俗话”而已。可是,一到了正经场合,几乎谁都不这么说。其实,做官有什么不好!发财又有什么不好!

把书读好了,去做官,不做贪官、昏官,而是做清官,做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做焦裕禄、做孔繁森,这样的官越多越好,做得越大越好,对人民越有利。把书读好了,有了文化,掌握了高科技,通过创新把第一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通过诚实的劳动和合法的经营去赚大钱,“发大财”而又照章纳税,这样的“财神”越多越好,财发得越多对国家越有利。

倒是有些人,读了不少书,甚至号称满腹经纶、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可就是缺少一样东西——德性,叫做缺德。这样的“半个读书人”,可能比不识字的坏人更坏!

有两句格言,可能对端正我们的读书目的很有指导意义:势力纷华,不近者为洁,近而不染者尤洁;智械机巧,不知者为高,知而不用者尤高。

由此,我想到了与读书有关的四种人应该如何做:

为师,近势力纷华、知智械机巧,不仅不染、不用,而且能保护、教育学生抵御邪门歪道,并且有愿望、有能力制止和打击搞邪门歪道的人,才能算得上一名合格的好教师。

为学,为父母而读书,只可能成为一个好孩子;为老师而读书,只可能成为一名好学生;受求知欲望和充实自己的动机的驱动,为浓厚的兴趣、执著的追求和社会责任感而读书,才会有无穷的动力,才有可能成为一位大学问家、大实践家。

为官,对顶头上司负责,可以保住乌纱;对党负责,可以保住党性原则和党籍;对人民负责,可以保住人类的良知;对历史负责,可能丢掉乌纱和党籍甚至生命,但可以得到好的口碑和灵魂的解脱。

为商,“无商不奸”不应该成为为商的行动指南;只有“以有余换不足”的适度流通,才能发挥商品的潜在价值和提高其使用价值。读书读得好并且合法经营的商人被誉为儒商。儒商求利但不忘义,现在有些商人,读了几句书以后,批判孟子的“王何必曰利,以有仁义而已”,其实质是为自己的见利忘义找托词。古代舍私利救国家的牲口贩子弦高,应该是儒商的世代楷模——尽管他不一定有很高的文化水平,但有一种爱国情操和牺牲精神。

近年来,我常有一种自我压抑的心情,我不能心安理得地自称为“炎黄子孙”。中华民族几千年灿烂的文明和先进的科技,为我国带来了何等的辉煌,可是,近百年来,衰落了。自1949年人民当家作主人以来,过去了半个世纪,我们这一代人还没有能使祖国母亲恢复她昔日的风采。我们是炎黄不肖子孙!落后要挨打,其实软弱也要挨打。等到有一天,我们在北京一跺脚,美国佬伸向轰炸我国驻外大使馆巡航导弹按钮

的罪恶之手就得缩回去——到了那时,我才能心安理得、问心无愧地对祖国母亲、对全世界所有的民族高呼,我是炎黄子孙!(鼓掌)这一天,也许我是看不到了,但你们应该、而且一定能看到!(热烈的掌声)我想跟我的儿子说:到了那一天,你“家祭毋忘告乃翁”的时候,请给我发一个 E-mail!(热烈而长时间的鼓掌)

现在,我可以公布我对“读书到底是为了啥”的答案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青少年时代立下的誓言,让我们以此共勉。

三 读书方法——无定规、有原则

不少学生总希望老师介绍读书方法,更有少数人希望老师能传授读书走捷径的诀窍。其实,一千个人读书,有一千种方法,而且,大都不可移植。如果硬要讲有什么方法的话,那只能概括为六个字——无定规、有原则。

我个人的第一个原则是,正确理解“好读书而不求甚解”。这句话出自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我想,他的本意决非叫人们读书可以不下功夫、浅尝辄止,而是要人们不读死书,不要钻牛角尖。但凡读一本书,首要的任务是弄清作者的观念、这本书宣扬的主旨,切不可被细节所困惑。

第二个原则,由约而博、由博返约。读书,有“翻一翻”和精读两种读法。刚开始时,最好在有根底的先生指导下,精读几本有分量的书,给自己打下良好而坚实的根底,养成个人读书的良好习惯。然后,为了拓广知识面,可以“博览群书”。当然,“博”了,难免不“深”,于是乎,在许多读过的书中,自己再精选几本精读。经过“越读越厚”,到“越读越薄”,加上自己的理解,形成了自己的观点,这样,书才算读出点名堂来了。

如何认定书好不好？我个人有一套“招数”。首先，看出版社，有一些出版社就从来不出平庸的书；其次，看看序言和跋，或者是前言、后记等。这些都是看主旨和观点最适当的地方。至于推介的文章宜慎读，因为，现在溢美、吹捧的文章太多了。

第三个原则，“勤能补拙”、“笨鸟先飞”、“熟能生巧”。有的人把耍小聪明也用到读书上来了。其实，坦然承认自己是“笨鸟”，只有“先飞”才不至于落后的人，是真正的聪明人。有些书要读得滚瓜烂熟。常言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中国的老式私塾要学生死背课文，当然有其十分落后的一面；但是，博闻强记要趁年轻，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小时候背熟的东西，虽然当时不一定都能理解，但是，先把它储存到“第二个胃”里面，长大以后，按需要时不时弄一点出来“反刍”，加上自己阅历的“酶解”和感悟的“催化”，可以使你终身得到营养。

四 书山歧路

常言道：“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今天“书山有路多歧路”，歧路本来就容易“亡羊”，何况，现在似乎总有那么一些专门误导青年的“误导专业户”。因此，在我们奋力攀登书山的时候，要小心误入歧途。当然，实在“歧路亡羊”也不是不可挽救，因为，“亡羊补牢，未为晚矣！”

我所看到的书山歧路，大致有下列八条：

歧路一，读书的苦和乐。我发现有些同学打电子游戏机、打扑克牌，兴致勃勃；一读书就犯困，打不起精神。其实，这里有一个苦乐观的问题。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耕耘当然是辛苦

的,但它预示着丰收的欢乐。有些学生老羡慕别的同学聪明,读书、解题好像不费什么力气。当然,有些人是机灵一些,但是,他们的“轻松”,是在读书上讲究“要得活方法,先下死功夫”的结果。

歧路二,读书的感悟与“捷径”。许多事情可能真有捷径,有窍门;惟有读书,一开始就得靠积累。有的同学只看到大学问家成功的喜悦,没有或不愿意看到过程的艰难。他们误认为灵感就是运气,就是机遇。其实,灵感只是稍纵即逝的火花,积累才是长年堆码的柴薪,光有火花,没有柴薪,能燃成熊熊大火吗!机遇也一样,她只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

歧路三,中国的典籍与西方和当前中国某些畅销书。中国的典籍太精炼、太浓缩,一个字包含的意义太丰富、太深刻,有时候又叫人感觉有点玄,因而,太难啃。不管说的人是否过度夸张,“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就充分说明了它太过于浓缩。要读懂它,首先要疏通文字障碍;其次要“掺水熬汤”,用“高压锅闷煮”。而西方和当前中国的许多所谓畅销书,从书名到内容,从写作的手法和用词造句到宣传手段和推销广告,仿佛要你相信,只要你读一遍,就能熟练地掌握待人处世的真谛、事业人生的成功之道,就能在社会实践中应用自如、立刻名利双收似的;加上那些“误导专业户”的天花乱坠的吹捧,这些书立即变成了崂山道士的符咒,烧成灰,冲上白开水,喝下肚去,立即可以“穿墙过壁”!只要稍微认真地翻一翻,你就会发现,这类书大都水分太多,要拧干、挤干来读。一本特大部头的《卡耐基成功之道》,我下了好几次决心,多次都没有把它读完;后来咬紧牙关通“翻”了一遍,整本书我只记得一句话,那就是卡耐基自己给自己撰写的墓志铭:“这里安葬着一个人,他最擅长的能力是,把那些强过自己的人,组织到他服务

的管理机构之中。”我认为,这是卡耐基成功的最重要的“门道”,他能团结大多数能人,他会使用“强过自己的人”,他不搞“武大郎开店”,不搞窝里斗。这是我用“漏勺”从大部头的“清汤”中捞出来的精华。

不论读中国的典籍也罢,读西方的畅销书也罢,还是毛泽东同志的主张管用,那就是我们还是得遵循“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正确方针。

歧路四,立竿见影与水到渠成。目前不少朋友,包括年轻的朋友和中、壮、老年朋友,有相当一部分人把浮躁的心态带到了读书之中,以为只要熟读“妇女防身 100 招”,就能制服欲行非礼的色狼。(大笑)其实,书,从读到滚瓜烂熟到熟练地应用,还有一个厚积薄发、“无限”积累、长期实践的过程。有的人只看到名家“渠成”的美好结果,没有、或不愿意去看他们“水到”的艰难过程——馅饼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会个个都恰好掉到你的嘴中;馅饼是靠自己从取材到加工,辛辛苦苦,一个一个烘烤出来的。

歧路五,手册性的书的死读与活读。话题至此,自然就会要转移到如何读手册性的工具书了。说手册性的书易读,那是说靠死记硬背就能“熟”,说它不易读,那是说一旦把它读死了,它顶多只能帮你解决 $N = N$ 的问题,一旦碰到 $N = N + 1$ 的问题,就傻眼了!“公关手册”之类的书就有这种特点。比如,“服务用语 50 句”、“服务忌语 50 条”,万一你遇到第 51 种情况,你说:“对不起,我得去翻翻手册!”一看没有,还得临时去请教公关部主任、企业形象策划人员,那就来不及了。比如处理人际关系,可能假设 100 种前提,设计 100 种应对,但是,若碰上此中没有料到的第 101 种前提(情况)呢?我有一个最“低级”、因而也就是最基础的原则,那就是:尽管我不一定总

能做到因为我的存在与活动而给他人带来幸福与快乐;但我一定要做到不因为我的存在与活动而给他人带不幸和痛苦。“登高必自卑”,要想攀登高峰,必须从低处起步。有了这样的“最起码”的思想基础作为起点,从这“最低级”的原则出发,不懈地向高处攀登,我想,达到共产主义崇高的精神境界,就不是一种空想了。

歧路六,人以书名与书以人名。有一种名人,是因为书写得好而出名,如屈原、李白、鲁迅等等,加上他们用自己的社会实践和做人的规范,身体力行地推行自己在书中提出的崇高理想、道德情操和人生追求,赢得了古往今来的广大读者。这种人写的书应该多读、细读,放心大胆但又独立思考地读;另一种人,在别的某一方面,由于某种凑巧的原因成了名,然后想起、或者由经纪人出主意写起书来,这些书里面,不是没有好书,但是它们混杂在与其说是“签名售书”还不如说是“卖书售名”甚至极少数是“卖名售奸”的、某些品位不高甚至俗不堪耐的书之中,那么,我们选取和阅读时,就应该特别细心和小心。有一部分名人好打官司,我陪不起——包括时间和费用都陪不起,所以在此,不愿、也不敢举例,更不点后一种名人之大名。(笑)

歧路七,素材与观点。有些书素材翔实而丰富,但是,我不同意作者的观点,或者已有公众的定论证明其观点是错误的。这样的书仍旧可以读,那么多的材料,不用白不用!我读这种书的办法是,用他的材料为我的观点服务。

比如奥地利著名动物学家、现代行为科学的创始人之一、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金获得者康罗·洛伦兹在他的一部重要著作《攻击与人性》中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低等动物的攻击行为对其生存有利;人类的好战

行为有其先天性的基础。在整本著作和他的思想体系的表述中,充满着对“人类的攻击性是合理的”的暗示。他研究的出发点是回过身来看“人的来龙”,是以社会生物学和存在主义为基础的;而我的观点是:人之所以为人,之所以能从动物中分离出来,恰恰就是在长期共同的劳动中逐步削弱内部自相残杀和加强协调的结果。我既回头看到了“人的来龙”,也看到了人与动物分离的本质;更前瞻了今后“人的去脉”。因此,我总是特别强调:人必须继承动物的某些本能,但人不能只剩下动物的本能。

歧路八,读书的求功名与求自娱。我有一位当处级干部的朋友,他退休时想提半级而未能如愿以偿,十分感慨地与我谈心:“唉,早知道这样,在我升到副科级的时候,就应该细读《资治通鉴》,因为里面有许多为官之道。”我说,你是幸运的。《资治通鉴》确是一部好书,但是,你若是像某些“官”那样,专门在它当中去寻找、吸收当官的“智械机巧”,把一本好书读歪了,说不定爬得越高,摔得越重呢!

读书,我不主张消极的自娱、自乐的自命清高,但一定要把注意力放在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培养高尚情操上。当然,我也决不排斥从书本中学习一些实用的技术和技巧,但我更重视做人、为师、为学、为官、为商的规范和艺术。我希望莘莘学子在读书与做人的领域中,以强大的知识武装头脑,以美好的情趣陶冶性情,以高尚的道德升华人格。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人生的旅程实质上就是一个读别人的书和写自己的书的过程。在我60岁生日的那一天,我想到,假如我能回到妈肚子里“再来一次”,我会怎样做人和读书呢?我以下面的感悟来自勉:

做人:狂放而不虚妄;

得意而不忘形；

同流而不合污；

奉献大于索取。

做学问：博览群书、独立思考；

兼容并包、自成一家。

“悟以往之不鉴，知来者之可追”，当我进入第二个 60 岁的起点时，要想达到上述的追求，我想还来得及。

再仔细想一想，其实，人生下地，只不过是一颗蕴藏着一点生机的种子，在吃饭、读书和实践中不断吸取养分，才有可能成长为参天大树。

所以，最后请允许我送大家一首诗来作为我今天演讲的结束语。这首诗是我 40 岁生日那天，与我的夫人罗声求教授同游岳麓山时，对我过去 40 年人生感悟的写照。我们把她看成是一女、一儿之后的第三个孩子，她的名字叫——

种 子

若不是贪婪的嘴啃干净瓜瓢果肉，

你怎能摆脱甜蜜的困扰；

若不是用污泥把你埋没，

你怎能从腐朽中吸取养料；

若不是常向你劈头盖脑地泼洒脏水，

你怎能出落得如此芬芳、俊俏；

若不是把你逼进岩缝之中，

你怎能磨炼得如此挺拔，咬定青山不动摇。

狂风把你刮上天空，

你却偏偏还要投向大地的怀抱；
暴雨为你洗刷征尘；
雷电为你的出世鸣锣开道。

于是，
你低吟，
你高唱，
你狂欢，
你咆哮！
然后，
你留下一片秀美的森林，
一簇顽强的生命，
一首绿色的赞歌，
一把奋进的号角。

然后，
你又悄悄地踏上征途，
顽强地继续你那生生不已的循环，
再把未开垦的处女地寻找、寻找……

谢谢大家，特别要谢谢张勇传院士自始至终参加今天的
报告会，为我把关！

演讲日期：1999年6月15日，本人供稿

编者絮语 “开有益卷”，这个提法太好了！“开卷有益”，这是古训，恐怕未必适应今天的实际，因为有太多的所谓“知识快餐”，以及出于种种目的拼凑而成的“书”，有的甚至是

“印刷垃圾”。稍不留意,就会步入书山歧路。

小学多读点童话,背点古诗;中学多读点文学名著;大学多读点思想深刻的经典著作。读书也有个阶段性。

隋允康

美国纽约科学院院士 北京工业大学教授

要做到在学习中培养创新能力、提高综合素质,有一个可利用的极好的素材,这就是去重视以往忽略了的知识发生过程;前人的知识发生过程中充分展现了创新能力的发展过程,知识发生的过程中也充分体现了前人综合素质的重要作用。我们如果只是注意知识的结论,那就忽略了凝聚在知识发生过程中极其生动、极其富有启发性的史料。

学习观念的变迁和学会发现知识

——在北京工业大学演讲——

20

世纪末教育领域的大讨论对学习者的重要的启迪有两点:如何通过学习去不断地培育创新能力和不断地升华综合素质?要做到这两点,对于学习的认识就不能简单地同掌握知识相对应,把知识掌握的多少作为比较高低的标准,而是通过对于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的过程,把创新能力增加多少和综合素质提高多少作为评价优劣的目标,也就是说,把学习的观念从学习知识转变为借助于学习知识的手段去学习发展创新能力和学习提高综合素质。在这当中,过

程的具体实施是一个值得悉心探讨的问题。

从根本上讲,就是要弄清楚知识、能力、素质同学习观念之间的关系。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用 K (Knowledge)、 A (Ability) 和 Q (Quality) 分别代表知识、能力和素质。具体从三个方面予以探讨,其一是学习观念的变迁,其二是伴随这一变迁的学会发现知识,其三是如何把握发现知识的学习方法。

一 学习观念的变迁:从 $A = K$, $= K_d / K_s$

和 $A = K$ 到 $A = Q^K$

东汉哲学家王充(公元 27—97 ?)提出的“知为力”实际上表达了第一种学习观念——掌握知识便会提高能力,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公元 1561—1629)的“知识就是力量”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把这一学习观念直接量化,可以得到如下表达式:

$$A = K \quad (1)$$

其中 A 和 K 分别代表能力和知识, $=$ 表达了知识转化为能力的系数。

从总体上看,人类拥有的知识越多,具有的能力则越大;但是从个体上看,虽然能力是知识的增函数,但也有的人知识虽多,能力并不是应有的那么强,也有的人知识虽不那么多,能力却异乎寻常的强。这是因为每个人知识的转换机制不尽相同,体现在转换系数 $=$ 的不一样上。另外,能力也未必是知识的线性函数。

从上述分析看到,知识转化为能力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是,作为信息的知识要转化为作为潜能的能力,有内在的转换机制,值得深入研究;其二是应当进一步研究能力与知识更一般的非线性关系。

按知识去度量能力的大小,可以用能够灵活运用的知识 K_a (a 为 active 的缩写) 占知识总量 K_s (s 为 sum 的缩写) 的百分比来描述:

$$= K_a / K_s \quad (2)$$

称为知识活化率。引入了这个概念,在强调努力学习知识时,应当倡导大力提高知识活化率。用两个指标代替一个指标,有利于出人才、出成果。

“知为力”或者“知识就是力量”表达了第一种学习观念,定量地按式(1)表达线性关系,未能反映人们的千差万别。

按知识从总体上表达能力,似乎无从下手,牛顿第二定律研究动力学的方法给出启迪,我们可以从局部出发去研究总体。先引入 dA/dK , 这是能力对知识的增长率,意思是:学习了一点知识会有多少能力增长的大小度量。观察周围的人们, dA/dK 有高有低,它与现有的知识 K 有关;另外,知识储备相差不大的人们,能力的增长有快有慢,说明 dA/dK 应当与 K^b 有关,而不是简单地同知识成正比,即

$$dA/dK = aK^b \quad (3)$$

其中, $b \geq 0$ 表明知识增长时能力也增长; $-1 < b < 0$ 表明知识增长时能力的增长减慢或停止;一般不可能有 $b < -1$, 因为这表明能力增长同知识成反比。

在 $a > 0$ 和 $b > -1$ 的条件下,对式(3)积分得(初始条件为: $K = 0$ 时, $A = 0$)

$$A = [a/(b+1)] K^{b+1} \quad (4)$$

根据知识活化率的概念,可以记

$$= b+1 \quad (5)$$

因 $b > -1$, 所以 > 0 。多数人属于 $0 < < 1$ 的情况;若 $= 1$, 表明所学知识皆有活性,实在很难;尽管有的人举一

反三能力很强,但从总体上也难以做到 1. 可以把式(4)记为

$$A = K \quad (6)$$

这个式子表达了能力同知识的非线性关系,不仅比线性关系更好地表达了所观察到人们能力同知识关系的千差万别,而且启迪我们在学习中培养创新能力,亦即追求

$$\max \quad (7)$$

这就是使知识活化率极大化。

式(2)、(6)、(7)实际上量化地表达了第二种学习观念——通过猎取知识的手段自觉、主动地发展能力。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透彻地表达了这一观念:“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

从科学史上可以看到屡见不鲜的现象,一些科学家的知识总量相近、创造能力相近,但是最终做出了高低相差悬殊的成果,其原因何在?

尽管我们很难找到完全理想的模型,但是,科学史上不断地记录了具有高层次哲学素养、高屋建瓴的研究方法、十分敏锐的科学美审美情趣的立体型大科学家往往可以做出发聋振聩的开拓性贡献,这是因为素质对于能力有一种放大效应:

$$A = Q^K \quad (8)$$

对于这种放大效应我们将在第三部分做具体阐发。

式(8)表达了 20 世纪末教育领域关于素质讨论带来的第三种学习观念——借助于知识去发展能力和提高素质,素质反转过来放大能力。

第一种学习观念持续了几千年,直至 19 世纪才成熟了第二种学习观念,应当说,第三种学习观念是 20 世纪末的产物。

二 学习方法的变迁:从善于输入知识到学会发现知识

伴随着学习观念的变迁,学习者的学习方法也有一个变迁。

与“掌握知识便会提高能力”的学习观念($A = K$)相对应,自然要崇尚善于向自己的头脑中输入知识的学习方法。“韩信点兵,多多益善”,知识越多,意味着能力越强,只注意知识本身的把握,而不能主动、自觉地考虑如何培养能力的问题。也就是说,善于输入知识的学习方法的注意点放在知识的结论上,学习重点放在理解透前人发现的结论上,强调记忆住前人发现的结论,至于注意产生结论的发现知识过程和考虑如何运用知识去解决问题,并不是这种学习方法的特点。一句话,这种学习方法的注意力集中在理解和记忆上面。

与“通过借助知识的手段主动、自觉地发展能力(包括创造能力)”的学习观念($A = K, K = K_d / K_s$)相对应,学习者要注意激活运用知识的能力,提高知识活化率,用增加知识量和提高知识活化率两个指标来对待学习。也就是说,由第一种学习方法的单纯注意知识的结论方面,转移到兼顾前人究竟怎样发现知识的过程,同时也能够注意如何运用知识解决问题方面,这时就不再停留在理解与记忆知识上,而是进一步发展为归纳、推导和运用知识。总之,这种方法能够通过猎取知识的手段自觉、主动地去发展包括创造能力在内的各种能力。这种学习方法由重视理解与记忆发展为归纳、推导与运用。

与“借助知识发展能力和提高综合素质,素质反转过来放大创新能力”的学习观念($A = Q^K$)相对应,学习者要注意通过猎取知识的手段自觉地发展能力,还要注意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也就是说,除了增加知识量和提高知识活化率两个

指标,还有第三个指标,即升华自己的综合素质。在这里,综合素质的升华是一个更为艰难的问题。19世纪末人们对综合素质的讨论历经了由“外求”转向“内求”的过程,例如:为了提高理工科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开始时想尽办法开文学作品课、音乐欣赏课、美术课等等。实施一段时间,人们逐步认识到:更重要的是在理工科的课程上通过专业 and 基础知识的学习,去发掘更高层次的内涵,对大学生们进行创新素质、人文素质、审美素质、品德素质、心理素质等的熏陶。这种由“外求”回归“内求”的过程对我们改进学习方法的启迪是:要做到在学习中培养创新能力、提高综合素质,有一个可利用的极好的素材,这就是去重视以往忽略了的知识发生过程;前人的知识发生过程中充分展现了创新能力的发展过程,知识发生的过程中也充分体现了前人综合素质的重要作用。我们如果只是注意知识的结论,那就忽略了凝聚在知识发生过程中极其生动、极其富有启发性的史料。后人在学习中,要想开发这笔宝贵的财富,只有效仿前人以开拓者的姿态去学习,才能真正体会到其中的奥妙并获得真谛。相应的学习方法是在第二种学习方法“理解、记忆、归纳、推导、运用”的特点上,补充赋予“模拟、探索、发现”的内涵。请注意,“归纳、推导、运用、模拟、探索、发现”可以概括为“创新”,或者说,它们是对“创新”的具体诠释。可见,只是“归纳、推导、运用”的“创新”是不完整的。

顺便指出,素质对于能力有一种放大效应,创新能力像其他能力一样,必然会因较高的素质而得到放大。

三 如何运用发现知识的学习方法

在学习中模拟前人发现知识的过程,把自己定位于探索者的地位,本着一种探索的姿态去模仿发现知识的过程,用以

代替消极地向头脑输入知识结论的做法。这似乎是在重复知识发生的历史,而意义就在于这种重复性的模仿之中;只有这种模拟,才能较全面地体会到前人在知识发生的过程中的甘苦,同时也会得到诸多方面素质的熏陶,促进能力的增长,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比知识结论多得多的东西,才能有创造力的增强。诚然,这种“过程”比“结论”更受重视的做法必然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相应的学习也必然更为艰苦,然而,出力、费时、艰苦当中自有学会发现知识的乐趣。代替陈腐的“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应当说:“书中自有探索妙,书中自有发现甜,书中自有创新乐”。总之,知识发生的过程比结论更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抓住这一过程才获得了培养创新素质的契机,它好像“授人以渔”的捕鱼术,而结论则是“授人以鱼”的几条鱼。人们早就知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在学习中采用发现知识的学习方法,也可以称为发现法,即以经历知识发现的姿态代替知识的输入,由于前人早已发现和总结了这些知识,客观的创造已成为历史,模拟这一创造的过程,是属于学习者主观上的创造,因此称之为主观创造法。

采用发现性或主观创造法进行学习,并不难具体付诸实施:面对要学习的知识,假定它的结论还没有得到,把注意力首先集中在这一知识将要产生的背景上,试图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然后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把被动地接受一个结论的学习调整为主动地、一步一步产生和获得这一结论的历程。例如:要想运用数学归纳法去证明如下结论 $1^2 + 2^2 + \dots + n^2 = \frac{n(n+1)(2n+1)}{6}$ 一点也不难,可是在学习它时,应当以发

现者的姿态出现,告诫自己:比证明更重要的是怎样知道这一结论,否则就没有可以去证明的对象,如果我回到了这一结论提出的时代,首先要找到结论。有些结论是可以循着归纳的路子总结猜想出来,可是上述这一结论要猜出却是十分困难的。然而,创新之处首先在于得到结论,证明只是使创新的结果合法化。前人有时候并不留下创新的过程,只是把结论留给后人,正如人们批评大数学家高斯是狡猾的狐狸,意思是他是“用尾巴扫去了雪地上留下的足迹”,使后人难以看到他的创新历程。由此可见,以发现法或主观创造法去学习,有些时候也并不那么容易,需要我们去深思,去进行再发掘、再创造,此时猜想或猜测前人进行创新的心智过程就变得十分重要。不妨以上述例子看看如何进行猜想。

设

$$1^2 + 2^2 + \dots + n^2 = S(n) \quad (9)$$

因

$$S(n+1) - S(n) = (n+1)^2 = n^2 + 2n + 1 \quad (10)$$

故 $S(n)$ 应当为 n 的三次多项式, 猜测其形式为

$$S(n) = an(n+b)(n+c) \quad (11)$$

其中 a 、 b 、 c 为待定的系数。于是得

$$\begin{aligned} S(n+1) - S(n) &= a(n+1)(n+1+b)(n+1+c) \\ &\quad - an(n+b)(n+c) \\ &= 3an^2 + na[2(b+c) + c] \\ &\quad + a(bc + b + c + 1) \end{aligned} \quad (12)$$

比较(10)与(12)得

$$\begin{aligned} 3a &= 1 \\ a[2(b+c) + c] &= 2 \\ a(bc + b + c + 1) &= 1 \end{aligned} \quad (13)$$

解得

$$\begin{array}{ll} a = \frac{1}{3} & a = \frac{1}{3} \\ b = \frac{1}{2} & \text{和} \quad b = 1 \\ c = 1 & c = \frac{1}{2} \end{array} \quad (14)$$

将(14)代入(11)得惟一解

$$S(n) = \frac{n(n+1)(2n+1)}{6} \quad (15)$$

我们的这个方法是在发现法或主观创造法启迪下得到的创新途径,本质上是采用了待定系数法。它不仅可以不用数学归纳法就能证明结论,更重要的是找出了得到结论的方法。这一方法有比较广泛的适用性,对于求其他级数和都可以应用。

如果我们能够在学习中,在珍惜知识结论的同时,更加珍惜这一结论的产生过程,那么我们会借助于丰富的知识素材,不停地砥砺磨炼自己的创新锋芒,不仅创造能力得到了培养,在主观创造道路上克服重重困难时,也会不断地升华自己的综合素质。这种学习方式造就出来的人,自然是创新素质强、适合 21 世纪创新要求的人。

21 世纪对学习者的要求,首先是着力培养创新素质,还有更强的自学能力的要求,这一要求除了与学会发现知识的密切相关,还依赖于我们利用计算机在网上进行远程学习。限于时间,这里就不予探讨了。谢谢大家!

演讲日期:2000 年 1 月 8 日,本人供稿

编者絮语 演讲者是力学博士,又雅好文史,有文史方

面的专著、论文出版、发表。这篇演讲用数学的方式来表述关于知识、能力、素质三者的关系,可能更利于理工科的同学的理解。提请大家注意的是,用数学的方式来表达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是一个有趣的尝试。编者的感觉是简洁、明了、逻辑性强。

涂又光

华中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

文明底内容包括人文与科技,文明底区别只在人文而不在科技;前句是说“内容”,后句是说“区别”;内容与区别是两个问题,不可混为一谈。若要再进一层,就必须指出,各个文明内的科技,都是同质的(homogeneous)过程,各处于不同的阶段,故有优劣之分,如氢弹底杀伤力,“优”于弓箭万万。各个文明内的人文,彼此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过程,都有存在底资格,只有异同,不分优劣。虽然不分优劣,其自身演化趋向现代化。

文明本土化与大学

——在华中理工大学演讲——

我

们这个世界,秦朝人早已说是一“家”,西方人近来说是一“村”,正在形成世界文明。文明底起源,就是当初各地土著创造的文化,这些本土文化,为数甚多。在中国,“周武王之东伐,至盟津,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这800诸侯,也就是800个本土文化底代表,若加上没有到会的那就更多。本土文化,通过彼此同化和自身演化,其

数渐减。随着秦汉底统一,以周文化为主的北方文化,以楚文化为主的南方文化,综合成为汉代中国文明。然后印度文明,以佛教为代表,传入中国,历时千年,与中国文明综合成为唐宋东方文明。然后西方文明传入中国,与东方文明综合,形成世界文明,尚正在进行之中。

本土文化底彼此同化和自身演化,其中最主要的区别是被迫还是自愿。被迫同化,例如北美殖民者初期对待土著印第安人,残酷至极,惨无人道。我小时候听老人讲“八月十五杀鞑子”的故事,说鞑子来了要 10 家共用一把菜刀,种种禁令,也很可怕。其实元人、清人入主中国,倒是自愿地汉化了,自然汉化,就属于自身演化了。北美后来设立 indian reservations(印第安人保留区),任其文化自身演化。到了 20 世纪,出现“植物保护区”,“动物保护区”,对植物、动物尚且保护,何况文化?这说明人类终于开窍了,可以不搞强迫同化了,就让本土文化自身演化好了。中国早已有此传统。周朝建国之后,封夏人之后代于杞,还搞他底夏文化;封殷人之后代于宋,还搞他底殷文化,宋人后代出了一个孔子,大放其文化光明。直到清帝退位,民国给予优待条件,待以宾礼,让他在紫禁城内称帝,亦含此意。转眼就是 21 世纪了,世界各地底本土文化,凡能幸存至于今日者,就有可能,从而应该,免于被迫同化,而自行演化,堪称各地底本土文明了。这是形成当今世界文明底大势所趋。

照此看来,当前和今后世界文明底形成,只能是现存各个本土文明底演化,演化出多种特色;不能是现存各个本土文明底同化,同化为一种文明。把世界文明想象成单一的一种文明,至少是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了。在这个内容极其复杂的形成过程中,已经呈现出最基本的形成趋向:就世界文明总体而

言是“现代化”(modernization);就各个本土文明而言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与“本土化”(indigenization)底统一;再总而言之,全球化与本土化都要现代化。

“现代化”一词出自西方,始见于1770年。本文使用此词,却不用西方讲法,而用中国讲法。西方讲法,是指一段历史,自某世纪开始的若干世纪为现代化时期,现代化完成了就进入“后现代”(post-modern)。中国讲法,是指日新,如“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又如“日新其德”,“日新之谓盛德”。中国底文明观,如《周易》所显示的,乃是始于“乾”而终于“未济”;尽管“终日乾乾”,“自强不息”,“日新其德”,依然“未济”,永未完成:所以是天天现代化,永远现代化。所以无所谓“后现代”。所以世界文明现代化这个趋向,不止是长期的,不止是永久的,简直是永恒的。

文明底范围,等于“后野蛮”(post-barbarian)的人类全部生活。人类底演化史,曾经经过野蛮时代,然后进入文明时代。所以文明时代是“后野蛮”。文明时代,仍有野蛮行为,它有大有小,最大的例如德意日法西斯发动世界大战,还有不是同类性质的例如中国大陆底“十年浩劫”,均未能使历史倒退到野蛮时代,结果还是文明战胜野蛮。我亲自经历这两场大难,养成对人类历史的乐观主义,服膺《老子》“柔弱胜刚强”底真理。人类全部生活,固然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仍可大致分为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等三个领域。物质生活领域实行全球化,精神生活领域实行本土化。社会生活领域,又可分为国内、国际两部分,国内部分实行本土化,国际部分实行全球化。社会生活领域分为国内、国际两部分,有可能分吗?例如人权,是国内社会生活,还是国际社会生活?争论总是有的,有争论是自然的,也是可以解决的,其根据就是国际法这

门学问。这种区分甚至可以采取法律形式,还能说不可能分吗?总起来说,在物质生活和国际社会生活领域实行全球化,在精神生活和国内社会生活领域实行本土化。什么叫全球化?什么叫本土化?全球化就是实行全球通用的“游戏规则”(game rule),本土化就是实行本土通行的游戏规则。game 在西方是万分严肃的活动,古希腊奥运会届数甚至有古希腊历史纪元底意义。而“游戏”在中国人心中总不及 game 在西方人心目中的严肃。game rule 若译为“比赛规则”又太仄了,若译为“活动规则”又太宽了,还是采用已经通行的译法吧,只是附带说明一下如上。

物质生活领域底全球化,不用说。国际社会生活,例如参加 UN(联合国),进入 WTO(世贸组织),与 IMF(国际货币基金会)交往,不实行全球化,不实行全球通用的游戏规则,能行吗?

这里谈一下物质生活与国际社会生活领域底全球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例如度量衡制度。只说“衡”吧,我小时候家乡的“平秤”十六两一斤,“大秤”十八两一斤,小学算术光为这些“斤求两,两求斤”的换算而应付不暇。后来改用“公制”:主单位为米、升、公斤,一律十进,人们如释重负。试问公制哪里来的?来自法国,本是法国本土文化。又如“公元”,全球通用,本是以色列本土文化。又如阿拉伯数字,全球通用,本是阿拉伯本土文化。不过阿拉伯数字,一说源出印度,据罗素考证,大约在 830 年,一位从梵文翻译数学和天文学著作的穆斯林学者,出了一部名为《印度记数法》的书,此书在 12 世纪译成拉丁文,西方最初是从此书拉丁文本学到现名“阿拉伯”数字的,它其实应该称之为“印度”数字。可以说,一切全球化的规则,寻其出身,都是直接或间接来自某一本土文化。反过

来说,一切本土文化,都可能为全球化规则作贡献。甚至可以说,文明本土化才有东西为文明全球化作贡献。

至于全球化、本土化、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底历史经验中举例体会。在中国进行革命,属于国内社会生活领域,应将马列普遍原理中国化即本土化,王明、博古却在此领域搞照搬外国作法的马列全球化,造成失败;毛泽东起来搞马列本土化,获得成功。中华人民共和国底经济建设,毛泽东继续搞本土化,发动大跃进,用心良苦,只是违背了现代化,故大跃进失败。大跃进期间大办钢铁,我在湖北荆门仙居乡参加,当时大办“小土群”(小型,土法,群众运动),批判“大洋专”(大型,洋法,专家路线),重点是批“洋”,说群众“望洋兴叹”,其实那个“洋”正是现代科学技术,批洋等于批现代化。由此可以领会,在国内社会生活领域,全球化必须本土化,本土化必须现代化。(至于物质生活和国际社会生活领域底全球化必须现代化,就不用说了。)

就文明底内容而言,它包括人文与科技。若就文明底区分而言,则区分各个文明(如中国文明、基督文明、伊斯兰文明等等)的标志只在人文,不在科技。再说一遍,文明底内容包括人文与科技,文明底区别只在人文而不在科技;前句是说“内容”,后句是说“区别”;内容与区别是两个问题,不可混为一谈。若要再进一层,就必须指出,各个文明内的科技,都是同质的(homogeneous)过程,各处于不同的阶段,故有优劣之分,如氢弹底杀伤力,“优”于弓箭万万。各个文明内的人文,彼此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过程,都有存在底资格,只有异同,不分优劣。虽然不分优劣,其自身演化趋向现代化。

如此看来,各个文明底特色只在人文。各个文明在科技上当然也有差异,此差异充其量不过是同质过程不同阶段底

差异。各个文明在人文上的差异,则是异质过程底差异,因而成为各个文明底特色。

将这个论点,当作一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弄清楚一些原则问题。比方说,在武昌办一所科技大学,努力赶上并超过美国 MIT(麻省理工学院)。这种雄心壮志,值得赞许。但是,如果(我是说如果)忽略了中国人文这个中国文明底特色,即使赶上并超过 MIT,其文明史底地位和意义,也不过是美国 MIT 底武昌分校,如此而已。因为它虽然是中国文明底一个组成部分,也许是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忽视中国人文,也就没有中国文明底特色,而没有中国文明特色的大学,只算是“在”中国的大学(*a university in China*),不算是中国“底”大学(*a university of China*)。换言之,只算是办美国大学底分校,不算是办中国底大学。仿此可以说,王明、博古只算是“在”中国干革命(*made a revolution in China*),毛泽东才是干中国“底”革命(*made the revolution of China*)。

就存在而言,人文与科技,是一个背包底内容,不是一副担子底两头。中国底文明,自上古直到 19 世纪末为人文阶段,20 世纪为科技阶段,这两个阶段都各自同时存在人文与科技,但是都把二者当作一副担子底两头,从而出现谁重谁轻底问题:在人文阶段重人文轻科技,在科技阶段重科技轻人文。现在正在迈入人文与科技统一的新阶段,才懂得把二者打在一个背包里,消除了谁重谁轻底问题。

美国密西根大学有一位退休的老先生 John S. Brubacher,快 80 岁时还在修订他底名著 *On 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论高等教育哲学》),此书末章题为 *The university as a church*(《大学亦教堂》),其中说,科学底发现一旦用于满足人底需要,实现人底希望,就成了人文。科学变人文,这是

光辉的辩证思维,我很敬佩。看来人文与科技底统一,成为世界文明底趋向,无可怀疑。

大学底发展可能突破大学形式。美国已有人因此提出,将 university 改为 multiversity,后者无法翻译为中文,只能从 uni—是“一”、multi—是“多”去想象,现有的译法皆不妥。这倒很有点生产力突破生产关系的意味。其实,university 可以突破,multiversity 又何尝不可以突破?突破再突破,就达到《老子》底“大象无形”(第四十一章),康德式的 formlessness。即便如此,也只是大学不见了,高等教育仍然存在。在哪里?下文就讨论这个定位问题。

好在我们还未到突破大学的时候,还是谈大学定位吧。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大学应有的地位,一个是大学现有的地位,这两个方面往往“错位”。识别是否错位,只能看实际、看行动,不能看理论、看口头:这是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方法¹,我至今奉为方法论。在社会生活底政治、经济、文化三部分中,大学应在哪个部分?这还用问!当然在文化这个部分。理论上、口头上谁都这么说。实际上、行动上则不尽然。实际上,行动上,在阶级斗争为纲底年月,大学定位在政治之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时期,有些人转而将大学定位于经济之中;只有极少数教育家相机坚持大学定位于文化之中,英勇灵活,且战且走,艰难前进。众所周知:社会生活底政治、经济、文化三部分是一个整体,其间关系密切,虽然如此,还是三个部分,各有不同的矛盾特殊性,本文称之为“原子”。政治底原子是“力”(power),经济底原子是“利”(profit),文化底原子是“理”(truth)。力、利、理底汉语拼音都是 li,此说可简称“三 li 说”。原子不宜单独存在,那种游离状态,极不稳定,三 li 皆然。三 li 原子合成分子,其

存在就稳定了。政治单位底分子含有三 li,但以“力”为中心,而“利”理”为“力”服务。经济单位底分子也含有三 li,但以“利”为中心,而“力”理”为“利”服务。文化单位底分子也含有三 li,但以“理”为中心,而“力”利”为“理”服务。大学应有的地位在文化之中,所含的三 li,以“理”为中心,而“力”利”为“理”服务,若不如此,便是错位。有道君子,以为然否?

秦朝博士叔孙通说“天下合为一家”,见《史记》本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 2720 页),《汉书》本传此语作“天下为一家”(中华书局标点本第 2124 页)。

常说 global village,意为“地球村”。

见《史记·殷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第 108 页)。

详见胡适《说儒》(1934 年 5 月作)。

据 Webster's Ni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韦氏第九版新大学词典》)。

见《礼记·大学》。

见《周易·大畜·象》。

见《周易·系辞下》。

详见 B. Russell: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Book Two, chapter X, page 423, Simon and Schuster 公司版。

此处涉及科技有无民族性。本文认为,现代科技已无民族性,而原始科技则有民族性,所以人类学有 ethnoscience(民族科学)之说。

- 1 见《毛泽东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2 版,第 856 页。

演讲日期:1998 年 11 月 18 日,华中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供稿,本人审校

编者絮语 这篇文稿最初是在华中理工大学人文讲座上作的演讲,后又发表在《高等教育研究》和《中国哲学史研究》上。此次收入本书,作者又作了修改。演讲者早年师从冯友兰先生,曾协助冯先生整理出版冯先生的文集。他的演讲、授课,常常是中、英文互为映照(不同的语言在表情达意上会各有所长),融义理、考据、文字于一体,一派大家气象。

吴同瑞

北京大学教授 副教务长

科学精神就是追求真理的精神,广义上看,也可归结为人文精神。科学精神求真,人文精神求善、求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也就是真、善、美的统一。

人文精神的底蕴就是以人为本,重视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尊重人的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创新精神,关怀人生的目的、意义和价值,追求人格的完美。

继承与超越

——北大如何形成有特色的文化品位

——在北京大学演讲——

北大的一位学者在关于“盛唐气象”的学术报告中讲了这样一段话:“一个伟大时代有气象,一个杰出人物有气象,一所特色鲜明的学校也有某种气象。当你走进北大西校门,面对民族形式的、庄严典雅的楼群,湖光塔影、风景如画的校园,特别是教学活动区域那种生动活泼、浓厚浓烈的学术氛围,你就会强烈地感受到这种气象。”(见本书所收袁行霈在北大演讲:“盛唐气象与盛唐时代”——编者)这席话得

到听众的广泛认同,因而引起一阵热烈掌声。这里,“气象”一词含有崇高评价的意思,意指某种特有的令人肃然起敬的整体风貌、气质、境界或品位。它是外在与内在、有形与无形、物质与精神、环境与氛围、传统与现实的有机统一。我这次演讲,就是试图从文化素质教育的角度,探讨“北大气象”的内涵及其形成原因与条件。

北大百年校史是一部不断革新进步的历史。蔡元培先生出任北大校长后,以一位杰出教育家的远见卓识,提出了一整套科学的教育理念,并且身体力行,积极推动北大的教育改革,开创了北大的许多优良传统。在进行文化素质教育方面,下列几点应予充分重视和肯定:

一 重视人文教育

北大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以中文、历史、哲学为代表的人文学科是北大传统的优势学科,大师级的人才辈出,学术性的硕果累累。他们不仅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文学者,而且对全校的人文教育作出了独特贡献。例如,在蔡元培校长的倡导下,“五四”时期的北大理科各系,就把国文作为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程。到了西南联大时期,由中文系开设的“大一国文”,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全校性必修课之一。这门课包括“范文阅读”与“作文”两个部分。“范文阅读”由教授轮流主讲。朱自清、杨振声、沈从文、王力、陈梦家、闻一多、罗常培、浦江清、罗庸等著名学者和作家,都教过这门课。而西南联大所培养的许多第一流人才,也都在不同程度上通过这门课,接受了中国优秀文学与文化传统的教育与熏陶。许多当事人的回忆文章,生动有力地揭示了这一事实。西南联大毕业生像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李政道以及被

誉为中国原子弹、氢弹之父的邓稼先等杰出科学家,都在大学阶段具备了很深的文学和文化修养。

艺术学科是人文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提倡美育,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重要特色。他从培育“健全的人格”的高度,把美育和德育、智育、体育并称为“四育”,并认为这“四育”可以相互渗透、相互促进。他说:“常常看见专治科学、不兼涉美术的人,难免有萧索无聊的状态。”这些人“不但对于自己毫无生趣,对于社会毫无爱情;就是对于自己所治的科学,也不过‘依样画葫芦’,决没有创造精神”。而“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盖以美为普遍性,决无人我差别之见能参与其中”。由此,他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著名号召,在一系列有关论著中,蔡元培明确阐述了美育对于德育、智育的促进作用,揭示了美育对于破除迷信盲从、发展科学民主的深远意义。没有美育的教育不但是不完全的教育,而且会成为畸形的教育。这种教育不可能激发“创造精神”,不可能养成“健全的人格”。为了贯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在蔡元培校长的倡导下,北大开设了《美学》和《美术史》课程。他曾亲自担任主讲教师,并编著《美学通论》一书。此外,他还发起成立并直接领导了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等学术组织,除进行艺术教学和研究外,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艺术创作、表演和鉴赏活动,极大地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很显然,北大一贯重视艺术教育和群众文化艺术活动的优良传统是由蔡元培校长开创的。

二 提倡“融通文理”

蔡元培校长认为,大学必须“偏重文、理两科”,不设文、理

科的学校只能称之为“专科”。学科比较齐全的综合大学,汇集了众多专家学者和优秀文化,自然会有较高的文化品位。北大正是一所以文理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依据科学发展的趋势和人才培养的规律,蔡校长明确反对重理轻文或重文轻理,而主张文理并重、文理沟通、文理结合。他说:“文科的哲学,必植根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现在用试验法,应列入理科;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试验法,有同一趋势。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属理科。历史学自有史以来属文科,而推源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他在许多场合告诫师生要破除“专己守残之陋见”,指出:“治文学者,恒蔑视科学,而不知近世文学,全以科学为基础;治一国文学者,恒不肯兼涉他国,不知文学之进步,亦有资于比较;治自然科学者,局守一门,而不肯稍涉哲学,而不知哲学即科学之归宿,其中如自然哲学一部,尤为科学家所需要;治哲学者,以能读古书为足用,不耐烦于科学之实验,而不知哲学之基础不外科学,即最超然之玄学,亦不能与科学全无关系。”针对这种狭隘的眼光,蔡校长主张文科学生应学习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理科学生也应学习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知识。他希望造就文理兼通、中外兼通、古今兼通的学识渊博的人才。这当然是很高的甚至难以企及的要求。现代知识爆炸式地发展,学科分化层出不穷,很难再出现过去时代那样百科全书式的“巨人学者”。但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仍应努力突破学科分化带来的局限,尽可能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具备较高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成为学识、能力、素质全面发展的人才。更为重要的是,文理融通与文理结合,实质上是要求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交融与结合。人文精神与科学

精神都依赖于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两者具有内在同一性。科学精神就是追求真理的精神,广义上看,也可归结为人文精神。科学精神求真,人文精神求善、求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也就是真、善、美的统一。中国古代典籍《周易·贲卦·彖辞》中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段经典论述就含有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相统一的朴素认识。在我国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的科学精神可惜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而“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人文精神则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强烈的人文精神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鲜明特色。“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北京大学一贯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自觉地张扬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传承民族文化优良传统。这正是“北大气象”的精义所在,也是北大精神魅力的不竭源泉。

三 注重发展个性

针对旧教育专制的、盲从的、压抑个性的严重弊端,蔡元培校长大力推进北大的教育改革。他在题为《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的演讲中指出:“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从这一教育理念出发,他在北大废除了年级制,而采用选科制,旨在打破因循守旧、强求一律的教育体制,充分发展学生的个性。如此教育观念和改革举措,对于培养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注重因材施教,不搞统一模式;崇尚个性自然发展,激活受教育者的思维力、想象力、意志力、创造力,反对扼杀学生的兴趣、特长等精神自由和创造潜能,正是文化素质教育的必然要求,也是人文精神的生动体现。人文精神的底蕴就是以人为本,

重视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尊重人的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创新精神,关怀人生的目的、意义和价值,追求人格的完美。这一切又以尊崇个性的全面发展为前提。人有社会性,也有个性。社会性蕴含于个性之中。人的个性千差万别,具有无限多样性、丰富性。“千人一面”、“干部一腔”的文学作品令人厌恶,一成不变、刻板划一的教育模式窒息人的聪明才智;而因材施教、发展个性就意味着鼓励多样性和创造性,就意味着最大限度地激发受教育者的生机与活力。幸运的是,蔡校长所倡导的教育理念和教育事业,在尔后一代又一代北大人的感悟和实践中得到体认和承传,成为他们的自觉追求,并逐步形成影响深刻、特色鲜明的校风和学风。它使相对古老的北大永葆青春活力,从而在世人心目中始终享有盛誉,成为众多学子所向往的著名高等学府。

光阴荏苒,斗转星移,北京大学经历了曲折发展的道路,但重视素质教育、特别是文化素质教育的传统从未中断。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实行院系调整,北大的文、理基础学科得到进一步加强,尤其是文、史、哲各系,几乎聚集了当时全国所有最著名的学者,形成大师云集、群星灿烂的辉煌局面,这为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当然,院系调整后专业划分过细过窄,社会上重工轻理、重理轻文的现象逐渐滋生,这又对文化素质教育带来了消极影响。

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以来,北大在继承优良办学传统的基础上,响应时代的呼唤,发扬优势,开拓前进,更加自觉地贯彻素质教育的宗旨,不断深化教学改革,加强文化素质教育。1986年,北大成立了艺术教研室(1997年成立艺术学系),开设面向全校的艺术教育选修课,指导学生艺术社团的课外活动。1988年,北大率先提出了“加强基础,淡化专业,

因材施教,分流培养”的教改方针,旨在加强综合素质教育,不拘一格培养人才。1992年,北大成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发挥人文学科师资力量雄厚的优势,统筹开展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普及工作,制作电视系列片《中华文化讲座》与《中华文明之光》,编辑出版《国学研究》、《国学研究丛刊》及《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丛书》,举办“中国传统文化系列讲座”,召开“汉学研究国际会议”,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影响,受到国家领导人的肯定。1995年,在国家教委的组织、推动下,北大成为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试点高校之一。为此,校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北京大学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意见》,提出了进一步加强文化素质教育的构想。经过多年的努力,北大的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成为北大办学特色的显著标志之一,因而于1997年获得“第三届全国优秀教育成果国家级二等奖”。1998年,北大隆重庆祝百年华诞,在展示全面素质教育、特别是文化素质教育成绩的同时,又通过校园、校舍的修整建设等措施,为今后开展文化素质教育创造了更好的环境和条件。今年,北大制定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规划,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和校园文化建设是其中的重要内容。1999年1月,教育部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中理工大学等32个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同年6月,党中央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制定了在各级各类学校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的方针。在时代精神的鼓舞下,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北大的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既继承了传统,又超越了传统,这表现在认识和实践两个方面:

(一)不断提高加强文化素质教育的自觉性,树立全员素质教育意识。

1999年1月,江泽民总书记在视察内蒙古大学时指出:“文化素质教育很重要,应当好好抓,理科的学生要加强学习人文方面的知识,文科的学生要加强学习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这一指示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和时代意义。当今时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际间的竞争日益激烈。未来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竞争实际上就是人才素质的竞争。高等学校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摇篮。大学生的基本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其中文化素质是基础。加强文化素质教育,重点指人文素质教育,也包括对文科学生加强自然科学的教育,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主要包括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如果说,加强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依赖于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那么,增强民族凝聚力则依赖于国民素质、特别是人文素质的提高。团结统一的信念,爱国主义的情感,自强不息的精神,厚德载物的胸怀,公而忘私的品质,艰苦奋斗的作风,都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精神源泉。由此可见,加强文化素质教育,是振兴中华历史使命和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大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需要。

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又是深化教育改革的迫切需要。当前高等教育普遍存在的倾向是:重智育、轻德育;重书本、轻实际;重科技、轻人文。国内外许多有识之士强烈要求大力改革现行教育,从根本上改变文化生态失衡的状况。把加强文化素质教育作为深化教育改革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既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又符合高等教育发展的普遍趋势,有助于推动教育观念的转变与更新。在为纪念北大百年校庆而举办的世界著名大学校长论坛上,李岚清副总理指出:“分科教育不应该使

某些学生精于古典而疏于现代,也不等于使某些学生精于科学而荒于人文。关键是通过各种渠道,使不同部分之间发生联系,在相融、共处和合作中相得益彰。大学在整合传统与现实、历史与未来、科学与人文、理论与经验、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将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北大校长陈佳洱院士也认为:“大学教育必须避免偏重学术而疏于品德。一定要十分注重培养学生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建立对祖国、对人民以至全人类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大学应充分利用多种先进手段更好地向学生传授本国和世界各民族的思想、文化和艺术精粹,着力提高他们的人文素养。”大学需要注意发挥学生的个性,实行‘因材施教’,还必须对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不断进行改革,使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理论与实践、教学与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学生具有合理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具有宽广的视野和深厚的学术功底。”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需要告诉人们:“科技”与“人文”、“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应当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北大提出,要树立全员素质教育意识,使加强素质教育、特别是文化素质教育的观念在北大全体师生员工中深入人心,努力做到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和自觉成才。这就要求教学工作、管理工作、服务工作以及环境整治工作都能体现出北大所固有的较高的文化品位,同时也要求受教育者自觉接受这种文化品位的熏陶,从而得以健康成长。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北大成立了综合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由学校党、政第一把手任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下设思想道德素质教育、科学文化素质教育、体育、艺术教育四个分会,加强领导,协调配合,全面推进北大的综合素质教育。

(二)全方位、多层次地开展文化素质教育,营造浓厚的校

园文化氛围。

文化素质教育是综合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必然要求,应贯穿于学校教育的全方位、全过程,而不需要外加任务、另搞一套。北大正是在努力实现教育的整体优化中加强文化素质教育的。

1.按照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目标的要求制订教学计划,使学生获得合理的知识结构。1990年,北大在对毕业生进行较大规模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修订了本科教学计划,在全国率先规定文科学生必须至少选修一门理科课程,理科学生必须至少选修一门文科课程,全校学生都必须至少选修一门艺术课程,以提高学生的科学素质、文化品位和艺术修养。这种做法一直得到坚持。近年来,根据陈佳洱校长的提议,中文系为理科一年级学生开设“大学语文”课程,聘请资深教授担任试点课的主讲教师。他们全身心投入,精心设计,精心讲授,重在培养学生对典范作品的鉴赏、感悟能力,使“五四”时期、西南联大时期由著名教授开设“大学语文”课的好传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通过教学实践的经验积累和不断改进提高,“大一语文”将会和“英语”、“计算机”一样,成为受全校学生欢迎的一门普修课。除开设必要的“素质教育课”以外,北大要求所有基础课和专业课都应渗透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要求所有教师都应自觉地为人师表、教书育人。许多德高望重的老教师在这方面起了很好的传帮带作用。这些蜚声中外的杰出学者无不注重“为学”与“为人”的统一,被人们誉为“道德文章,堪称楷模”。他们的人格魅力对青年后学有极大的感召力,在他们身上体现了北大有特色文化品位的最高境界。

2.开设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北大的第二课堂,从内容到形式均绚丽多彩,深受广大同学的欢迎,并强烈地吸引他们

参与其中,不知不觉地受到感染和熏陶,从而提高了文化素养。这是北大校园文化的一大特色,也是北大文化品位的生动体现。例如,开展学术讲座。北大校园内几乎每天都有精彩的学术讲座,各院、系争相组织,全校学生自由选听。近年来,学校组织了四大系列讲座:“中华文明之光系列讲座”、“自然科学前沿系列讲座”、“艺术教育精品系列讲座”、“当前社会热点问题系列讲座”,都受到了同学们的热烈欢迎。专题讲座内容集中、精粹,便于组织,更可使广大同学直接聆听学术大师们的教诲,与大师对话,真正达到了“听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的效果。被北大学子们称为“聆听大师”的高水平讲座,那种气氛极其热烈、师生亲切交流的场面实在让人感动。又如,开设“名著名篇导读”。选取古今中外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著作或篇章,聘请学术造诣深、讲课效果好的教师,做提纲挈领、画龙点睛式的讲解,意在引导学生阅读与钻研原著、原篇。这样的导读课由于听众太多,课堂不得不设在礼堂,听课者近千人。为了指导学生课外阅读,北大在1988年就编印了《大学生导读手册》,后来又陆续编写了《文化精品选粹》、《优秀文艺作品推荐目录》,并以推荐的优秀文学作品和艺术节目为重点内容,有计划地组织演出、评论、展览、读书会、笔谈会等等。此外,还有体育竞赛等文化活动。北大的同学普遍认为,他们从第二课堂所受的教益,甚至超过了第一课堂。

3. 组织学生社团活动。组织学生社团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北大的一个优良传统,有利于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发挥学生的特长和爱好,展示学子们多姿多彩的个性。由于名牌效应,北大生源充足,可以好中选优,学生文化基础较好,综合素质较高,富于首创精神。因此,

北大学生社团十分活跃,现有社团逾百,号称“百团大战”。社团分为理论类、实践类、文艺类、体育类等多种。如社会知名度很高的邓小平理论与实践研究会、爱心社、山鹰社、五四文学社、北大学生合唱团等,都开展了有意义、有水平的学术、文化和社会活动,体现了北大学子的创新精神和文化品位,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这些社团成了学生陶冶情操、磨炼意志、砥砺品格的最好的学校,也为“北大气象”增添了光彩。例如,山鹰社的建团宗旨是“存鹰之心于高远,取鹰之志而凌云,习鹰之性以涉险,融鹰之神在山巅。”去年(1998)4月,为向母校百年华诞献礼,北大学生在“山鹰精神”的激励下,成功登上海拔8201米的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峰,成为首支登上8000米以上高峰的国内大学生登山队。1997年,北大学生合唱团参加西班牙“第43届哈巴涅拉与复调音乐国际合唱节”比赛荣获第一名,1999年参加全国大学生艺术节合唱比赛又获一等奖。有的学生举办了校内个人演唱会,或灌制了个人录音带。今年(1999年)举办的首届中国服饰艺术表演大赛上,获得“中国十佳超级男模”第一名的竟然是北大法律系的一名研究生,他以“形体美和精神美的和谐统一”征服了观众和评委。这些事例生动地反映了北大文化素质教育的成果。

4.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青年学生提出了四点殷切的希望,其一就是“希望你们坚持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这是青年学生健康成长的必由之路。北大采取课内外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学生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如社会调查、参观访问、社会服务等。特别是利用假期,组织学生到边远地区进行调查研究、知识传播、科技扶贫、社会工作,在条件艰苦的地方经受锻炼、贡献智慧,并在

实践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5.美化校园环境。北大现在的校园——燕园,曾是晚清的一座皇家园林,山青水秀,景色迷人,还有许多历史文化名人的遗迹和周围名园的遗物。燕大、北大在这里建校后,又陆续形成了不少革命历史遗迹和人文景观。这些都是进行文化素质教育的生动教材。为了更好地开发利用这种得天独厚的宝贵资源,北大通过专家审议遴选了一批校园文化景点,包括北大革命历史纪念碑、勺园、蔡元培像、李大钊像、未名湖北石屏、斯诺墓、未名湖石舫、抗日活动联络处、“三·一八”烈士碑、钟亭、智慧之树、博雅塔、华表、梅石碑、临湖轩、塞万提斯像、葛利普墓、北大星等,以及校园内的名木、名石,都一一立牌予以介绍,并结合专家讲解拍成电视片,作为提高文化素养的活的教材。北大还通过百年校庆,加强了文化素质教育的硬件建设。如在李岚清副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建成了规模宏大、堪称一流的北大百年纪念讲堂,这里将成为高雅艺术表演和欣赏的殿堂;在新建的亚洲高等学校最大的图书馆内,建设了一座设备先进、功能齐全的音乐教室。时至今日,北大校园已不可能是与世隔绝的象牙之塔。一所名校应当充分关注周边环境的整治,发挥导向作用和辐射作用,提高社会环境的文化层次。因此,北大师生积极参与中关村高科技园区的规划设计,以使中关村地区建设成为能与高科技相称的高文化品位的新兴科学园区。所有这一切,都有利于美化与优化校园环境,营造健康、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使北大校园的自然之美和人文之美得以高度和谐统一,在这里养育出一代又一代高素质的栋梁之才。

(文中引用的蔡元培校长的言论大多转引自梁柱教授所

著《蔡元培与北京大学》一书,特此说明。)

《美术与科学的关系》,《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2月23日。

《以美育代宗教说》,《新青年》第三卷,第6号。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东方杂志》第31卷第1号。

《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第1号。

《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5月31日。

《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三卷,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36页。

《21世纪的大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1页。

《科教兴国动员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北京大学教务处推荐,本人审校

编者絮语 提高大学的文化品位与格调,是加强文化素质教育的任务之一。北京大学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近年来在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方面又有许多新的举措。这篇演讲展示了北大的文化品位与格调,值得借鉴。

吴硕贤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教授

有些人很有学问,但缺少见识。这种人往往不会大有作为。有大贡献大成就的人,往往是通常所说的有识之士。“识”往往比学问更重要。学习文史哲对于“识”的形成很重要,因为要广见识,就要广泛地吸取前人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识”就是正确地决策,就是计谋。

理纬文经织锦成

——谈科技与文艺

——在华南理工大学演讲——

1 1984年,我在清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时,曾写下一首七律《获博士学位有感》:“荣膺博士慰平生,瀚海扬帆又一程。书到用时方恨少,学臻佳境益求精。边缘领域拓荒始,理纬文经织锦成。制度于今初设立,长空伫看众星明。”其中“理纬文经织锦成”一句是我治学的体会,即必须以理工科的学识为纬线,以人文学科的素养为经线,方能织出学术研究之锦。

科技与文艺同是人类文明的成果,是构成人类文化的两个重要方面。在古代,科技与文艺是不可分的。在古希腊神

话中,缪斯是主管科学和文化之神。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写过著名的《建筑十书》。他认为建筑师必须“擅长文笔,熟悉制图,精通几何学,深悉各种历史,勤听哲学,理解音乐,了解医学知识,通晓法学家的论述,具有天文学或天体理论的知识”。古罗马另一大学者波伊提乌提出以四艺为教育科目:即算术、音乐、几何与天文学。后来西方在中世纪又加进语法、修辞、逻辑三学科构成七艺。我国古代大教育家孔子以六艺教授弟子,即“礼、乐、射、御、书、数”,也是兼习科学与文艺。中国许多文化典籍,如“四书五经”、《史记》、《汉书》等,不仅是文史书籍,同时也包含有科技文献,记录了天文、地理、历法、气象、乐律等多科知识。例如《易经》,可说是人类最早的关于宇宙观和事物变化规律研究的知识总汇。中国历史上许多文化名人,同时也是杰出的科学家。如屈原在《天问》中就提出160多个问题,涵盖天文、地理和宇宙论;老子的《道德经》,是关于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著作,充满辩证法的思想,并有关于原子论的天才猜测;庄子的著作也富于科学幻想,具有相对论、辩证法的思想成分。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其著作也包括了宇宙观、天文、数学等自然科学理论。东汉的张衡,既是杰出的科学家,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用水力转动的浑天仪,以及候风仪、地动仪,写下了天文学名著《灵宪》,首次正确地解释了月食的成因,同时他又是杰出的文学家。他的诗作《同声歌》、《四怨诗》等,对五言诗的形成起过重要的作用。他还留下了《二京赋》、《归田赋》等汉赋13篇。北魏的地理水文学家酈道元所著的《水经注》,以及北宋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等,既是科学巨著,又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可以说,历史上科学知识的流传、积累和普及,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些学者很高的文学修养。

类似的情况也可见于外国的学者。如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既是画家、雕塑家,又是建筑师、机械工程师。他研究过人体解剖学、地球物理学、气象学、植物学和水文学,测绘过城市地形图,是近代制图学的奠基者。美国政治家富兰克林,也是进行过著名的雷电实验的科学家。他发明了避雷针。他的文笔很好,参与起草了著名的《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

只是到了后来,学科划分越来越细,形成了隔行如隔山的状况,造成了许多人的偏科现象,特别是科技与文艺的隔离,出现了如梁思成先生所批评的那种“半个人的时代”。

今天我们再次强调科技与文艺的结合和一体化,强调理工科学生应具备人文社会科学的素养。文科的学生,也应具备科技知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当今科技与文艺的发展,又重新强调学科的交叉、渗透与融合。科技与文艺的交流与融合的趋势又重新得到加强。正如李政道先生所预言的那样,²¹世纪将会出现二者会合的顶峰。

从历史上看,科学技术一直对文艺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日本著名电影理论家岩崎昶说过:“艺术不是单纯地从几万年前堆在某处的两块石头上的壁画开始而发展到今天这样规模的,它所以能逐渐扩大其领域,成为巨大的力量,首先是因为它能够最勇敢、最迅速地接受和利用每一时代最发达的机械(技术)。换句话说,艺术就是直接产生于一切时代,一切社会的生产技术这一基础上的。”例如摄影技术的发明,就使绘画艺术的风格和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电影、电视的发明,更促使电影艺术、电视剧艺术等新的艺术门类的产生和发展。今天科技与文艺的结合更加密切,出现了许多边缘学科和交叉领域。如好莱坞的电影艺术就离不开声光电等模拟制作技术和仿真技术,离不开三维动画、虚拟现实等高新科技。电子

技术的发展,促使了电子音乐的产生。目前,随着 MIDI(乐器数字接口)的发明,更开创了计算机音乐的新时代。一人一套设备就可以成立音乐工作室,利用各种音源、合成器、计算机、打印机,可以创作各种音乐,可以产生任意频率的声音。传统的乐器由于是靠弦、膜或管柱空气的振动而发音的,因此只能产生线状频谱。现在的音乐,可以模仿自然界任何声音,甚至产生闻所未闻的声音,由此正在引起音乐理论、音乐创作和音乐欣赏的深刻变革。此外,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信息高速公路等高新技术,无不对文艺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出现了诸如计算机美术、家庭影院、网络音乐等许多新生事物。

此外我们还应看到,过去人类的科学研究着重于对客观外界的探索。对人类自身的了解还很欠缺。21 世纪科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就是加强对人类自身奥秘的探求,真正体现科学技术的以人为本。这就涉及对人类视觉、听觉等心理、生理现象的研究。我本人是搞建筑声学的,从声学学科来讲,今后将更加注重生理声学、心理声学、听觉机理及音质评价等方面的研究。由于人具有双重属性,既是作为客观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又是作为社会学意义上的人。因此对人类自身研究必然涉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个层面。总之,无论你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也好,还是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好,彼此都需要有共同的语言,需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需要文理沟通,需要广博的知识结构。

另一方面,人文社会科学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有巨大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指导或决定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道路以及应用前景和后果。我们知道,哲学是科学的基础,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指导。过去科

学技术的发展,有一个方向性的错误,就是在与自然的关系上没处理好,造成资源的破坏、浪费和环境的污染与恶化。今天我们提出可持续性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方略,就是要修补与纠正这种偏差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如果我们能早些从东方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上汲取智慧的话,人类的发展本来会更健康,少走些弯路。科学技术常常表现为双刃剑,既可造福人类,也可对人类造成巨大的伤害;既可以是第一生产力,弄得不好,也可能成为第一破坏力。这就有赖于我们发展出正确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来指导与规范科技的发展。

过去流传一种看法,认为科学思维侧重于逻辑思维,艺术思维侧重于形象思维,过于强调二者的区别。我不很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二者虽然有些区别,但相同的成分更大。例如二者都强调创新,重在有所发现;都需要敏锐的观察力、洞察力和直觉能力,即善于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归纳概括出具有规律性、普遍性的东西,也即具有抽象思维的能力。此外,科学与文艺的创造都需要有灵感。有人说,天才就在于善于建立两点之间的联系,也就是善于联想。举个例子说,苏东坡到庐山,写下“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诗句。这说明他善于从所观察到的场景中悟出哲理。去过庐山的人很多,但并非人人都能产生灵感,悟出哲理。科学家也一样。科学研究的对象包括许多常人接触到的事物和现象。作为科学家他必须善于从常人熟视无睹的现象中抽象出本质和规律性的东西。人们每天看到日出日落,习以为常,但只有哥白尼提出地动说对此作出正确的解释。人们常常看到苹果落地,但只有牛顿从中悟出万有引力定律。李政道先生说得好:“艺术和科学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它们事实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还听说过有这样一种议论,也是从上述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对立论的观点中派生出来的,即认为理工科学得好的,文科常常学得差,反之,文科学得好的,数理往往学得不好。有人还举出某某名人为例来说明。我不否认人的先天才能有不同,有的在某一方面特别有才能,在另一方面却表现平平。但我认为从后天讲,这主要还是偏科造成的。当然我们要在某一方面有较高的造诣和成就的话,就不能平均使用精力,应当学有专长。但这不意味着可以畸形发展,对某些学科过于偏废。而且我坚信,那些第一流的杰出人物,多数是文理兼通的。只不过由于术业有专攻,有时不得不在其他方面有所割爱,使他们的某些潜能未能充分地发挥而已。

以上我从当今学科发展的趋势,科技与文艺的相互作用以及文理科思维的共通性来谈科技与文艺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由于今天在座的主要的是理工科学生,所以下面我着重谈谈为什么要强调理工科学生应具备人文素养,必须具备文史等社会科学知识和接受文艺的熏陶。

首先我们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我们培养的人才应是有道德、有纪律、有高尚理想和情操的人。简而言之,就是心灵要美。固然科技知识对于塑造人,对于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优良的作风是很重要的,但是光有科技知识还不够,还必须强调人文社科知识和艺术对于塑造心灵的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拿爱国主义来说,爱国主义不是无缘无故、凭空产生的,一个对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知之甚少的人,一个不了解文天祥、史可法、陆游等民族英雄和爱国诗人的人,很难想象他会有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基础。前面我已说过,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它是造福人类,还是危害社会,关键看掌握科学技术的人的思想与道德情操。计算机编程的好手,可以编出

有用的软件,服务千家万户,但也可以利用计算机来作案,或制造、扩散病毒。同样的,学生化药理学的高材生,可以研制出良药,救死扶伤,但也有的成了制毒贩毒的罪犯。这方面已有很多人谈过,今天我不想过多地在这方面展开。我想谈谈理工科学生学好人文知识,提高艺术修养的必要性的几点个人的体会。

首先一点我认为从事科技工作的人离不开撰写论文,作报告,甚至还要写书、写科普文章,没有好的口才和文才不行。人家说口才和笔头是人的外才,内才外才都很重要,否则满腹经纶,就是表现不出来。我碰到一些理工科学生,写起文章来错字连篇,文句不通,语无伦次,如何能清楚地整理和表述自己的思想?钱学森主张科学家要善于深入浅出地将专门知识告诉公众和外行人,使人明白易懂。深入浅出不是很容易做到的。我本人由于过去文理科都学得较好,1965年高考时,我6科总分考了569分,是以最高总分考入清华大学的。我体会我较好的文科底子,对我搞科研很有好处。我写的论文,投到刊物上,编辑一看,很有条理,文从字顺,常常不用修改就能发表。中文学得好,外语也容易掌握。我由于中文底子好,所以用外语写作论文,也较容易入门上手。

另外我们可以从文史知识、文化典籍中学习到许多可贵的人生体验、智慧和谋略,更好地指导我们的人生,也能对我们科研的方法、方向和道路提供某些有益的指导。俗话说:鉴古可以知今,文化典籍是人类几千年文明的积淀,经验的积累和智慧的结晶,是经过大浪淘沙淘出的金子,是经过历史的考验、筛选流传下来的,因此是十分宝贵的。如三十六计与儒家学说,日本人、美国人都运用于指导现代军事和企业管理。我们一般的学科知识,通常至多只有几百年的历史,有的只有几

十年,甚至只有几年的发展历史,我们都能从中获益良多,更何况历史典籍,是记录了数千年多少天才人物的思想和智慧的经典,阅读之,无疑更可以使人获益匪浅,对于形成正确的思想方法和人生态度有很大的帮助。当然对于其中存在的某些历史局限性和一些属于糟粕的东西需要加以鉴别。

人们常用学识这个词,又常称赞某人见多识广。这里的“识”,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知识的“识”,但更重要的是见识的“识”。有些人很有学问,但缺少见识。这种人往往不会有大作为。有大贡献大成就的人,往往是有见识的人,即通常所说的有识之士。“识”往往比学问更重要。学习文史哲对于“识”的形成很重要,因为要广见识,很重要的来源之一,就是广泛地吸取前人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识”就是正确地决策,就是计谋。有的人学问不错,但搞科研却没有多少创造性,遇事往往没有主见,甚至作出错误的抉择。这就反映见识不够。我本人之所以能在科研上作出一些成绩,我想与我的人文素养不无关系。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说明。一是我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之一,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策略来从事科研工作,坚持“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原则,科研选题大都比较适当,不选那种面面俱到假大空的课题,而是每次深入地解决一个方面的问题。还有在人生道路上,我从古人的格言:“以不变应万变”,“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吸取智慧,比较能持之以恒,不随波逐流,多年来一直坚持在建筑环境声学上做研究工作。我原来是学建筑学的。这些年建筑设计很热门,很赚钱,但我不为所动,坚持我的研究工作,这才作出较有系统性的工作和贡献。当今社会上浮躁风气较盛,许多人往往随波逐流,今天社会上流行下海,他就跟着下海,明天又羡慕别人当官,又匆匆爬上岸来想考公务员,后天看到人

家在招聘特聘教授,又觉得还是考研好,结果往往一事无成。所有这些都说明正确的抉择和见识很重要,而要做到这一点,不是靠专业科技知识所能解决的。

我还想谈谈智商与情商的关系。一个人的人生和学业要获得成功,除了机遇,除了智力因素外,情商也很重要,也就是必须善于为人处世,控制自己的感情,具有坚强意志和毅力。文艺对于陶冶性情,培养情商有很大作用。优秀的文艺作品,小说、戏剧、诗歌等是人生的教科书。多看这些作品能使我们无论在顺境或逆境下,在各种考验面前,都能以理智的、正确的、豁达的、乐观的态度去面对它们。有的学生失恋或遇到暂时的挫折,就一蹶不振,垂头丧气,甚至轻生。有的因为妒忌同伴的成功,怀疑老师偏心,竟然走上犯罪的道路。这些都是由于心理素质、思想修养方面的缺陷造成的。《红楼梦》里有一句话:“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古人同时又提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借此来丰富人生的阅历,陶冶豁达的情怀。这些都说明不能只埋头学习专业知识。如果你失恋想不开,想想苏东坡的词:“天涯何处无芳草”,我想心境就会豁然开朗。如果你暂时失意,想想当年韩信受胯下之辱,我想就会心理平衡。我说这么多,无非是要说明人文素养对于一个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提高情商,增长见识,走上成功的人生道路是非常重要的。

华南理工大学研究生院供稿,本人审校

文学与艺术

ZHONGGUO DAXUE RENWEN QISILU

袁行霈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开明与开放是盛唐气象的根基。惟
开明才能革旧布新云蒸霞蔚，惟开放才
能百川汇海博大深邃。

盛唐气象与盛唐时代 ——在北京大学演讲——

—

盛唐指唐玄宗在位的开元、天宝年间，大致相当于公元8世纪上半叶。这时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治开明，文化发达，对外交流频繁，社会充满自信，不仅是唐朝的高峰，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期。盛唐涌现出以李白、杜甫、王维为代表的一大批诗人，他们共同开辟了一个气象恢宏的诗歌的黄金时代。

所谓“盛唐气象”，着眼于盛唐诗歌给人的总体印象，诗歌的时代风格、时代精神：博大、雄浑、深远、超逸；充沛的活力、创造的愉悦、崭新的体验；以及通过意象的运用、意境的呈现、性情和声色的结合而形成的新的美感——这一切合起来就成

为盛唐诗歌与其他时期的诗歌相区别的特色。盛唐诗人王湾有一首《次北固山下》，当时的宰相张说称赞不已，将颈联抄在官署的墙上，作为诗歌的楷模。（见殷 《河岳英灵集》）这首诗的中间两联正好可以用来形容那个时代：“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那三个形容词：平、阔、正，还有那高悬的风帆，从残夜中生成的海日，进入到旧年里的江春，都让人感受到盛唐时代的气息以及盛唐诗歌的风貌。再看以下这些盛唐诗人的歌唱：“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登鹳雀楼》）“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李白《庐山谣》）“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望岳》）“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别董大》）在这些诗句里洋溢着一种涵天盖地的雄浑之气，千载之下仍能令懦者勇、弱者壮。盛唐诗人并不是没有忧愁，李白就经常把愁字挂在嘴边，诸如“愁疾”、“愁颜”、“愁心”、“愁发”、“愁肠”，不一而足。但我们只要将李白和中唐的孟郊、李贺，晚唐的温庭筠、李商隐比一比，就可以感到李白愁得来有力、愁得来气派。正如他的名句：“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显示的是强者之愁，在愁中有一股浩然奇气。杜甫也写愁，那是一片忧国忧民的伟大之愁、健康之愁：“忧端齐终南，颍洞不可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集中地体现了盛唐气象的诗人，往往是富有魅力的人物。例如王维——那个时代培育出来的全才——便是这样一个人。他的佛教造诣很深，而且能将禅意融会到诗里。他是书法家，又是音乐家和画家，被后人推崇为文人画的始祖。他的

画迹,据《宣和画谱》著录,仅宋朝宫廷里就有 126 件。王维 9 岁就会作诗属文,他的政治感遇诗、山水诗、边塞诗、赠别诗,都是第一流的。苏轼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书摩诘蓝田烟雨图》)李白的魅力更是无人可以匹敌,他以一种震慑的力量征服了当时的读者。他不甘心走一般士人的科举之路,要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声誉直取卿相。他常自比为大鹏,任意地遨游于天地之间。秘书监贺知章在长安初遇李白,诵其《蜀道难》,竟呼为“谪仙人”,解下身上的佩饰金龟换酒为乐。唐玄宗也降辇步迎,御手调羹以招待他。杜甫在洛阳与离开长安东下漫游的李白相遇,便跟随李白漫游了许多地方,别后杜甫对他仍念念不忘,写了许多诗怀念他。称赞他“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还有一个叫魏万的人,为了一睹李白的风采,从嵩宋出发追踪李白几千里,终于在广陵见面,称赞李白的诗“鬼出神入”。盛唐诗人的魅力,既是属于他们个人的,又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只有辉煌的时代,才能为辉煌的人物提供形成魅力的条件。

盛唐气象作为盛唐时代精神的反映,也呈现在书法、绘画、音乐等其他艺术门类之中,张旭的草书狂放不羁,李颀在《赠张旭》中形容他写字时的神态:“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颜真卿的楷书在庄重严整之中透露出凛然而不可犯的气势。吴道子的绘画轰动长安,他在兴善寺绘画时,“立笔挥扫,势若风旋,人皆谓之神助”。(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吴道子在洛阳曾遇到书法家张旭和舞剑名手裴 ,裴请吴在天宫寺为他亡故的双亲作壁画,吴不受金而请裴舞剑以壮气。“舞毕,奋笔,俄顷而成。”张旭也在那里写了一壁字。洛阳人都说:“一日之中,获睹三绝。”(朱景玄《唐朝

名画录》)当时还有专擅画马的曹霸、韩干、韦偃等。杜甫在《丹青引》中称赞曹霸的画“有神”;说他为玄宗的御马画像,“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董庭兰善弹胡笳,李颀描写他的音乐所产生的效果:“川为净其波,鸟亦罢其鸣。”(《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弄房给事》)公孙大娘善舞剑器,当她舞蹈时,“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这些艺术家的出现,以及他们有若神助的艺术,同样呈现了盛唐气象。

二

盛唐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在前期,盛唐气象主要表现为:投身社会 and 参与政治的热情,高度的自信和自尊。后期,李林甫、杨国忠等奸相当政,这时盛唐气象主要表现为:敏锐的洞察力,暴露社会矛盾的勇气,对国家的责任感,以及对社会危机即将到来的忧虑。例如李白在《古风》其二十四中痛斥宦官和斗鸡小儿,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揭露政治的腐败。又如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夕揭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样尖锐的问题。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对社会充满信心和责任感。李白 61 岁时还请求参加李光弼的军队,去讨伐安史叛军。杜甫虽然忧国忧民,但不是悲观主义者。写于安史之乱期间的《北征》,忠实地记录了战乱中民生的疾苦,却仍相信国家将会中兴。他漂泊西南之际所写的《登楼》,在痛心“万方多难”之余又把大唐比作北极星,相信它不会沉沦。他在《江汉》中说:“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在《凤凰台》中说:“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在《洗兵马》中说:“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正是在安史之乱那些最阴霾的日子里,他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从诗歌创作的角度看,盛唐和前代相比有一些新的趋势。从这些趋势中也可以看到盛唐气象:

首先是面向外部世界。初唐诗歌的发展脉络是从宫廷御用的路线转向个人抒情的路线,这是很大的进步。如果只是沉溺于个人感情的纠葛之中,而不能面向外部世界,那还是很有局限的。盛唐诗人既不用诗去讨好帝王,也不把诗当成只供个人玩赏的小摆设,而是把一己之情融入普遍性的主题之中。这普遍性的主题就是社会政治主题,希望尽自己的力量创造出长治久安的局面。李白抱着宏伟的理想,欲“济苍生”、“安社稷”,“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然后像鲁仲连、范蠡、谢安那样功成身退。杜甫突破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虽然一生未达,却始终以天下为己任。其次是表现新的体验。盛唐诗歌的题材都是旧有的,无非是感遇、咏怀、咏史、山水、田园、离别、闺怨、边塞、从军、宴饮等等。明代张之象《唐诗类苑》收有1472位诗人的28245首诗,占《全唐诗》的3/5。此书按题材分为39类,没有哪一类前代未曾写过。可见盛唐诗人的贡献并不在于开拓了新的题材,而在于他们就原有的题材,找到并表现了新的体验。例如边塞诗早在汉魏就有了,此后一直没有中断过,可是许多人写边塞诗未必到过边塞,而盛唐的边塞诗多出自诗人亲身的生活体验。高适以政治家的眼光议论边防之得失,王维和岑参以诗人的敏感描绘边塞奇异的风光,王昌龄以战士的口吻诉说内心复杂的感情。例如:“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高适《燕歌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使至塞上》)“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这样真切的诗句以前是少见的。第三是大眼光、大格局。初唐以精细

为美,盛唐以阔大为美。李白的眼光简直是宇宙眼光,他说:“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日出入行》)又说:“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赠裴十四》)他与宇宙处于平等的地位,也可以说他心里装着整个宇宙,并以这种气魄看待社会与人生。这是一种全新的眼光和格局,正如皮日休所说,李白是“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刘枣强碑》)此外如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望月怀远》)王维的“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汉江临眺》)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凉州词》)杜甫的“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望岳》)这些盛唐的佳句都表现了大眼光、大格局,具有雄伟的气魄。

三

盛唐气象的形成有诗歌艺术方面的原因,例如性情与声色的统一,意象的运用与意境的呈现等等,这在拙作《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一书以及其他一些论文中已从多方面做过论述,限于时间关系,这里就不再重复了。下面仅从历史、文化的发展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方面做一番探讨。

从历史、文化的发展这个角度看来,有两点值得注意:

首先是南北文化的交融。晋室东渡之后,中国经历了200多年的分裂和战乱。在这期间,南北双方的文化呈现相当明显的差异。南方喜庄老、尚清谈,注重抽象名理的论辩;北方流行汉儒的经学,注重人的行为准则。南方文风华靡,北方文风质朴。南方的书法多见于帖,南帖飘逸;北方的书法多见于碑,北碑凝重。《隋书·文学传序》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

之大较也。”很显然,单一的南方文化或单一的北方文化,都有局限性,如果不能融合就不能蔚为大观。隋朝统一全国,以及大运河的通航,已经开启了南北文化互补的过程。唐朝继隋之后,经过太宗贞观之治,文化交融的过程大大地加速了。南朝的“文”收点了北朝的“质”,北朝的“质”充实了南朝的“文”,“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隋书·文学传序》)一种融合了南北文化之长的、与唐帝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相适应的新文化达到了成熟的地步。盛唐气象正是这种富有深厚内涵的新文化的升华。如果说战国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那么盛唐就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李白带有蜀地的浪漫与豪情,杜甫带有中原的纯朴与厚重;王维信佛,李白崇道,杜甫尊儒。盛唐的许多诗人都有一段漫游的经历,这只有在国家统一的时候才有可能。南朝的诗人足未涉黄河,身未登泰山。而北朝的诗人,亦未能见到南方的奇山异水。若论眼界、胸襟和见识,他们就差多了。盛唐的诗人可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李白五岳寻仙,四海为家,足迹及于大半个中国。杜甫也有一段壮游时期,黄河上下、长江南北都留下他的足迹。当时的东越即现在浙江东部地区,风光奇丽,许多诗人都到那里寻幽探胜,觅得诗的灵感。就连大半生隐居在家的孟浩然,也有浙东之行。至于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人,远走东北、西北边陲,充分体验了军旅的生活,目睹了边塞的风光,他们的眼界就更不一般了。其次是中外文化的交流。当时的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大都市,都是中外文化交汇的地方。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都会,在8世纪前半叶人口已达百万,居住着许多外国的王侯,供职于唐朝的外国人,留学生,求法僧,外国的音乐家、舞蹈家、美术家,以及大量外来的商贾,至于外国的使臣更是络绎不绝。在宗教方面,佛教之外,

伊斯兰教、祆教、景教和摩尼教也都得以流行。敦煌石窟中所存《摩尼光佛教法仪略》是开元十九年翻译的汉文摩尼教经典。音乐、舞蹈、美术等方面的交流也给盛唐社会注入新的气息。早在唐太宗时就设立了十部乐,其中四部来自唐朝境内少数民族,四部来自国外。盛唐时期外来的舞蹈也很流行,如著名的胡旋舞。敦煌石窟中盛唐的壁画和雕塑,以雄浑的气魄、卓绝的造型、丰富的色彩,远远高出于其他时期。中外文化的交流,打开了盛唐人的眼界,开阔了他们的胸襟,这对气象的形成无疑起了积极作用。

归根结底,盛唐气象的出现是由大一统的局面下经济繁荣、政治开明、社会安定所决定的。无法想象,在一个民生凋敝、战乱频仍、国家分裂的时代会有甚么气象可言。关于盛唐经济繁荣的局面,文献不乏记载,如:“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元结《问进士》三)“四方丰稔,百姓殷富。……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郑綮《开天传信记》)据两《唐书》、《唐六典》、《通典》、《资治通鉴》、《唐会要》等书记载,从中宗神龙元年(705年)到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短短的50年间,人口就从37140000,增加到5291930,增幅达40%。人口激增说明社会安定、经济富裕。可是在这种情况下,物价反而有所下降,开元初年,“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新唐书·食货一》)天宝年间人均粮食达到700斤。杜甫在《忆昔》里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玄宗诛除了韦后、太平公主等腐朽势力后,任用姚崇、宋璟等贤相,整顿吏治、检括田户、改善财政、改革兵制,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并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的空间。在这里有必要特别提一下被称为“救时之相”的姚崇,以

及宋睢。姚崇为人豪爽,崇尚气节,为政简肃,掇断如流。开元元年(713年),玄宗不顾某些大臣的激烈反对,毅然任命姚崇为相。姚崇提出“十事要说”,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从稳定政局、整顿吏治、改善财政这三个大方面申述了自己的施政纲领,得到玄宗的支持。姚崇于开元四年(716年)罢相时推荐宋睢继任相位。宋睢耿介无私,直言急谏,而且工于文翰。在3年多的时间里,继续贯彻姚崇的政策,使得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盛唐时期能够出现姚崇、宋睢这样的人物,而玄宗又能发现和任用他们,这对盛唐安定繁荣局面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安定的局面下,儒、释、道三教得以并用,思想界出现比较自由的气氛,这是形成盛唐气象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儒家在唐朝的地位不断提高,玄宗很重视在官学里研习儒家经典,并允许民间立私学以弘扬儒家学说。对于佛教,玄宗在开元初期曾经采取一些限制的政策,但总的看来他对佛教还是尊重的,对于开元年间传入的密宗尤有兴趣。玄宗的崇道更有甚于尊儒,他在科举中设立了道科;在两京设立崇玄馆;还亲自注释《道德经》颁示天下。在思想比较自由的气氛中,诗人们可以从各方面汲取营养。李白信道,杜甫尊儒,王维崇佛。他们的不同信仰,对于形成各自的诗歌风格起了重要的作用。

人才发展空间的扩大是一个起了直接作用的因素。由于唐朝实行抑制门阀士族的政策,以科举取士,打破了门阀士族垄断政治的局面,使大批中下层庶族文人登上政治舞台。与此同时,文化也从少数士族文人手中转移到中下层庶族文人手中。这批在唐朝建国后成长起来的新人,有丰富的生活阅历,比较了解社会的实际、政治的利弊和民生的疾苦。他们有

抱负、有见识、有能力,敢于冲破旧的藩篱开拓新的局面。盛唐文化实际上主要是这批新人创造出来的,盛唐气象也就是这批新人的气象。

盛唐文人之间有一种健康融洽的关系,这也有助于气象的形成。杜甫在《忆昔》中回忆开元年间的情况说:“天下朋友皆胶漆”,反映了当时的状况。他们觉得某个人受了委屈,就为之大声疾呼,有担待、不世故。杜甫为郑虔鸣不平:“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甲第纷纷厌梁肉,广文先生饭不足。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过屈宋。德尊一代常坎坷,名垂万古知何用。”(《醉时歌》)李白为王十二鸣不平:“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而当他们佩服一个人时,又出自真心地褒之扬之。从贺知章和杜甫对李白的推崇、李白对孟浩然的称颂中,都能看出盛唐文坛那种良好的气氛。杜甫的《饮中八仙歌》描绘贺知章、李白、张旭等八人醉后的狂态,欣赏和钦佩之情溢于言表。还有一个人应当特别提来说一说,这就是张说,他是从初唐过渡到盛唐的关键人物。他的诗还带着初唐的拘谨,不具备盛唐诗歌那种浏亮与光彩。但是他“前后三秉大政”,朝廷的“大手笔”都是由他撰述,“天下词人咸讽诵之”。(《旧唐书·张说传》)他特别奖掖后进,他所奖掖的文人能考知的有张九龄、贺知章等30余人。还有一些是曾以文学受知于张说,日后以政绩著称的,如房、李泌、刘晏等。这种奖掖后进的做法已经形成传统,贺知章和张九龄受到张说的拔擢,他们又再奖掖后进,如贺之对李白,张之对王维。从以上所举的种种事例可以看出,盛唐文人是怎样的大度。盛唐文坛的情况可以借用曹丕《典论·论文》里的两句话

来形容：“咸以自骋骥马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

总之，开明与开放是盛唐气象的根基。惟开明才能革旧布新云蒸霞蔚，惟开放才能百川汇海博大深邃。盛唐不过短短的 50 年，其国势之强盛，气象之恢宏，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亮点，放到世界历史上也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一片辉煌。

演讲日期：1998 年 11 月 9 日，北京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推荐，本人审校

编者絮语 盛唐时代，从世界文化史的角度来看，与之相媲美的也只有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不能不对我们民族的最为辉煌的时代有所了解。演讲者是著名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专家，这篇演讲虽然还只是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分析、描述盛唐时代和盛唐气象，但也足以让我们为之感动，为之自豪。

费振刚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作为一个文化传统的集中体现,《诗经》在不同层面上,在不同情况下,会以不被察觉的方式影响我们的生活。对于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来说,我们不仅要在不知不觉当中接受它的熏陶,同时我们更应该自觉地去理解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精华的《诗经》,我想这样不仅会提高我们对文化的理解,同时也是我们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的全面素质的体现。

《诗经》的经典性

——在香港城市大学演讲——

感

谢各位嘉宾、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来听我的关于《诗经》的演讲。

《诗经》作为一个文本的出现在中国很早,距现在有 3 000 多年。当然,它成为经典要晚一些,大约是在距现在 2 000 年的时候,即汉代。为了适应汉代中央集权的社会制度,当时的执政者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把孔子的思想作为统一规范全

国上下思想的一种标志,于是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个很著名的事件,叫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这个时候起,孔子就被作为“圣人”,与孔子有关的一切都被涂上了神圣的色彩。孔子在生前作为教材来用的一些古代的文献,也被称为“经”,包括《诗经》在内还有《书》、《易》、《春秋》、《礼》,一起被称为“五经”。同时,从汉代开始,在政府设立了“博士”,立“五经”博士来教授有关的人员。

什么是“经”?上一次张隆溪教授作了很多解释,很多说明(见本书所收《文化传统与现代阐释》——编者)。我想说的是,由于把孔子当作圣人,把孔子思想当成了国家、政府推行的统一全国上下思想行为的标志,这个“经”,就具有“神圣”的意思,“圣人”的意思,表明其中包含了许多恒常不变的真理,有了实实在在应当遵循的规则。正是由于“经”具备了这样的意义,它就被一般人看做非常高深,非常玄妙,是与我们离得很远很远的东西。但是我想,如果经典离人们太远,把它树得高,那么经典的意义就会逐渐地消失。经典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应当说它总是在不同的层面上影响着人的生活,人们会在不知不觉的状态下来接受它。

就《诗经》而言,我想我们许多的同学在许多成语里面,甚至在中学语文课本里面都已学过它。这种了解,大部分同学都会有。但是我要说的是,我们还会在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谈话中,在我们日常教育中,经常用到《诗经》的一些词语来表达我们的一些认识。在这里,我再举一些我们平常生活中遇到的,大家可能知道但没有察觉到的例子。

最近十多年来,内地常常隔个一两年、三五年就会有一个港台的作家被内地的人、特别是年轻人所喜欢。最早的一位为内地人所了解的作家,是一个女性作家,叫琼瑶。我想这个

大家也是知道的。她的好几部小说被拍成了电视剧,其中有一部电视剧,叫《在水一方》。大家也许知道,她的名字以及电视剧《在水一方》,都和《诗经》有关系。《诗经》的一首诗叫做《木瓜》,它的第二章“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琼瑶的名字是从这里来的。《蒹葭》,这是一首很有名的诗,“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洄从之,道阻且长; 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这应当是一首情诗,一个青年男子,或者是一个青年女子,在秋天的早晨,10点钟之前,想追求心爱的人儿而追求不到,心情苦闷,这种感情在这里表现得很充分。我想,这个表明了我们现代人还不断地在运用《诗经》这一古老的形式来表达一种感情,乃至它的词汇、它的语言还会出现在我们生活中。顺便我想说一下,在生活当中也有常常用“投桃报李”表达礼尚往来的意思,“投桃报李”这个成语并不是从这首《木瓜》诗中出来的,而是出自《诗经》的另外一首作品,即“大雅”中的《抑》。在这篇作品中,有两句,就是“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即“礼尚往来”的意思。除了这个之外,上一讲张隆溪教授谈到了《关雎》这首诗。《关雎》是《诗经》的第一首,这首诗应当是人们所熟悉、所了解的。为什么把《关雎》放在《诗经》的第一首?必然有很多人讨论这个问题,我想之所以把《关雎》放在《诗经》的第一篇,表示了中国的先人对男女婚姻乃至家庭的重视。因为在中国人看来,男女婚姻、家庭乃是一个社会的基础,也是一个社会的开始。《关雎》表现了人们对于美好的婚姻、幸福家庭的祝福。所以《关雎》这首诗的第一章,“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四句就成为人们在祝贺新人的时候对美满婚姻的赞颂,对幸福家庭的赞颂,这已经是我们生活中常常能够听到的。除了这个之外,在婚姻上还常常出现“天作之合”

这种祝福。“天作之合”也出自《诗经》，即出自“大雅”的《大明》。这首诗是赞美周代的创始人周文王和他的妻子的夫妻关系的，所以后来人们用“天作之合”来表示对一对新婚夫妇的祝愿。在《关雎》中还有四个字也成为了我们的口头语，这就是“辗转反侧”。这四个字在诗中是用来形容男子追求女子没有得到那种焦急不安的心情，它很生动地描绘了男子因相思之苦，在夜里睡不着觉，不断地翻转自己的身体的情形。所以后来在生活当中也用这四个字来表现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不能睡得很安稳的情况。《诗经》里面还有好多作品谈到相思之苦，有一首诗叫做《采葛》，它描绘相思之苦是“一日不见，如三秋兮”。这种表现也是很贴切、很生动的。

除描写爱情之外，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在和朋友、同事交往当中，也常常有用到《诗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些朋友买了新房子、搬了新居，大家祝贺他“乔迁之喜”。“乔迁之喜”的“乔迁”两个字也是出自《诗经》，出现在“小雅”的《伐木》中，“出于幽谷，迁于乔木”，是讲鸟从低地方飞到高地方，乔木是高大的树木。用这个来祝贺人们喜迁新居，应当是我们常常会碰到的。此外，祝贺一个朋友生了一个小孩，如果是一个男孩，就叫做“弄璋之喜”。“弄璋”这个词也出自《诗经》，是在《诗经》的《斯干》中。《斯干》里面说“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表示对一个家庭、一个朋友生了个男孩子的祝愿。此外，祝寿，我们常常祝人“寿比南山”，这个词汇也是出自《诗经》。过去人们祝封建社会的皇帝“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这个词也出自《诗经》里面，而且出现不止一次。在“小雅”里，有一首叫《天保》，这首诗是一篇祝寿的诗，一共有六章，其中，第四章就出现了“君曰卜尔，万寿无疆”。

总之，以上所说表明，《诗经》尽管是经典，在其长期流传

过程中确实有它神圣的一面,有与人民大众相疏远的一面,但是另外一面作为一个文化传统的集中表现,它又在不同层面上,在不同情况下,会以不被察觉的方式影响我们的生活。对于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来说,我们不仅要在不知不觉当中接受它的熏陶,同时我想我们更应该自觉地去理解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精华的《诗经》,我想这样不仅会提高我们对文化的理解,同时也是我们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的全面素质的体现,这就是我们在大学里开设中国文化课程的一个重要目的。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想讲的是《诗经》作为经典是怎样成为经典的。要了解《诗经》是怎样成为经典的,首先要了解《诗经》在成为经典之前,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实际上,《诗经》里的作品本来是我们中国的先人在不同场合下所写的诗。什么是诗?我想从现代意义上来讲有很多的解说。中国人的传统认为诗是言志的,即“诗言志”。所谓“载行为志,发言为诗”,就是说,把心里所想的東西说出来就是诗,也就是说,诗是人们表达的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感受。所以《诗经》就它本来的形态来说,和我们现代人写的诗并没有什么不同。现在的《诗经》文本一共有 305 首,它分成了三个部分,其中有一部分叫做“国风”,有 160 首,这 160 首大部分是当时的下层的人们所写的。古人又讲“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就是诗表达了人们在生活当中或者做事的过程中的一些感受。其中也有一些,按照朱熹的讲法是出于“礼”。一般的生活,除了人们的喜怒,男女相爱,“歌言其情”,男女交往过程中用诗来表达他们之间感情的叫“情歌”、“恋歌”。除了“国风”之外,另外 145 首,叫做“雅”和“颂”。“雅”和“颂”的作者大部分是当时上层的公卿、大臣,相当于今天的高层人士;也有一些作者是农民、政府的一般公

务员。“雅”、“颂”中有一些作品表达了这些作者对当时的社会问题的意见；也有些作品是他们奉命——奉国家的命令——来写的有关祭祀祖先、神灵的作品，用这些作品表达一种对祖先、对神灵的称颂，也希望通过祭奠这些祖先、神灵使之给予人们以保护。总的来说，古代这些作品与现代作品一样，是表达思想感情的。所不同的是，这些作品是可以歌唱的。所以这些作品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并没有什么神圣的地方。

《诗经》中的这些作品可以说是由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方写的，当时的社会并没有出版机构，也没有我们现在所谓的诸如电视台之类的传媒机构，那么，这些作品是怎样集结在一起呢？为什么这些作品集结在一起叫做《诗》？正如我刚才谈到的，《诗》成为“经”是因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历史事件，《诗》为什么会汇编在一起，就要说到另外一个历史事件，这就是所谓周代的“制礼作乐”。周公“制礼作乐”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国成为礼仪之邦，我想应当说是从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开始的。那么什么是礼？简单地说，礼就是维持社会秩序的一些基本规则。从大一点来说，像国家的典章制度，小一点来说，是社交的各种规矩。周公在制礼的时候，特别强调“乐”。他强调礼乐配合，用乐来配合礼的实行。这种情况我们现代生活中也还会遇到。比如说两个国家交往，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到异国去访问，在迎宾场合，要奏双方的国歌，要检阅仪仗队，检阅仪仗队过程中也要奏乐。这些都可以说是礼乐的配合。在古代也是如此。正是由于这种礼乐配合的需要，就必须制作在礼仪场合上使用的音乐。当时有主持这个工作的专门机构，而主持这个工作的人大多数称为“太师”。太师一方面把从各地收集起来的民歌整理出来，一

方面把当时的公卿、大臣所作的诗配上乐曲,以便能够在各种场合下使用。所以所谓“风”、“雅”、“颂”实际上就是在不同场合演奏的乐曲的歌词。所以最初并没有《诗经》这个名称,而是简单地称为《诗》,或者叫做“诗三百”。由于各种原因当时的音乐我们听不到了,但是歌词却保存下来了,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诗》里面的作品。在当时的等级社会里,有所谓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规定,所以一般人并不了解“诗”。礼和乐作为文化的一种表现,在当时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学习它,掌握它。贵族也只有掌握了礼,掌握了乐,才能够参与社会活动。因此可以说,对礼乐的了解,是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标志。在行礼过程中,也唱乐,同时必须对乐的歌词有所了解,懂得这些作品,所以在人们交往过程中也要会运用这些作品。所以在春秋时代我们常常在一些记载、一些古代文献当中,有这种所谓“布诗”、“言诗”的记载,就指的是引用《诗》来表达自己的认识。能够恰当地引用《诗》的作品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在当时社会也被看做是一个人的能力、修养的一种表现。这就是《诗》在未成为《诗经》之前它所起的作用。

那么,孔子与《诗经》有什么关系呢?孔子用这种官方文献来教育学生,因此《诗经》会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得以流行。孔子本人也特别强调学习《诗》的重要性,他说,“不学《诗》,无以言”,就是说你要不学《诗经》的作品就不会讲话,也就是说会表达得不很深刻、不很准确。上一次张隆溪教授讲到学习《诗经》之后可以运用《诗经》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和认识,同时也可以《诗经》来联络感情,来唤醒、启发人们的认识。可见孔子对《诗经》的重视。同时孔子也对《诗经》的内容做了简要的说明。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

邪”是讲《诗经》表达的是非常纯正的感情、认识。孔子也对《诗经》的第一首诗《关雎》下了评语,叫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正因为孔子与《诗经》有这么一种关系,《诗经》才具有了经典意义。但是这才只是开始。《诗经》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被作为官方的一种思想被提倡,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人们在重视之后,就会把孔子所说的话,孔子所用的教材、各种文献经典化、神圣化。这个神圣化、经典化的过程就是上一讲张隆溪教授所说的“阐释”。《诗经》是当时的人所写的诗,和我们现代人所写的诗并没有不同,但是要经典化,就必须把《诗经》的作品从普通的文学作品提升到儒学经典的地位。这个过程就是把一般人写的诗变成经典的过程。在经典化过程中,人们对“诗”的阐释就附加了许多并不是作品本身具有的内容。也可以讲,在《诗经》经典化的过程中,讲了不少歪理。

下面我还想再举两首诗来说明《诗经》是怎样被经典化了的。“国风”中的一首诗,叫做《小星》。“迢彼小星,三五在东。肃肃宵征,夙夜在公。寤命不同!”下面是“迢彼小星,维参与昴。肃肃宵征,抱衾与 ,寤命不扰!”这首诗现代人是这样认为的:诗的作者或者主人公是一个小吏。“迢彼小星,三五在东”,指晚上黄昏时或黎明之前,星光闪烁,但不是很多。“肃肃宵征,夙夜在公”,是讲宵征是在夜里,“夙夜在公”是讲不管早晨、白天、夜里,都要为公操劳,所以“寤命不同”,感到自己的待遇、遭遇特别不一样。这首诗实际上是一个小吏对自己不幸生活的感叹。汉代人讲这首诗就是另外一种说法,叫做“惠及下女”,所谓“惠及下女”,是指国君的妻子对国君的妾能够容忍,她不去陪伴国君,而让妾去陪伴国君。而妾自己也知道自己的地位与妻不一样,所以是“寤命不同”。“寤命不扰”,

也就是妾能体会夫人的恩惠。这样一种解释就完全离开了这首诗的本意,而是在强调当时社会的那种道德伦理观念。所以“小星”这个词在过去就被看成小妾的代名词。

《子衿》也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诗:“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这首诗也是一首情诗:一个女子在思念、埋怨自己喜欢的男孩子为什么不来?不来也可以,为什么连个信也不给我?但是汉代有人认为它不是情诗,而认为这首诗表明对学校被废除的不满意。为什么学校废除了呢?因为当时战乱的关系,学校没法正常上课。他怎么看出来这个学校不能正常上课呢?因为“青青子衿”,学生的衣服比较简朴,可以说是衣服。同时指出学校停课有一部分学生离开了学校,有一部分学生还在学校,这首诗是留在学校的学生对离开学校、逃课的学生的一种谴责。这样一种解说实际上是批倒了作者的思想的层次,可以让人们通过他的解说来遵循社会的、他所认为的必须遵守的规矩。在封建时代这种解说是很多的,延续的时间也很长。最终导致《诗经》越神圣,就越离开作者,就越不真实。

《诗经》本文一共不到三万字,但是后来的解说越来越多,就成为一种经学。经学是一种专门的学问,是两千年封建社会学术的主流。这种解说本身就造成了《诗经》的严肃的、神圣的意义。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诗经》正是建立在这层层结叠的解说之上,而要想看到《诗经》的本来面目,就必须化解这些异样的解说。所以,《诗经》的经典意义,源于对它的解说过程之中。以上所说的是第二个内容。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今天应该怎么看《诗经》的作用?中国自从汉代以后倡导所谓的“尊古读经”。一个人要立足于

社会,要实现自身的价值,“尊古读经”是他的主要手段。一个人要成就自己的功名,成就自己的事业,“尊古读经”就是他的基础。19世纪之后,中国的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动,这个过程中也带来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最严厉的批评是对儒家思想的批评,其中包括对儒家经典的批评。中国社会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引起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思考,同时也引起了对如何改变中国从19世纪以来对比西方相对落后的局面的思考。1919年“五四运动”提出了两个口号:一是“打倒孔家店”,一是“欢迎德先生、赛先生”。德先生是“democracy”,赛先生是“science”,即“民主”和“科学”两个口号。从这两个口号来看,我们对传统的认识要在新的基础上进行。对传统的批评主要是运用从西方引进的科学和民主的武器。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经学就瓦解了。经学成为哲学、历史学和文学研究的对象。所以现代人的研究,不再把《诗经》看成是传统经学的一本书,而把它看做是诗歌总集。所谓诗歌总集,实际上是与传统的书籍分类有关系。传统的分类,经就是指儒家经典,五经也好,十三经也好,只要是儒家经典就属于经。“史”就是历史。除了儒家之外的那几家,道家、法家等等,叫“子”。“集”是个人作品,“总集”是一个时代,一个文体的汇集。现代人不再把“诗”放在“经”的部分,而放在“集”的部分。也就是说,实际上人们不再把“诗”称为经了。

接下来我想说,虽然现在不再把孔子看成是圣人,但是,孔子是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人物;“经”不再称为经典,但它是一部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著作。我想经典性就是指这个。把经学化解为哲学的、历史学的、文学的,那么《诗经》应该是一部文学作品。因此,下面我想谈谈《诗经》作为一部文学著作,它的经典性或经典意义,或者说它对后世的重要影响

主要在哪方面？我想主要谈三点。

第一点,《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体系的杰出的体现,也是后代诗歌体系的基础。大家都知道,《诗经》的基本的体例是四言律诗,但《诗经》并不仅仅是四言的,除四言之外,还有三言的、五言的、七言的、八言的,还有一种杂三言、五言、七言、八言。可以说,中国的古代诗歌的发展基本是从二言体到四言体,过渡到五言体、七言体,乃至后来的词和曲。而《诗经》中以上各种句式都存在,这为后来诗歌的发展在体系上、在句式上奠定了基础。《诗经》还形成中国诗歌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押韵。后代的诗歌,从韵脚的排列看,从韵脚的排列看,主要在双句押韵,即二、四押韵,也有的时候是一、二句,空了第三句,接着在第四句押韵。如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光”、“霜”是押韵的,第三句是不押韵的,第四句“乡”也是押韵的。也有的诗第一句不押韵,二、四句押韵。王之涣的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白日依山尽”的“尽”字不押韵,“黄河入海流”和“更上一层楼”,二、四句是押韵的。在中国古代诗歌有些双押韵,有些一、三句押韵,也有全部押韵的。多种情况下是双句押韵。《诗经》里面基本上就是这样一种押韵方式。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就是一、二、四押韵。所以中国古代诗歌的押韵形式在《诗经》里面都可以见到。所不同的是,《诗经》的押韵并没有什么成法,没有固定的一种规定,而是很自然的。所以我在前面没有说到《诗经》中如后代诗那样的平仄问题。后代诗歌讲平仄,在每一句诗里面和另外相对的诗里,平仄要错开。《诗经》的一些作品乃至汉代的作品其实合乎平仄,但是并没有硬性规定,所以《诗经》的时代是比较自然的时代,但它又确实是后代诗歌

韵律的最早的体现。

第二点古代诗歌的艺术表现。谈到艺术表现,从《诗经》来说,是和风、雅、颂相联系的赋、比、兴问题。关于赋、比、兴,中学老师都讲过,我就不想说很多,只是想说这在《诗经》里面是和风、雅、颂相对而言。风雅颂是讲《诗经》的分类问题,而赋比兴是讲诗歌的表现手法问题。赋比兴是表现手法。赋比兴的具体含义有很多解说,这里我想引用朱熹的说法,所谓赋,就是“敷陈其事”,用现代的话就是直接的叙述、描写;比,就是比喻的意思,用一事物来比喻另外一事物,这是朱熹讲的,“以此物比彼物”;所谓兴,朱熹讲,“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说之辞也”,是说写诗要用另外一件事开个头;赋,它是一个叙述的问题,不再举例子。关于比,比喻,在《诗经》里面有一些是整篇都用比喻,比如《相鼠》和《硕鼠》,都是用老鼠来比喻一个不受欢迎的人。更多的比喻是在句子里面,如讲一个女孩子的皮肤很好,叫做“肤如凝脂”。兴是诗歌的开头。比如《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这首诗的开头写了春天的美好,也会使人想起女孩子的漂亮,也会想到这首诗后面所写的热闹气氛。这就是“兴”的手法。《诗经》的三种表现手法对后代的诗歌创作是有影响的。后代诗歌的表现手法尽管很丰富,但都可以用所谓赋、比、兴来概括。

第三点,我想谈谈关于传统的问题。中国的诗歌可以说有现实主义诗歌,浪漫主义诗歌。人们都把中国诗歌现实主义传统的源头归之为《诗经》。对社会的批评,对人们生活的不公正的待遇的控诉,这些在《诗经》的“国风”里有,在“大雅”、“小雅”里也有。而这种对人们、对社会的关心正是中国诗歌的主流。这个主流的开始是《诗经》。

我想,从这三个方面来看,《诗经》对中国诗歌发展的重大

影响,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理解的《诗经》的经典性。由于时间关系,后面三点讲得不充分。我有一篇文章,和我讲的内容有关系,是我十多年前发表的,如果大家觉得有意思,可以在会后看看。谢谢大家!

演讲日期:1998年10月19日,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科目中心供稿,录音整理:范辉,未经本人审校

编者絮语 剥去两千年来裹在《诗经》身上的经学外衣,使我们认识其作为经典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这篇演讲的意义还不仅限于此,实际上,它还涉及到经典被误读或被有意曲解的有趣现象。在大力倡导阅读经典时,怎样对待经典和对经典的解说,值得注意。

吴冠中

著名画家

实际上,中国画对西方画的防线,已经给冲得七零八落了,已经防不住了。现在只有冲上去,只有迎面碰撞,不是退让、不是拉开距离,而是越来越近。碰撞、交融以后,不是说就没有中国画的特点了,还是会有我们的特点,特点是消灭不了的。互相越吸收才越丰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西必须是一种互相碰撞,互相吸收,吸收之后再保持我们的特点,这是一条至关重要的路。

中西美术比较谈

——在北京大学演讲——

很

感谢有这样一个机会,到北大来谈一谈关于艺术方面的问题。这是我第二次来北大了。第一次是在 80 年代初,是改革开放不久,到北大来谈艺术方面的问题。那时候好像人也很多,而且听说朱光潜先生也要来。我心里就打鼓,有点不敢讲了。今天像朱先生这样水平的人恐怕很多,我心里还是有些打鼓。因为我实际上是个画家,对理论没有研究。当然,我可以说我是个实践者,因此我把我所实践的

经验提供给理论家来批判,来作为研究资料。所以今天我讲的都没有什么理论性,可能只是一些自己的体会。

今天我主要是讲中西绘画的比较。总体讲两个方面,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先讲一讲中西绘画有哪些不同。正好目前美术馆有个展览,是我们油画协会发起的,就是把西方油画中的风景画同中国的山水画这两个画种拿来同时展出、比较。我觉得这个构思很不错。因为中西绘画理论讲了很多了,实践上更应该拿出来比较。以风景画和山水画作为切口,比较合适。因为它排斥了其他诸如社会、政治的因素,在大自然面前大家一律平等。这样进行比较,容易找到问题。所以这个画展很有意义。在评选的时候,包括孙家正部长都参加了。他们觉得这样的构思不仅是学术性的,而且是挑战性的,是国际性、历史性的。因为中西绘画的碰撞是必然的。21世纪中西美术的碰撞与交融事实上已经是否定不了的,已经是客观的存在。那么今天拿出来比较呢,正好是一个好机会。所以我想先从这方面谈起——我倒不是因为说我也是油画协会的,给他们做宣传,而是因为根据我自己学画的经验,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东西两方面都搞,始终是在中间来回跑,所以我特别支持(指美术馆展览)。我也给他们写了论文,题目是“邂逅江湖”,副标题是“油画风景与中国山水画合映”。

我自己对这个问题有亲身的体会,因为我过去开始学画,是林风眠那个体系,那时叫绘画系,油画、国画都要学,这有很大的好处。后来再分成国画系、油画系,我觉得这样学西洋画的缺点比较大。以我的观点看还是应该合起来。如果我今天有权力改革美术学院,我就不设系,而是先设课,油画、国画、

素描都有。各种课让同学自己选。这是美术自助餐。根据你的胃口,你的用量,去选教师的课。当然,这有个学分限量的问题了。你要选到多少才够你的分量。这样你自己可以挑你爱学的东西,你应该学的,必须要学的。同时,也考验那个教师的课有没有效,有没有用。没有用,这个课就停下来,这个教师就要下岗。我认为应该是这样。因为根据我们过去的学习经验,老是学生不满意教员,总觉得往往是聪明的学生遇上不太高明的教师。这样的情况很多,这对艺术教学非常不利。

一个教师教了一班学生,同一个杯子,二十个人来画,虽然都看出是杯子来,但实际上还是不一样。每个人对杯子感受不一样,我感受的杯子是形,长、短,你感受的杯子是光、滑。每个人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你看的是质感,我看的是体型,另外不同人看到的是节奏。把和顶,线与点,重点也不一样。因此每个人感受不一样,他选择的角度就不同,画出来的东西也就不一样了。那么西方的教学体系呢?西方是以人作为艺术表现对象的主体,主体是人物,从古到今,都是这样。因此,在一个人身上,体现出的每一个时代的审美观点也不一样。比方从希腊、罗马时代到拉斐尔、提香、达·芬奇,这些人表现的人体是很古典的,很完整的。那么波提切利则不同了,他表现人体的韵律感、线、节奏,多方面地表现人体。到马蒂斯,人体又完全不一样了。审美感的时代变迁,都在人体里面体现出来。因为时代不同,每个人的感受也不同。我们一定要重视感受。比方画人,《蒙娜丽莎》与凡·高的《自画像》,都是肖像画,但两者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么再到莫迪里阿尼,画长脖子的那个,就更不一样了。所以同样的肖像,他们画得都很像,都达到了艺术的高峰,但是,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时代的差

异很大很大。这是我们学西洋画的一个体会。另外,西方古代绘画都是以人为主题,树木、风景只是作为一种陪衬,作为一种背景,是次要的。到后来获得了独立的发展,才有了风景画、花卉等独立的画种。西方的大师,作为真正的艺术家,他们的区别不是在题材上面的。他画人物,也画风景、静物、肖像,对象只是作为启发他感受的一个材料,什么东西都可以感受,都可以入画,都可以进入到他的感情。那么他就不光局限在技法上,感受是主要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西就有很大的区别了。西方早期的风景画,也还不是实际的写生,而是在室内闭门造车,画一个大概,因而不是太生动。那么西方真正的风景画,是印象派油画,真正是对景写生,画出自己不同的感受。每一种风景里面,早上、中午、晚上,即使同一个对象也不一样了。这是很写实的。这是我学生时代学西洋画的又一个感受。

同时还要学中国画。那么中国画上课就很不一样了。我的老师是很了不起的老师,就是潘天寿。潘天寿本人很有造诣,我也很崇拜他,他是我的恩师。但他还是用旧的、老的观点来教学生,从临摹入手,什么都要临。他的要求是一定先要笔墨,先要临摹。像“四王”,就是王原祁、王时敏这些人的作品,即使缺少情感,老套、程式化,但是也要临,为了笔墨,硬着头皮临。如果中国画里面没有石涛,没有八大山人,没有弘仁这几个和尚——他们的东西是比较生动、感人的——如果没有他们的这样一些感人的山水画的话,我也不想学中国画。因为有那些东西吸引我,因此也硬着头皮画一些这样的东西。

这样两边学,上午学油画,下午学水墨画。两种教师讲的不一样,要求也都不一样,那么在学生脑子里就打架了,当然也有思索了。因此我就分析构图。中国画的构图,一般都是

立幅的,山从下面开始,一层一层往上。它的构图比较雷同,可以归纳为四个字:起、承、转、合。“起”,往往都是从几棵树,或者一个沙坡,或者石头、水、亭子开始。“起”之后,另外一个山来接过去,叫做“承”。“承”之后,因为很长,要适应这个画面,那么要变化,叫“转”,扭曲一下。转到最后,要“合”。这是中国山水画构图的四个字,总是跳不出这样一个规律,跳不出这样一个框框。这就很单调,你们现在看我们街上挂的山水画,是千篇一律,基本上都是这个“起承转合”。使人感到实在很乏味。而石涛就不一样了,他在这方面有很大的突破。他就不是这么老套的起式。我们看东西,远景、中景比较丰富——因为远了,形象丰富、重叠,而近的东西则单调。石涛却相反,他往往把中景、远景拉过来作为近景,作为画面的主体,而不局限于起承转合,打破了这样一个规律,因此他的东西比较生动。我说他的东西是一种肖像,是山水的肖像画,所以动人、感人。石涛自己也讲了,他的很多山水画是从生活来的,像黄山。所以他也很坦诚地讲他的经验,是“搜尽奇峰打草稿”。

油画是写生的,不是临摹的。写生也会遇到问题,因为写生是对景写生啊,也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远景好看,中景好看,因为远景、中景比较丰富,会重叠,而近景面积大,又空,没有东西,所以我们画画的时候往往为近景苦恼。油画的解决方法就不是起承转合了,而是透视的远近问题了。远与近的东西不好处理,我就想办法把透视规律打破,把近景压缩,因为它不好看。中景、远景反而成为主要的。这有点学石涛了。有的近景不行就把他搬走,移花接木。这样一个转变是从中国画吸收过来的,但是写实的方法从他那里来,感受却是西方的。我觉得,我对中西绘画不同的体会,首先是这个方

面。

其次,是讲色彩与黑白。

西方油画,是讲色彩的。尤其像印象派,实际上是一个写实派,很忠实于对象,忠实于实际感受。忠实到什么程度?就像我刚才讲的,同一个草垛,同一个教堂,早上、中午、晚上,阴雨晴天,都不一样。因此,感受变化,画面也跟着变化,这是很忠实的了。中国画绝对不是这样的。中国画当然也讲“外师造化”,就是“行万里路”,路要走得多,看的多了,“胸中有丘壑”,才能自由组合。组合是概念,因为不是从自然直接写生而来,感觉就少了一些。所以这是两个非常矛盾的东西:一个是非常写实却非常局限;一个是非常概括却非常空洞。中国画对阳光视而不见,根本不看阳光的,只讲构图、构思。西洋画追求色彩斑斓。印象派讲的都是阳光下的色彩,他们没有黑与白,绘画不存在纯粹的黑与白,因为阳光照射以后,白的也不是白的,黑的也不是黑的。因此他们画一匹白马,一匹黑马,白马的阳面是打阳光的,打黄、红等暖色,阴面是蓝的、紫的;黑马的阳面也不是黑的,而变成一种暖色,阴面则变成蓝的了。他们不承认黑白,印象派讲“黑白不是色彩”。但是我们中国画主要是黑白。色彩是次要的,除了工笔画重彩外,一般讲山水画是“浅绛”。浅绛就是水墨已完成了,偶然点一点色彩。中国画以黑白为主,西方呢,排斥黑白,所以这两方面又在我身上打架了。

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我觉得摄影是一个好例子。最早的摄影是黑白的。世界是彩色的,照相出来是黑白的,依然很真、很像。彩色世界到了黑白照片里,同样很真实。那么以后发展到彩色照片,都可以胜过绘画了。有些好的彩色照片,恐怕达·芬奇看到都要五体投地。但是现代的许多摄影师都倾

向于黑白。因为黑白能表现世界的本质,能表现色彩的本质。所以黑白这个东西非常重要。不仅是摄影如此,画家也是如此。印象派已经过去了,现在西方很多画家非常重视黑白,把中国的黑白,包括书法里的一些东西吸收过去。有一批画家,比方到中国办过展览的法国的 Soulayes,美国的 Kline,这些画家都是用黑白二色作画。而中国画则吸收了色彩,浅绛不够,要用色彩来表现了。那么近代、现代,更多的年轻画家不满足于黑白,要用色彩了。但是宣纸这个东西,颜色一点上去就化掉了,像水彩画,它没有力量,没有冲击力。因此要改变工具,用各种方法来改变。西方画家把我们的黑白搬到油画里面,我们也要把他们的色彩拿过来,为我们所用。日本人在这方面做得比我们还早。多少年以前,日本展览的就有两种画,一种叫日本画,一种叫洋画。它虽然标明这边是西洋画,那边是日本画,但是你进去看,却分不清,这两个基本上混淆了,就是说日本画吸收西方的,而油画里面也有日本味。这些变革是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次美术馆这个展览,我当时就建议,一面是中国山水,一面是油画,到圆厅中间,应该摆那些油画往中国画方面倾斜的、中国画往油画倾斜的作品,两者在圆厅里碰撞,就像两军在前线碰撞。

第三,西方完全讲视觉效果和视觉冲击力,中国画讲意境,特别是境界。这两种东西都很重要。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讲:一切写景,都是写情。我觉得讲得非常好。不仅中国画是这样,西洋画也是同样的。他既是写景,也是写情的。至于什么样的情,这就是不同的情况了。比方塞尚,他的画具有很强的建筑性效果,像刀切似的,铿锵有声,音乐感很强烈。这是他的情。Viltlird,一个专门画巴黎的法国画家,他的画有一种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的感觉。他用一种疏密的关系

来表现：一块白惨惨的墙，后面很密的树，或者很小的房子，或者白墙上很小的窗户，有些窗户常常像墓碑。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凄凉的感觉。所以他的情是凄凉的，甚至有一种哀艳的感觉。所以我特别喜欢他，有一种东方味，不靠阳光，而靠疏密关系来衬托。那么凡·高，他画的风景更不得了，这是一种强烈的感情。他让人感觉到地动山摇，风景里面都是一种不安宁的震动。因为他画的那些地方，像阿弗勒，我都去看过，那儿的地平线也是很平的，树也是很宁静的，房子也是很呆板的，怎么在他眼睛里看出地动山摇了？这是他的感情，并不是法国的风景都是地动山摇的，是凡·高的心里在地动山摇。所以他表达的，还是他的一种心态。

中国画讲情，讲意境。物是不重要的。在道理上，这一点与西方是相同的。但表现手法就不一样了。比如说黄宾虹。黄宾虹先生当然有他的成就，有人把他评价得很高很高，有人觉得不怎么高。坦率地讲，我对他的评价也不是很高。他的谈画录里有一句话，西方绘画里最好的作品不过等于我们的能品。中国画分好多品，最起码是能品，其次是神品，再上面是逸品。说西方最好的绘画不过等于我们的能品，是这一代画家对西方的无知。这个无知不是他们的过失，而是我们民族的悲哀，是我们封闭造成的结果。黄宾虹那些画，早期也是很一般，构图也是很老套，层层相因的。那么他好在哪儿呢？倒是他晚年的小品、手卷，里面局部的那种苍茫浑厚的感觉非常好，这就是所谓笔墨了。他整个绘画没有造型，很一般，没有什么特点。但是后来我在香港看了他晚年局部的东西，确实很好。这些东西怎么出来的呢？他活得岁数大，到晚年了，熟练了，笔的运用自如了。我没有见过黄宾虹。李可染先生非常推崇黄宾虹，他和黄宾虹关系很好。他亲眼见过黄宾虹

作画。这是李可染先生对我讲的,黄宾虹晚年画画很努力,画的时候,找不到吸水的,他就把笔往衣服上擦一擦,就造成了意外的效果,产生了毛笔的那种苍茫的感觉。

刚才我讲了,西方好画家不是没有感情,只是同中国画家的感情不同而已。这方面就要讲到诗与画的问题。中国画要有意境,更要有诗意。现在我们看到,中国画基本上都有题诗。画与诗本来是两码事情,怎么能联系起来呢?范宽、李成的画都没有题诗的。范宽的名作《溪山行旅图》,不但没有题诗,连名字都找不到。后来是我的一个老同学,台湾“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专门研究这个的,用放大镜找,在树根那里找到范宽这两个字,这是他很大的一个贡献。所以古代根本不题诗。后来出来一个苏东坡,他说,观王维之画,画中有诗;味王维之诗,诗中有画。当然苏东坡悟性很高,体会到了,这样他就是始作俑者,也闯了一个大祸。从此以后,“画中有诗”,画上的就开始题诗了。实际上“画中有诗”,诗不在画上,而是在画里面。画本身有诗,而不是把诗句放上去。当然有的题诗还是好的,比较贴切。但很多是不贴切的,是为题诗而题诗。这已经是泛滥得不得了了。这种情况下,诗与画是“同床异梦”,不是诗误解了绘画,就是绘画污蔑了诗。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绘画是面积,是平面的,面积的运用类似于文章的结构,非常重要。鲁迅讲,文章里面可有可无的字、句、段都要删掉,毫不可惜。绘画也是这个道理。马蒂斯讲过一句很重要的话:画面上没有可有可无的东西。在画面上不起积极的作用就起破坏作用。那么我们因为很多地方浪费了,结构不够,没办法,就用诗来弥补。这样一来,我们就没有足够充分地重视绘画面积的运用,所以视觉效果就差了。

西方古代绘画不讲诗。就是我刚才讲的油画中的意境,

是我自己体会出来的,我是用一个中国人的眼睛来体会凡·高的感情、气息。他们提出过画与诗的关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波德莱尔第一次说:德拉克洛瓦的画里有诗意。这是他们第一次提到画里面有诗意。对西方来说,画里面有诗,这好像是一个发现。实际上他们都有诗,只不过诗藏在画里面,没有题在画上面。我们把它题到画面上,画里面反而没有诗。正因为画里没有诗,却以诗来附加上去,反倒常常影响了画面的面积。在西方看来,诗与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一个是空间,一个是时间。比如拉奥孔,表现这个题材的既有诗,也有雕刻。雕刻是空间的活动,诗歌是时间的活动,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我们没有解剖这个问题,就囫圇吞在一起,而且越来越糟糕了。古代人比我们高明处在于不知不觉中自然的诗意就进去了。雨果也画画,但是他没有把绘画与文学混为一谈。我们古代的那些画家,如荆浩、关仝、董源、巨然等也都是讲绘画的,他们从来不以诗人的面貌出现。我们现在是有很多的所谓诗画家,又是诗人,又是画家。当然,也有这样杰出的人才,但是很多人其实是把这两者的糟粕搁在了一起。

因此,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很早就归纳了两句话,我觉得归纳得非常好。他说西方的绘画近于建筑,中国的绘画近于文学。西方现在发展一种文学性绘画。就是用文学来代替绘画,不再是绘画,没有视觉冲击力了。而我们正好相反。绘画是文学的注脚。西方除了吸收我们的黑白以外,也吸收中国画线条的流畅。像莫奈晚期画的睡莲,基本上是完全运用笔墨来表现了:水流的线,睡莲的圆,那完全是笔墨画,放大到局部用黑白表现出来,那就是中国画。他们把我们这些流畅的手法尽量地吸收。大家都知道美国的波洛克,他的画面交错缠绵,都是线。那个粘糊糊的油画怎么用线呢?他的办法是

用桶,桶里放了颜料,下面有窟窿,他把布铺在地上,凭他的激情在上面跑,颜料就漏下去了。再换颜色,多种颜色交错缠绵,这实际上正是黄宾虹追求的苍茫感觉,不过他更有色彩感。所以我感觉到,这里面相同的地方很多,表面上碰撞,实质有很多相似。这是我在做学生时,学了油画和国画以后的感受。总之,我觉得,西方现代派画家与中国古代好的画家,如果相遇的话,好像哑巴夫妻,不能讲话,但是马上会相爱。

讲到这里,我想讲讲潘天寿老师。我对潘天寿老师非常尊敬、佩服。他虽然从来不谈西方,但他的作品里面有一种天赋、悟性,吻合了西方现代的造型、结构,特别是构图、结构这方面,呈现出平面分割的特点。所以他的气势很符合西方现代的理论。但他不是从西方学来的,而是自己悟出来的。所以很多外国人来看中国画,看到潘天寿的画,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但潘天寿的观点呢,是要“立足于民族艺术”,立足于民族本位,不动西方的东西,而他的作品恰巧又吻合了西方现代艺术理论。这表面上很矛盾,其实也不矛盾,很自然的嘛,同样的东西大家互通了。他虽然也说,中西画要拉开距离,但这是他在很不得意的情况下讲的。那时中国画与西洋画分系,而年轻学生大部分喜欢西洋画,学中国画的人很少了,中国画比较受冷落,因此他心里有点委屈。他说这话,立足点是要发挥我们民族的特点,是一片爱国心,对艺术的一片忠贞。但是这个话今天被人利用,被什么人利用呢?一些保守的人,他们好像是为了民族的发展,对西方的东西,明的不说,实际上要排斥一点,要躲开一点,要拉开距离。你们想,怎么拉开距离?照我刚才讲的,距离越来越不好拉了。他不给你拉开距离,你怎么办?你只好退;他又进了,你再退,退到后面,你没有路了,你退到哪里去啊?所以有的人说要守住中国画的防线。

实际上,中国画对西方画的防线,已经给冲得七零八落了,已经是防不住了。现在只有冲上去,只有迎面碰撞,不是退让,不是拉开距离,而是越来越近。碰撞、交融以后,不是说就没有中国画的特点了,还是会有我们的特点,特点是消灭不了的。互相越吸收才越丰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西必须是一种互相碰撞,互相吸收,吸收之后再保持我们的特点,这是一条至关重要的路。有很多的论调说,“要保持我们的传统”,“我们要自己的东西发展”。口号是对的,但是实际上,这就像近亲结婚,一代不如一代。你们看这些中国画,你们要看吗?特别是你们这些年轻人。而混血以后的东西,往往强壮。我们不要近亲结婚以后虚弱的躯体,而要杂交以后强壮的体魄。

以上谈的是第一个问题:中西绘画的不同。下面讲第二个问题:中西结合的问题。我是一直讲中西要结合的,但是这个问题:中西结合的问题。我是一直讲中西要结合的,但是这个结合的问题很大。为什么要结合?就是因为结合之后比不结合更好,因为我们近亲结婚不行了,吸收外来品嫁接之后,形成新品种。如果新品种不如旧品种,那就不如不结合,但是往往结合之后不如旧品种。植物上的嫁接我不懂,大概很困难,可能接得好,也可能接不好。那么艺术上的嫁接我觉得更困难。文艺是个活的东西,活的接了以后能不能存活,活了之后,新品种是不是更好,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现在中西结合成了一个很时髦的口号了,画画的人都说他是中西结合,到处是中西结合,遍地都是中西结合了。这个结合里面,坏的占99%。我觉得如果是这样,还不如不结合。因此要分清优化结合与劣化结合。大家都知道这个笑话:舞蹈家邓肯给萧伯纳写信,说我们两个结婚,生个孩子,头脑像您那么聪明,面貌像我这么美貌,那是最理想了。萧伯纳说不行啊,如果头脑

像你,样子像我,那怎么办呢?生理上是如此,艺术上更困难。我们举几个例子。郎世宁,比较早的了,是一个传教士,他搞中西结合,用西方写实的手段,来画中国的花鸟、中国的皇帝、中国的宫廷生活——当然我们要原谅他,在历史上,他还有功劳,他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桥,但是他结合的结果是很丑的。他写实的功力,并没有西方那么高的水平,中国画的韵味,中国画的情趣都没了。像郎世宁的结合,我认为是一种失败的结合,一种劣化的结合。但是不否定他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在中西结合方面,在近代,我认为做得比较好的是林风眠。他的结合,不是技法的结合,不是拿毛笔来画西方的写实——这样的结合是很肤浅、低层次的,他的结合观点是审美观的结合,是西方审美观同中国的审美观的结合,这就扩大了我们的审美观。当然我们古代审美观也有了,以樱桃小嘴为美,现在可能认为大嘴更美呢。所以我们的审美观逐渐要扩大。那么西方的传统,从希腊罗马、文艺复兴一直发展到现代艺术。现代艺术无非是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个是非洲的因素,一个是亚洲的因素。亚洲的中国还比较远,都是日本、波斯的,再是非洲的雕刻,这些进去以后,杂交混种,才产生西方的现代艺术。西方的现代艺术是杂交的品种,不是完全的西方产物。

那么结合以后,就会发生各种问题。如材料问题,手法问题等。现代材料,包括各种新材料,如机器的,电脑的,越来越复杂,这些当然对艺术起促进作用;手法也越来越丰富,这是好的一个方面。但是艺术同科技不完全一样,因为艺术主要表达的是感情,复杂的工具固然有效,但是简单的东西同样不能替代。因为简单与复杂的问题在艺术上,是辩证的。复杂有它的优点,简单也有它的优点,不能替代的。现在陶器制作

技术很发达,但是手工制作的粗陶,那种美感、手感是不能替代的。而且,将来机器越来越替代了人工以后,在艺术上,人手、人脑、人的感情的东西,价值恐怕越来越重要,越来越高。

就以现代京剧来说,背景太多就会影响表演主体。那么现在的背景,后面又是山啦,又是树啦,周信芳都看不见了,所以这个问题应该重视。我同演员谈过,他们也同意我的观点,但他们也无奈。当年盖叫天演武松打虎,没有背景,有人给他建议,你是不是后面打点背景,那会更好。盖叫天怎么讲,“背景就在我身上。”这个话讲得真是精到:我会把背景都表现出来。所以总的讲来,绘画造型艺术,是靠视觉美,视觉美就离不开形式美,是从形式来搞的。好了,现在思想是比较解放了,当时80年代初,我提形式美的时候被攻击的不得了啊,现在形式美变得很普遍了,因此就变成一种游戏了,出现了很多玩世不恭的形式,变得很泛滥了。这又变成了另外一种倾向。艺术到底是感情的传达,如果天下只有一只黄莺,它是不唱歌的,必须有异性的黄莺,它才会唱歌。艺术,也必须要找对象,它是一种传递感情的通道。玩弄形式,没有内涵的话,是走不通的,顶多轰动一下,很快就会被淘汰了。因此绘画的手段,应该一切为了表现感情。现在的情况是:你看,今年全国一次评奖,某个人得了个金奖,过两年,没了,不是他,是别人了。再后来又是别人了。各领风骚三五年。为什么这么一步步被淘汰呢?关键就是“路遥知马力”,这个“力”体现在修养、情操、品位的高低上,体现在感情的真假上,不是玩弄形式。所以我觉得当年我提倡形式美的问题应该说是必要的,但现在有些泛滥了。

还有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有人认为“笔墨等于零”。

因为中国画用笔墨,西方是用油、颜料、布。笔墨是一种材料,是一种工具,是一个奴才,是为我所用的。古代的绘画基本上是制图,带有功利性、目的性,是一幅图,所以过去作品的名称一般都叫图,比方《簪花仕女图》、《五牛图》、《韩熙载夜宴图》、《捣练图》、《清明上河图》,这些名作都是图,都带有目的性。如《韩熙载夜宴图》是李煜要看韩熙载生活怎么样,让人画出这个图来,代替照相。但是这些艺术家,画图时全身心投入进去,因而就逐步进入到艺术了,也就是从制图进入到美术。创作艺术时造型等等都体现在笔墨上了,因此用笔用墨往往是一个很明显的标准。同一般的工匠不一样,工匠画的东西没有笔墨。笔墨开始被重视了,逐步发展以后,到了近现代,笔墨成了一个标准了。一张画,笔墨好不好,好像就是这张画好不好。舍本求末——本来笔墨是要服从绘画本身的,现在反而以笔墨作为评判标准了。实际上是不懂绘画的人才会这样的。说笔墨好坏其实是很抽象的,怎么能拿来作为一个标准呢?所以就有很多奇怪的说法了:这画不错,可没有笔墨。这种怪论很多。一张画如果你画的好,有感受,不管用什么笔墨,这个笔墨都是好的;这张画画得不好,再用什么笔墨,这个笔墨也是不好的。因此我提出“笔墨等于零”的观点。我的文章开头第一句先讲:脱离了具体画面,孤立来谈笔墨的价值,这个价值等于零。我是讲得很清楚的。但是,很多人可能没看这个文章,光是听说吴冠中讲笔墨等于零了,引起了很大轰动。其实我第一句就讲脱离了具体画面,孤立地讲笔墨,笔墨才等于零。我的观点有那么多人反对,可我再拿我的文章看一看,觉得我没有错,一个字都没有错。我举个例子,就是这次展览,故宫把我们历代的山水画也拉出来,作为我们这个展览的一部分,去参观的都是行家,都是搞美术的。有一幅傅山

(号青主)的山水画,但画得不好。看到那幅画,一个女士就讲:这幅画笔墨不好。傅青主的笔墨还不好?那什么叫笔墨?我说是画不好,不是说笔墨不好,傅青主这个书法家难道不懂笔墨吗?所以这个评论很明显是以笔墨来代替绘画。像有些农民画、儿童画也是极好的,但这里有什么笔墨?它不是笔墨,是一种情感的表达,所以好画同笔墨不能混淆。创作是作家要表达自己的一种特殊的情感,非常困难,你怎么表达出来?作品怎样才能产生?这是“无中生有”啊!本来没有,你要创造。怎么创造呢?你把前人用的方法拿来套这个对象的话,永远没有意思,永远是学生的口袋,把他的东西套上来。有些人认为林风眠是没有笔墨的。倪云林画得很瘦,笔条很细,同吴昌硕的粗完全是两码事,哪一个笔墨好?所以笔墨是不能脱离具体画的。皴法也是一样,山有石头山,土坡,因此用斧劈皴来表现石头,用披麻皴来表现土山,有些山石头与土混在一起,用乱柴皴来表现。各种皴没完没了,基本上是用各种线的变化来表现对象。因为中国画手段很有限,就是一支毛笔,毛笔是尖的,它有多少办法呢?只有靠点靠线,所谓笔墨往往局限在点线之间了。后来出来一个米芾父子,米家山水,没有线,云山染得多了,朦朦胧胧,他表现了他自己的感受。不用这种办法不能表现米芾的感觉,这同那些皴法完全不一样。用笔墨观点讲呢,这个笔墨是什么?那么米芾也没有笔墨了。所以现在很多画家,都是抱了这个传统的笔墨不放,抱了几种皴法不放。因此他画黄山,画华山,画五岳、六岳、七岳、八岳、九岳都一样。甚至有些画家到美国去了,画了美国写生出来一看,还是中国的传统山水。我们讲笔墨好坏,是根据哪一个标准呢?谁家的笔墨是正宗,哪样的笔墨是优劣?所以这是空的。我之所以讲笔墨等于零,关键是针对这

样一个问题。

什么是传统？传统在每个朝代都变，不变就是没有传统。我说传统是不断反传统的连续整合。如果没有反叛，不能反掉前面的传统，这个传统就到此为止，从此死亡。在这一点上，我要特别讲到石涛。石涛是中国美术史上很重要的画家，尤其是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文献《苦瓜和尚画语录》。我也看过一些老先生的注解，都看不懂，看他们的解释，越看越糊涂，都没有解释清楚。我不是理论家，我是搞实践的。后来因为打官司，一场官司打得我不想画画了，因此我就读书了，专门去读石涛的《苦瓜和尚画语录》，我觉得我读懂了。我们首先要懂得他的心灵，像懂得凡·高一样懂得他的心灵，才能够深入。我觉得对石涛应懂得他的作品，再看其理论。他的《画语录》里面，关键是他提出的“一画之法”。什么叫“一画之法”？解释历来很多，有佛教的，有哲学的，用各种办法来解释他的一画之法，有的解释得很可笑。什么叫“一画之法”？这是个谜，三百年前的谜。我觉得我已经揭开了他的谜底。石涛写《画语录》，我看是为了反击当时对他的攻击，说石涛没有固定笔墨，这可能是王原祁他们。因此石涛《画语录》基本上是用来反击这个问题的。他经常讲，古人之须眉不能生我之面目。而且石涛经常强调这两个字：感受。这个很重要。中国画家里面很少重视感受，感受是现代的说法，古代也有感受，但没有提出这个名称来。感受是他所主要强调的。他自己感受“一画之法”：“一画之法自我开始，一法贯总法。”这怎么解释呢？从他的作品，从他重视感受这点来讲，我觉得很清楚了，石涛讲的“一画之法”，不是讲一个具体的方法，是讲一个法的观念。就是根据自己的感受来创造表现感受的方法，这叫“一画之法”。因此每一次的感受不一样，每一次的方法也不一样，

这叫“一法贯总法”。任何方法都可以。因此,一画之法是讲法的观念,表现主义的观念,只要表现出来,你用什么方法都可以。他的一画之法就等于表现主义,只不过石涛用了一画之法这么个名称。他经常讲,笔墨当随时代,无法之法乃为至法。把这些观点联系起来看,那么石涛绘画的方法就非常明显,就是表现主义的观点,不要临摹,描写自然,而是根据感受创造出自己的方法来了,所以他的观点讲得很妙。举一个例子,他讲用线用点比较生动。他讲点中国画要苔点,点是来辅助表现的。中国人可能善于总结,但是一总结就死翘翘。刚才讲了几种皴法,就只能用这几种皴法了,不能发明其他皴法,点也是一样,又被归纳了几种点,像瓜子点之类的什么点。石涛对点的看法,讲得非常妙。我不讲他全面的,就引他几句。他说,他的点,有“如胶似漆邐邐透明点”。还有两点从未向人道破,怎么样两点呢?有“没天没地劈头盖脸点”,还有“千岩万壑明净无一点”。他打破了点的观念,提出这样的点,所以他的观念的解放也是非常彻底的,我觉得很了不起。这次正在展出的他的“搜尽奇峰打草稿”,他的点非常突出,他把山淡墨浅钩,把点突出来了,色的位置,色的节奏,对画面起了主要作用,因此旁边有些树,竹林,用细线画,瘦瘦的,不黑,造成一团灰色,这是为了突出那个黑点,黑点在画面上起的作用就好像跳踢蹋舞那个感觉。他完全把感受表现出来了,而不是老套的。所以我觉得石涛毫无疑问应该是中国现代绘画之父,这是惟一的。西方不是常讲吗,塞尚是西方现代绘画之父,从他起绘画的观念改变了,不是描写自然,而是表现自然。但石涛比塞尚早 200 年,应该是世界现代绘画之父。这个不是阿 Q 式自大,而是确实如此。刚才讲到笔墨的问题,同西方相比,西方重油彩,我们重笔墨,色彩也是相对的,也是根据

不同的画面需要来讲色彩。如果孤立地来讲色彩,红衣服,绿衣服,蓝衣服,哪一个好看?绘画上没有好坏,它是相对的,是颜色与颜色之间的关系。关系之间才会产生优劣。比如一幅旧画掉了一块颜色,我要来补这块颜色,明明看了是红色,我调色板上调色补上去,不对,准不对,再调也不对,很难补准,什么原因呢?因为它受画面上的环境的制约,它的红颜色附近是什么颜色,才产生这个效果。我的调色板环境与它不一样,说明它的红色效果常常靠相互关系烘托出来。威尼斯画家委罗内塞的画的特点是富丽堂皇、华丽、金碧辉煌。有一次下了雨以后,威尼斯街道变得十分泥泞,他说,我可以用这个色调来表现一个金发少女。就是说颜色是相对的,尽管用这么脏的颜色,可以来表现一个金发少女,因此,颜色脱离了画面,就无所谓好坏,无所谓价值,等于笔墨脱离了画面,无所谓价值是一样的,也等于泥巴拿来塑成雕塑以后,才有价值,没有塑成形象,没有塑成雕塑之前的泥巴是没有价值的。我讲笔墨等于零,等于“泥巴等于零”,这个意思是一样的。这次展览里面有一张八大山人的山水画,因为他都是简练为主,这幅山水皴的比较多,他的皴法用淡墨浅墨渲染,这完全不是皴法了,有一种好像用刷子来刷的效果。因此,笔墨的问题应该完全根据需要来发展。不考虑笔墨,画好了,都是好笔墨。抱住笔墨不放的观点,我觉得是发展中国绘画的一个拦路虎,应该出来很多武松打虎。那么我说笔墨等于零,还有一种痛心的感受,因为西方许多人认为中国水墨画是没有前途的。那么我们有没有前途?如果局限在笔墨那样下去,那么确实如他们所讲,中国画是没有前途的。我希望发展我们的传统,以事实否定这样的话,所以我才讲笔墨等于零。表面上人家讲吴冠中是革命派,要革掉笔墨的命,实际上,从这个意义上讲,我

是一个“保皇派”。

北京大学艺术学系供稿,录音整理:姚宏波,审校:陈旭光,未经本人审校

编者絮语 中西艺术的确是两个不同的话语系统,其审美理想、表现手法有较大的差异,但作为人类艺术精神的表现,它们又有着共同之处,完全可以互为借鉴。吴先生既是著名画家,又在美术理论上颇有造诣,讲起中西美术来,既有理论见解,又有自己独特的审美体验。

谢铁骊

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

怎么才算一个好演员呢？如果他连演三部、或者多部戏都能够成功地塑造不同的形象，这样的演员才能称得上好演员，称得上表演艺术家。你要是演什么都一样，完全从自我出发，这只能叫自我表现，谈不到人物的创造了。

电影艺术是一门综合艺术

——在北京大学讲演——

这 一次北大邀请我来，我本来不敢来或者说不大愿意来。因为我将近有 20 年没有到大学里和同学中来这样“讲话”了。这次来北大，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偿还我对北大的一份情意。那是在 5 年前，我在北大校园里拍《穆斯林的葬礼》的时候，北大对我的拍摄工作非常支持，分文未收。当时还有很多同学作群众演员，支持拍摄工作。5 年过去了，当初的同学大概都已经毕业分配了，个别留校当教师的今天也不一定能见着了。

我今天要讲什么呢，因为电影艺术的问题太多，从哪里讲起都很困难，所以最后我还是想了一个很简单的题目，就是

“电影艺术是一门综合艺术”。大家一听,也许就会觉得,这不是太简单了吗?尤其你们艺术系的同学,大家都知道,电影作为综合艺术,它就是文学、戏剧、美术、音乐等有机的融合。不过,我今天不是从理论上来讲,而是从我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举一些例子让大家来听一听。也许不能够使大家满意,那就请原谅啦。

现在的电影剧本还是叫“电影文学剧本”,这说明,电影作为一门综合艺术的第一条,就是文学。写电影剧本,还是离不开文学创作的那几个要素,大体就是,有故事,有情节,有人物,有景物的描写,有情绪的渲染,还有所要阐明的主题思想。所谓的“电影文学剧本”统统是按这几个要素来进行,来组合的。再有一个现象,我们电影大都是从小说改编而来的,还有的是从“名著”改编而来的。我自己拍了大概 30 部电影,其中我自己改编的,有 15 部左右,占我所拍摄电影的将近一半。我开始作改编,是听从了一代电影宗师夏衍的教诲,他说你们做导演的不妨自己改一改小说,这样你不必花太多时间,拍起来也方便一些。听了夏公的教导以后,在 1962 年,我选择了《早春二月》作第一部电影的改编工作。在改编中,有的小说是短篇,有的小说是中篇,有的还是长篇。短篇就要把几个短篇糅合起来,例如我前两年拍的《迟桂花》,这是为了纪念郁达夫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杭州方面委托我拍的。我就从郁达夫的短篇中,选了《春风沉醉的晚上》、《茑萝行》、《迟桂花》,还有其他的比如《薄奠》,把它们糅合起来,构成了一个故事片。当然串还是以郁达夫来串,但郁达夫的名字在剧中没有用真名。再比如《聊斋》。《聊斋》故事都很短,但非常精彩,有的就几百个字一篇。我在拍完《红楼梦》以后,厂里希望我能拍一部能卖钱的片子,但又不能拍那些太庸俗的东西,我就在古典文学

中,把《聊斋》中的几篇综合起来,因为这几篇风格也还是统一的。这部片子的名字叫《古墓荒》。

其次,有的小说近于中篇,字数不多,但又不是短篇,如张天翼先生的小说《包氏父子》。整个小说最多不过两万字,要改成一部电影长度是不够的,但是我在很小时就读了这篇作品,印象非常深。在这部电影中我就添加了很多我自己的生活。因为我是江苏人,张天翼所写的背景也是江浙一带,主人公的生活及当时的社会情景,在上小学的时候我就有所观察,有所体会,所以我可以把我过去的这些生活补充进去。我们老家有一个评论家就讲,说谢某人改这篇东西,把在淮阳城里一个中学的名字都用上了。这篇小说改编时张天翼先生还在世,拍完了以后,我到 he 家里,拿厂里的放映机放映出来,请他看,他当时说话已经很困难了,看完以后对我也是点头致意。可惜他后来不久,大概不到半年就去世了。当初说好,我这部电影的开头是以我的身份来采访张天翼先生,有张天翼先生的镜头。我想这个镜头可以长久地保存下来。

长篇小说像《穆斯林的葬礼》,不过它是由作者自己改编的。我改编的有电影《红楼梦》,六部八集,大约 13 个小时,看起来就起码要用三个晚上了。但是这部巨著,不用这么大的篇幅,而是很简单地、局部地、部分地把它体现在银幕上,我总感觉不满足,因此我下了很大的决心,把它拍下来。拍完后我回首一看,自己都不敢相信当时哪来这么大的勇气、毅力。因为当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有人说电视剧拍了,为什么还要拍电影;电影中的贾宝玉我用的是女演员,又有人说我选这个演员就注定要失败。但就是在这么大的舆论压力下,我咬着牙,六部八集全部拍下来,从改编到拍摄花了五年时间。因为有些人不了解情况,就说选演员,当初我们一开始也是要选男

的,但是后来发现有问题,因为这部电影,从开始到完成起码要将近四年时间。这四年中间,我如果选一个男孩子,十五六岁,四五年下来,这个男子的形象会有很大的改变,所以后来选了一个女演员,这个女演员也不是随便选的,她化妆以后得有一些男孩子的味道。《红楼梦》这部作品太富有电影所需要的那种动作性和画面感了,有时候,我读其中的几回,就发现用这几回的篇幅就完全可以拍一部电影。因为这部名著,它是用人物,用人物的性格,用人格的语言来展示矛盾冲突的发展,作者很少站出来解释和评述。所以在进行《红楼梦》改编的时候,虽然进行了很多考证,也请了很多红学家作顾问,但还是有很大的遗憾,这是电影所无法解决的。就说小说中的诗词歌赋,也是没有办法表现的,一首诗你要把它朗诵下来,观众一时还不一定听得懂,你还要给他解释,光时间就要花费很多。在电影中所用的几段也是一些片段或是不需观众理解,用音乐和画面带进去。尽管这样,《红楼梦》中的很多诗词还是不得不舍弃了,这就是电影的手段不如小说之处了。名著改编成电影要超过小说本身是很难很难的。

下面我简单地说一下关于《早春二月》的改编。《早春二月》是一个中篇,正好适合一部电影的容量,但它的难度在于男女主人公的感情交流与发展是通过来往书信进行的。可读信是没有动作的,在电影上无法表达,戏剧冲突也无法进行。我后来花了很大功夫,把柔石同志的所有作品都通读了一遍,这对我帮助很大,从中吸取了很多东西,而且我对小说中的生活也很熟悉。这样我也可以从柔石同志的其他小说,从我们的生活中补充一些东西进去。柔石同志在29岁时就就义了,他在二十一二岁的时候就写下了《二月》。最后定名的时候,夏公写了一个批件给我,建议把片名加“早春”二字,这样给人

以一种希望感,又带有春寒的意思。在原著中调子是比较低沉的,我们就把调子改成激昂一些,去投向革命的洪流。这就是我关于文学改编成电影的一点体会。

第二点,就是戏剧的因素。电影的结构,离不开戏剧的结构和框架,这就是矛盾冲突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尾。戏剧演员的表演对电影演员有很大影响。有些电影表演艺术家是演话剧出身的,现在有很多你们认为是明星的演员也是从戏校上来的。当时有人提出电影应该丢掉戏剧的拐棍,引起了争议,有人说应该丢,有人说不能丢,还没有定论。我的观点,仅供你们参考。戏剧的时空受舞台的限制,一幕开始从头到尾中间不能隔时空,只有幕与幕之间、场与场之间可以间隔时空。我们那个时候电影的确还留有整场戏整场戏的习惯,所以当时提出这个问题的确还是有针对性的。在表演方面,舞台演员声音要穿透到最后一排,因此,他们的表演不得不稍加夸张。但他们在朗诵台词时口齿和语言的表达是不能丢的。举个例子,“你吃饭了吗?”的逻辑重音应该放在“吃”字上,放在别的地方就不对了。另外当时我们在电影的调度上也有些受舞台的影响。在舞台上,演员之间的对话要面向观众,甚至演员的转身也要面向观众转,不要背对观众。这也影响到我们当时的一些电影。舞台有一个面向第四道墙打开的问题,作为电影就不必要了。另外,话剧是靠对话、靠语言来传达的,电影就不一定了,不能完全靠语言来传达。在1961年创作会议上,夏衍同志提出我们电影的四个缺点之一就是对话太多。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确应该向一些掌握整个电影技巧的西方电影学习,它们的对话不像舞台剧那么多。有一部日本电影《裸岛》,一句对话也没有,这也是它的一个创造吧。现在有些人要把话剧改成电影,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我看要超过话剧是不容易的,因为话剧的结构是很严密的。像《雷雨》一共四幕,它的结构是非常严密的,要改编成电影,你就一定要打散它。越打散,就把它最大的优点,即结构的严谨给打掉了。所以著名的话剧要改成电影是很困难的。这是我的感觉。我们在戏剧中间,不单是话剧,也包括古典戏剧,也都是去吸收它们的优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在这里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红楼梦》的演员,当时在全国选了有大概十个剧种的。我为什么要找这些演员呢?(当然也要看他们的表演,他们年轻,程式化的东西不是很多。)因为他们穿起古装来比较舒服、自然。当时我说:你们的身段,我要你们保留30%,另外的70%留给电影,因为穿古装要是没有一点身段怕是很困难的。另外我想举《早春二月》中的一个例子,在《早春二月》中,肖涧秋拿着笔改卷子时,听说文嫂死了,强压住内心的激动,很沉稳地站起来,拿起笔往笔套子里插,插的时候这个笔就直抖,插不进去。这也是从戏曲中吸收来的。所以你们也要看看戏曲。中国传统的戏曲,包括地方戏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所以关于“戏剧拐棍”是丢是不丢,要做具体的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地全丢掉,我们可以有机地结合嘛,你能结合多少就结合多少。

下面我讲一讲美术在电影中的作用,包括建筑和雕塑在内。置景或搭景是美术工作重要的一部分。它像建筑师一样,要画成一个蓝图。在置景方面,有内景、外景、场地景的区别。内景是指在摄影棚内搭的景;外景是外面的那些山山水水,包括一些室景,像这个大礼堂,我们电影界的术语讲叫外景。在《红楼梦》里,有一场“白雪红梅”,需要把一个“栊翠庵”搭在一个高坡上,还要有桥、有水、有河,搭起来等雪。本来要到东北,预算要50万元,花不起,后来花了5万元搭在一个院

子里。这是很冒险的,要是不下雪就只好人工布雪了,正好天公作美,下了一场大雪,所以有的时候也是要靠天吃饭的。现在北影厂的“荣国府”就是当时我们拍《红楼梦》时搭的,现在成了一个旅游点了。拍古代题材的影片,建筑还好办,就是怕表现路途。原野,古代也是原野,也是山山水水草草木木,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但路与现在差别就大了。为了使观众多一点古代感,我就在路边搭一个碑亭,这样对路的现代感就能稍微破坏一些。

另外我再讲一下化妆。化妆也是美工的一部分。化妆,我想在座的女同志都应该知道,一种是自然妆,这个好办,就是你本来的样子嘛,几乎不要化妆,如果你脸白了一点,稍微弄一点薄薄的油彩就行了。另一种是美容妆,现在电影对美容妆很注意,那个电影演员,主角是怎么漂亮怎么好,甚至很多年岁大的演员也都要这样子,那个绢纱咱是左绷,右吊,粘上以后,那油彩要画得很厚,不然你盖不下去呀!过去我们电影还是比较考究的,在化妆上很少有穿帮的片子,化妆师化妆时起码要有一两个助手盯着。现在电视就不讲究化妆,很多演员绢纱的痕子都看得很清楚。这在电影里是通不过的。在电影里,演员上场之前,我们要看了以后,确定演员的化妆能保证拍近景了,或者能拍特写了才行。

下面讲讲美工方面的道具。道具是个很复杂的问题。道具分两种,一种叫陈设道具,一种叫戏用道具。陈设道具比如说就是这个房子建设好了,用道具来布置,叫陈设。戏用的,就是演员手里拿的道具。道具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有时候我们向人家借的道具都是很贵重的,你一旦给人家损坏了,或者换了,这就很麻烦。有一次在故宫,那个西太后用过的餐具,故宫方面派五个人跟着餐具来。这不能怪人家。要

是现在呀,恐怕连想都不能想,因为现在故宫根本就不让进去拍。

下面谈一谈摄影。摄影既有技术成分,也有艺术成分。技术部分有对机器的掌握,有胶片的感光问题。摄影艺术,它跟照相又不同,它是活动的画面,不是固定的一幅。早期我们的电影有点受苏联的影响,苏联早期的电影十分讲究画面,有些电影每一个画面都能够形成一幅画。但是后来我们发现,电影的镜头应该是活动的,它的画面不是一幅一幅地进行的。于是就提出一个口号,要把那照相的白边,也就是那个相片的白框框打破。现在的电影就好多了,灵活得多了。这也是因为我们逐渐受西方,尤其是受到美国电影的一些影响的原因。

我前面已经把我们的主要部门和它们的关系大致说了一下,我现在来谈一谈同演员的合作。我们现在的演员,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我前面说的带有舞台表演的痕迹,一种是太自然主义化。所以如何指导演员表演、与演员合作,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了。演员的表演是否正确,用什么东西来检验来判断呢?一是按事物发展的逻辑,一是按情感发展的逻辑,用这两个逻辑来判断。事物发展的逻辑在剧本、在导演各方面,这些应该说在拍摄之前就已经注意掌握了。而情感发展的逻辑则由演员掌握的比较多。比如,有的时候我们有些演员在舞台或电影上突然没有来由地哭了,令观众莫名其妙;有时候演员在银幕上哭得很厉害,下面观众反而哈哈大笑,这就是因为你没有把观众带入规定情境中去,没有诱发他们,所以现在我们对演员要谈情感逻辑,也就是要合情合理吧。我举一个例子,刘姥姥一进大观园的时候,那个小孙子摔了一跤。刘姥姥赶紧给扶起来。头上有个包,就给揉揉,揉完了,“啪”——拍那么一下就算完了。扮演刘姥姥的赵丽蓉表演得很好,因为

刘姥姥是一个乡下人,小孩子摔一下不算什么的。要是贾宝玉摔一下那就了不得了,那连老太太都得惊动。而刘姥姥就是那么揉揉,揉完了一拍,好像是一种安慰似的——“没什么事儿”,这是很合情合理的。这就是规定情境中的人物的情感逻辑。什么是规定情境呢?就是在具体时间,具体地点,具体情况下人物的情感表现。我提醒演员时时不能忘记这个。我们去考验演员的表演是否正确,就要从这几个方面来看。

另外就是关于表演中的动作学说。动作除了包括伸手呀,踢腿呀,走路跑步呀这些形体动作,另外语言也是动作。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在动作学说中间,更重要的是心理动作,就是人物心理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愿望。刘姥姥刚进大观园的时候那么谦恭,对王熙凤那么小心,说好话,这很简单,不就是想弄得王熙凤给她一点银子吗?但自己又不好张口,不好意思,所以既有欲望,同时这个欲望又是隐蔽的。

下面讲讲关于演员情感的投入问题。情感投入非常重要,有的演员情感投入得很快,有的则较慢,但你还不能硬挤他,挤出来的是假的。有时候我们为了等这个情感,可以暂停,甚至可以把灯关掉,让演员冷静一下,好好考虑考虑。有时候我们用他(她)的对手来帮助诱导,也只能到此为止。实在不行呢,我们也只好使用甘油——不能用眼药水啊,因为眼药水进去他(她)会吸收的,脸上也挂不住,而甘油可以挂住。如果要让他(她)流泪,甘油进到眼睛里,眼睛一受刺激就要流泪,但是老实讲,有些用甘油刺激流泪的,我们一看就能看出来,就从它那个镜头的分切,我们就能看出来。再一个,跟演员合作要唤起他们的体验,只要能唤起一点,再演起来效果就会很好。我们现在选演员,好像就是要漂亮,大概观众也认这个。那么怎么才算一个好演员呢?如果他连演三部、或者多

部戏都能够成功地塑造不同的形象,这样的演员才能称得上好演员,称得上表演艺术家。你要是演什么都一样,完全从自我出发,这只能叫自我表现,谈不到人物的创造了。当然,现在年轻的演员们还是不断地成长,我也希望将来在你们艺术系中,能够出现,也肯定能出现编、导、演方面的人才。

我今天要讲的内容很多,有的是常识性问题,也许大家早就知道。最后,我要把江总书记关于电影的“精品意识”的三句话说一说。江总书记在视察八一厂时提出,我们的电影生产要有“精品意识”。“思想要精深,艺术要精湛,制作要精细”。这三点是当前我们电影工作所要努力达到的。当然要达到精品还要经过时间的考验和历史的考验。这就是我今天讲话的结束语,谢谢大家。

问:现在有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说电影是综合艺术,还有一种说电影是机器的语言。请问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答:对电影的看法,有各种流派。像法国有新浪潮流派,它就是不要故事,不要情节,只要电影画面和画面之间的组接。我们年轻导演不是有一种探索片吗?他们也在探索,我们对这种探索也应该是肯定的,但是他们探索的结果还是回到我们传统的老路上来了。将来电影怎么发展?科学进步了,电影也会更进一步发展、改变,这也是可能的。

问:您对新一代导演,比如张艺谋、陈凯歌、姜文等如何评价。

答:他们的确有一种创新的精神。按你们的划分我们属于第三代,或第四代,像黄建中、谢飞,像陈凯歌、张艺谋算第五代。第五代导演有一些影片的确是有突出的表现的,在国际上也有得了大奖的。对于我们这些前辈来说,只有去鼓舞

他们,决不会去泼冷水,去打击他们。但也不是说他们的电影就无可挑剔。

问:古典名著的韵味和由此改编的电影的韵味是不是一回事?如果能统一,是为什么?如果不能,那么改编是否就是对于古典名著的一种破坏?

答: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如果说电影有韵味的话,它应由小说的韵味而来。但是电影也有长处,能够普及,用形象化来使观众感受,比如有些人看不懂或没机会读《红楼梦》,如果他看了电影,也就能有所了解了。至于这个韵味,电影是怎么也超不过那些名著本身的。

问:电影有了形象之后是否限制了人的想象?

答:这是没有办法的。比如说《红楼梦》,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林黛玉,可是电影拍出来,就这么一个,就强迫你接受了,这也是电影不如小说的一个方面。但是这里面的长处我刚才也说了。另外作为一个导演,你的想象力应该超过一般观众的想象力,否则你就是平庸的,当然我也不是说观众中就没有想象力强的人了,比如说我们要拍导弹题材的电影,那些导弹专家一看就感觉你是外行,所以这个想象力你也要从生活中去积累,去观察,从各种小说、电影中去吸收,所以你们将来要做导演的话,想象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北京大学艺术学系供稿,录音整理:王晓宁,审校:陈旭光,未经本人审校

胡智锋

北京广播学院副教授 《现代传播》副主编

90年代中后期为什么倪萍不再火爆了呢？这不是她个人的原因，而是因为她代表的这种节目样式开始走向衰落，人们的兴趣点发生了转移。

《焦点访谈》找到了一条路子，就是人们所概括的所谓“领导重视，群众关心，社会普遍存在”。这是中国特色的，这几句话来之不易，是经历了种种痛苦得来的。它是一种宣传艺术，很高超的宣传艺术。

中国当代电视观念的沿革

——在华中理工大学演讲——

各

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很荣幸能登上享誉海内外的华中理工大学人文讲坛，就中国电视观念的沿革谈一点自己的想法。据我所知，华工新闻系不仅是全国理工科学校中最早创办的新闻系，而且也是改革开放

后最早创办的新闻系之一,在我工作的北京广播学院,近几年就有十几位来自华工的学生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因此,希望我的演讲能有助于加强我们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同时,也有助于加深大家对电视这一传媒的了解。

首先,让我们来简单地梳理一下中国电视传播业的发展脉络。中国电视传播业是从 1958 年起步的,其标志是北京电视台即中央电视台的前身的成立。大致经过了两个大的段落。

第一个大的段落是从 1958 年到 1978 年的基本建设阶段。首先从大众传播体系来看,电视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在这期间只不过是图像把广播、报纸、杂志等其他媒体的信息播报一下,等于再传播。这时,电视独立的传播特征和样式还没有形成,或者说电视的独立性还没有明显地凸显出来。其次,从艺术体系来看,传统艺术样式,如音乐、电影、舞蹈、美术等,已经比较成熟了,形成了自己独立的艺术特征,而电视呢,无非是把这些艺术样式通过图像传播的方式,在电视荧屏上再现一下,比如说对音乐会、各种舞台表演的转播等等,基本上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艺术特征。所以说,不管是信息传播,还是艺术传播,在这一阶段,电视基本上都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样式,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特征。

1978 年改革开放给电视带来了发展机遇,从 1978 年到 1984 年,电视的地位逐渐上升,特别是在 1984 年前后,国家成立了广播电视部。中国电视传播业从此进入了其发展的第二个大的段落,即本体建设阶段。

1978 年以后,我们从国外引进了先进 ENG 一体化摄录设备,这个一体化的设备解决了什么问题呢?解决了一个电视的声画同步问题。原来电视新闻节目说是直播的,其实并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直播,只能叫原始直播,因为当时的所谓的直播都是播音员事先背好稿,现场卡口型。再比如原来拍电视,是用胶片先拍图像,再录声音,然后一块合成。有了这个ENG一体化摄录设备,就轻松多了。声音和图像可以同时被记录下来,这样就可以大量地录制节目和储存节目,节目播出逐渐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这个难题的解决是中国电视传播发展的重要一步,大大提高了电视节目的生产力。

与此同时,电视开始被迫跟其他的传播样式和艺术样式断奶。原来电视主要靠电影部门提供片子播一播,但随着电视覆盖面扩大,传播能力增强,再加上从1979年开始,上海播了第一条广告,酒的广告,电视慢慢地可以挣钱了,电影界、戏剧界和其他新闻媒体发现电视火起来之后,都不愿意再继续给电视提供信息、提供节目了,逼得电视不得不探索自己的样式,做自己有独特样式的节目。于是,生产电视剧、电视专题片和纪录片就成了一个迫在眉睫的事。这样,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电视就进入了大发展的本体建设的阶段。所谓中国当代电视观念的沿革也主要发生在这一阶段。

我认为80年代和90年代还是有所不同的。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80年代可以称作电视制作人的时代,90年代则可以称之为电视制片人的时代。

前面我们说过,进入80年代,中国电视进入了飞速发展的阶段。有资料说1958年全国只有50台电视机,电视台也只有一家。到1978年,全国也不足一万台电视机。而进入80年代后,各个省级电视台突然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了。1983年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上,吴冷西部长提出了“四级办电视”,一下子把电视的覆盖面延伸到了县一级。这样电视在80年代的发展异常迅速,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电

视事业成为了中国各项事业里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

电视媒体的发展如此之快,但人们的电视观念如何呢?电视到底是什么?不知道。于是大家就要学,学什么?发现电视跟电影最像,于是就学电影,按照电影的模式——制作方式、剪接方式和美学原则来指导电视的制作。电影的生产方式主要是艺术创作,一个好剧本、一个大导演或一个大明星就意味着可能带来一个好片子。这就意味着电影的质量取决于制作者的水平。电视在80年代也是这个情况。就是说,电视媒体如果有自己非常有水平的节目编导,它就有可能在竞争中取胜。所以整个80年代电视人的口头禅就是“干什么呢?”“做片子呢。”我们从“做片子”这三个字就可以看出来,80年代电视人对电视的理解,就是拍片子,做片子。所以,它的竞争还是取决于制作人的水平和能力。

到了90年代,随着电视媒体自身产业化水平的提高和中外电视交流的频繁,大家越来越不再把电视仅仅看成是一种艺术,而是更把它看成一种传播媒介。电视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它竞争的是什么呢?如果说投资上百万,花几年时间拍出一个大片,来证明你这个台的实力是80年代的骄傲和标志的话,那么,到了90年代就发现这种做法是得不偿失的。就算你台里养了几个有水平的编导,也依然可能会在竞争中失败。因为你这个媒体生存和发展的水平,不仅仅取决于某一个或者某一些编导、制作人的水平,还要看你的名牌栏目的运作水平。如果你有一档或者几档名牌栏目,那么,就可能带来巨大的广告收入。将这些收入投资到你投资的作品上,你就有可能在竞争中取胜。所以说90年代是制片人的时代。这时,电视更需要一个制作群体,这个制作群体的统帅就是栏目的制片人。如果你这个台里有几个出色的制片人,这些人不仅

仅有艺术头脑,更有经济头脑,运作头脑,那么,你这个台就可能抓住时机,同时带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只有产生这种效果,这个媒体才能立得住。

有同学或许要问,90年代之后,什么样的人会成为电视传播业的主导力量?我个人认为,下面可能会进入电视策划人的时代。为什么呢?现在大家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觉,我们的节目千篇一律的情况非常多,频道资源浪费得很厉害。一档名牌栏目出来后,马上有一堆跟上“克隆”。这个情况说明我们的电视策划资源匮乏。这个问题制片人解决不了,光会运作和有一定的艺术头脑还不行,还需要一个智慧的头脑,而智慧的头脑需要综合的能力,能够根据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运转情况及时地做出判断,提出可操作性方案。这种人就叫“策划人”。

所以,我认为中国电视传播80年代以来的本体建设阶段,可以用制作人时代——制片人时代——策划人时代来概括和表述。与此相应,不同时代的主要电视节目样式也表现出其各自不同的特征。

具体说,80年代是电视专题节目及综艺、电视剧节目的年代。首先,由于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各行各业都有很多事情要表达,这种表达需要很多电视节目去反映它,而且基本上就是靠电视专题片的形式来体现。这种有确定的主题、完整的构思和针对性导向的专题片可以说是80年代电视屏幕上的主体部分。

从1983年以来电视文艺出现了综艺晚会,其标志就是春节联欢晚会这种形式的出现。晚会也成了80年代电视审美消费的主要热点和焦点,所以,倪萍就成了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电视的一个缩影。90年代中后期为什么倪萍不再火爆

了呢？这不是她个人的原因，而是因为她所代表的这种节目样式开始走向衰落，人们的兴趣点发生了转移。整个 80 年代到 90 年代初，当时社会发展迅猛，人们更需要一种赏心悦目的，既体现传统的文化品格又体现当代人审美取向的艺术形式，而晚会形式比较符合这一阶段人们的审美需要。客观上人们开始住单元房，不再住大杂院，人与人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看电视的机会越来越多；再加上其他诸如城市不准放鞭炮、没有庙会等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春节晚会或者综艺晚会，在某种意义上补充了人们对这种群体性仪式化的需要。因为人是有群体生存需求的，有大杂院，大家聊天啊，串门啊，觉得很自然，可能看晚会的时间就要少一些。一旦这种方式取消了，或者因为大家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了，这种心理需要怎么去满足？看晚会！晚会热闹。于是，综艺晚会专题片就成了 80 年代最热手、最受欢迎的电视传播样式和艺术样式。

当然在 80 年代，我们同样不可小瞧电视剧的发展。由于电影的生产力在下降，同时电视剧的低成本使大规模生产有了可能性，像《三国演义》拍了 84 集，《红楼梦》拍了 37 集，这种多集拍摄，相对成本不算太高，同时经过后期开发还可以带来新的效益，比如影视基地，可以带来各种各样的旅游收入，诸如此类的因素使得电视剧的生产大规模地增加。大家在影院里看电影觉得不方便，在家里又看着不着电影，怎么办？电视剧就取代了电影的地位，尽管失之粗糙，但毕竟还是出了很多好的东西，慢慢地电视剧也找到了自己一些独立的特征。

进入 90 年代，大家发现电视突然风头一转，最大的改革力度出现在电视新闻上。为什么呢？80 年代改革开放的初期，社会发展迅猛，而 90 年代是一个平稳发展期，或者说，是一个社会的转型期。特别是在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国际政

治风云变幻,使得社会的文化构成和社会生活方式,包括国际的、国内的各种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越来越需要一种务实的东西。面对社会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人们更多拥有的是在适应从计划到市场转型期的一种阵痛。这种阵痛的力度是很大的,好多人不习惯。比如下岗,一个人突然发现没着没落了,这是很痛苦的事。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恐怕娱乐不起来,高兴不起来,也欢快不起来。所以,如果说80年代人们最需要的是,用现在的说法,叫做“解闷”;90年代则更多的是要“解气”和“解惑”。大家心里有气,需要“解气”,通过电视来泄气;大家有困惑,通过电视来“解惑”。

于是电视大量地需要新闻节目,尤其是深度报道,到《焦点访谈》的出现则达到了一个高潮。《焦点访谈》的前身是“观察与思考”。它从80年代初期开始创办,三起三落。当时这个节目还是有一些影响,但是一会儿被“毙”掉,一会儿又活起来,结果一直就没有生存得很好。《焦点访谈》找到了一条路子,就是人们所概括的所谓“领导重视,群众关心,社会普遍存在”。这是中国特色的,这几句话来之不易,是经历了种种痛苦得来的。它是一种宣传艺术,很高超的宣传艺术。这里头有很多智慧,包括时机、尺度、分寸的把握。电视新闻的改革带来了电视的一些新的需要,大家对电视的时效性、直观性和务实性等等,都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电视的观念在90年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说,电视在90代的成长速度超过了以往的30年。具体地说,我认为90年代电视主要经历了五种新观念的沿革。

第一种新观念是电视纪实观念。尽管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解决了纪实的技术上的问题,但观念的问题并没有解

决,大家还习惯于传统专题片的思路——主题先行和画面加解说词。这种方式对社会生活的呈现是经过了主体加工的,而这种主体加工又有非常多、非常强的指令性和主观导向的色彩,达到极端的样式可能会出现主观粉饰现实的情况。这种风气在 90 年代需要务实的环境当中已经不适合了,大家呼吁一种新的电视节目样式。1985 年以后,我们连续搞了七届中日纪录片的交流展映等活动,在中外纪录片的交流当中,大家发现了纪录片的一种新创作方式,就是纪实方式。

什么是电视纪实呢?我认为电视纪实有这样几个特征,一是从主题先行变成了主题后行。在记录拍摄生活状态的过程中,不带有任何框框和有色眼镜预先设置主题,而是在跟踪生活过程当中,自然而然地得出主题,甚至也不要去看主题,而是让大家去感受这种主题,这是第一个特征。电视纪实的第二个特征就是跟踪拍摄,所谓跟踪拍摄是跟摆布拍摄即“摆拍”相对应的。以往的电视专题片的思路就是摆拍,我想好了,摆布好了,让你再走一遍。于是我们发现千篇一律都是主人公从后景走到了前景,从田地的那头走到这头,走到你跟前。业内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摆拍,电影可以,但是电视用这种方式就是非纪实。真正的电视纪实只能跟踪拍摄。你不能改造他、摆布他,而是依据他、遵循他,遵循生活自然而然的流程和规律,而不是主观地去改造生活本身,摆布生活,这是对生活的最大的尊重。电视纪实的第三个特征是抓取不可预测、甚至是带有一些悬念的生活细节。尽管我们说纪实是完全跟踪生活、不能改变生活自然的流程,但也不是说就不能去想象。应该根据编导、节目创作者的生活经验,大概预测会出现什么结果,要设定可能会出现几种情况。当然有些情况确实想不到,就要赶紧地抓住它,而往往这些细节是电视纪实当中

最珍贵的段落和镜头。如果一部纪录片里头出现了这种丰富的、不可预测的、稍纵即逝的细节,这些又往往是自然生活过程中最真实、最有感染力的一些东西,你抓住了并把它们记录下来,你就成功了。之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唤起观众的一种期待,达到一种非常好的收视效果。电视纪实的第四个特征是要有一段相对完整的生活段落,或者生活流程,不能任意地裁剪。在一部完整的纪录片里,起码要有一两段完整的、不间断的生活流程。传统的电影蒙太奇的思路就是“啪啪啪”地剪,而纪实电视更倾向于长镜头的应用。所以按照这样一种要求,电视纪实体现了两个技术上的特征,一是长镜头的应用,长镜头就是说,记录生活相对完整的一个段落,而不是任意剪裁;二是同期声,即同步记录人物自身的声音,还包括周围环境的聲音。

电视纪实在 90 年代初的代表作是《望长城》。《望长城》的成功拍摄标志着中国电视纪实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电视纪实作为一种观念开始进入电视人的头脑中,很快影响全国,有人把它称做“纪实主义”。从这开始,电视本体建设也进入一个大发展的阶段。如果说过去电视是被动地吸收文学、戏剧、电影、广播、杂志和报纸的艺术样式和信息,被动地依赖和遵循它们的传播样式和特征,那么,到了 90 年代,电视开始反过来辐射他种媒体。比如戏剧,开始出现了纪实性的戏剧,报纸开始出现了纪实写真,甚至在一些电影中我们也能感受到电视纪实的影响。

电视的纪实观念意义重大,其突出的功绩是造就了一大批电视纪录片。中国电视纪录片从 90 年代开始,进入国际,开始获得国际大奖,其中包括四川台的《藏北人家》、《回家》,山东台的《壁画后面的故事》,上海台的《德兴坊》、《十字街头》

等等。

特别是到了 90 年代后期,我们在《邓小平》和《香港沧桑》这两部 90 年代的代表性巨片里看到了电视纪实的深刻影响。尽管是传统的政论体的纪录片,但《邓小平》和《香港沧桑》中也体现了浓重的纪实特征。以中央电视台军事部和上海电视台的国际部纪录片室为代表,再加上山东电视台,四川电视台,包括浙江电视台,还有全国几个比较优秀的电视媒体,在这个方面表现得尤为出色。而这种电视纪实的观念,作为栏目形式,成为一个栏目的标志性的制作样式,则体现在《东方时空》的“生活空间”上。整个“生活空间”完全按照电视纪实的方式来拍摄,是典型体现电视纪实观念的一个栏目板块。

第二种新观念,是电视栏目化观念。1993 年 5 月 1 日中央电视台开播了一个著名栏目《东方时空》,标志着中国电视进入到了栏目化的阶段。所谓栏目,就是应该有统一的标志,统一的时段,统一的编排方式,统一的串联,统一的风格,有一种相对稳定的规范。在栏目化之前,中国电视的传播、播出和 production 方式经常是由个人意志所决定的,就是我说的制作人时代的特点。比如说我自己有这个兴趣,或者上级交给我一个任务,所以我要来做这个节目。而栏目化意味着什么?不管上面怎么要求,也不管个人有什么兴趣,只设定一个固定的时间段,在这个时间段里,栏目的结构、风格、编排方式、制作方式和栏目音乐等是完全统一的。比如到了早七点我看《东方时空》,第一板块肯定是“东方之子”,第二个板块肯定是“生活空间”,或者是“音乐电视”,第三个板块肯定是“时空报道”,是非常固定的。这种相对稳定的规范的生产和播出的样式,至少产生了两个效应:第一造就了一批有较高知名度的名记者、名编导、名主持人和名制片人。在此之前,我们可能会问,今

天播什么？但是到了栏目化阶段，星期几播什么，是基本稳定的，不会轻易变动的。特别是日播节目，日版节目，尤其像“东方时空”一天滚动好几次在几个频道上播出，白岩松天天出来，用相声里的话讲就是混了一个脸熟，大家天天见你，就熟了，你的出镜率甚至比领导人都要高。带来什么效果？你就成了名人。而一个媒体拥有了自己的名人队伍就意味着它的效益。由于天天看这些名字，天天看这些脸，你就知道了《东方时空》的制片人，它的编导，它的主持人，它的记者。对于一个媒体来讲，这种明星效应，名人效应带来的是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第二个效应，培养了相对稳定的观众群。就像我们晚七点钟要看《新闻联播》一样，到了几点要看什么，变成了一种收视习惯。一旦一个人养成了这种收视习惯，他就成为了稳定的观众。如果说有一批观众大家都有这个习惯，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观众群。相对稳定的观众群就是收视率的保障，而收视率带来的同样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实际上栏目化使得媒体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一个媒体要想竞争成功，战略之一就是要推出自己的名牌栏目。

第三种新观念是电视谈话的观念。以 1996 年 3 月 16 日开播的《实话实说》为标志，电视谈话类节目迅速崛起，成为各电视媒体竞相模仿的一种生产和传播方式。事实上电视谈话类节目是西方电视的主体样式，在整个西方电视节目中可以占到 60% ~ 70%。电视谈话类节目体现了媒体的真正价值，可以真正实现观众的参与和交流。谈话类节目实际上就是人际交流在媒体中的延伸，由媒体根据观众的兴趣设置话题，或者预测观众的一种需要，邀请观众和观众的代言人出场，展开谈话。如果说，纪实和栏目化只是实现了阶段性的一种开放，

那么,谈话类节目要比纪实和栏目化更开放。因为在纪实和栏目中老百姓的参与也是受限制的,而谈话类节目可以是相对不受限制的,当然我们只是相比较其他的节目样式而言。像香港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的节目,它几乎是有开头,没有结尾——结尾是没法预测的,充分地体现了谈话的开放性。如果说,纪实已经实现了局部的不可预测,当然这个前提是它抓住了不可预测的生活细节,那么,谈话类节目就是不断处在开放中,不断处在不可预测中,因为,在自由和开放的谈话环境中,关于某个话题,谁也不知道这个人会说什么,那个人会说什么,这样,观众的参与就达到了相当自由的程度。生活中人与人的谈话可能是有很多琐碎的东西,电视的谈话则既是高度浓缩的,又是充分展开的。正是这种相当规模、相当深入的观众参与,展现了谈话类节目的魅力。我们有的教授甚至指出,21世纪是对话的世纪,也就是说,谈话类节目将成为电视节目的主宰。

第四种新观念是电视直播观念。像《实话实话》这样的谈话类节目是开放的,但毕竟经过剪辑加工改造过的,也是经过了部分设计的,其开放度和它的惊心动魄的或震撼人心的那种感觉和感受还没有出现,或者说还不足够,那么,现在第一时间段的报道就成为了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重大的历史时刻、重要的信息,我能不能现在进行时地同步介入?如果能够实现电视大规模的直播,就等于每个观众都有可能直接介入重大历史时刻的进程中,如果能够实现这一点,电视所产生的魅力将是无与伦比的,没有任何媒体可以代替它。这一点的突破是在1997年,代表性的直播是中央电视台的几次大的直播活动。两次是社会性的——黄河小浪底工程和长江三峡大江截流的现场直播;一次是政治性的——香港回归的现场直

播,这次直播震惊中外,也达到了中国电视收视率的最高点。所以这个节目带来的效益就不是其他节目所能比的。再加上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联合直播的“柯受良飞跃黄河”,实际上搞了四次大型电视直播。1997年以后,我们又搞了大量的经济报道直播,比如“3·15 特别行动”直播。直播已经成为一个电视媒体的实力、水平和魅力的某种象征。1998年在中国新闻史上可以大书特书一笔的,是中央电视台首次直播了江泽民和克林顿在北京举行的中美首脑高峰会的记者招待会,这是需要有极大魄力的——我们敢于向全世界直播中美两国元首的政治对话,其政治效应和国际影响是巨大的。这说明什么问题呢?直播包括谈话类节目,它的开放性和第一时间的报道实际上是最具电视魅力的,也是最体现电视特征的。声音、图像和文字同步记录,卫星传送和微波传送同时使用,几乎调动了电视全部的技术手段。这种立体、全方位、多层次报道的实现,第一依赖于电视媒体的整体技术实力和报道能力,第二依赖于社会的民主化程度和水平。同时,电视直播的实现也对促进社会的民主化起到积极的、其他媒体和艺术样式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其意义不可低估。

第五种新观念是电视的游戏娱乐观念。1998岁末 1999年初以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等为标志,一大批电视游戏娱乐节目走红全国。湖南卫视,从一个地方台杀出来,带动全国电视的一种走向,这也是一个奇迹。一个“快乐大本营”,一年几千万的收入,影响力和媒介魅力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以“大本营”、“快乐”、“欢乐”、“总动员”诸如此类字眼出现大量的游戏娱乐节目,成为各家媒体竞相出台的新的主打节目和栏目。

这个现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电视的每一次

观念变革其实都是对于以往这种观念的开发不足或开发不到位的一种补偿。电视游戏娱乐节目的崛起和火爆说明了我们以往的电视过于重视说教,而比较少地顾及到它的游戏娱乐功能。游戏娱乐是人的一种本能,它是无时无刻不通过其他样式来表达的,游戏娱乐节目的走红实际上是人们把游戏娱乐的本能愿望通过电视来宣泄来表达。但是所有的补偿都是阶段性补偿,一个浪潮的兴起是对过去开发不足的补偿,但是一旦补偿到位,它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它就变成了一种常规的观念和常规的样式,所以大家不要对这种突然火爆的观念或样式感觉有什么不得了。纪实一出现,大家就说电视的本质是纪实;一说栏目,电视的本质就成了栏目化;一说到谈话类节目,电视就全都成了谈话类节目;说直播,除了直播其他都不是;一说游戏娱乐节目,其他节目也什么都不是,只有游戏娱乐节目是本质。这种观念就不对。电视是一个多棱镜,是各种各样的功能和样式的汇集。人有多少欲望和需要,电视就应该满足多少需要和欲望,这种开发是没有止境的过程。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一种新观念崛起的历史必然性。纪实就是对过去主题先行的一种“拨乱反正”;直播就是对过去过于封闭的一种交流方式的“拨乱反正”;谈话类节目是对大家封闭自己心理的一种“拨乱反正”;栏目化是对缺乏规范的电视生产方式的一种“拨乱反正”;游戏娱乐是对过于正统的节目形态、风格的一种“拨乱反正”。这么去理解,我觉得是符合实际的。所以说这五种新观念是中国电视逐渐认识到既符合中国国情,又符合电视传播普遍规律的一些新观念。由于这些新观念的崛起带来了中国电视的飞速发展,所以,90年代电视的发展力度,压倒了其他媒体,成为当之无愧的第一大众传播媒体。

中国电视本体建设的下一步发展是什么呢？我的预测是生活服务类节目的崛起。大家需要更方便、更快捷、更直接、更到位的生活服务，而电视在这方面的开发远远不够。我说的是真正到位的策划和真正到位的生活服务类节目。这类节目可能是电视所亟需生产的一种样式。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种预测。

回顾中国电视的发展，可以看出，我们开始只是把电视看做一种喉舌，看做一种工具，后来发现它的产业属性，自从广告进入电视以后，大家发现电视可以赚钱，每一个时段让出去都可以赚取巨大的利润。这样，人们发现了它的产业功能和产业属性。所以说，既要发扬我们中国特色的电视媒体的特点，即首先要完成宣传任务，在这个前提下，也要达到它的市场效应。为什么成功的栏目和节目可以取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就在于它既完成了党的宣传任务——领导重视；同时，满足社会需要——群众关心；还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社会普遍存在。这是中国传播艺术的特点。

最后，我简单地谈一谈中国电视下一步发展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第一，最近电视业内对频道专业化问题探讨很热烈。频道专业化实际上是电视生产和经营的一种最基本的观念。电视媒体自身的组织形式，一是频道，二是栏目，三是节目，以往我们经营的多是节目。后来我们经营的是栏目，下一个段落，我们将经营频道。将来的竞争首先是整体频道的竞争。频道将会向专业化的方向发展，每一个频道要有它非常鲜明的风格和它的主打的内容，比如电影频道、体育频道、读书频道等，我喜欢什么，就选择专门的频道来看，这是个大趋势。当然，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频道专业化在我国将是一个很漫长的

过程。

第二,产业化的问题,或者局部的产业化的问题。现在经常是10个小时的努力、10个小时的成本做1个小时的节目,这是一个反效应。只有产业化、集团化的经营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在有限的人力物力的条件下,产生超出这个人力、物力的巨大的效应。

第三,解决地区发展的差异问题。电视的这种产业化功能或者说市场化效应是有条件的,因为中国的社会发展是不平衡的。我前面所说的这五种新观念只能说是代表了中国最先进的五种电视观念。电视的覆盖面现在在全国基本上都能达到,但是各地区发展非常不平衡。不平衡导致了很多矛盾,如果不解决,后进永远是要拽后腿的,不可能保障电视的整体的发展。

第四,理论建设问题,这非常重要。中国电视10年来的大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观念更新的结果。如果一个领导者,一个媒体的决策者和整个媒体的从业者没有一种先进的观念去指导,用先进的观念去运作,它就可能永远地落后于这个时代的需要。而新观念的诞生一方面来自于实践的摸索,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扎实的理论建设与深刻的理论概括。从这个意义上讲,理论建设迫在眉睫。我们现在需要高瞻远瞩的决策研究,需要深入扎实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可具操作的应用研究。基础理论研究要提供原理,决策研究要保证导向,应用研究要满足从业者的实际需要。

第五,电视教育问题。80年代电视人才只要求具有单方面的知识结构就可以了,比如学摄像就学摄像,学播音就学播音,但是未来恐怕不行。从制作人到制片人到策划人,越来越需要具有复合型知识结构的人才。将来不会为一个职业设定

一个专门的专业,一个单科的专业将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变革的需要,这是没有生命力的。所以说将来最需要复合型的电视人才。我们的课程体系、教学内容都要围绕这个目标去设计。现在加强素质教育,提倡培养复合型人才,也是这一要求的体现。另外一点就是电视要进入学术状态,现在电视教育整体上学术水平不高。电视教育需要以电视理论研究的水平为依托,电视的理论研究水平不高,而电视的实践发展又那么快,你就不可能把最新的成果和观念教给学生,结果是被动的。如果教育观念落后,培养出来的学生一出去,就已经落伍了。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基于广大从业者素质的提高,所以我们应当把最新的电视观念传给受教育者。当他们成为中国电视中坚的时候,就可能把这些观念与他们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创造出体现时代水准和人民需要的辉煌业绩。谢谢大家!

演讲日期:1999年9月30日,华中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供稿,录音整理:佚名,本人审校

编者絮语 演讲者是电视理论研究方面颇具影响的新锐之一,出版和发表获国家级成果奖的专著多部、论文多篇,参加了如《香港沧桑》等大片的编导工作,参与了如《东方时空》等著名栏目的改版策划工作。因此,谈及中国当代电视观念的转变,既有理论,又有实践,已初具“登绝顶以览众小”之气象。

沈致隆

北京工商大学化工学院教授

“音乐应当使人类精神爆发出火花”，即使在失恋时刻，贝多芬抒发内心痛苦的乐曲也被后人称作“月光奏鸣曲”，带给世人美好的享受和无穷的回味。人们说他音乐的主题是“穿越苦难，走向光明，通过斗争，获得胜利”，这恐怕是贝多芬成为“乐圣”的原因。这16个字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真谛，也是人生道路上的座右铭。

音乐与人生

——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演讲——

我 这个讲座的题目来自改革后的北京音乐厅。几年前，北京音乐厅的检票处从大门外改到了楼梯口。两者之间的大厅成了售票、售书和售有声资料的地方，进门右手CD和VCD架子上赫然入目的是许多关于音乐的名言。其中德国大诗人歌德的话：“不爱音乐不配做人。”(笑)别笑，后面还有话——“虽然爱好，也只配称作半个人。只有对音乐倾倒的人，才可以完全称作人。”引起了我的思考。音乐是什

么？它与我们这个世界、人生有什么紧密关系，才使得歌德发出这一番议论？看了一些书以后，才知道这个问题曾让无数哲人、学者和艺术家苦苦思索且答案各不相同。

20 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说：“我们这个世界可以由音乐的音符组成，也可以由数学公式组成。”在科学家眼里，音乐是人类应用数学方法对自然界已存在的声音进行选择 and 组织的产物。法国浪漫主义作曲家圣·桑说：“音乐无时不在表现情感，音乐本身就是情感的化身。”黑格尔也有许多类似但更详尽、更严密的论述。可见在艺术家、哲学家和美学家眼里，音乐是人类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英雄人物拿破仑说过：“马赛曲是共和国最伟大的统帅，它所实现的奇迹是不可思议的。”在政治家眼里，音乐是历史的记录，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工具。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在教育家眼里，音乐是启迪人类智慧、完善人类道德的最佳教科书。而在医生眼里，音乐是保健治疗的有益帮手，对人的健康、情绪和心理都有明显的作用。罗曼·罗兰就是因为音乐的作用由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成为伟大作家的。

这么多不同的答案，正说明了音乐具有深刻魅力和广泛影响，因此它使得无数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教育家和文学家热爱音乐，学习音乐，甚至投身音乐并从中受益终生。孔子、柏拉图、白居易、列宁、钱学森、薛定谔的事业和生活，都与音乐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爱因斯坦所说的，“如果没有我早年接受的音乐教育，无论哪一方面我都将一事无成”，大约是他们的共同心声。

有人说，你讲的都是伟大人物，起码是高级知识分子，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恐怕就不那么爱好音乐。也有的同学说，老师，我五音不全，照歌德的说法，我就不是人了。（笑）还

有人说,过去史书上的记载使人以为历史是帝王将相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你怎么说历史与音乐有关系?音乐是表达人的感情的,人生和社会的发展又是受人类感情影响的,音乐和历史也就有了关系。作家梁晓声说:“歌是人类本能的冲动之一种,也是人类普遍的冲动之一种。”他还用民间俗语所说的“男愁唱,女愁哭”来说明唱歌是人的本能,也就是证明音乐和人生有密切的关系。但他忘了中国农村妇女为父亲或丈夫上坟时的哭腔也是有旋律可记谱的。(笑)“寡妇哭坟”不就是有名的民间音乐吗?应改为“女愁也唱”才对。(笑)他又忘了,男人不只愁了要唱,高兴了也要唱。识不了几个字的农民,高兴起来不也要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往前——走”和“喝了咱的酒,上下通气不咳嗽”吗?(笑)头一次看电影《红高粱》的不少北京人听了这些插曲往往忍不住笑起来,连说“真是土得掉渣”!(大笑,鼓掌)但这两首歌确实与主要角色的人生有密切联系,才这么有生命力,被观众牢牢记住,唱遍了城市农村和大街小巷。梁晓声又说:“中国人唱的歌,远的不说,从五四至今,择其十之一二而串联,几乎就是一部缩写的近代史。而且不必借助于解说词,时代背景一听就清楚明白。”说得好!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不就是靠各个时代的歌曲来讲述历史而脍炙人口的吗?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社会的延续就是历史,人生与音乐若没有联系,歌何以组成历史?梁晓声是对的。他被一些青年人称为中国的巴尔扎克,看来对音乐有如此深刻的见解也是其文学成就的原因之一。

有一个问题不知你们想过没有,贝多芬的音乐好在哪里?他被称作“乐圣”,成为千百位杰出音乐家和千百万音乐爱好者崇拜的偶像,20世纪70年代末又被美国学者的一本畅销

书《人类 100 位名人排座次》选中,和孔子、牛顿、耶稣基督、拿破仑、毛泽东等人一起并列为对人类社会几千年历史发展影响最大的 100 位名人,甚至排名在英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领袖克伦威尔前面,原因何在?论旋律,他的音乐不如肖邦、柴科夫斯基那样缠绵悱恻、多愁善感得让人落泪,而是质朴、简单。构成《C 小调第五交响曲》第一乐章的主要音乐材料,竟然是被称作“命运敲门声”的、再简单不过的 4 音音型。这个音型既是引子的动机,又是主部主题的基础,还是副部的伴奏和结束部的基本节奏,同时又作为展开部的主要材料。所以说他的旋律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他的和声不如公认的和声大师瓦格纳,据说他全部作品所用的和弦只有 20 几个,而有的作曲家一个乐段所用的和弦就超过 20 个。他的配器不如拉威尔,虽然内在平衡极好,却很少写进配器教材。他的语言不如德彪西,后者能用旋律和调性都不明显的音乐语言将雄伟壮观又变幻莫测的大海和昏昏欲睡的牧神描写得惟妙惟肖。那么贝多芬和他的音乐究竟好在哪里?

我上小学的时候,就知道他有一个别名叫“悲多愤”,悲惨的“悲”,愤怒的“愤”。从这个名字上,可以找出答案。除了他在音乐结构上有其他人难以企及的天才外,贝多芬的不朽在于他的苦难历程、民主理想、斗争精神和伟大人格。贝多芬的一生充满苦难:他不是莫扎特式的神童,却从 4 岁起就不得不在父亲的逼迫下学习钢琴和提琴,失去了童年的欢乐;他感情丰富、热爱生活,却多次失恋,终生未婚;他视音乐为生命,大器晚成,30 岁以后刚刚开始写出交响曲,却渐渐失去了听觉;他追求真理,向往民主,却不得不承受因法国大革命屡遭挫折给他带来的沉重心情。但在逆境面前,在权势面前,贝多芬却从来没有低下高贵的头颅。他战胜了个人的痛苦和不幸,用

饱满的热情、坚强的意志,用充满哲理性思考、充满斗争精神的音乐,与命运抗争,与黑暗的现实抗争。在他的音乐里,没有个人的痛苦,没有个人所受的磨难的记述,更没有逃避现实的无病呻吟。即使在他内心最苦闷的时候,感到的也是“只为穷人的福利而演奏”是“多么幸福”,并将优美的音乐献给人民大众。他歌颂光明,歌颂进步,鼓舞人民斗争的信心。“音乐应当使人类精神爆发出火花”,即使在失恋的时刻,他抒发内心痛苦的乐曲也被后人称作“月光奏鸣曲”,带给世人美好的享受和无穷的回味。人们说他音乐的主题是“穿越苦难,走向光明,通过斗争,获得胜利”,这恐怕是贝多芬成为“乐圣”的原因。这 16 个字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真谛,也是人生道路上的座右铭。贝多芬的音乐好就好在给人生以启迪和鼓舞,这是千百位杰出音乐家、千百万音乐爱好者崇拜他的原因,也是他逝世 170 多年以来,他的音乐一直在世界各地演奏,从没有一分钟停止过的原因。

一部分当代大学生的心理素质有问题,承受挫折的能力较弱,轻生的现象在不少学校时有发生。1995 年我所在的学院里有一位 20 岁的一年级学生因失恋自杀身亡,(听众一片叹息声)他来自偏僻山村,历尽艰辛才成为家庭中惟一的大学学生。在悲痛之余,同学们感叹他的“想不开”,“对不起父母”。这时正好我在讲《交响音乐欣赏》,深感这个认识太不够了!贝多芬一生充满苦难,个人生活上屡遭挫折,却顽强地与命运作斗争,用音乐鼓舞自己和人民,直至临死还把拳头指向天空。你们这么年轻,遇到一点挫折心理就承受不了,岂不惭愧?你只失恋一次,才 20 岁,就再也找不到对象了?(笑)就彻底绝望了?贝多芬多次失恋,终生未婚,照这样岂不早死了,哪来的 9 部交响曲?(笑)这位同学虽然数理化成绩很好,

心理却不够健康,不爱参加文体活动,更谈不到有音乐修养。我劝大家多听贝多芬的音乐,热爱他,热爱他的音乐,学习他对待社会、对待人生的态度,在困难时就有了勇气。以上是我当时讲贝多芬的音乐时和同学们谈到轻生问题的话。

常有人很好奇地问我:“你是物理化学教师,为什么又教音乐?音乐与你的工作和人生有什么关系?”我现用在英国的一段经历来回答这个问题。当我还是一个初中生的时候,就迷上了交响音乐并为此而买总谱、学小提琴,幻想将来即使不能在交响乐队拉小提琴哪怕在中央乐团拉幕也好,(笑)可以天天听心爱的音乐。当时我虽刻苦练琴但后来理想还是没有实现,于是就远离了音乐。“曾经沧海难为水”,免得触景伤情,看别人演奏引起自己的痛苦。万万没想到的是,我被国家公派到英伦三岛留学时,少年时代的爱好给了我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以极大的帮助。那是改革开放不久的20世纪80年代初,刚到伦敦的第一天,在大使馆教育处的会议室里,参赞就提到了要提高心理素质,防止因孤独忧郁而精神失常的问题。他说:一年到头不断的持续阴雨天气形成了英国人抑郁内向的性格。他们对陌生人冷淡,外乡人在此易感孤独。自1980年起,中国先后向英国派出数百名访问学者,到1983年已有15人患上精神系统的疾病提前回国。有一位医学专家因无人理睬,做不出成绩,自感无颜见江东父老,导致精神崩溃,跳楼身亡。所以每当新来的留学人员到达,参赞都要重复这一话题。初听此说,大家都有些半信半疑:真有这么邪乎吗?我到达目的地利物浦市后,才知此言并不夸张。

开始我和20多名鱼龙混杂的外国留学生挤住在一栋三层楼房内,公用厨房冰箱里我储藏的食品经常被盗,有时不得不饿着肚子去实验室。每晚我卧室外的摇滚乐噪声不断,失

眠是常有的事。在学校里情况更糟：导师将研究题目和实验室的钥匙交给我之后就再难见踪影。专业不对口，设备没见过，说明书看不懂，且实验室里只有我一个人，不会有人帮助我，自己也想不出怎样接近其他办公室的人的办法。有一段时间工作毫无进展，整天在屋里呆坐着。为了闯过语言关，我每个周末都去公园寻找无事可做的退休老人聊天。谁知连他们也不理我，宁可在椅子上看报纸甚至呆坐一天，也不愿和我多说一句话。那段时间里，从没有过的孤独感阵阵袭来，大有置身于荒岛上而一筹莫展的感觉，你别说，还真有跳楼的心。（笑）

转机源于交响音乐。一天我路过电器商店，突然听到了德沃夏克 E 小调第九交响曲那熟悉的音调，由于孤独过度已经麻木的我为之一振，不由自主地走了进去。听着从价值 4 000 英镑的菲利浦音箱里传出的第一乐章主题——那长笛、双簧管和小提琴依次奏出的优美旋律，听着德翁那明晰、简朴的和声构成，似乎又回到了故乡，美好的童年如在眼前。第二乐章近似五声音阶“思故乡”的主题由英国管吹出来了，我不禁想到了祖国，好像看到“一条大河波浪宽”歌词所描绘的美丽、富饶的国土和勇敢、可敬的人民，顿觉心旷神怡。听完全曲，孤独和烦恼就开始离我而去。我从没有像当时那样深刻地体会到这首交响曲的内涵和精神力量，当天就买了一盒 BBC 交响乐团演奏的录音带回家听了起来。过去听说有人欣赏此曲百余次仍兴致勃勃，我一直将信将疑。然而我在英国两年的留学生活就验证了这一说法的真实——我何止听了它 100 遍，我几乎每天听两到三遍！它柔美、抒情的第一、二乐章化解了我的乡愁，慰藉了我孤独与寂寞的心灵，它威武雄壮的第四乐章振奋了我的精神，坚定了我克服困难的决心。

精神振作起来,办法就有了。何不以交响音乐的爱好和古板的英国人交朋友?我于是以请教管弦为名和英国教师开始了谈话。经过推荐,我找到了该系公认的两位“音乐专家”,他们不但很乐意回答我的问题,还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英国人眼里,“文化大革命”毁灭了中国的一切文化,怎么有一位化学教师如此熟悉欧洲古典音乐?他们反过来问我许多问题特别是中国音乐的问题。从此他们经常和我一起谈音乐、文学。不但谈埃尔加、伯拉姆斯、格里格、西贝柳斯、狄更斯、哈代、勃朗特,还谈孔子、论语、荀子、《乐记》,谈《广陵散》、《梁祝》、二胡……此事很快传遍了全系,大家都知道新来的中国人有较高的英国和欧洲文化修养,普遍对中国和中国人有了好感,我因此赢得了尊重,开始有了朋友。后来我无论做什么,除这两位“音乐朋友”外,其他人也愿意帮助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在白金电极上镀铂黑不成功,一位叫欧恩斯的高级讲师主动来教我,因为太投入他差一点忘了上课。从此我不再孤独,精密仪器不用看说明书也能操作起来得心应手,实验一步步走向成功,研究成果指日可待……当然,精神失常也就与我无缘。(鼓掌)

可惜那盒有历史意义的《自新大陆交响曲》的录音带我没能带回国。架不住其他中国访问学者和学生的请求,我临行前留给了他们。这些人虽然个个是科学英才,但多数生长在农村,从未接触过交响音乐。出国后和外国同学或同事在一起,谈起专业踌躇满志,但别人一谈音乐,立刻坐立不安,赶快借口上厕所溜掉。(笑)自认识我以后,他们纷纷“拜”我为“师”,请教古典音乐的名家名曲,思乡时和我一起听《自新大陆交响曲》,我又多了许多中国朋友。到我回国时,这些过去自称没有音乐细胞的人,再也离不开音乐,尤其离不开古典音

乐了。相信他们后来的人生与音乐也有了故事,像我一样。

1996年《光明日报》、上海《文汇报》、《中国文化报》、《爱乐》杂志等单位在全国发起《交响人生征文》,我将以上故事写成文章应征,和作家蒋子龙等三人一起得了一等奖。在颁奖会上,评委之一、中央歌剧芭蕾舞剧院交响乐队著名的指挥家卞祖善对我说:你没搞音乐,真是音乐界的一个损失。我说不敢当。但作为一个化学家在理工科院校普及音乐教育不也一样是对音乐的贡献吗?而且一个非职业音乐家的人生与音乐的关系不是更有说服力吗?这就是我为什么介入音乐教育的原因之一。

刚才介绍了在英国的经历,下面说说在美国与音乐的故事。

1997年我应邀前往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访问之前,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几个月之后的告别讲学,竟然会以一曲二胡独奏《赛马》结束。意料之外的原因很简单:出国前我基本不会拉二胡。(笑)

我初中时就崇拜贝多芬,想学钢琴。但因经济条件所限,只好买了一把廉价小提琴来练习。后来虽然未能如愿进入音乐学院,却有幸受教于新中国第一代小提琴和指挥大师黎国荃,受益终生。在北京大学念书时又在学生管弦乐队拉过第一小提琴,“文革”中还学过大提琴,也算有几分古典音乐的底子,对西洋乐器不算一无所知。虽然有人称二胡为“中国的小提琴”,“文革”中在单位业余演出队里小提琴派不上用场,我也尝试过学二胡并曾向人请教,但终因演奏技巧和风格与小提琴有很大差别而始终未能学会。指法和揉弦,将小提琴的技巧“移植”过来还能凑合。特别是指法,刘天华还曾将小提琴的揉弦技巧应用于二胡,丰富了它的表现力,因此我在二胡

上的揉弦一看就不是民间艺人的习惯,颇有几分“洋气”,故自诩为“学院派”。(笑)弓法则完全不同。二胡的弓子夹在两根弦之间,不似小提琴弓自由,拉起来运弓的力度、方向怎么也找不着感觉,苦练仍然过不了关。为此觉得二胡和我没有缘分,只好放弃,在宣传队里改拉手风琴或当乐队指挥。

近30年过去了。1997年我到波士顿之后,往来于美国高校之间,紧张而繁忙。由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举世瞩目,我又手持哈佛大学官员的身份证,处处遇到的都是笑脸相迎,但对祖国母亲和中华文化的思念和景仰仍然与日俱增,难以遏制。特别是听到一些歪曲事实真相、攻击中国的言论后,内心很不平静,民族感情从未有过这么强烈,虽然自己的任务是来学习研究、搜集资料的,但总也克制不住宣传中华文化、歌颂祖国的念头。一天,我前去拜访新英格兰音乐学院理论系主任戴维森教授,看见他的办公室里有把低档次的花梨木二胡,就借来试着拉拉。

因为这把二胡的音质太差,我只好用半只铅笔代替琴马,音量虽变小,但噪音却大大减弱。每天早7点,我就来到自己单独使用的办公室,趁隔壁的同事未到,练上一个小时。每天晚上夜深人静之后,我更无影响他人的顾忌,就再拉上一会。拉着二胡,就感到自己和中华文化离得很近,感到和自己热爱的祖国心心相通,幸福感油然而生。一天不拉,就觉得不自在。

奇迹发生了!30年前在国内怎么练也学不会的全弓、跳弓和右手拨弦技巧,竟然很快过关,自己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因此《赛马》这首欢快流畅、反映新中国各民族大团结和幸福生活的乐曲成了我每天清晨必奏的曲目。二胡声声,使我想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各民族的兴旺

发达,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自豪,立志努力推动祖国的教育改革事业,弘扬优秀的中华文化。由于二胡演奏的功力渐渐深厚,居然有一位 1997 年刚刚获得波士顿大学音乐艺术博士学位的台湾籍钢琴家兼作曲家因同样热爱中华文化,拜我为师从零开始学习二胡。我对她讲二胡的弓法、指法,讲刘天华、华彦钧,讲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的传统和教她拉练习曲,练《良宵》、《二泉映月》,出国前的三四把刀,竟然成了海外华人音乐家的二胡“教师”。

本以为我和二胡的故事就到此为止了,想不到一天清晨隔壁办公室的美国同事比平时早到一个小时,使这个故事有了一个高潮。他听到了我的“独奏”后,对只有两根弦,却能发出如此美妙音乐的二胡表示惊讶和赞赏,显示出极大的兴趣。他不但请我“再来一个”,还问到许多中国文化的问题。这个小插曲,使我萌发了另借一把较好的二胡,在告别讲学时以独奏作为结尾的念头。用在美国学到的一技之长,临行前宣传中华文化和祖国的成就,真是好主意!(笑)

我离开美国前两天的告别讲学在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图书馆的学术报告厅举行,主办单位是该学院的国际办公室,题目为《中国艺术教育的历史与现状》。哈佛大学不但是美国的学术中心,还是美国政府制定国内外政治、军事、外交政策的思想库,各种学术流派和政治主张十分活跃,都想扩大自己的影响。虽然其中不乏像“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这样客观公正的学术团体主张与中国友好,也有不明真相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状况尽力贬低和抹黑,从而宣传“遏制”中国的主张。为了扩大中华民族文化的影响,宣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中小学和整个社会艺术教育蓬勃发展的形势以及其中深刻反映出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的进步,我选择了这个题目,

民族乐器的介绍和表演既是讲学内容的证明和补充,又表达了我的感谢和告别之情。

这个题目和演讲的形式对听众有很大的吸引力,半个多月前哈佛教育研究生院刚刚在网上公布了这一消息,院内外乃至波士顿地区教育界的人士就不断打电话来询问细节。现场不但有哈佛的师生参加,还有不少各地的中小学教师前来,据说这次讲学已纳入他们继续教育的学位课程。我介绍了孔子是古琴演奏家、作曲家、音乐教育家这些过去不为绝大多数西方人所知道的事实,详述《论语》中表现出来的孔子丰富、深刻的美育思想,说明中国艺术教育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迅猛发展的原因,在于重视艺术教育的悠久历史传统和今天政治开放、经济繁荣、教育发展的形势。一个小时的讲学结束后,我用录像带介绍了中国有6 000多年历史的乐器埙、3 000多年历史的乐器古琴;请当地的华人民乐演奏家夏耘女士弹奏琵琶。最后,在她的伴奏下我独奏了二胡曲《赛马》。演奏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师生们和教育界人士报以长时间的掌声,我只好又加演了一曲《众手浇开幸福花》,同样是欢快活泼的曲目。

讲学因丰富的历史和现实资料,再加上生动的器乐表演,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演讲一结束,听众对中华文化和中国当前教育的繁荣表示出极大的兴趣,纷纷提问。我一一解答了他们提出的10多个问题,大家表示非常满意,一再向我表示感谢。国际办公室主任米开尔斯博士高兴地说:“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生动的学术报告!”

我在哈佛的讲坛上演奏得干净、利索,充满激情,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拉得这么好,灵气从何而来。夏耘女士说她来美国多年,认识不少华人二胡演奏家,也听过多次《赛马》,

没有一个业余人士能将这首曲子拉得如此韵味十足。她热爱中国文化的丈夫虽然是美国人,也赞不绝口,夸耀二胡音乐的美妙。但他们都不知道,几个月前我还不会拉二胡。

因为进步就这么快,50岁以后还学会了一种乐器,当时我很得意,自认有几分天才。刚一回国,我就买了把价值1200元的乌木二胡,并订了拜师深造计划,列出详细的练习曲目,满心想练几年后和专业乐手比个短长。可是谁也想不到,我回国已经一年了,却再没有碰碰二胡的愿望,更谈不上深造。虽然这个结局并不美好,(笑)但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并非我特别爱好民乐,也不是突然有了演奏二胡的天才,在美国的几个月里,身处异国他乡对祖国和中华文化的热爱和思念,才发生了我——北京一所工科大学化学教师在哈佛讲坛上演出二胡独奏的奇迹。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掌声)

本人供稿

编者絮语 作为一名工科大学的教师,近几年来,演讲者致力于大学音乐的教育和研究工作。也许正因为不是专业的音乐人,也许正是用自己的人生去理解音乐,他的演讲才如此富有感染力,即便是“音盲”,也会激动不已。

胡智锋

北京广播院副教授 《现代传播》副主编

90年代中后期为什么倪萍不再火爆了呢？这不是她个人的原因，而是因为她代表的还节目样式开始走向衰落，人们的兴趣点发生了转移。

《焦点访谈》找到了一条路子，就是人们所概括的所谓“领导重视，群众关心，社会普遍存在。”这是中国特色的，这几句话来之不易，是经历了种种痛苦得来的。它是一种宣传艺术，很高超的宣传艺术。

中国当代电视观念的沿革

——在华中理工大学演讲——

各

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很荣幸能登上享誉海内外的华中理工大学人文讲坛，就中国电视观念的沿革谈一点自己的想法。据我所知，华工新闻系不仅是全国理工科学校中最早创办的新闻系，而且也是改革开放

后最早创办的新闻系之一,在我工作的北京广播学院,近几年就有十几位来自华工的学生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因此,希望我的演讲能有助于加强我们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同时,也有助于加深大家对电视这一传媒的了解。

首先,让我们来简单的梳理一下中国电视传播业的发展脉络。中国电视传播业是从 1958 年起步的,其标志是北京电视台即中央电视台的前身的成立。大致经过了两个大的段落。

第一个大的段落是从 1958 年到 1978 年的基本建设阶段。首先从大众传播体系来看,电视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在这期间只不过是图像把广播、报纸、杂志等其他媒体的信息播报一下,等于再传播。这时,电视独立的传播特征和样式还没有形成,或者说电视的独立性还没有明显的凸现出来。其次,从艺术体系来看,传统艺术样式,如音乐、电影、舞蹈、美术等,已经比较成熟了,形成了自己独立的艺术特征,而电视呢,无非是把这些艺术样式通过图像传播的方式,在电视荧屏上再现一下,比如说对音乐会、各种舞台表演的转播等等,基本上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艺术特征。所以说,不管是信息传播,还是艺术传播,在这一阶段,电视基本上都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样式,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特征。

1978 年改革开放给电视带来了发展机遇,从 1978 年到 1984 年,电视的地位逐渐上升,特别是在 1984 年前后,国家成立了广播电视部。中国电视传播业从此进入了其发展的第二个大的段落,即本体建设阶段。

1978 年以后,我们从国外引进了先进 ENG 一体化摄录设备,这个一体化的设备解决了什么问题呢?解决了一个电视的声画同步问题。原来电视新闻节目说是直播的,其实并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直播,只能叫原始直播,因为当时的所谓直播都是播音员事先背好稿,现场卡口型。再比如原来拍电视,是用胶片先拍图像,再录声音,然后一块合成。有了这个ENG一体化摄录设备,就轻松多了。声音和图像可以同时被记录下来,这样就可以大量地录制节目和储存节目,节目播出逐渐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这个难题的解决是中国电视传播发展的重要一步,大大提高了电视节目的生产力。

与此同时,电视开始被迫跟其他的传播样式和艺术样式断奶。原来电视主要靠电影部门提供片子播一播,但随着电视覆盖面扩大,传播能力增强,再加上从1979年开始,上海播了第一条广告,酒的广告,电视慢电地可以挣钱了,电影界、戏剧界和其他新闻媒体发现电视火起来之后,都不愿意再继续给电视提供信息、提供节目了,逼得电视不得不探索自己的样式,做自己有独特样式的节目。于是,生产电视剧、电视专题片和纪录片就成了一个迫在眉睫的事。这样,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电视就进入了大发展的本体建设的阶段。所谓中国当代电视观念的沿革也主要发生在这一阶段。

我认为80年代和90年代还是有所不同的。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80年代可以称作电视制作人的时代,90年代则可以称之为电视制片人的时代。

前面我们说过,进入80年代,中国电视进入了飞速发展的阶段。有资料说1958年全国只有50台电视,电视台也只有一家。到1978年,全国也不足一万台电视。而进入80年代后,各个省级电视台突然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了。1983年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上,吴冷西部长提出了“四级办电视”,一下子把电视的覆盖面延伸到了县一级。这样电视在80年代的发展异常迅速,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电视事业

成为了中国各项事业里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

电视媒体的发展如此之快,但人们的电视观念如何呢?电视到底是什么?不知道。于是大家就要学,学什么?发现电视跟电影最像,于是就学电影,按照电影的模式——制作方式、剪接方式和美学原则来指导电视的制作。电影的生产方式主要是艺术创作,一个好剧本、一个大导演或一个大明星就意味着可能带来一个好片子。这就意味着电影的质量取决于制作者的水平。电视在80年代也是这个情况。就是说,电视媒体如果有自己非常有水平的节编导,它就有可能在竞争中取胜。所以整个80年代电视人的口头禅就是“干什么呢?”“做片子呢。”我们从“做片子”这三个字就可以看出来,80年代电视人对电视的理解,就是拍片子,做片子。所以,它的竞争还是取决于制作人的水平和能力。

到了90年代,随着电视媒体自身产业化水平的提高和中外电视交流的频繁,大家越来越不再把电视仅仅看成是一种艺术,而是更把它看成一种传播媒介。电视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它竞争的是什么呢?如果说投资上百万,花几年时间拍出一个大片,来证明你这个台的实力是80年代的骄傲的标志的话,那么,到了90年代就发现这种做法是得不偿失的。就算你台里养了几个有水平的编导,也依然可能会在竞争中失败。因为你这个媒体生存和发展的水平,不仅仅取决于某一个或者某一些编导、制作人的水平,还要看你的名牌栏目的运作水平。如果你有一档或者几档名牌栏目,那么,就可能带来巨大的广告收入。将这些收入投资到你投资的作品上,你就有可能在竞争中取胜。所以说90年代是制片人的时代。这时,电视更需要一个制作群体,这个制作群体的统帅就是栏目的制片人。如果你这个台里有几个出色的制片人,这些人不仅

仅有艺术头脑,更有经济头脑,运作头脑,那么,你这个台就可能抓住时机,同时带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只有产生这种效果,这个媒体才能立得住。

有同学或许要问,90年代之后,什么样的人会成为电视传播业的主导力量?我个人认为,下面可能会进入电视策划人的时代。为什么呢?现在大家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觉,我们的节目千篇一律的情况非常多,频道资源浪费得很厉害。一档名牌栏目出来后,马上有一堆跟上“克隆”。这个情况说明我们的电视策划资源匮乏。这个问题制片人解决不了,光会运作和有一定的艺术头脑还不行,还需要一个智慧的头脑,而智慧的头脑需要综合的能力,能够根据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运转情况及时地做出判断,提出可操作性方案。这种人就叫“策划人”。

所以,我认为中国电视传播80年代以来的本体建设阶段,可以用制作人时代——制片人时代——策划人时代来概括和表述。与此相应,不同时代的主要电视节目样式也表现出其各自不同的特征。

具体说,80年代是电视专题节目及综艺、电视剧节目的年代。首先,由于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各行各业都有很多事情要表达,这种表达需要很多电视节目去反映它,而且基本上就是靠电视专题片的形式来体现。这种有确定的主题、完整的构思和针对性导向的专题片可以说是80年代电视屏幕上的主体部分。

从1983年以来电视文艺出现了综艺晚会,其标志就是春节联欢晚会这种形式的出现。晚会也成了80年代电视审美消费的主要热和焦点,所以倪萍就成了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电视的一个缩影。90年代中后期为什么倪萍不再火爆了

呢？这不是她个人的原因，而是因为她所代表的这种节目样式开始走向衰落，人们的兴趣点发生了转移。整个 80 年代到 90 年代初，当时社会发展迅猛，人们更需要一种赏心悦目的，既体现传统的文化品格又体现当代人审美取向的艺术形式，而晚会形式比较符合这一阶段人们的审美需要。客观上人们开始住单元房，不再住大杂院，人与人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看电视的机会越来越多；再加上其他诸如城市不准放鞭炮、没有庙会等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春节晚会或者综艺晚会，某种意义上补充了人们对这种群体筭仪式化的需要。因为人是有群体生存需求的，有大杂院，大家聊天啊，串门啊，觉得很自然，可能看晚会的时间就要少一些。一旦这种方式取消了，或者因为大家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了，这种心理需要怎么去满足？看晚会！晚会热闹。于是，综艺晚会专题片就成了 80 年代最热手、最受欢迎的电视传播样式和艺术样式。

当然在 80 年代，我们同样不可小瞧电视剧的发展。由于电影的生产力在下降，同时电视剧的低成本使大规模生产有了可能性，像《三国演义》拍了 84 集，《红楼梦》拍了 37 集，这种多集拍摄，相对成本不算太高，同时经过后期开发还可以带来新的效益，比如影视基地，可以带来各种各样的旅游收入，诸如此类的因素使得电视剧的生产大规模地增加。大家在影院里看电影觉得不方便，在家里又看着不着电影，怎么办？电视剧就取代了电影的地位，尽管失之粗糙，但毕竟还出了很多好的东西，慢慢地电视剧也找到了自己一些独立的特征。

进入 90 年代，大家发现电视突然风头一转，最大的改革力度出现在电视新闻上。为什么呢？80 年代改革开放的初期，社会发展迅猛，而 90 年代是一个平稳发展期，或者说，是一个社会的转型期。特别是在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国际政

治风云变幻,使得社会的文化构成和社会生活方式,包括国际的、国内的各种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越来越需要一种务实的东西。面对社会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人们更多拥有的是在适应从计划到市场转型期的一种阵痛。这种阵痛的力度是很大的,好多人不习惯。比如下岗,一个人突然发现没着没落了,这是很痛苦的事。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恐怕娱乐不起来,高兴不起来,也欢快不起来。所以,如果说80年代人们最需要的是,用现在的说法,叫做“解闷”;90年代则更多的是要“解气”和“解惑”。大家心里有气,需要“解气”,通过电视来泄气;大家有困惑,通过电视来“解惑”。

于是电视大量地需要新闻节目,尤其是深度报道,到《焦点访谈》的出现则达到了一个高潮。《焦点访谈》的前身是“观察与思考”。它从80年代初期开始创办,三起三落。当时这个节目还是有一些影响,但是一会儿被“毙掉”掉,一会儿又活起来,结果一直没有生存得很好。《焦点访谈》找到了一条路子,就是人们所概括的所谓“领导重视,群众关心,社会普遍存在”。这是中国特色的,这几句话来之不易,是经历了种种痛苦得来的。它是一种宣传艺术,很高超的宣传艺术。这里头有很多智慧,包括时机、尺度、分寸的把握。电视新闻的改革带来了电视的一些新的需要,大家对电视的时效性、直观性和务实性等等,都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电视的观念在90年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说,电视在90代的成长速度超过了以往的30年。具体地说,我认为90年代电视主要经成了五种新观念的沿革。

第一种新观念是电视纪实观念。尽管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解决了纪实的技术上的问题,但观念的问题并没有解

决,大家还习惯于传统专题片的思路——主题先行和画面加解说词。这种方式对社会生活的呈现是经过了主体加工的,而这种主体加工又有非常多、非常强的指令性和主观导向的色彩,达到了极端的样式可能会出现主观粉饰现实的情况。这种风气在 90 年代需要务实的环境当中已经不适合了,大家呼吁一种新的电视节目样式。1985 年以后,我们连续搞了七届中日纪录片的交流展映等活动,在中外纪录片的交流当中,大家发现了纪录片的一种新创作方式,就是纪实方式。

什么是电视纪实呢?我认为电视纪实有这样几个特征,一是从主题先行变成了主题后行。在记录拍摄生活状态的过程中,不带有任何框框和有色眼镜预先设置主题,而是在跟踪生活过程当中,自然而然地得出主题,甚至也不要去看主题,而是让大家去感受这种主题,这是第一个特征。电视纪实的第二个特征就是跟踪拍摄,所谓跟踪拍摄是跟摆布拍摄即“摆拍”相对应的。以往的电视专题片的思路就是摆拍,我想好了,摆布好了,让你再走一遍。于是我们发现千篇一律都是主人公从后景走到前景,从田地的那头走到这头,走到你眼前。业内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摆拍,电影可以,但是电视用这种方式就是非纪实。真正的电视纪实只能跟踪拍摄。你不能改造他、摆布他,而是依据他、遵循他,遵循生活自然而然的流程和规律,而不是主观地去改造生活本身,摆布生活,这是对生活的最大的尊重。电视纪实的第三个特征是抓取不可预测、甚至是带有一些悬念的生活细节。尽管我们说纪实是完全跟踪生活、不能改变生活自然的流程,但也不是说就不能去想象。应该根据编导、节目创作者的生活经验,大概预测会出现什么结果,要设定可能会出现几种情况。当然有些情况确实想不到,就要赶紧地抓住它,而往往这些细节是电视纪录当中

最珍贵的段落和镜头。如果一部纪录片里头出现了这种丰富的、不可预测的、稍纵即逝的细节,这些又往往是自然生活过程中最真实、最有感染力的一些东西,你抓住了并把它们记录下来,你就成功了。之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唤起观众的一种期待,达到一种非常好的收视效果。电视纪实的第四个特片是要有一段相对完整的生活段落,或者生活流程,不能任意地裁剪。在一部完整的纪录片里,起码要有一、两段完整的、不间断的生活流程。传统的电影蒙太奇的思路就是“啪啪啪”的剪,而纪实电视更倾向于长镜头的应用。所以按照这样一种要求,电视纪实体现了两个技术上的特片,一是长镜头的应用,长镜头说是说,记录生活相对完整的一个段落,而不是任意剪裁;二是同期声,即同步记录人物自身的声音,还包括周围环境的聲音。

电视纪实在 90 年代初的代表作是《望长城》。《望长城》的成功拍摄标志着中国电视纪实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电视纪实作为一种观念开始进入电视人的头脑中,很快影响全国,有人把它称做“纪实主义”。从这开始,电视本体建设也进入一个大发展的阶段。如果说过去电视是被动地吸收文学、戏剧、电影、广播、杂志和报纸和艺术样式和信息,被动地依赖和遵循它们的传播样式和特征,那么,到了 90 年代,电视开始反过来辐射他种媒体。比如戏剧,开始出现了纪实性的戏剧,报纸开始出现了纪实写真,甚至在一些电影中我们也能感受到电视纪实的影响。

电视的纪实观念意义重大,其突出的功绩是造就了一大批电视纪录片的成长。中国电视纪录片从 90 年代开始,进入国际,开始获得国际大奖,其中获得国际大奖,其中包括四川台的《藏北人家》、《回家》,山东台的《壁画后面的故事》,上海

台的《德兴坊》、《十字街头》等等。

特别是到了 90 年代后期,我们在《邓小平》和《香港沧桑》这两部 90 年代代表性巨片里看到了电视纪实的深刻影响。尽管是传统的政论体的纪录片,但《邓小平》和《香港沧桑》中也体现了浓重的纪实特征。以中央电视台军事部和上海电视台的国际部纪录片室为代表,再加上山东电视台,四川电视台,包括浙江电视台,还有全国几个比较优秀的电视媒体,在这个方面表现得尤为出色。而这种电视纪实观念,作为栏目形式,成为一个栏目的标志性的制作样式,则体现在《东方时空》的“生活空间”上。整个“生活空间”完全按照电视纪实的方式来拍摄,是典型体现电视纪实观念的一个栏目版块。

第二种观念,是电视栏目化观念。1993 年 5 月 1 日中央电视台开播了一个著名栏目《东方时空》,标志着中国电视进入到了栏目化的阶段。所谓栏目,就是应该有统一的标志,统一的时段,统一的编排方式,统一的串联,统一的风格,有一种相对稳定的规范。在栏目化之前,中国电视的传播、播出和生产方式经常是由个人意志所决定的,就是我说的制作人时代的特点。比如我自己有这个兴趣,或者上级交给我一个任务,所以我要来做这个节目。而栏目化意味着什么?不管上面怎么要求,也不管个人有什么兴趣,只设定一个固定的时间段,在这个时间段里,栏目的结构、风格、编排方式、制作方式和栏目音乐等是完全统一的。比如到了早七点我看《东方时空》,第一版块肯定是“东方之子”,第二个版块肯定是“生活空间”,或者是“音乐电视”,第三个版块肯定是“时空报道”,是非常固定的。这种相对稳定规范的生产和播出样式,至少产生了两个效应:第一造就了一批有较高知名度的名记者、名编导、名主持人和名制片人。在此之前,我们可能会问,今天播什么?

但是到了栏目化阶段,星期几播什么,是基本稳定的,不会轻易变动的。特别是日播节目,日版节目,尤其像“东方时空”一天滚动好几次在几个频道上播出,白岩松天天出来,用相声里的话讲就是混了一个脸熟,大家天天见你,就熟了,你的出镜率甚至比领导人都要高。带来什么效果?你就成了名人。而一个媒体拥有了自己的名人队伍就意味着它的效益。由于天天看这些名字,天天看这些脸,你就知道了《东方时空》的制片人,它的编导,它的主持人,它的记者。对于一个媒体来讲,这种明星效应,名人效应带来的是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第二个效应,培养了相对稳定的群众群。就像我们晚七点钟要看《新闻联播》一样,到了几点要看什么,变成出一种收视习惯。一旦一个人养成了这种收视习惯,他就成为了稳定的观众。如果说有一批观众大家都有这个习惯,这说就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群众群。相对稳定的观众群就是收视率的保障,而收视率带来的同样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实际上栏目化使得媒体的经济效益和效益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一个媒体要想竞争成功,战略之就是要推出自己的名牌栏目。

第三种新观念是电视谈话的观念。以1996年3月16日开播的《实话实说》为标志,电视谈话类节目迅速崛起,成为各电视媒体竞相模仿的一种生产和传播方式。事实上电视谈话类节目是西方电视的主体样式,在整个西方电视节目中可以占到60%—70%。电视谈话类节目体现了媒体的真正价值,可以真正实现观众的参与和交流。谈话类节目实际上就是人际交流在媒体中的延伸,由媒体根据观众的兴趣设置话题,或者预测观众的一种需要,邀请观众和观众的代言人出场,展开谈话。如果说,纪实和栏目化只是实现了阶段性的一种开放,那么,谈话类节目要比纪实和栏目更开放。因为在纪实和栏

目中老百姓的参与也是受限制的,而谈话类节目是相对不受限制的,当然我们只是相比较其他的节目样式而言。像香港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的节目,它几乎是有开头,没有结尾——结尾是没法预测的,充分地体现了谈话的开放性。如果说,纪实已经实现了局部的不可预测,当然这个前提是它抓住了不可预测的生活细节,那么,谈话类节目就是不断处在开放中,不断处在不可预测中,因为,在自由和开放的谈话环境中,关于某个话题,谁也不知道这个人会说什么,那个人会说什么,这样,观众的参与就达到了相当自由的程度。生活中人与人的谈话可能是有很多琐碎的东西,电视的谈话则既是高度浓缩的,又是充分展开的。正是这种相当规模、相当深入的观众参与,展现了谈话类节目的魅力。我们有的教授甚至指出,21世纪是对话的世纪,也就是说,谈话类节目将成为电视节目的主宰。

第四种新观念是电视直播观念。像《实话实话》这样的谈话类节目是开放的,但毕竟经过剪辑加工改造过的,也是经过了部分设计的,其开放速度和它的惊心动魄的或震撼人心的那种感觉和感受还没有出现,或者说还不足够,那么,现在第一时间段的报道就成为了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重大的历史时刻、重要的信息,我能不能现在进行时地同步介入?如果能够实现电视大规模的直播,就等于每个观众都有可能直接介入重大历史时刻的进展中,如果能够现实一点,电视所产生的魅力将是无与伦比的,没有任何媒体可以代替它。这一点的突破是在1997年,代表性的直播是中央电视台的几次大的直播活动。两次是社会性的——“黄河小浪底工程”和“长江三峡大江截流”的现场直播;一次是政治性的——“香港回归”的现场直播,这次直播震惊中外,也达到了中国电视收视率的最

高点。所以这个节目带来的效益就不是其他节目所能比的。再加上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联合直播的“柯受良飞跃黄河”，实际上搞了四次大型电视直播。1997年以后，我们又搞了大量的经济报道直播，比如“3.15 特别行动”直播。直播已经成为一个电视媒体的实力、水平和魅力的某种象征。1998年在中国新闻史上可以大书特书一笔的，是中央电视台首次直播了江泽民和克林顿在北京举行的中美首脑高峰会的记者招待会，这是需要有极大魄力的——我们敢于向全世界直播中美两国元首的政治对话，其政治效应和国际影响是巨大的。这说明什么问题呢？直播包括谈话类节目，它的开放性和第一时间的报道实际上是最具电视魅力的，也是最体现电视特征的。声音、图像和文字同步记录，卫星传送和微波传送同时使用，几乎调动了电视全部的技术手段。这种立二依赖于社会的民主化程度和水平。同时，电视直播的实现也对促进社会的民主化起到积极的、其他媒体的艺术样式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其意义不可低估。

第五种新观念是电视的游戏娱乐观念。1998年岁末1999年初以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等为标志，一大批电视游戏娱乐节目走红全国。湖南卫社，从一个地方台杀出来，带动全国电视的一种走向，这也是一个奇迹。一个“快乐大本营”，一年几千万的收入，影响力和媒介魅力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以“大本营”、“快乐”、“欢乐”、“总动员”诸如此类字眼出现的大量游戏娱乐节目，成为各家媒体竞相出台的新的主打节目和栏目。

这个现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电视的每一次观念变革其实都是对于以往这种观念的开发不足或开发不到位的一种补偿。电视游戏娱乐节目的崛起和火爆说明了我们

以往的电视过于重视说教,而比较少地顾及到它的游戏娱乐功能。游戏娱乐是人的一种本能,它是无时无刻不通过其他样式来表达的,游戏娱乐节目的走红实际上是人们把游戏娱乐的本能愿望通过电视来宣泄来表达。但是所有的补偿都是阶段性补偿,一个浪潮的兴起是对过去开发不足的补偿,但是一旦补偿到位,它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它就变成了一种常规的观念和常规的样式,所以大家不要对这种突然火爆的观念或样式感觉有什么不得了。纪实一出现,大家就说电视的本质是纪实;一说栏目,电视的本质就成了栏目化;一说到谈话类节目,电视就全都成了谈话类节目;说直播,除了直播其他都不是;一说游戏娱乐节目,其他节目也什么都不是,只有游戏娱乐节目是本质,这种观念就不对。电视是一个多棱镜,是各种各样的功能和样式的汇集。人有多少欲望和需要,电视就应该满足多少需要和欲望,这种开发是没有止境的过程。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一种新观念崛起的历史必然性。纪实就是对过去主题先行的一种“拨乱反正”;直播就是对过去过于封闭的一种交流方式的“拨乱反正”;谈话类节目是对大家封闭自己心理的一种“拨乱反正”;栏目化是对缺乏规范的电视生产方式的一种“拨乱反正”;游戏娱乐是对过于正统的节目形态、风格的一种“拨乱反正”。这么去理解,我觉得是符合实际的。所以说这五种新观念是中国电视逐渐认识到既符合中国国情,又符合电视传播普遍规律的一些新观念。由于这些新观念的崛起带来了中国电视的飞速发展,所以,90年代电视的发展力度,压倒了其他媒体,成为当之无愧的第一大众传播媒体。

中国电视本体建设的下一步发展是什么呢?我的预测是生活服务类节目的崛起。大家需要更方便、更快捷、更直接、

更到位的生活服务,而电视在这方面的开发远远不够。我说的是真正到位的策划和真正到位的生活服务类节目。这类节目的崛起可能是电视所亟需的一种样式。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种预测。

回顾中国电视的发展,可以看出,我们开始只是把电视看作一种喉舌,看作一种工具,后来发现它的产业属性,自从广告进入电视以后,大家发现电视可以赚钱,每一个时段让出去都可以赚取巨大利润。这样,人们发现了它的产业功能和产业属性。所以说,既要扬我们中国特色的电视媒体的特点,即首先要完成宣传任务,在这个前提下,也要达到它的市场效应。为什么成功的栏目和节目可以取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就在于它既完成了党的宣传任务——领导重视;同时,满足社会需要——群众关心;还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社会普遍存在。这是中国传播艺术的特点。

最后,我简单的谈一谈中国电视下一步发展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第一,最近电视业内对频道专业化问题探讨很热烈。频道专业化实际上是电视生产和经营的一种最基本的观念。电视媒体自身的组织形式,一是频道,二是栏目,三是节目,以往我们经营的多是节目。后来我们经营的是栏目,下一个段落,我们将经营频道。将来的竞争首先是整体频道的竞争。频道将会向专业化的方向发展,每一个频道要有它非常鲜明的风格和它的主打的内容,比如电影频道、体育频道、读书频道等,我喜欢什么,就选择专门的频道来看,这是个大趋势。当然,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频道专业化在我国将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第二,产业化的问题,或者局部的产业化的问题。现在经

常是 10 个小时的努力、10 个小时的成本做 1 个小时的节目,这是一个反效应。只有产业化、集团化的经营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在有限的人力物力的条件下,产生超出这个人力、物力的巨大的效应。

第三,解决地区发展的差异问题。电视的这种产业化功能或者说市场化效应是有条件的,因为中国的社会发展是不平衡的。我前面所说的这五种新观念只能说是代表了中国最先进的五种电视观念。电视的覆盖面现在全国基本上都能达到,但是各地区发展非常不平衡。不平衡导致了很多矛盾,如果不解决,后进永远是要拽后腿的,不可能保障电视的整体的发展。

第四,理论建设问题,这非常重要。中国电视 10 年来的大发展,某种意义上说是观念更新的结果。如果一个领导者,一个媒体的决策者和整个媒体的从业者没有一种先进的观念去指导,用先进的观念去作,它就可能永远地落后于这个时代的需要。而新观念的诞生一方面来自于实践的摸索,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扎实的理论建设与深刻的理论概括。从这个意义上讲,理论建设迫在眉睫。我们现在需要高瞻远瞩的决策研究,需要深入扎实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可具操作的应用研究。基本理论研究是提供原理,决策研究要保证导向,应用研究要满足从业者的实际需要。

第五,电视教育问题。80 年代电视人才只要求具有单方面的知识结构就可以了,比如学摄像就学摄像,学播音就学播音,但是未来恐怕不行。从制作人到制片人到策划人,越来越需要具有复合型知识结构的人才。将来不会为一个职业设定一个专门的专业,一个单科的专业将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变革的需要,即没有生命力的。所以说将来最需要复合型的电视

人才。我们的课程体系、教学内容都要围绕这个目标去设计。现在加强素质教育,提倡培养复合型人才,也是这一要求体现。另外一点就是电视要进入学术状态,现在电视教育整体上学术水平不高。电视教育需要以电视理论研究的水平为依托,电视的理论研究水平不高,而电视的实践发展又那么快,你就不可能把最新的成果和观念教给学生,结果是被动的。如果教育观念落后,培养出来的学生一出去,就已经落伍了。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基于广大从业素质的提高,所以我们应当把最新的电视观念传给受教育者。当他们成为中国电视中坚的时候,就可能把这些观念与他们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创造出体现时代水准和人民需要的辉煌业绩。谢谢大家!

演讲日期:1999年9月30日,华中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供稿,本人审校

编者絮语 演讲者是电视理论研究方面颇具影响的新锐之一,出版和发表获国家成果奖和专著多部、论文多篇。参加了如《香港沧桑》等大片的编导工作,参与了如《东方时空》等著名栏目改版策划工作。因此,谈及中国当代电视观念的转变,既有理论,又有实践,已初具登绝顶一览众小之气象。

经济与社会

ZHONGGUO DAXUE RENWEN QISILU

赵海英

香港大学博士

苦干固然重要,但要真正而且彻底地改变一个国家的经济面貌,最主要的还是国家是否被正确地领导。

衡量一个制度好坏的最根本标准是:看它能不能使人尽量发挥出自己的才能和优势。

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

——在华中理工大学演讲——

感

谢华中理工大学的校领导和经济学院的院领导能邀请我。今天,我就“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这个题目发表一点看法,算作抛砖引玉。

中国的古人称 30 年为一世,并用“恍如隔世”来形容事物的变化之大。中国近代史上有数个 30 年:辛亥革命到 1949 年新中国建立,是 30 年;1949 年到 1979 年的计划经济,也是 30 年;1979 年到现在,接近 30 年。这三个 30 年,虽然变化都很大,但真正能称得上“恍若隔世”的,似乎只有最后一个,即

改革开放的 20 年来。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所有的人都在关心同一个问题:经济发展。许多人在耗尽毕生精力做理论研究,目的是找出一条发展经济的正确道路;有的人在埋头苦干,为的是为经济发展的大厦添砖加瓦……其实,苦干固然重要,但要真正而且彻底地改变一个国家的经济面貌,最主要的还是国家能被正确地领导。如欧洲,“二战”的灾难可以说是毁灭性的,但他们在 30 年的时间里便在战争的残墟上重建了家园,并且是比我们要美丽和富裕的家园。有经济学家认为:在相同的条件下(劳动素质、制度、技术水平相同),如果只是因为缺乏资本、设备、厂房等硬件而导致经济暂时滞后的一方,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和先进方趋于一致。这并不是耸人听闻,而是经过理论和实践证明了的。贫穷的国家和发达国家相比,虽然在技术和资金等方面处于劣势,但也有一个长处:有很廉价的劳动力。贫穷国家要想尽快地发展经济,便要充分利用这一巨大的潜力。当然,光有劳动力还是不够的,他们还应该建立起一套相应的“软件”配套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改变观念和建立制度。只要做到这一点,物质财富便会如同一个 baby,给他 30 年的时间,他一定能长大。(笑)

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改变观念的问题。

子路曾经问孔子:如果请您出来治理国家,您该怎样做。孔子说:正名。也就是使人民的观念正确。子路觉得很奇怪,孔子便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仪不兴,礼仪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以措手足。”通俗地说,便是如果观念未改变过来,一切都免谈。这个道理,拿到我们进行经济建设的今天仍然适用。

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促进经济的发展,大兴土木,建

厂房,筑桥梁,铺铁路,忙得不亦乐乎。虽然硬件方面的投资的确很重要,但如果不重视国民素质的提高和观念的改变,一味地建设投资也是白浪费,是本末倒置。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总是呼吁要节俭,要反对浪费,并且对一些浪费现象很是反感(如群众对公款吃喝的厌恶),但这种浪费和制度扭曲所造成的浪费相比,可谓是小巫见大巫,而与因观念落后所造成的浪费相比,则更是差得远。

观念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打个比方说,有的人是夜猫子(我自己便是),白天干事没什么精神,一到晚上却精神抖擞。如果要他变成正常人的样子,白天劳动,晚上休息,是很难的。这只是一个习惯问题,如果上升到观念的层面上了,要改变就更难了。美国有一位经济学家说:世界上最难改变的是人们想问题和看问题的方法。对一个国家来说,真正的领导(并非单指政治上的领导,还包括其他方面的)是要能领导社会和民众走出新天地的人。

观念之所以难于改变,是因为它是心理行为方面的东西,是人性方面的问题:它之所以重要则是因为心理行为的改变才能使外在行为改变。

人性的问题是很复杂的,别看人类上天入地,大到宇宙小到夸克,都在作深入的研究,但人类对自身,尤其是自身的心理深层次层面却知之甚少。中国文化对人性则有较深刻的认识。儒家经典中,孟子认为人性本善,而荀子则认为人性本恶,比方说小孩一出生便知道和别人争要东西,要改变恶的人性只有靠后天的教育。告子持折衷观点,他认为人性无所谓善恶,是一片空白,后天环境就像一个染缸,好的环境培养出的人性是善的,而坏的环境培养出的人性则是恶的。更有甚者,佛教和道教则认为恶和善都是相对的,因此他们认为人性

无所谓善恶。虽然对人性善恶的问题在中国和西方都有争执,但两者为防止人性向善的方向转变,都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中国主要依靠伦理和仪礼来教人学好,而西方则主要靠上帝和刑具来对人进行约束。

经济学家认为人性的善恶不是他们所要探索的东西,他们只是在认定人都要为自己利益而奋斗的基础上,找出促进经济发展的最佳途径。到目前为止,经济学家虽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但他们对人类最大的贡献仍是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市场经济作为各种经济形式中的一种,它最微妙的地方是:充分利用了人都要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的人性特点,进而达到使整个社会都提高的目的。通俗地说就是尽最大的可能调动一个人的潜力使其自身富裕,因为人是社会的组成单元,每个人都富裕了,社会自然富裕了。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忽视了人类自身的本性而一味地要求人们“存天理,灭人欲”,其结果是造就了一批假、大、空的东西,使人性扭曲,经济发展也违反了客观规律。

这就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观念问题!

我认为,衡量一个制度好坏的最根本标准是:看它能不能使人尽量发挥出自己的才能和优势。如果在某种制度下的大部分人觉得被制度束缚住了手脚,空有满腹才能却无法和无处施展,这个制度就不能称之为好制度,而如果一个制度能像大禹治水般对人们的才能加以正确引导,使其最大程度地为社会服务,就算这种制度有其他方面的不足,它仍不失为一种好的制度。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式,它实质上就是无为而治,即依据市场规律办事。老子认为“治大国如烹小鲜”,很赞成无为而治。当然,经济学家提出市场经济理论时可能根本就没

有上升到哲学的层面上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毫无疑问的是,市场经济将这一伟大的哲学思想具体化了,并为人类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市场经济利用人为自己利益奋斗的心理特点,当然并不意味着对人性的压制,但也不意味着对人们一味放纵。与此同时,法律之剑仍悬在人们的头顶,目的便是使其不至过于越格。西方社会认为市场经济并不是将一切交给市场,彻底不加干涉,而是还要法制为它的自由竞争提供保障。这种法制并不是单指法律,它实际上指的是体制。

西方将体制划分为两种:硬体制和软体制。硬体制包括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制度层面的东西,而软体制则包括社会文化、行为方式、文化传统等文化层面的东西。

在现实中,我们对硬体制的建立总是很关心,经济学家讨论的焦点也往往集中在它上面。虽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在他的著作中也提到过软体制的重要性,但人们往往不明白硬体制和软体制之间的关系。

其实,制定法律制度等硬体制固然重要,但没有软体制还是不行的,因为软体制是硬体制的基础。没有软体制这块地基,硬体制的房子无从搭起,就算搭起也是不堪一击。软体制如果不行,再好的硬体制也是空有其貌,没有任何作用。

就拿印度来说,它们实行的是民主选举制度。按理说,选举权在人民手中,人民肯定会选出好的、廉洁的政府官员。但事实是:印度是目前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是不是选举这项制度有问题呢?不是!问题的根源在于印度的软体制不行。其一,印度的整个社会文化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因此选不出好的官员来。其二,就算选出好的官员,因为他们没有配套的软体制,好的官员难以执行自己的决定和政策。其结果是

民主选举空有其貌。

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情况也是这样,几届的民主选举选出的都是腐败的总统,最后人们甚至欢迎独裁者来统治他们的国家。

我举以上的例子只是为了说明软体制的重要性。在中国,如果要想建立起完善的体制,仅仅制定几条法律是不行的,关键在于执行。而法律的执行与否便在于社会风气和人们的行为方式(如人们是否讲裙带关系,是否“宽于律己,严于律人”等),这便属于软体制的问题。

至于软体制如何建立,这便是非我等所能解决的问题,它仍有待于中央领导人去思索。(笑)

我在前面曾引用过孔子的“正名”来说明改变观念的重要性。现在我还打算用孔子的话来谈谈我对如何改变社会风气的看法。

有人问孔子:该如何改变社会风气?是不是应该用刑罚来强制性地对人们作出要求?孔子说:要想真正改变社会风气,其实根本用不着去大兴刑罚,只要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孔子这句话我们往往指责为宣扬封建等级,其实它有很深刻的含义,就是拿到现在,它仍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说的是,做“君”的人要尽君主的职责,做“臣”的人要尽臣的职责,做“父”的人要尽父的职责,做“子”的人要尽子的职责。通俗地说就是各种职务和身份的人都要尽其本职。我认为在当今社会“君君”这个问题很重要。孔子还说过“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这里的“君子”不是道德意义上的君子,而是指领导,他的意思是:只要领导干部能各尽其职,带头作出表率,群众便会上行下效,“见风而

伏”。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仍要求“君”要“君”,“臣”也要“臣”,我们国家要完善法制关键也在于领导干部能以身作则。

经济学发展到今天,出现了很多分支,经济学家也多如牛毛。但真正有思想有创见的并不多,其中有一位直到近些年来才被人认识到他的价值,他的名字叫哈耶克。他认为一切经济理论都是建立在逻辑推理的基础上的,所有的经济理论看起来都是合乎逻辑的,但它们是否有实用价值就只有靠实践来检验了。事实也是这样的,就拿计划经济来说吧,别看它现在受到了许多人的非议,并且被我们所淘汰,但如果你从逻辑上去考察它,你同样会发现它并未出现任何错误。

哈耶克还认为,人们总是以为他们是理性的动物,但事实上他们在经济现象中的表现证明他们是经验性的。人们总是在经验的基础上去认识世界,他们心中有各种欲望,导致他们的理性有时并不起作用。这点与佛教的理论有相似的地方,佛教认为人是有各种欲望、有偏见的,只有做到“无我”时才能不为物累,达到理性的境地。

哈耶克这个理论给我们的暗示是,有许多时候我们被经济学家欺骗了。就拿我们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来说,其中便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渐进疗法和休克疗法。

渐进疗法的意思是,我们要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必须是一步一步地进行。这种理论持有者的依据是,市场经济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新东西,我们不可能对它有很全面的认识,并且在其建立过程中,势必会出现一些新问题,我们必须逐个解决,否则它们积累起来将成不治之症。说白了便是要采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目前,这种理论在我国占统治地位,并且我国的经济改革也是采用这种做法。

休克疗法则认为这个转变过程应该一步到位,正如跨越一条鸿沟,如果一步没能跨越,得到的将是掉进沟底的惨重后果。他们的依据是:在渐进式变革过程中势必会形成一些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为维持他们的既得利益,必将对后来的、损害他们利益的改革造成障阻,结果是改革将越来越难以进行,最终将半途而废。

渐进疗法理论支持者用前苏联的解体来诘问休克疗法理论支持者,而休克疗法理论支持者则认为,前苏联的改革是短痛,假以时日,俄罗斯的经济肯定将重新起飞并超过中国,而中国的改革则是长痛,其前景将越来越暗淡。

这两种理论都有道理,事实如何,只能靠时间去证明,我不敢妄加评论。但我认为,包括这两种理论的所有经济理论都可称得上是盲人摸象,摸到象鼻的人摸到的的确是象鼻,摸到象耳朵的人摸到的也的确是象耳朵,但都不是象。作为一种经济理论,它不可能面面俱到地考虑到现实经济改革中可能出现的所有问题。因此我们也不能寄希望于市场经济能解决我们的所有问题,市场经济如同一柄剑,在一流的剑客手中将无坚不摧,而在末流的武师手中则一击即断。

现在,我们为发展经济,的确应该向西方学习一些先进的东西,但我们的传统和一些优良传统不能丢。我们学习西方的经济理论,借鉴西方的法制建设,这些东西都是硬体制的东西,而作为同样重要的软体制,只能从我们的传统和习俗中去发掘。有些国家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往往忽视了这一点,不学他们文化的精华,却照搬他们的流行文化,自身的优良传统也被丢进了垃圾桶,其结果是,整个民族变得浮躁,没有根基,不知何去何从。

中国人一向是讲究现实的,中国人的逻辑也是现实的逻

辑,我们的祖先并不太注重理论,只要它有用,我们使用它,不太追究其原因。如中医,开始并没有什么理论,完全是一种经验的东西,一种药物为什么能治病,我们的祖先并不知道,它能治什么病也是试出来的,中国的神农氏尝百草的传说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西方则和我们相反,他们事事追求逻辑,追求原因。这似乎可以算得上东西方文化的不同特质。

“知其然”虽然使中国人讲实际、讲实事求是,但“知其所以然”毕竟能为我们指明道路。在今天的经济改革中我们要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就要求我们在继承求实的优良传统的同时,还要做到讲理论、讲知识,向西方学习,只有这样,我们经济改革的航母才能驶向远洋!

演讲日期:1999年5月23日,华中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供稿,录音整理:王毕文,未经本人审校

编者絮语 近年来,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把经济问题与人文、社会问题联系起来研究,如经济伦理问题。本文将经济与文化的关系作为关注点,是不是也是一种表现呢?在西方商品经济开始繁荣时,卢梭、莎士比亚等对西方社会日益严重的“商品拜物教”现象的有力批判,是不是对商品经济的弊端有所制约作用呢?是不是对规范商品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呢?

陈建新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

1995年5月8日,中国乒乓球队3
2胜瑞典队。国际乒联主席哈马龙德在
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瑞典队有世界上最
好的球员,中国有世界上最佳的球队。
这句话蕴含了很深刻的系统思维思想。
因为中国队的胜利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中
国队教练蔡振华运用系统思维方法,排
阵布局出奇兵,演绎了一场现代田忌赛
马。

现代企业家的思维方式

——在华南理工大学演讲——

同

学们好!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在这里与这么多有志
于做一个现代企业家的同学们共同探讨现代企业
家的成功之路。近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在我国由计划
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在我国深化国有企业
改革的攻坚战中,传统的思维方式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成为
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严重障碍,即使像企业经营管理这种
看起来十分具体、操作性极强的实践性活动,即使像企业家这
种一般人认为最讲实惠、甚至常常是急功近利的社会角色也

都摆脱不了思维方式这种十分抽象、思辨性极强的观念形态的制约。

去年我去天河开发区调研,当我谈及天河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发展似乎不太景气时,开发区的工作人员同我们谈到了一个观点,很多搞开发的人,以一种“小生产的方式搞高新技术产业的开发”,当然不会有大发展。这里所谓的“小生产方式”有可能指的是小生产的生产方式,但主要指的是小生产思维方式、思想观念。

最近我看到一个材料,“中关村的老板危机”,讲的是北京中关村高新技术开发区在经历了创业阶段,争取新的更大发展时却步履维艰,其困难在于许多企业家没有了当初的创业激情,有人看见赚了几个钱,都希望能将钱分到自己的口袋里;有人依然是当年的“草寇作风”,或者是家族式管理,家长作风,不适应新的管理形式;有人满足于当“小老板”,没有当大老板的雄心和气魄,更不要谈当国际性的企业家。这当然会阻碍中关村地区的新的发展。思考一下制约中关村的老板们发展的深层次原因,也是思维方式的问题。联想到1987年首届20名优秀企业家至今仍叱咤风云者所剩无几,感觉中国的企业家大多昙花一现、成为“彗星”式人物。究其原因,有政策、法制、舆论等因素,中国没有培育和保护企业家健康成长的土壤和环境。但从企业家自身的素质方面找原因,不具备现代企业家的思维方式是主要的。

天河开发区的“小生产方式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也好,“中关村的老板危机”也好,中国企业家的沉浮都启示我思考,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主力军,市场经济的弄潮儿的企业家要能跟上改革开放的发展,要能继续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里起主导作用,思维方式的建设和转变是一个非常重要,也是非

常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有一次与几个朋友在一起闲聊这一话题,其中有个朋友是国内某著名企业集团的一个中层管理职员,他说我这些思考有见解,而且与他们的老总一贯的思想很合拍,就邀请我去给他们的中层管理人员讲了这么一个题目,促使我在这方面作了更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我的这些思考和研究是很不够的,尤其是我缺乏企业工作的经历,就显得很单薄。但我认为这个问题对于搞好国有企业改革、振兴民族工业、培养新一代企业家都是十分重要,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我今天讲三个问题:

- 一、思维方式与思维方式的现代化。
- 二、现代思维方式在企业活动中的作用。
- 三、企业家思维方式的转变。

第一个问题主要是要使同志们了解什么是思维方式和现代思维方式的基本特点。

谈到思维方式,同志们很容易把思维方式与思维方法联系起来,甚至等同起来。作为一般的理解,二者等同也没什么大的问题,但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来研究,二者是不同的。思维方法通常是指的思考问题的方法,它是很具体的,可操作的,如我们熟知的形式逻辑的方法,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等等。思维方式的抽象程度更高,含义更宽泛,它是一种文化层面的观念形态的东西。所谓文化,最核心的就是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是一定时代的人们在一定的观念、知识和方法的基础上形成的思维过程中的思维形式、思维方法和思维程序的总和,是一种思维框架,它本质上是人们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反映。它是不可操作的,但它却无时无刻地不在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发生着影响,包括对人们的思维方法的影响和制

约。而且这种影响往往是潜移默化的、强制性的、人们无法抗拒的。这是思维方式所具有的普遍的社会性和积极的能动性的特点。思维方式还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鲜明的民族性。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们由于它们的生活环境、生活经历、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不同,其思维方式也大不一样。一些广为流传的口语和趣谈,如德国人严谨、法国人浪漫、美国人实用等,虽然有的难免附会和牵强,但都说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在思维方式、价值尺度、情感取向、文化心理素质方面的差异。

前面我们谈到思维方式具有强烈的时代性。那么随着历史的进步、时代的发展,现代思维方式与古代、近代的思维方式也大不一样了。

20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以来,由于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深刻影响,世界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科学技术整体化、综合化的突出表现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工程技术三大知识体系的汇流,科学、技术、生产的一体化,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加强,知识经济已见端倪;世界的政治军事格局从冷战时代的两极对抗转化为多极竞争,经济出现了全球化的趋势,各个利益集团的矛盾与对抗虽然仍然存在,并会不断加剧,但诸如全球性问题等共同面临的困境又把各利益集团紧紧地联系起来;此外,社会的开放化、文化的多元化、交往的信息化和网络化都是这个时代的突出表现。

这样一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人类活动方式的改变,反映在思维方式的转变方面,就是思维方式的现代化,从传统的、机械的、封闭的、单一的思维方式向综合的、开放的、多维的现代思维方式的转变,尤其是形成了以整体性、综合性为基本特征的现代系统思维方式。系统思维方式是现代思维方式

的核心和主要内容,以系统思维方式为核心凝聚了现代思维方式各方面的内容,折射出现代思维方式五彩缤纷的多元互补特征和未来发展趋势。

在现代社会活动中,系统思维方式的应用是十分广泛的。1995年5月8日,在第43届世乒赛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以3:2胜瑞典队,夺回失去6年的斯韦思林杯。在记者采访国际乒联主席瑞典人哈马龙德时,他说:瑞典队有世界上最好的球员,中国队有世界上最佳的球队。这句话蕴含着很深刻的系统思维思想。因为中国队的胜利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中国队教练蔡振华运用系统思维方法,排阵布局出奇兵,演绎了一场现代田忌赛马。现代管理科学中崛起的管理系统学派等,就是受现代系统思维方式的影响而产生的。

现代思维方式的特点是综合性、创新性、开放性、预见性、多元化、信息化。最能体现现代思维方式这些特点的是由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同志概括总结出来的综合集成思想。综合集成思想把各方面有关专家群体的知识和才能、各种类型信息及数据与计算机的软硬件三者有机结合,构成高度智能化的人-机交互系统,同步加速地对事物反复进行定性与定量的分析与综合,激活群体智慧,发挥整体优势和综合优势,集智慧之大成,从而找出总体上观察和解决问题的方法。综合集成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继承和创造性运用,是现代系统思维方式的具体体现,它为人类解决面临的日益复杂的开放复杂巨系统问题提供了一种科学的方法论,为当代管理决策提供了全新的思维方式。

下面讲第二个问题:现代思维方式在企业活动中的应用。

在前面的介绍中,思维方式是一种很抽象的东西,是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但是它又确实无时无刻不在对人们社会生

活的方方面面起作用。那么现代企业经营管理受不受到思维方式的制约和影响?现代企业家需要不需要现代思维方式的建设和转变?答案是肯定的。而且从前面我们所谈的来看,这个问题的提出和解决非常迫切,非常重要。

思维方式作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种思维框架,是自觉不自觉地对人的活动起制约作用的。作为现代经济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的企业经营管理活动,当然也要受思维方式的制约,或者说,现代思维方式在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有着十分突出和重要的作用。

1. 现代思维方式是造就一代新型企业家的基本素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一个崭新的社会群体,或称社会角色,即企业家。前些年,还有人否认中国有企业家,其理由是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现在看来,中国企业家的出现已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而且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中国也正在形成或者说已经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中国的企业家主要由三方面组成:一是国有工商企业的领导人,二是民营企业、大量的乡镇企业的领导人,三是个体工商企业者(包括外资、三资企业的领导人)。不管是何种企业的领导人,都不同于传统体制下的“政府厂长”,“官员经理”,那只是一种执行者,充其量只是 manager(管理者)。真正的企业家 enterpriser 必须是代表真的自负盈亏,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工商企业的经营者、管理者。英文的企业家 enterpriser 本来就含有创业、冒险、有进取心的意思。在中国,对企业家有很多曲解,企业家声誉不高,没有安全感,应该让社会了解企业家、尊重企业家。企业家行为必须符合经济人及本企业利益的规范原则。企业管理是一项开拓性极强的工作,企业家是一种具有高度创造性的职业,没有科学的思维方

式和较强的思维能力,就无法确立现代化的管理观念,也不会有深邃而宽博的管理眼光,就不能发现新问题,开拓新局面,也就难以登上企业家的高峰。因而,企业家必须掌握企业管理的基本理论,熟知现代企业管理的方法,是经营企业的行家。

企业家不是自封的,也不是靠哪个人赠予的,而是通过自己的实践的努力,社会公认的。综观世界各国有关企业家素质和条件的观点,几乎都认为作为一个企业家应具有创新能力、战略能力、经营管理能力和知人用人的能力。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企业家是个经济学概念,它是说明一种素质,而不是一种职务。不是说企业家非得是厂长、经理。他认为企业家有三个条件:一是有眼光,能发现别人不容易发现的赚钱的机会;二是有胆量,要敢于拍板;三是有组织能力,能把各种生产要素组合在一起产生高效率的组合能力。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企业家还有第四个条件,就是有社会责任感。有人说,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应具有战略家的头脑、政治家的胸怀、哲学家的思维、科学家的智慧、军事家的胆识、艺术家的灵感、外交家的口才、体育家的体魄。同学们可以思考思考,这些能力中哪一种又离得开思维方式呢?所以说,现代思维方式是造就一代新型企业家的基本素质。国内外一些著名的企业家,如日本的松下幸之助、土光敏夫,美国的艾柯卡、卡内基,我国的“电视三杰”等之所以能攀上企业家的高峰,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重视思维方式的作用,有一套自己的经营管理哲学。大凡成功的企业家,都是具有哲学思维兴趣和掌握了现代思维方式的 manager,都是重视思维方式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的管理角色。换个角度说,科学的现代思维方式是现代企业家必备的条件之一,不掌握科学的现代思维方式的企

业管理者,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现代企业家。可以说直至今天,在我国真正具有开拓创新能力的企业管理者还是凤毛麟角。

2. 现代思维方式是深化企业改革、扩大开放的前提。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对不同类型的企业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原来的国有工商企业的领导人面临着如下转变:

第一,从产品生产的组织者转变为商品生产的经营者的。最近,江泽民同志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讲话中,还特别指出国有企业要实现管理模式由过去的单纯的生产管理向经营管理的转变。

第二,从一切听命于上级的执行者转变为自主经营的决策者。要给企业充分的自主权,首要的是明确企业家独立的法人代表地位。

第三,从单纯的国家财产的使用者转变为国家财产的增值者。企业家的职责就在于实现企业的价值,必须注重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

国有企业在转轨改制的过程中,若不实现思维方式的转变,建立顺应时代潮流的现代思维方式,就有可能穿新鞋走老路。改革开放从放权让利开始,但有些厂长、经理一旦有了权,当了婆婆,却不知道路怎么走,又去为自己找婆婆。其原因就在于他们以往没有独立的思维方式,而是习惯了听命于上面的红头文件,不懂得用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思维方式去管理企业。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如何接受这个转变、适应这个转变、完成这个转变,不在思维方式上首先来个转变,从过去的“执行型”“封闭型”转变为“自主型”、“决策型”、“开放型”和“开拓型”显然是不行的。

对于民营企业、乡镇企业和个体工商业者来说,虽然受传

统计划经济体制束缚较少,企业的利益主体明确,利益主体对企业的发展方向、企业目标的调控直接、有力、有效,这些都是它们相对于国有企业的优势。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企业经营管理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也都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企业活动因素的数量不断增加,企业活动因素的相互联系日趋复杂,企业活动因素的变化日趋加快,而且国有企业转轨改制以后,甩掉了原来的包袱,其本身具有的优越性将得以很充分的发挥,这无疑对民营企业、乡镇企业、个体工商业者是一个挑战。民营企业、乡镇企业和个体工商业者能不能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也必须注重思维方式的转变。有些乡镇提出了“拓宽思路,拓宽公路,拓宽财路”的口号,顺德北蟮人提出的从“我们的产品的国际市场”到“我们的国际市场”战略,视野开阔、思维灵活,表现出这些“洗脚上田”的农民企业家们良好的思维素质。

此外,扩大开放、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实施国际化经营战略等,决策管理的风险性更大,不确定因素更多,非程序性更强,作为企业家的战略性决策和管理来说,要能很好地适应这种变化,都必须以建立现代思维方式为前提。

3. 现代思维方式是有效运用现代管理方法的先导。

企业经营管理思想是企业管理思维活动所产生的结果,管理思想现代化受思维方式所制约,因而思维方式的现代化是企业管理思想现代化的先导。企业管理现代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改革创新的过程。企业管理者具备现代思维素养,树立现代化管理思想,才能大胆创新和有效采用现代化的组织、方法和手段,使企业管理现代化工作卓有成效。企业管理者如果只是在传统思维方式的桎梏中转圈圈,那就不可能提出任何新套路。只有改变陈旧的思维方式,确立现代化的思

思维方式,用新的眼光、新的思路和新的途径进行思考,才能创造性地接受新思想、提出新观点,从而实现企业经营管理思想的根本转变。把思维方式现代化弃于一边,孤立地强调管理方法和手段的更新,是舍本逐末、治标不治本的做法。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不能实现企业管理现代化,而且必然造成管理思想的贫困和僵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具体的企业管理理论、方法和技术的引进介绍方面,倾注了较大力量,各种学派、理论和方法和技术都有介绍,基本改变了我国缺乏企业管理知识的状况。但用得怎么样呢?管理效益提高的速度和幅度并不大,落后的状况并没有根本好转。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现代化管理方法用起来还不如老办法,有的企业虽然用了一些新方法,但是穿新鞋走老路,还在传统思想的指导下去应用,效果也不好。有的地方花巨款买了计算机、联了网,培训人员,但却得不到使用。据统计,我国计算机用于管理最好的莫过于发工资而已。这些情况的症结就在于思维方式的转变没有跟上,思维方式没有先行。很多现代化管理方法是建立在现代化思维方式的框架和基础上的,而且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源于日本的TQM和源于欧洲国家的ISO9000质量认证体系就体现出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美国式CI策划偏重于视觉识别(VI),并以标准字和商标作为CI的主要内容;日本式CI更注重经营理念(MI),积极开展各种识别活动来提高企业产品的服务质量、信誉和知名度等。如今不论是生产管理、网络技术、目标管理等等,都必须树立系统观念、综合观念、集成观念,要从整体和全局出发,统筹全局。电子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用于管理,关键是按信息观念和网络文化的思想调整管理体制、组织机构和人际关系。所以若没有树立新的思维方式,在

旧思维框架里去运用新方法、新技术,或者就方法而方法,就技术而技术,方法再好,技术再先进,成效不大,推广不开,甚至南辕北辙。

4. 现代思维方式是不断提高企业经济活动效益的保障。

现代思维是企业管理者认识和改造客观现实的理性应变能力。这种能力在企业管理中发挥得好,决策和管理的效益就会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有效地开发和利用思维资源,能为企业带来巨大的财富,这是知识经济和知识管理的依据所在。在知识经济时代,现代思维是比物质资源更宝贵的特殊资源。物质资源是有限的,智力资源是无限的: $0 \sim \infty$ 。开发不起来为 0,开发起来为无穷大。在知识经济时代,无形的智力资源将有形的物质资源的效益和潜力尽可能地发挥出来。过去办好一个企业,有资金、物资和管理经验就行了。今后要办好一个企业,光凭借上述几种资源已经远远不够,还必须充分发挥思维资源的作用。现代企业管理者惟有熟练地掌握现代思维方式,保持其思维的精确性、敏捷性、灵活性和创新性,才能提高“出主意”的效率和准确度,创造性地把企业办得更出色。离开现代思维,就会失去创造性管理能力,不可避免地落后于形势或受制于竞争对手,从而把企业引向死胡同。正是这个缘故,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美国、日本等一些工业化国家的企业,为了不断增强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以及职工的素质,进而提高企业的利润收益,兴起了研究和讲授专门以开发思维资源为宗旨的创造学的热潮。

下面讲第三个问题:企业家思维方式的转变。

这里我只是就我的体会谈谈在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面临变化万端的市场形势和国内外经济形势,作为一个现代企业家应逐步建立的几种现代思维方式。现代思维方式并

不排斥传统思维方式,而是对其加以扬弃、整合和优化;现代思维方式也不是以华夏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取代西方文化,而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互补,走向融合。

1. 经验思维向科学思维的升华。

传统思维方式是一种经验思维,企业领导人根据多年的经验“拍脑袋”决策,它的主要特点是具体形象性和直接可行性。经验思维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由于缺乏对事物内在规律性的揭示,只能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对人的认识和实践有指导作用,超出一定条件和范围就会丧失其有效性。现代思维方式要求向科学思维升华,以经验思维为基础,注重实验和分析,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丰富和强化了科学思维的功能。科学思维用于决策和管理,特别注重科学的知识、科学的手段和科学的程序。科学思维的基础在于对大量信息的占有、分析和处理,对于企业来说,主要是产品的市场信息收集和整理,以及对市场趋势的预测,包括建立必要的基础信息库,保障科学决策程序的完整的规章制度。尤其是网络技术的兴起,为企业的经营管理、决策和预测提供了极其先进的技术手段,也给现代企业家带来了新的挑战 and 机遇,能在网上捷足先登,对于企业的竞争与发展至关重要。要实现向科学思维的升华,对企业家的知识结构提出了较高要求。现代企业家应该使自己成为有一技之长,知识广博,有技术、懂经营、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

2. 单向思维向全方位思维的拓展。

单向思维是指拘于一个方向、一个原因或一个角度思考问题,拘谨有余而开拓不够,收敛过头而发散不足。中国古代有所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说,就是一种全方位、开放式的思维。多方位、多视角、多元素、多层次地进行考察、探

索和思考,发散思维与收敛思维互补、纵向思维与横向思维交叉、精确思维与模糊思维并重,力求把握事物的质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特别是现代企业活动环境复杂、形势多变,这种全方位思维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思考问题要充分考虑到思维对象的多因素、思维领域的多方位、思维目标的多选择、思维途径的多渠道,从诸多目标和方案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选出最佳方案、最优决策。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逐步形成,企业家面临着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从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从行业经济向区域经济的转变,从重产量产值向重质量效益的转变,从重实物资产向重无形资产的转变,从重外延投入向重内涵发展的转变,所有这些转变的实现,必须确立全方位的系统思维方式。

3. 常规思维向超常思维的飞跃。

近年来“超常”提得很多,很多城市、企业都提出了“超常发展战略”。我觉得对什么是“超常”要有正确的认识,超常只能是超越常规的思路、方法和格局。因为改革开放的深入,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面临世纪之交,城市、企业都机遇难逢,因而有了突破原来指标超常发展的要求和愿望。超常只能是超越主观,而不是超越常规的客观规律。有位很有见识的老人说过一句很有见解的话:“发展是硬道理,客观规律更硬。”违背客观规律去超越常规,这样的教训中国是很多、很惨痛的。超常思维也是这样,只能是超越习以为常的思维、方法等。首先要突破思维定势的束缚,思维定势是人们在思维习惯的作用下而形成的一种固定模式,它有其积极的作用,也有其保守的一面。面临新形势、新对象的时候,它会束缚人们的思想,应该尽量地减少思维定势的消极作用。其次要敢于实事求是地大胆怀疑,提倡“逆向思维”,勇于否定自我、超越自我,不断

创新,在产品性能、质量、包装、品种、行销网络、促销手段等各方面,超前决策、独出心裁、敢为天下先。这种超越常规的创新思维,是许多成功企业家的秘诀。日本索尼公司 85 岁的名誉董事长井深大坦然直言:“独创,决不模仿他人是我的哲学。”

4. 直觉思维向理性思维的渗透。

理性思维主要是逻辑思维,遵循严格的逻辑规则,传统的科学思维主要是这种循规蹈矩的理性思维。直觉思维是一种非理性思维,人们由于灵感、顿悟和潜意识的作用,“突发奇想”。企业活动是一种操作性很强的活动,直觉思维起不起作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毫无疑问,直觉思维用于内省休养,可极大地提高现代企业家的素质。付诸经营实践,往往使企业柳暗花明、枯木逢春、重发生机;或者启迪灵感,开发出新产品,开拓新市场。国内外大凡优秀的企业家必定是有眼光、有魄力的经营者。这种“眼光”和“魄力”,就以出色的直觉力为基础。市场风云变幻莫测,要求企业家以高度的直觉去及时把握住市场变化端倪及其规律,在别人看不到机会的地方发现机会,在别人还犹豫不决的时候能果断决断,靠的就是直觉对随机性的认识和把握。企业家有了 35% 以上把握便可决策,这时的决策可能是对风险的挑战,尤其是当企业家处于两难困境(风险和机遇并存而且对等),是对企业家直觉力的严峻考验。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只有在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敏锐深刻的直觉力的支持下,经过长期经验的积累和理性思维的锻炼,才能具备适应商战竞争的优秀的直觉力。

5. 个体思维与群体思维的融合。

个体思维与群体思维是两种不同思维主体的思维活动。随着现代生产活动的高度综合化、社会化,企业家的决策单靠

个体思维远远不够,必须与群体思维相结合,集思广益,实行民主决策与管理。中国传统管理素来“以人为本”,注重举贤用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创造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经验,即要求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技术改造;干部、工人与技术人员三结合。这一经验被日本人学去后,成为日本战后经济迅猛崛起的法宝。松下公司的“全面质量管理”,丰田公司鼓励员工提合理化建设,连澳大利亚一些企业也开始注重激发广大职工的“士气”,无不体现出这种个体思维与群体思维融合的思维方式的优越性,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中实现个体思维与群体思维融合的科学途径是发挥“智囊团”的作用,这是一种高于传统谋士的概念,也不同于群众参与的现代决策管理活动。它讲究专业结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的优化组合,运作的科学化,实现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美国兰德公司、斯坦福战略研究所、日本的野村综合研究所是当今世界上最优秀的“智囊团”,它们为许多企业乃至政府决策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本人供稿

编者絮语 一位著名企业家说过大意如此的一段话,虽然同是企业,但有的是在生产产品,有的是在生产品牌,有的是在生产文化、哲学。的确,企业家的思维方式对企业的发展方向起着决定性的影响。或许今后你要从事企业管理工作,那么,建议你从现在开始,就努力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

周冠雄

广东顺德市北螭镇镇长

作为学生,在自我培养和定位上,我觉得要抓紧时间从事严格的科学技术训练,这点上,华中理工大学有很好的传统,科学上从严、技术上从严、训练上从严。可是脑袋瓜不能从严,否则就不会有创意。

资源有限,创意无限

——在华中理工大学演讲——

应

华工的书记和校长之邀,我今天来到了这里,我也想回来看看。我出去大概有 8 年了,如果加上干项目的时间,那就有 10 年了。原来我准备了一个稿子想和大家一起探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学校建设的若干问题的思考”,后来考虑到是给你们学生讲,而这个题目有人说应该给干部讲的,所以就临时换了个题目。而换的这个题目没有稿子,有不妥之处,还请原谅。

首先,我谈的是,我离开高等学校到位于珠江三角洲的顺德市的一个农村,经过短短 10 年的努力,把北螭镇建设成了一个国家的十强镇(排名第四),成为全国科技产业的示范镇以及乡镇发展企业的示范区。这 10 年的工作经验和实践,我

有个体会就是:资源有限,创意无限。

顺德市北螯镇地处珠江三角洲的腹地,10年前在顺德市经济综合实力排名是在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之间徘徊。它是一个种植水稻和甘蔗的地区,当时工农业总产值大概只有3 000万元,工业只有一家地方国营的糖厂。这10年来,我们走过了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现在正在走第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发展阶段是改革开放到1992年,我把这一阶段总结为以国家计划经济为主导的发展的历史时期。从1993年开始到1996年,是我们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发展战略是适应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适应国家从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重大改革的历史潮流,大力发展经济。现在是进入了第三个战略发展时期。下面我首先介绍一下前面两个历史时期北螯镇的发展情况,从中来阐述我的观点。

1993年以前,我们北螯镇的发展主要是在计划经济历史条件下利用计划经济所不能管到的市场的剩余空间以及中央人民政府在计划经济调控条件下为农村和乡镇企业发展所提供的政策,也就是说在这两个方面来谋求我们发展所需的空间和效益,加速农村在由农业向工业化进程发展过程中资本的原始积累。这个发展战略的主要特点是高负债发展和政府大额信用担保贷款,向市场和国家要高效益,去解决工业化过程中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这是根据我们国家当时历史条件而作出的创举。因为北螯那个地方不但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缺乏,信息资源、技术资源和信贷资源也很缺乏,当时工农业总产值才只有3 000多万元,但到了1996年,我们的总产值达到83亿,今年(1997年)预计可达100个亿。我们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在第一个历史时期我们充分利用计划经济所

管不到的市场来发展。计划经济是一个求大于供的经济,记得当时在华中理工大学买东西要排队,还要抽签,谁抽到谁才能买。我们北螭镇首先利用市场发展电风扇行业,到市场去拿我们的效益;第二,利用国家为发展农村和乡镇企业,以及在实施东南沿海发展战略过程中所制订的各项优惠政策,这些政策主要有,国家振兴农村经济所提出的各项科技计划的信贷规模,减免税赋制,三资企业进出口的零税率制,对三资企业不征税等。我们搞个项目出来,力争进入政府的计划,然后根据国家的政策,将政策转化为资本。我们很快上了一些工业、农业的项目,这些项目在当时国家计划经济是管不到的,因为当时国家只管钢铁、粮食、油类、棉花等,并且控制得很死,而这些小的轻工产品国家就管不到了。因此我们这个历史时期的发展战略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拿自己的公章,掏国家的钱。当时我们的创意就在于这一点,当然我们这样做,可不是偷,这是根据国家政策规定合法取得的钱。我们用这些钱去解决我们工业化过程中的原始资本积累这一问题,一口气干了几年,主要是在当时国家不加以管制的轻工家用电器这些项目上发展。我们要想发展起来,必须得有足够的资金,光有政策是不行的,因此我们要先向国家借钱,国家成了我们的债主,然后我们就变成了财主。这就是所谓的高负债发展战略。在具体操作上,我们又有些新的创意。总之,在1993年以前,我们做了两件事情,上了一系列的项目,基本上完成了初级工业化的过程,实现了农村经济从以农业经济为主到以工业经济为主的历史性的转折;实现了农村经济从传统种植业向现代养殖业的转变。在完成这两个历史性的转变过程中,我们培养起了两个区域性的支柱产业,一个是以轻工家用电器为主体的产业,第二个是养殖、加工、服务、贸易、

出口一条龙的大农业。在大农业支柱产业中,我们有现代化的养殖场,有饲料生产基地,我们现在大概有 200 多个养殖场,产值超 1 亿的养殖场就有好几个。这样就形成一个商品化经营、工厂化生产的大农业生产布局。我们有年产 44 万吨的饲料加工厂,有年产价值 5 亿港元生产加工能力的食品加工出口基地,以及一整套社会化的服务体系。在轻工家用电器这个产业里,我们有 8 家国家二级企业,培养了一系列的名牌产品,如“美的”、“ICMC”等。“美的”一年销售额大概为 30 个亿,饲料加工厂 6 亿—8 亿。建起了一系列大的工厂,创建稳定信誉的品牌,最重要的是培养出来了一批工程技术人员队伍,把这个相对落后的地方变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小城镇,完成了城市化的初步进程。我上面讲的就是第一个历史时期。

在这么一个很短的时期内,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取得了一个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但同时,又冒出了许多问题。首先,我们第一步的发展是高负债的,向政府贷了许多款,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高。其次,政府的信用担保贷款额度大。第三,在实施这种发展战略过程中,我们大部分是做对了,但也有做的不对的。由于决策和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一系列的客观和主观因素造成的失误,就演变成了对政府的直接债务。所以这类问题造成的负债就很大,这与政府的信用担保贷款是不同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这样一种发展战略中还存在一个我们很多大中型国有企业都有的问题,那就是企业职工福利待遇问题。这是我们第一个发展阶段的概括和思考。总的来说,我们在这一阶段的发展是有创意的,也是我们惟一可走的正确道路。利用政府的资源,利用信贷资源,利用国家的政策,来发展我们的

工业化。但同时,也使我们在 1993 年以后的发展面临一些问题。

我们必须及时考虑怎么去用提高政府的工作创意去解决这些问题,使得北虢的经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进入我们的第二个历史发展时期。就是国家从以计划经济为主逐步引导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的转型时期,我们要适应这种转变,进行我们的第二种发展战略。我们看到了以上所面临的问题,就必须进行调整。在这个调整时期,资源有限的问题仍然存在,这就对我们的工作创意要求很高。当时我任经济发展总公司的总经理和常务副镇长,主管金融、税务、科技、经济和财政,我必须想办法解决赚钱的问题。1993 年,国务院开始实行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要控制对固定资产的投入过多,速度过快。国家要收钱,通过银行系统对认为不合理的投资收费,特别强调控制房地产投资等非生产性的投入。但由于客观原因,这些钱国家收不上来,只好收我们企业的钱。这些企业有效益好的,也有效益差的,效益差的也交不上钱。1993 年我们国家政治上正处于第三代领导核心全面接替第二代领导核心的时期,政治上的特点决定了经济发展的特点,也使得我们许多人价值观念发生了改变,开始变得向钱看。这个时期我们处在单一的公有制模式,这就与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变产生了诸多冲突。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控远远跟不上社会实际上进行的步伐。当时国家进行了四大项目的改革,除了总体的经济宏观调控外,第一,金融体制的改革。银行不准信用担保贷款,要拿财产来抵押。第二,财税的改革。国家颁布了新的税法,用增值税这个体系代替原来的税制,并且把原来的税务局一分为二,分为地方税务局和国家税务局。国家税务局直接归中央管,这就是政治上的一系列原因所带

来的。因此,由于改革,我们前一阶段所走的路行不通。第三,进出口贸易的改革。取消了减免税和出口退税。实行外商的国民待遇,第一点,税收与国民一样,第二点,贷款与国民一样,第三点,开放市场。而我们国家在第一点上一步到位,第二点不能兑现,第三点拖拖拉拉,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因此我们前一阶段的战略就彻底行不通。我们意识到了国家的这种转变,就像国家每年提高教师待遇 10% 的政策一样,只是说而不出钱,那只好我们出票子了,在这一点上,国家也是很有创意的。我们只好根据这种转变来调整我们自己的做法,来进行我们自己的创意。

1993 年到 1996 年是我们的调整时期,我们想了新的办法去进一步保证我们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们营造了一种小政府、小政策、小气候、小环境,去做大政府、大政策、大气候、大环境下干不了的小事。这几年,我们做了五个调整:产权结构的调整,投资结构的调整,社会保障结构的调整,政府职能的调整,人才结构的调整。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我们具体做了什么。

我刚才说过,在计划经济历史条件下,我们搞的企业都是单一的公有制,那么产权结构的调整就是将单一的公有制调整到多种所有制结构,用产权进入市场。由于国家的改革,向我们企业收钱,我们流通资金没了,贷款也贷不到了,再加上社会生活多方面的变化,致使企业效益外流,这主要是分配问题造成的。针对这一问题,我就将内部产权拿到市场上,使之转变为资本,来解决我所面临的问题和组织新一轮的发展。我们将那些大企业、基础产业企业由单一的公有制转化为股份有限公司,实行政府控股,其余股份放到外资手上、到民间资本手上、到老百姓手上。将那些中小型企业改造为有限责

任公司,实行社会控股,全部股份都到了老百姓手上。我们采取的是赎买的方式。

同时我还必须进行投资结构的调整,用在产业结构调整时用赎买方式所得到的钱,去对调整后的两种模式的企业进行投资。政府的钱从过去用来办企业变成现在办工业园区,办港口码头,办海关,办公园,办学校,搞通信,办高尔夫球场,所有这些事都是把一个落后的乡镇逐渐城市化,同时改善我们的投资环境。我们建了北蟻港,建成两年来的实践表明,效益是很好的。另外我们还建了北蟻报关公司,从水路和陆路直接到香港,把一个落后的农村地区逐渐改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二类口岸。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用自己的公章,掏别人口袋的钱,做北蟻的事业。创意就在这里。走出了一条在国家严格控制税收的条件下,利用社会民间资本和国际资本来发展北蟻的路子。举一个例子来说,我创办了一个高收费学校,由开始 1 200 名学生每人收费 18 万元发展到现在的 2 300 名学生每人收费 33 万,我一直从幼儿园管到高中毕业,虽然等学生毕业后 33 万返还给家长,但我把这些钱集中起来去搞另外的投资是可以创造巨大效益的。

第三个调整是社会保障结构的调整。由于产业结构由单一所有制向多种所有制的调整,企业职工福利保障不能由国家来完全承担,因此产业结构调整后的有限公司必须为老百姓做主。因此我们同步搞了四个保险:养老、医疗、工伤、待业保险。由于当时国家规定不允许有失业,那只有叫待业,名为待业,实为做好失业的准备。因为没有现有企业工人的失业就不会有大批的企业生力军的兴起;没有落后企业的破产,就不会有后起的明星企业、高科技企业的兴起,这是经济发展铁的规律。因此我们的待业就等于失业,一旦失业就去领取

失业补助金, 现在我们的青年一旦失业就主动去接受再就业培训, 争取再就业。当时的计算机培训是由我开始搞的, 后来引进了一批科技人员, 才让他们去搞, 我就不用亲自去干了, 可以说在这方面我是鼻祖。

第四个是政府职能的调整。建国 40 多年来, 我们国家集中力量做了一件事, 就是将建国初期的多种私有制关系逐渐转变为确保单一的公有制结构。政府职能紧紧围绕这一中心来办事。大量的人进行非物质财富的生产, 物质财富的生产得不到重视。因此政府职能只能进行调整, 去适应改变。政府职能的调整有四个方面: 第一是投资发展, 第二是社会保障, 第三是“三资”监控, 第四是企业精神文明。这就是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

最后是人才结构的调整。我们根据国家的政策制定了自己的发展模式, 那么按照这一模式来进行发展, 就是用自己的公章, 掏别人口袋的钱, 来促进北虢的发展。原来北虢是一个很小的地方, 如果人才结构不调整, 再加上资源的有限, 肯定是发展不起来的。你要用别人的钱来发展自己, 而那些有钱的人又不在北虢, 所以北虢的发展就要在北京干, 要在港澳台干, 要在美国、欧洲、日本、韩国干, 没有人才是不行的。我刚去北虢的时候, 跟外商谈判, 我是集服务员、秘书、总经理于一身, 从“奴隶”到“将军”, 这就反映出了人才结构的不合理。我用了四年的时间只提拔了四个大学生, 其中主要阻力在于干部, 后来我经过努力才用事实说服了他们。

从 1993 年到 1996 年我主要做了这几件事情, 逐步引导我们的经济发展, 不是只讲投入。就像我们国家国有企业整天讲投入, 然后固定资产如何如何多, 其实并不是那么多, 有好多都亏了进去。如果报表上的东西全是真的, 那为什么还

有那么多国有企业效益不好,工人发不下来工资呢?这是很矛盾的。因此我们实实在在要走出这一条路来。

第三个历史发展时期,我们要加快现代小都市的建设步伐,把北虢建设成现代化的工业小都会,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步子就是进一步提升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发展高技术、高科技产业,进一步完善股份股权,特别是产权结构的调整,让它走入良性循环、进入市场经济的轨道。使我们比较放心的是,党的十五大在产权改革和分配制度改革上对我们以前所取得的成绩加以肯定。这次回华工,有人对我说,最近老在新闻联播上看到我。我对他们说,这是政治上的需要而不是我的功劳。十五大做出决定,要改变产权,改革分配制度,这与我们前几年做的是一样的。现在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走好第三步发展战略,是否能够走好,我希望得到华中理工大学的支持。我们没有资源,搞高科技产业,高附加值的产业更新换代,更没有资源,资源都在你们手上,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到我那里去?

讲了这么多,为的是说明一个主题:资源有限,创意无限。主要是从北虢的实践来说明这个问题的。当今社会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方面已经并且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并且还会继续下去。作为学生,在自我培养和定位上,我觉得要抓紧时间从事严格的科学技术训练,这点上,华中理工大学有很好的传统,科学上从严、技术上从严、训练上从严。可是脑袋瓜不能从严,否则就不会有创意。这次来华工看看,觉得华工在这点上做得比较好,那就是重视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接下来,我就谈谈有关这方面的内容。

创意是需要四书五经和策论的,这是知识的基础,过去科举考试就是要考这两门。主考官监考的四书五经考试通过

后,还要在皇帝面前考策论,策论就是出了问题看有没有对策,历史上许多好的古文都是出自好的策论。四书五经好的,充其量进翰林院,相当于现在的研究生;策论好的可以外派做县令、州官,策论不好就做不了官。现在社会处在向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对于学生人文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华工有许多学生在我们那里工作,另外我还接触到不少学生,我发现华工毕业的学生,卖苦力的多,当经理当官的少,当“大官”的更少。山东海尔集团的总经理是北大数学系毕业的,我也是数学系毕业的,华工学生在我们那里最高当到车间主任、副科长,我希望以后华工毕业的学生能当上“大官”,因为我也是华工出来的嘛,当然了这也要看你自己的能力如何了。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我得益于数学的严格教育和人文学科的熏陶。我刚去那里的时候,条件是十分艰苦的,我当时带了几名学生,总共是8个人,都是华工的,住的是40平方米的地方,上下铺,我的学生住我的上铺,我又重新过起了学生生活。那时候每月领几百块钱,很不好过的,压力也很大。骑自行车去上班,有时候车胎破了,没办法就步行,那些经理们半路看到我,就用小汽车把我接走,我这个教授还是值钱的。如果这点心理素质调整不过来,别说是10年,3年就跨了。我认为,中国还是有许多人文学科的宝库的,我比较欣赏的有几句话:为将之道,不战而胜者为上将;战而胜者为中将;利战而胜为末将;利战不胜不为将。有时候很多社会人事上的问题,你要么就胜他,要么就跟他,而你既赢不了又不能接受人家,你岂不是一辈子难受吗?这些都是古代的道理,所以你四书五经要读好,人文素质要提高,要提高自己的观察问题、判断问题、承受问题和预见问题的能力。其实我们在北螭做的许多事情是具有预见性的,然后你还必须找到路子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要多

读一些策论的书。今后的社会是需要经过严格训练具有创意的人才,我们北蟥多年的实践就说明这个问题。而理工科大学很多学科本身就是培养严谨和科学精神的,华工一直是以从严治校而闻名的,严要严在对学生的基础知识的训练,这一点我是放心的,那么为了让学生以后在社会上具有创意,那就需要把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桥梁架好,让人文素质变成学生内在的一种素质。总的说来,培养创意要经过严格的训练,要提高自己的人文素质修养。

我们对于大的问题必须善于提出大的创意,要提出大的解决方法,我们要在第一层次上去提出思考,这一步错了,那接下来的全部都会错,这是创意最重要的。比如,我们搞产业结构的调整,就是一个大的创意,如果我们不这样搞,而是一味地效仿大多数企业去集资,那就全都错了,到头来会全都赔进去的。那么具体来解决一些小的事情,那就是小的创意。另外,你们还要重视群体的创意,在念书的时候,你们要加强群体间团结,要加强彼此之间的交流,要跟得上社会的节奏,在现实生活中这一点非常重要。我发现我们那里的一些学生,产生不了群体的创意,他既不受人管,也管不了别人,整天跑单帮,这样一来连个人形象都没有了,就很难适应这个社会。你们要善于接受别人的授权,也要善于授权给别人,平常要加强对创意的思考,这样才能把一件事情办好。同时,我们当干部的也要善于授权,一个好的创意,单靠自己是不行的,要授权给别人。我觉得你们现在的学生比我那个时候多了许多创意,我在中山大学念书的时候,我读的是五年,到了四年级,还像个农民的孩子,傻乎乎的。有一次别人找我谈话,站在寝室门口叫我,而我却让他进来,其实他是想叫我到外面跟他谈。我的许多创意也是在后天自己慢慢锻炼出来的。

我想,今天我就谈到这里。谢谢大家。(掌声)

演讲日期:1997年11月17日,华中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供稿,录音整理:王磊,未经本人审校

编者絮语 演讲者是一位镇长。镇长登上赫赫有名的高等学府讲坛,这也算是一大新闻吧。但这位镇长的演讲至少给人两点启示:一,越是基层,就越是有大学生施展才华的天地;二,创新不只是科技创新,也包括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等等。一个好的创意,其中也许蕴含着无限商机。

李其荣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不是同一个概念，“个人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强调个人独立性、创造性，强调个人自由发展，不受或少受社会、政治和宗教势力的限制。

一个人可以有自己的自由，但是不能损害别人的自由。自由只有在与责任一起运用时才发挥作用。这就是克林顿总统在《希望与历史之间》一书中指出的：“没有责任感，任何自由社会都不会繁荣。”

美国个人主义价值观透析

——在华中理工大学演讲——

首

先，我要感谢华中理工大学的领导、老师和同学们给了我一个学习的机会。

今天，我报告的题目是：美国个人主义价值观透析。我想通过对这个问题的探索，增进我们对美国文化的了解，并扩大视野，学习美国文化中有益的东西，抵制和批判其落后、腐朽

的内容。另外,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核心,也是美国精神的主体。北京大学段连城教授说,美国的高速发展靠两条,一是个人主义,自由竞争;二是地大物博,人口稀少,个人主义有用武之地。二者缺一不可。因此,研究美国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有助于我们对美国现代化的理解。

我准备讲三个大问题。一是个人主义的含义及其来源;二是美国个人主义在文化上的表现;三是如何评价美国的个人主义。

先讲第一个大问题,个人主义的含义及其来源。

“个人主义”这个词,最先是由法国政治学家、思想家托克维尔使用的。在19世纪40年代,他在考察了美国9个多月后写下了《论美国的民主》一书。这本书收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中。托克维尔在这本书中最先提出了“个人主义”这一概念,并对它作了详细系统的阐释。

个人主义的内涵,一般来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个人主义,是泛指西方从文艺复兴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随着反封建压迫和神权统治的斗争而形成的以个人为中心的思想。狭义的个人主义,主要是指“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这一概念出现以后的个人主义思想体系及其理论,也即是西方的一种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其主要内容是:强调人是价值的主体,相信每个人都具有价值,高度重视个人的自我支配,自我控制,自我发展。一句话,个人主义是以个人为本位的人生哲学。

个人主义有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最早的广义的个人主义,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初期的一些人文主义思想家的论述。他们强调个人的个性、个人的尊严和个人的幸福。文艺复兴时期的个人主义强调从宗教的束缚下解放人的个性。这种个

人主义最初表现在绘画、雕塑、文学艺术作品上。在绘画艺术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达·芬奇的不朽之作《蒙娜丽莎》。1992年我在巴黎参观卢浮宫时,见到了这幅画的原作。你在任何一个视角观察这幅画,画中的妇女都向你微笑,表明这幅画像对人的观察分析与艺术概括都达到了极高的境界。在雕塑艺术上,米开朗琪罗的许多雕像精美无比,在技艺上已超过了希腊古典雕刻的杰作。在艺术和文学方面,人文主义者既书写拉丁文的诗歌和戏剧,也按照古典形式写各种散文。但丁用意大利文写了《神曲》。彼特拉克用意大利文写的抒情诗歌最为突出。薄伽丘的《十日谈》也是用意大利文写作的。以上人文主义者及其艺术和文学作品仅仅是对人的本性和特征的理解的开始。

到了17、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时代,个人主义思想向前发展。这时期的个人主义则提倡把人从自然界和封建专制等一切迷信和权威下解放出来。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中对美国影响较大的是卢梭和洛克。

中西文化存在深刻的差异,如对个人主义的理解便是一个例子。中国的《辞海》界定“个人主义”为“一切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的思想……表现为损公肥私、损人利己、惟利是图、尔虞我诈等”;《现代汉语词典》诠释“个人主义”是“一切从个人出发,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之上,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错误思想”。一句话,中国文化中的个人主义是利己主义的同义词,是一个贬词。而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不完全是划等号的,西方学者注意把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区别开来。托克维尔指出:“个人主义是一种新的观念创造出来的一个新词。我们的祖先只知道利己主义。”他说:“利己主义是对自己的一种偏激的过分的爱,它使人们只关心自己和爱

自己甚于一切。利己主义是一种只顾自己而又心安理得的情感,它使每个公民同其同胞大众隔离,同亲属和朋友疏远。”他的结论是:“利己主义是一种恶习。”个人主义是民主主义的产物,并随着身份平等的扩大而发展。”可见,在西方学者心目中,“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不是一个概念,“个人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强调个人独立性、创造性,强调个人自由发展,不受或少受社会、政治和宗教势力的限制。“个人主义”在西方人那里是一个美丽的字眼。因此,我们在分析西方个人主义的性质和作用时,要采取辩证的态度,既不能把它等同于“自私自利”,全盘否定;也不能只看其可取的一面,忽视其消极的一面,要看到“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之间不是互不相通的。

其次,讲一讲个人主义在美国文化中的表现。

什么是美国人价值观中的个人主义呢?美国学者萨姆瓦有一个解释。他说,美国文化中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念,包括自主动机,自主抉择,自力更生,尊重他人,个性自由,尊重隐私等层面。我以为,美国个人主义在文化上的表现主要有:

第一,个人隐私。中国人见面习惯问年龄、婚姻、工作和收入,在美国则不然。在美国人看来,这些都属于隐私,别人不得打听。一个人要访问另一家,必须事先打招呼,未得主人允许不得跨进别人的家门。私人信件别人不能拆阅,即便是子女的信件,父母也不能拆。在美国快餐店里,美国人也只是各自端个盘子,各自吃各自的,不干扰他人。我们中国人见面寒暄时常问:“你上哪里去呀?”“吃饭了没有?”美国人会感到,我到哪里去,吃饭了没有,关你什么事?

在美国,个人的隐私权是受到尊重和法律保护的。如果一个人出于获利、好奇或恶意的动机而侵犯别人的隐私权,要

受到惩罚。但公众有权知道公职人员的收入、财产和个人作风等方面的情况,这不叫侵犯别人的隐私权。1974年美国颁布隐私法,规定:个人可以要求了解学校、雇主和政府保存的关于他个人的档案,而不允许保存者泄露档案的内容。

第二,个人自立。美国孩子长到18岁,便离开父母,自立门户。老人也不愿住在自己子女宽敞的家里。父母与子女进餐馆,吃罢饭后,各自付饭钱。1993年我在美国做合作研究时,一次,一对美国夫妇请我到中国餐馆吃饭,同时进餐的还有他们的来自加拿大的儿子和媳妇。吃完饭,我特别留意看他们如何结账,结果是父母与子女分别付钱。在美国家庭里,孩子有很大的自主性,一般很少听到父母对孩子说“别这样,别那样”,孩子太调皮时,就说“回到自己的屋去吧”。

在美国,学生打工很普遍。有些学生打工,是因为家庭经济状况不好;但相当多的美国学生打工,则是为了培养自己的自立精神。根据1993年的资料,美国中学生打工的有500万人;约有 $\frac{2}{3}$ 的高中生每周打工5个多小时。现在许多中国学生到了美国,受美国人文化价值观的影响,打工也成为他们的一门必修课。

因为珍惜自立,美国人不服老。中国人视“老”字的称谓为尊称,而美国人则讳言老。因此,当我们去机场迎接外宾时,与其说“你这样高龄,长途飞行,一定很累了”,不如说“你这样长途飞行,还如此充满活力”,他会更高兴。游山时,对美国老人也不必主动去搀扶,如果看到他需要帮助,最好先问一声:“我可以帮助你吗?”

美国人的自立精神还表现在美国人爱自己动手。我在美国研修时,常看到某些家庭全家动手修建、装修房屋,家庭主妇自己动手修理漏水的龙头,公司的经理自己动手修门窗,等

等。

第三,个人表现。美国人勇于个人表现,爱“出风头”,爱冒险,爱新奇。一些美国人为争创世界纪录,比吃多少条“热狗”,吸多少支香烟,喝多少瓶啤酒,跳伞结婚、海底结婚、坟场结婚,无奇不有。

美国人不爱“随大流”。譬如听课,美国人谁先到就坐在最前面。老师提问时,美国学生争先恐后地举手。在美国课堂上保持沉默的学生,是很难拿到“A”的成绩的。在穿着方面,一般来说,公司职员比较正规,西服革履的,但下班后美国人比较随便,大多数美国人爱穿牛仔裤、T恤衫。家庭陈设也是如此,很少有两家一致。美国人的这种文化观念是受这种思想支配的,即“我就是我,你就是你,我不是你,你不是我”。

因为美国人勇于自我表现,所以比较坦率,不会故作谦虚。以讲课或作报告为例。如果你首先声明自己水平有限,错误难免,请多多批评指正,等等,美国人会想,你既然如此不行,又何必来讲呢?中国人请人到自己家里作客,主人照例要说菜很少,做得不好,而美国人的习惯是说“这是我夫人的拿手菜”,“这是城里买到的最好的冰淇淋”之类。中国人到朋友家做客,主人问你要不要再加点菜或酒,我们尽管还想要,却照例说饱了够了。在美国如果这样,主人一般就不再给你加,你只好饿着了。

这里还讲一段我自己的经历。我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研修时,正赶上中国艺术节在这里举行,我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这次中国艺术节。在中国艺术节上,我用中国的毛笔写了一个条幅“中国艺术节”送给我的一位美国朋友。当时我自认为谦虚地说:“这字写得不好,送给你作纪念。”这位朋友听后没有作出任何反应。站在我身旁的一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呆了

8年,比较了解美国的文化价值观,他说:“你这话不应该这么说,你应该说,这是你写得最好的条幅,这样,美国人会认为你很尊重他。”我按照他的话重复了一遍,这位美国朋友连声说:“谢谢,谢谢。”他并拿着这幅字画要我为他照相留念,我很乐意地为他照了一张。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这张照片。

在美国的中国人往往由于过分谦虚,由此失去了许多与美国同行公平竞争、争取权益的宝贵机会。这种机会的最重要表现是在晋升职称、保住饭碗等问题上。

幽默感也是美国人自我表现的一个特点。美国人的幽默感是有名的。前任总统里根被称为“大宣传家”,原因之一就是爱开玩笑。1981年里根遇刺,几乎丧命,但送医院时,他还对医生幽默地说,希望你们都是共和党人。因为民主党是反对他的。这话大大缓和了公众对总统遇刺而感到的震动和担心。里根遇刺受伤,被送进医院动手术。手术后几小时里根便传出几张纸条,安慰在外面的白宫工作人员。一张纸条上写道:“邱吉尔说过,最令人兴奋的感觉莫过于被人暗害而秋毫无损。”还有一张便条上写着:“如果我在好莱坞受到这么好的照顾的话,我一定留在那儿。”医生称赞里根是位好病人,他听后低声对他们说:“我非如此不可,我的岳父是医生。”

伍德罗·威尔逊是美国惟一获政治学博士学位的总统,这是同学们都知道的。当他任新泽西州州长时,他接到从华盛顿来的电话,说他的好友、新泽西州的一位参议员刚刚去世了。他非常悲痛。不想几分钟后,新泽西州的一位政治家给他打来电话。“州长,”那人吞吞吐吐地说:“我希望接替他的参议员位置。”“好吧,”威尔逊对这位政治家的这种迫不及待的做法非常反感,他说:“如果殡仪馆同意的话,我本人完全赞成。”

生活在美国,到处都能感受到美国人的幽默。从汽车尾部的“别吻我”标语,到商店的装潢陈设,从街头的现代派雕塑到家居布置,都能让你发出会心的笑声。“开玩笑”确实是美国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第四,个人思考。美国人善于思考,不轻信别人的话,尤其是官方的看法。《纽约时报》是美国官方的报纸,信不信由你。美国没有指导新闻宣传的机构,传播媒介的报道和言论一般是作者和记者的看法。美国新闻传统认为,风调雨顺不是新闻,水旱灾害才是新闻;夫妻和睦不是新闻,打架离婚才是新闻;安定团结不是新闻,动乱不安才是新闻。总之,新闻要有新闻的价值,正如一句名言所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

第五,个人自由。美国人的自由观是什么概念呢?美国人的自由观与欧洲流行的概念不同。在欧洲,“自由”是指人们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用托克维尔的话说,削弱约束力量通常被认为是建立自由。美国的自由观“不仅指免除对肉体的约束,而且指个人有权签订契约;有权从事任何一种普通谋生职业;有权获取有用的知识;有权结婚、建立家庭和抚养孩子;受自己良心的支配崇拜上帝,以及普遍地享有历来被认为是自由和平等地追求幸福所必不可少的那些特权。”美国学者摩狄曼·阿德勒认为自由有三种主要形式,即“天生的自由”——人性之中固有的专属人类的自由;“后天的自由”——与智慧和美德相联系的自由;“环境自由”——完全依赖于有利的环境所获得的、可以不同程度地拥有或被剥夺的、因人而异的自由。

美国的“自由观”强调,自由不是“无法无天的自由”,而是“在法律约束下的自由”。这是自由权利的前提。没有这个条

件,也就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如果一个人可以自由地损害另一个人的自由,结果将是谁的自由也得不到保证。换句话说,一个人可以有自己的自由,但是不能损害别人的自由。比如,张三的一种享受被李四认为影响到自己了,李四有起而攻之的权利和说理处。有这样一个故事:在纽约,有一个中国人夏天在自家厨房内有穿着短裤光着上身做饭的习惯,但他有一天因此接到了住在他对面楼内一位女士的信。这封信上说,这位中国人不穿上衣在自家厨房中走动的行为已经对她构成骚扰,如果不立即予以更改,她将向法院提出诉讼。又比如说,张三在自己家的院子里心血来潮地修筑了一道高大的木栅,以更好地保护自家的隐私不被外人偷窥。但如果邻居李四觉得这道木栅妨碍了自己的视野,他可以写信给市政府要求拆除。因此,美国人强调,自由只有在与责任一起运用时才发挥作用。这就是克林顿总统在《希望与历史之间》一书中指出的:“没有责任感,任何自由社会都不会繁荣。”

尽管如此,不少美国人仍在想方设法钻政府的空子。譬如,一方面按规定向政府纳税,另一方面尽可能多找些豁免的理由,以求少交税。书店里还公开出售教人们如何合法地少交税的手册。又如,法律对结婚和离婚的规定各州都不一样,有严有宽。因此有人为了早日达到目的,不惜远赴另一州去办离婚手续。由于美国人鼓吹“性自由”,给社会带来一些问题。未成年的女孩子生孩子。从1989年起,未婚先孕的少女数字已突破百万大关。1994年,我在美国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一个美国女孩,当时她只有19岁,却已是三个孩子的妈妈。我与她谈起来,当我问及孩子的父亲时,她告诉我三个孩子有三个爸爸。由于她太年轻,长期与男人混在一起,她受到警察的监控。同性恋在美国公开化和合法化。美国人拥

有自由持枪的权利,这一规定也给社会带来不少恶果,如自林肯总统遇刺身亡以来,共有6位美国总统遇刺,4人死亡。至于其他方面的枪杀案件,更是时有发生。

第六,个人选择。这主要是指政治上的投票和选举。在选举中是投共和党的票还是选择民主党,每个选民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要“象”要“驴”,任你决定。自1874年漫画家纳斯特画了一头大象代表共和党,一头黑驴代表民主党,象与驴就成为两党的象征,家喻户晓。“象”与“驴”千方百计相互攻击,争取选票。这成了美国政治文化的核心,符合美国人“自己思考,自己判断,自己选择”的文化心理。

第七,个人平等。平等观是美国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一般来说,美国人等级观念淡薄,在早期,阶级界线不太明显,多数为中下层阶级。美国是新开辟的国家,在创业之初,几乎所有美国人除了力量和意志外都一无所有,大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因此承袭来的权利就无足轻重,大家靠本事吃饭。美国人信奉“天赋人权”说,《独立宣言》就宣称,“所有人都生而平等”,都具有“天赋人权”,即“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美国的平等同欧洲的概念大相径庭。在美国,“平等”是指机会平等,而不是在处境方面人人一样。也就是说,人人都有获取成功的同样机会,而他们各自努力的结果并不一定相同。这就如同一百米赛跑一样,每一个运动员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同时起跑,但结果总有“第一”和“最后”之分。在“获得成功”的赛跑中,人人都有从“贫困”冲到“富裕”的机会,但是不会每一个都能成功,因为人的能力和才智不同,驾驭机会的本领也不同。这就是美国人的平等观。

美国人的平等观表现在各个方面。在生活中,美国人认

为在大自然面前,人人有生存权利,只要有力气,有能力,谁都可以获得自然,谁都可以发财当富翁;在政治上,他们主张投票箱面前人人平等,也就是说,人人有选举权;在教育上,资产阶级进步思想家提倡人人有受教育的机会,公立学校人人均可上学;运动场上,美国人也有他们的标准,只要有体育才能和技术的人,都可以参加竞争;在社交场合,美国人喜欢平等待人,也喜欢被别人平等相待,摆架子、高人一等的表现为人们所不取;在官兵关系方面,美国人认为,官兵之间应该是平等的,指挥官不能向士兵摆资格,不能把权威当宝杖使用;在宗教方面,美国人认为人人有信仰宗教的权利,只要是新教徒,不要经任何神职人员作中介,都可以与上帝相通。

美国人虽然讲平等,可是事实上这一理想难以实现。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直至今日依然存在。

第八,个人竞争。竞争不是美国所特有的,人类社会总是存在着竞争的,美国的不同之处在于使它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态度,并且从政治原则和组织结构上,为竞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并给予保障。

美国人认为竞争是合情合理的、正大光明的活动,是因为在思想传统上,它不仅是个人的而且是社会共有的意识,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竞争,作为一种价值观,它影响着美国人各方面的生活——政治生活、学术争鸣直至人们的日常生活。美国人不大像英国人,他们对一个人家庭出身、父母职位这一类东西不大感兴趣,因为一个人在生活中能否成功,父母的大名帮不了多少忙,也没有人买这个账。总统的儿子照样可以去擦汽车,能否出人头地全靠个人的奋斗去争取。比如在学校里,学生要想得到奖学金或其他鼓励,前提条件是要力求学业成绩超过别的同学。大学教师晋升、提薪的条件,除本人的

著述外,还要看学生们对他教学工作的评比。每学年末,学生们都要填一份对教师授课情况的评比表,内容包括:教师的传授能力如何;课余辅导是否充足;对本专业的知识是否精通等等。评比的结果送到校方。因此,谁晋升谁长工资不取决于在校时间长短,而是看上述的条件。在这种环境下,教师授课的表现就意味着和同行的相比较,也就是一种竞争。公司里的小职员,即使是打打字或归档文件的,也要力求干得比同事们出色,才有希望晋升或加薪。商品也一样,只有物美价廉,才能胜人一筹,打开销路。如果在竞争中对此不经心,人和物都可能被淘汰。

竞争不仅给各种事业发展带来活力,也增强了人的向上意识。这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但是,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社会造成了一些问题。有学者指出,这种竞争导致了美国人溃疡病和精神崩溃的高发病率。如何解决竞争社会出现的社会问题,也是美国社会面临的难题之一。

最后,讲一讲如何评价美国的个人主义。

对美国个人主义的看法,历来就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早在1842年著名英国作家狄更斯在访美后就写过《游美札记》,他对美国社会作了辛辣的讽刺和抨击。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写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对个人主义提出了“两种矛盾的看法”,至今仍然被奉为经典。一方面,他指出了个人主义者认为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给个人主义加上社会和政治意义;另一方面,他也指出了个人主义的局限性,认为个人主义者“只知有己”。

在当代论述美国的著作中,无论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对个人主义更是褒贬不一。有人认为,美国是一个个人至上、惟

利是图的国家,也有人认为美国是一个文明程度高、生活富裕的国家。到底如何来评价美国的个人主义呢?我认为,一方面应该看到个人主义对美国社会所起的进步作用,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个人主义对美国社会所造成的危害。

个人主义对美国社会的进步作用,表现在:

第一,个人主义的“自由、平等”口号成为鼓舞人民、教育人民、动员人民的巨大精神力量。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自由、平等”口号曾经成为美国人民争取独立、推翻英国殖民压迫的战斗号角。《独立宣言》的发表,极大地鼓舞了北美人民的革命斗志,人们在它的激励下,热情洋溢地走上战场,为争取独立这个伟大的目标而战。1787年宪法使美国成为一个更为统一的国家,并确立了共和制度,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正因为“自由、平等”口号鼓舞、教育和动员了人民,使这次革命取得了很大的成果。直到今天,美国人的个人主义价值观还鼓舞着人们,成为人们前进的动力。克林顿总统说:“《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应当常备案头,反复诵读,这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好处。”

第二,早期个人主义使美国人赢得了充分享受生活的“机会”,确保了国家的成功。克林顿在谈到要把美国的期望变成现实时说,“机会”、“责任”、“社区”这三种价值观塑造了我们人民的特性,确保了国家的成功以及我们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它们是构建美国的基本条件。克林顿在这里讲的“机会”,就是肯定了个人主义的积极形象。在早期美国历史发展中,美国人征服自然,靠个人主义的力量开发边疆,求得生存,为美国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美国农业、城市的发展,也不打上个人主义的烙印。

第三,个人主义使人们的追求多元化。美国这个国家之

所以显得有活力、生机勃勃,就在于美国人讲究一个“新”字,求新求变是美国人的哲学,因此在美国新产品、新观念、新风俗层出不穷。求新求变的观念,促使美国人去搞新的发明,推动社会的进步。有统计数字说,1901年到1984年的诺贝尔奖获奖人中,美国人占了130多个,苏联和日本分别为10个和5个。美国社会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

但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美国文化也造成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个人主义造就了美国社会的贫富悬殊。美国社会是一个竞争社会,竞争固然是好事,因为竞争能推动社会进步。但是,美国只讲起跑线的平等,所以出现了严重的贫富不均。美国的穷人可能不像不发达国家新闻照片上穷人的那种形象:骨瘦如柴、憔悴不堪;但是他们的处境常常是十分困难的。1994年2月,克林顿政府承认,美国有700万人无家可归。美国是西方国家中两极分化最为严重的国家。据美国官方1995年的统计,占美国人口1%的富人几乎拥有这个国家所有财富的40%。

个人主义发展为放任就会给国家给社会造成危害。美国的确是一个比较自由的国家,但是,由于“自由过度”,而给社会带来了许多“美国病”,如吸毒、犯罪、暴力、同性恋等等。这些“美国病”给这片“自由乐土”上的人民构成了巨大的危险。

个人主义使得美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种族歧视。我们并不否认美国在反对种族歧视,实现民族平等上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进步,但应看到种族歧视对美国社会的困扰。如:黑人在政治上始终是二等公民;在经济上不能享受与白人同等的劳动权利;在教育上,大部分黑人学生只能进黑人占多数的

质量差的学校;在宗教信仰方面,自 1995 年以来,美国南部 9 个州中已有 30 多座黑人教堂被人纵火焚毁。其实,在美国,不仅黑人,其他有色人种同样受到歧视。华人处境虽较好,但绝大多数人仍有“二等公民”之感。

总起来说,个人主义在美国历史上起到了别无他物可替代的作用,成为美国文化的价值核心。美国社会、美国人的最崇高的愿望都是同个人主义密切相连的。美国人信奉个人尊严,推崇个人独立思考、独立判断以及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实现个人利益。这些都是个人主义的积极表现。然而,美国的极端个人主义对社会与个人造成了严重危害。我们并不争论美国人是否应该放弃他们的个人主义,因为放弃个人主义就等于是放弃美国人的最深刻的本质。但是,限制个人主义的极端发展,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全方位地构建开放的、合作的、创造性的新型的美国个人主义,应该成为美国人的长期的艰巨任务。

谢谢大家。

演讲日期:1997 年 6 月 12 日,华中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供稿,录音整理:佚名,未经本人审校。

编者絮语 看来,过去我们对作为对美国社会文化核心的个人主义价值观至少有两个误解:第一,把个人主义等同于个人中心;第二,过分强调个人主义的弊端,忽视了个人主义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看来,在世界日趋一体化的今天,我们不仅要正确对待和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还要正确对待和理解域外文化。

人文访谈

Zhongguo Daxue Renwen Qisilu

游 学 谈

——访华中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张良皋教授

饶传平 谢 添 王 沐

采

采访出来,已是黄昏。回首望去,张先生的寓所在晚霞中显得更加宁静。在这座年轻而充满朝气的大学里,这寓所可有些年头了。在这小屋里,岁月流逝,张先生杂学旁搜,交游俊彦,游刃建筑学、红学、巴楚学之中,游历祖国各地、世界诸国、谈笑各讲坛之上。近年来,张先生更是活跃于武汉高校人文讲座里。我们每每感叹他催人奋进的求学经历,赞赏他思深语妙的学术论述和蹊径独辟的治学视角。张先生曾谓“垂老投荒兴未休,逍遥别境足优游”,令人惊叹他何以在学海中优游自如。

我们将他接受采访时的谈话整理如下,谓之“游学谈”。

风来雨往 随遇而安

人生似一本书,打开它,我们就能体味浸透其中的艰辛与磨难,感悟蕴含其中的苦恼与喜悦。张先生在平静地诉说他的治学甘苦时,分明涌动着一种情感。他的“随遇而安”,是经过命运不停锤炼后锻造出来的性格。其实他向学求索的行动从来就没停止过。所以张先生曾写道:“一粟渺天地,猛志宁常在。”

这一辈子非常平凡。别人总说“金色童年”,我的童年可称上不“金色”。虽说祖上是书香世家,但家道中落,到父母这

一代已是十分困顿。常说自己能“随遇而安”，这其实是生计所迫，只能如此。

很喜欢读书，但条件艰苦，读书时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小学毕业后，便无力升中学。后来老师代我交报名费，才得以参加升学考试。以第三名被省一中录取后，由于读不起，又以第一名考入另一个学费便宜的中学。初二时，获得省“公费生”资格，才得以继续学业。那个社会虽然很不公平，但偶尔出施一点小惠，使我们贫困学生还有一点想头。

初中毕业后，再度升入省一中的“化身”——建始高中。高中毕业时，由于全省会考名列第二而保送至中央大学。当时正战乱，抵达重庆时中大已开学一月有余。无奈只好放弃保送，在重庆打工一年。在第二年又以前茅的成绩考入中大。出于对文学、艺术的偏好，我选择了建筑这一行。读大学期间经济上依然紧张。有年暑假，我回武汉，在老系主任鲍鼎先生的事务所帮忙，后来鲍先生便送了笔钱给我，使在我山穷水尽的时候渡过了难关。我很感激鲍先生，如今我写了一本《匠学七说》，便在后记上写明“献给鲍鼎先生”。

1947年中大毕业后，我去了范文照事务所工作。范先生乃斯道钜子——中国建筑师学会理事长，我在那里学到了扎实的业务经验。工作期间加入了上海的地下组织新青年联合社。由于白色恐怖，不得不回到武汉，不久便迎了解放，后来一直在武汉市建筑设计院工作。1957年，被划为右派，险遭灭顶之灾，于是失去了太多实现自己理想与抱负的机会。但我也并不抱怨什么，在政治上靠边站后，仍然在困顿中努力有所成就。例如人民剧院的改建，就是别人不干的“癞痢头工程”，扔给我做，恰像卓别林在《淘金记》中啃皮靴，那靴底被咀嚼得有滋有味，到后来甚至令人艳羡，工竣开张，阖里轰动。

我在中央大学建筑系师从的鲍鼎、刘敦桢、童隽、杨廷宝、谭垣、李剑晨以及后来接触的范文照等诸位,都是一代大师。所以我自许“业就经师”,倒并非狂妄。有人挽朱自清:“使顽夫廉懦夫立,求经师易人师难。”我能为其易,足矣。不过大匠之学,非一代人所能造极,所以我也乐于为师,在1982年进入华中理工大学参与创办建筑系,夺席谈经,找到了用武之地。

我的经历很普通,但个中滋味,也许只有我自知。我明白,在某种程度上,命运好像一头怪兽,它高踞在上俯视着我们;但为人倘若安贫乐道,进退皆随遇而安,不泯壮志初衷,也许又可以跃上怪兽的头颅,在某种程度上把握自己的命运。

梦怀鄂西 溯源西南

张先生幼时在鄂西生活过。神秘的鄂西是一个保存完好的巴楚文化橱窗。张先生常说鄂西使他难以忘怀,以致常在梦中忆起。梦归故里,是一种溯源之念。这种情怀使得张先生追溯起文明的源头。与其他人意见相左,张先生到福建开会之日曾说,“此生初味八闽水,不信黄陂是故乡”。

我对中国文明源于黄河流域的怀疑,缘起于对席居制的考察。在中央大学我向老师们问起席居源于何处,他们都说不清来历。我后来悟到,席居不可能是寒冷地区的习俗。只有在南方较热地区才能“升堂脱屣,登席脱袜”。这其实本也是中华民族崇尚清洁、勤于浣沐的古风。所以,席居这种最早的居住形态已开始暴露出中华文明源于西北或中原学说的矛盾。

可以发现,席居制与吊脚楼是理所当然相配套的——只有在通风良好的吊脚楼里才能做到每日拖地以保持地面清

洁,而吊脚楼又主要集中于西南地区,因此,从建筑发展序列上看,中华文明第一故乡里应在西南。

吊脚楼建筑属干栏建筑体系。从它的发展来看,这历经了傣、哈尼、侗、壮、瑶、土家等民族的推动与演变,并进而演进了正统的中国建筑。最早,傣族使用的是纯粹支起式的干栏建筑,墙体外斜,这样能导引气流,使炉火燃烧充分,并能加速冷空气进入以净化室内空气。后来,哈尼族建筑逐步发展,分男女从建筑两边上楼,这很可能是婚姻制度的体现。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建筑形制本身与仪典相配套的文化内容,因此,建筑也反映了文化的发展。由于男女分住,在哈尼族建筑中,中柱自然出现了,它将住房分成了双开间。随后,侗族保留了哈尼族的双开间制度,到壮族、瑶族才开始有了“明间”的概念。而我注意到,双开间制在典礼建筑如明堂、太庙、太极殿中,用十二间的双数,从最初一直实行到陈朝,这期间在梁代曾一度改为单数开间(十三间),但这项改革直到隋唐才算巩固下来,于是我们可以设想:哈尼族和侗族开创了中国隋唐以前的古制,它是由西南传到中原的。

隋唐后,单开间制盛行。而单开间制是原始居民迁入黄土地区后逐渐形成的。人们发现,在黄土地区造隧道窑洞,一孔不足,三孔正好,再多则不必。于是“一堂二内”,传承下去,变成地面建筑的“一明两暗”,再往多间发展,自然形成单开间制。于是,从双开间与单开间制的交替上看,伴随着先民的迁徙,中国建筑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而得到了发展。因此,尽管单开间制只能形成于黄土地区,尽管目前我们所见华夏正统建筑多为单开间,这与中华文明源于西南并不矛盾。由于建筑型制成型,聚落产生,文化也形成了。于是,可以断言,建筑上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性”,文化上所体现的“传承性”,都根源

于“地区性”。

正由于“地区性”的重要性,所以,对自然资源的考察,也可由此窥见到文化发展的历程。我发现,中国铜器用铜多来自南方。考古成果揭示湖北盘龙城是商代北方用铜的基地。另外当年匈奴用的就是南方的铜,所以贾谊曾提出过对匈奴禁铜,割断其日用器皿及兵器的生产材料来源。提到铜,南北多少都有,但铜锡共生矿只在南方,而青铜是铜锡合金,所以北方的齐家文化中很早就出现了红铜器,但一直没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青铜器。这样就可以看出,由于资源分布的不均,使得南北方在铜器的制作及应用上出现了差距。南方领先于北方,这也佐证了中华文明不应首先源于西北及中原地区。

中国本来无“华夏”,中原大地出于黄河冲积,形成很晚,没有旧石器文化没有土著主人,来的都是“客家”,“居夷则夷,居夏则夏”。我认为,最早到中原定居的是巴族,包括后来随周武王伐纣,“打回老家”的庸、蜀、羌、微、卢、彭、濮——“巴师八国”。自虞夏后,百越民族拥入中原,后来居上,与早入中原的巴人结合,建立了夏、商、周、秦、汉五个光辉朝代。巴师八国中的羌族发展成为北方民族,他们一直坚持要占领中原,也就是“打回老家”。这就是一部华夏民族史。

不仅如此,亚洲其他国家至今仍保留了与西南地区相近的东西,这也印证了西南地区作为源头的辐射作用。我在日本看到的日本传统建筑,与中国的干栏建筑十分类似。中国道教建筑的“父母殿”可能保存了哈尼族的男女楼梯制,可称为“二阶堂”,日本人至今仍有此姓氏。在不少民俗上,日本与云南地区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两地都吃糯米,生了小孩要挂鲤鱼等等。日本学者在他们的考古中发掘出群仓遗迹,百思不解;后至贵州看见群仓现存实物,喜不自禁。所以近来日本学

者,每每欣然承认他们是古百越民族,群仓之制,便是一证。

总之,我相信,黄垺非源,源在西南。

取径匠学 猎奇探胜

小中见大,必需敏锐的目光;登高览胜,更需深厚的功底。张先生自谓“上穷碧落下黄泉,求索无厌”。他从建筑入手,探索红楼梦的艺术魅力。在人文讲坛上主讲红学十数次,场场爆满,受到了师生的极大欢迎。进而,以匠学论文化,更是张先生平生所望。他别开洞天,应能带给我们许多启发。

“文革”时,靠边站的有时倒也得到解脱,我竟然有机会静下心来研读《红楼梦》。如同先朝文人“逃禅”一样,我们这是“逃红”。作为学建筑出身,我有理由相信,曹雪芹是个建筑师,是我的同行。有本《南巡盛典》,它记载了乾隆头四次下江南的情形,书里有一个关键情节:乾隆第三次南巡是在壬午年,那时扬州就造了一个行宫。行宫宏伟非常,乾隆当时就为它题了字,叫做“大观堂”。这就不禁让人联想到曹雪芹在乾隆题字时就在大观堂里,而且很可能参与了大观堂的建设!他的小说已经写成,无意中冲犯了皇帝,这毁了他的小说,也毁了他的性命。

《红楼梦》里面的故事就像芭蕉树一样,剥了一层又一层,层层深入,同时,在这种引人入胜的过程中,它的故事情节就如同建筑一样,立体地构建起来了。每件事的原因结果都很清楚。有时原因在前,结果在后;有时结果在前,原因在后。而另外一方面,书中的建筑本身就构架了情节,比如修建大观园,书里就着了不少笔墨,但更为重要的是,书中建筑营造出了一个主人公在其中演绎故事的场所,而这些建筑所反映出

来的意象,则展示出了人物的命运。

我曾按照自己的理解,指导毕业生做了一个大观园的模式。对文字的理解我也许不如文学家们深,但对建筑的体悟我相对要更多一些。这个模型里,我设计了一个供水系统,内外两环,这就使得全园子都有了水。在规划建筑布局时,则必须考虑到人的活动。贾宝玉试才题对额、元妃省亲、刘姥姥进大观园、抄检大观园等等路线,都要做到一笔画成。中国园林不过分讲究对称,建筑就不应互相遮挡,使得它们在各个面上都有展示自己的机会。在这个模型设计过程中,我发现建筑布局契合了人物的身份、性格,甚至反映了人物的命运。例如厨房有些文学家认为它在东北角,但园子里大多数人住在西边,厨房太远,菜送过来都凉了。何况妙玉也住在东北面,她吃菜都那么讲究,会愿意去吃大锅饭,能忍受得了厨房油味吗?再如,迎春、探春、惜春、黛玉等女孩子都住在西边,这样和李纨比较近,方便管理。宝玉是男孩,离女孩子要有些距离,所以怡红院应该在东面。这样,宝黛二人便一东一西,互相呼应,很符合书的主题。但不巧地是,宝钗住在了北面,便和宝、黛形成了一个三角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大观园的中轴线正好通过宝钗的住地。而中轴象征着权位,这就暗示了宝钗对元春娘娘有紧跟态势,事实上,也正是元春有意作成宝玉、宝钗的婚事。这样一来,从建筑布局可看出宝钗胜算在握。所以,书中建筑本身也图解了故事,展示出了人物的命运。依我的理解,书中建筑已经成为了情节发展中一个跃动的要素,它引发出了书中人物,烘托了情节的气氛,建筑反映出来的神奇意境已经产生了某种艺术魅力。

同样,我们也可以在其他文化典籍里透过文学反观建筑。中国建筑与文学的联姻世所罕见,外国就很少见到系统描写

歌颂建筑的文学作品。比方《古文观止》里宋文有 51 篇,其中有 17 篇是谈建筑的,竟占了 1/3。《文选》里描写建筑的文章则更多。甚至中国每个城市,每座庙宇的建造、修葺过程都会在不计其数的地方志、碑刻里得到描述。这些文章歌功颂德,但并非都是应景之作,它们篇篇都是传颂千古的美文,辞华藻丽,意境绝美。何况它们都表达了作者希望人间成为仙境的宏愿。《岳阳楼记》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感喟更是种崇高的情操。

在浩繁的文学卷轴中,建筑的身影不时浮现,因此,取径匠学,可以畅游于经文典籍之间。推而论之,借建筑甚至还可窥文化之堂奥。

以一个建筑师而言及中国文化之全局,是不是太“奢侈”?我以为:当仁不让。建筑的体积,比器物要宏大得多,流传要“顽固”得多。取径此道,以考文化,其方法论上优势理当超过器物。比如,从器物上考证,通常认为铜器时代应早于铁器时代,但我在埃及所见深墓葬井,在岩石上竟凿下 30 多米,若无坚韧锋利的金属工具,绝不可能。而昭塞尔金字塔及其周围墓井的时代,相当于中国五帝时期,可见此时埃及必早有铁器。这个意见为一般史家所未道。我求教于苏丹美术史家阿赫默德先生,他完全赞同,并指出,苏丹的 Maroe,相当于非洲古代的伯明翰。我想借鉴非洲,或许可找到钥匙,解开中国巴人“丹穴之利”的秘密。

游观二极 同异多元

张先生说得好,向传统学习也是我们一个好传统。只有以这种心态,我们才能通观历史,游刃有余,才会尊重自己的传统,并在多元文化趋同趋异并行情况下发扬光大自己的传

统。否则,我们恐怕“有朝续拍芙蓉镇,难觅王村吊脚楼”。

对于文化传统,我们倒想说,向传统学习就一直是我们的一个传统。从一些较好的建筑作品看到,中国建筑师在建筑中用上一些古典符号,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像曲阜五马池的牌楼,有现代感却不失中国古典味。昆明民族村大门,用的是现代材料,现代工艺,但一看就知道它是中国古典的,而且还带有民族特色。但要注意的是,中国古典建筑不仅仅是一个形体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空间的问题。空间经营得当,再现代的东西也是中国的。像华中理工大学图书馆,前面一个三合院,后面再一个四合院。格鲁庇乌斯的高足迈伦女士就说美国建筑师设计不出这样的图书馆,因为这样的空间只有中国人才会经营。中国建筑历史悠久,我们要从空间上来看建筑传统。现在有人一盖房子就要加大屋顶小亭子,很多人也不断就此进行批判。我是从来不加入这个合唱的。大屋顶小亭子确是中国的东西,但中国建筑就只有这么一个形体?老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建筑师们未免太短视,批评家们也恐怕太狭隘。中国建筑师当然该做中国建筑,关键在于做得好不好,而不必争论该不该。

有些国内建筑师学着做起了所谓的西洋古典建筑。其实西洋古典建筑极其讲究,不好学。中国建筑师不会做中国建筑,怎能叫人相信他会做西洋古典?了不起做一些假洋古董,这怎么行?!武汉有个建筑,说是“西班牙”式,我看倒是让人“笑掉牙”。一些中国建筑师不做中国建筑,反映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没有足够的信心。其实,中国文化才是强势文化。它能延续至今就说明了自己的优越。阿Q说,“老子以前比你们阔多了”,并没有错。在这点上,有些人连阿Q都不如。

它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式微,这是完全错误的。中国文化传统不是式微了,而是它的某些东西隐晦了。那些隐晦的部分并非消亡了,不过是历史的聚光灯没照在上面。若干年后,它们也许会显现,为我所用。

因此,对待传统首先要能看到传统的显晦性。在这个显晦相继的连贯过程里,我们要扬弃传统。“扬弃”是从德文翻译过来的词,并非“抛弃”;其实我们早已有了很多更形象的近义词,如显晦、臧否、消长、激扬等等。对于传统,我们可能要隐晦其中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消灭。有些东西,哪怕仅仅保存在博物馆里,也能引起人们对历史的兴味,引发反思,这是有益处的。而对于另一部分,我们要发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面向未来。不“背靠传统”而光说“面向未来”,就好比说不吃前两个馒头而只吃第三个便饱了一样。在发扬过程中,当然要融入我们的创新。其实任何创新,都是在传统上的起跳。我提出一个口号,叫做“游观二极”。两头看,未来无限,过去也无限。只有通观两极,才能贯串历史,不断前进。建筑正是如此。没有历史的概念,不摆正自己在历史过程中的位置,就不会在显晦交织的传统中显现自己的地位。“游观二极”便是在纵向上来看待传统。

而横向上,则要求整体、综合的目光。建筑上,我们要认识到建筑本身构成了环境,同时也面临着外部环境。中国环境哲学强调中庸。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庸意味着致中和求永恒的境界。于是,中国的风水学说要求建筑要互相照顾,并把对方纳入到自己的环境景观中来。20世纪20年代,西方的柯布西埃宣称建筑是个机器,建筑外表只是副产品,建筑以外的环境是自然产生的。这样便把建筑与环境割裂开来。不过西方现在又逐渐回到了正轨。有位建筑师就说

道,建筑是发自内心的,但立刻跟着的就是环境的张力,环境让我这么做,两方面的力量形成了一种均衡,于是出现了“我的”建筑。这表明,整体地看待建筑已是共识。

论及文化传统,我们更要有整体的目光,并能领悟到在所谓“全球化”环境中文化的多元性。在全球化的时代,不同文化在某些方面趋同不可避免,但在另一些方面趋异也不可避免。这个情况可概括为“造趋向,化趋异,作趋齐,用趋变”。目前各国之间经济交往日益增多,各种文化也在互相影响,互相竞争。中国文化传统只有在坚持自身主体性时,通过我们的创新以及吸纳其他文化的优秀因素来完善自己。它作为一种强势文化,一定会在显晦交替的过程中得到继承和发扬。

编者絮语 张良皋先生是建筑学的博士生导师,专业之外,又从事文史研究,他关于《红楼梦》的演讲,同杨叔子院士的那篇《理想崇高,志于成人》一起,成为华中理工大学人文讲座的“经典”。

成功的演讲,除了演讲者具有渊博的知识、风趣幽默的演讲口才,演讲者本身的人格魅力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他们本身就是人文精神的体现。因此,从本卷开始,我们将在以后各卷新增一个栏目,《人文访谈》,以介绍他们的学术和人生经历。这或许也是培养人文精神、人文“启思”的方法之一吧。

后 记

逝者如斯！迄今为止，本书已出版了四卷。如果将这四卷的内容放在一起来看，我们发现，经过几年的积累，各个主题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1996年，在本书第一卷出版时，编者曾在《后记》中写道：

本书可以容纳互相间并不一致的学术观点。我们希望读者摆脱先入为主的成见，不是满足于在对与错两极之间找到答案，而要辩证地全面地把握和理解每篇演讲的思维方法和视角，从而宽阔自己的视野，启迪自己的思想。这也正是书名“启思录”的蕴义。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在绝对的对与错之间寻找答案，思维因此也受到固定的方式的制约，不够活跃，思路狭窄，创新能力的发展受到限制。实际上，世界上的许多问题，学术上的许多观点，很难用绝对的对与错来区分，并不是非此即彼，非彼即此。黑格尔在分析悲剧冲突时指出，悲剧冲突的双方各有其合理性，又各有其片面性，双方各自强调自己的合理性，而忽视了自己的片面性，于是冲突就不可避免。最终，冲突的双方谁都不可能成为胜利者，胜利者是绝对理性。把黑格尔的悲剧理论用来对待不同的学术观点之间的讨论，作为青年学生，我们应该了解一个事物的多个侧面，也就没有必要停留

在用简单的是与非来判别它们,而是要通过不同的学术观点的对话、冲突,从中去寻找各自的合理性,最终激活我们的思维,开阔我们的思路,启发我们的思想。因此,这些不同的学术观点的对立、冲突,最终的“胜利者”应该是我们——读者。

基于这样的想法,我们在本卷的编者絮语中尽可能的将各卷中的相关演讲联系起来,目的就是希望我们的大学生读者阅读时,能将本书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既见树木,又见森林,使大家在获取知识、思想的同时,也能激活自己的思维,形成自己的思想。

本书出版以来,一直得到广大读者的厚爱。不少读者给我们写信,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本卷根据大家的建议,做了些补充,如尽可能多的增写“编者絮语”(新版第二卷亦增写了编者絮语),注明演讲时间等。我们恳请广大读者继续关注本书,不断提出新的意见和建议,使我们的工作更加完善,更植根于大众之中。

本卷收录了来自香港城市大学的两篇演讲稿。文化素质教育在大陆境外称之为“通识教育”,许多学校成立了通识教育办公室。香港城市大学为加强学生的人文教育,成立了“中国文化科目中心”,邀请著名专家、学者举办中国文化讲座。继上卷推荐了张信刚教授的演讲稿后,此次他们又推荐了四篇演讲稿。本卷中的北京大学费振刚、张隆溪两教授的演讲稿就是由该校推荐的。

湖南大学在著名的岳麓书院设立讲坛,邀请海内外著名学者演讲。承蒙他们的慷慨允许,本卷选登了他们推荐杜维明、王选、余秋雨等教授在岳麓书院的演讲稿。

北京大学举办的“美育精品系列讲座”在社会上引起了强

烈的反响。本卷刊登的著名艺术家谢铁骊、吴冠中的演讲稿就出自北大的“美育精品系列讲座”。此外,北大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还推荐了袁行霈等教授的演讲稿。

此外,还有一些高等学校和学者向我们推荐了稿件。在此,本书编委会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限于本卷栏目的安排和篇幅,部分优秀讲演稿未能在本卷中刊登,我们将陆续在以后各卷中继续选刊。

本书的编辑出版是作为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工作之一,同时本书也是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成果之一,已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与爱护。为确保本书的质量,也为了使更多的人能共享人文讲座这一宝贵资源,本书编委会深信能继续得到各高校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教务处、团委以及人文讲座主持人、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推荐优秀演讲稿。来稿请寄:

430074,湖北省武汉市,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内)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余东升同志收,联系电话:(027)87541724;

或:430074,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夏增民同志收,传真:(027)87547172,电子信箱:jimmyhsia@etang.com。

编 者

2000年5月20日